

# 学术研究

郭沫若題

**Academic Research**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主 编：叶金宝

# 学术研究

(1958 年创刊)

2025 年第 8 期

总第 489 期

出版日期：8 月 20 日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生成与特征

邹广文 林劲博 1

## 哲学

新质生产力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赋能

吴育林 李金霞 8

中国式现代化：一种文明本位的实践新叙事伦理的开启

李建森 袁一达 16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基点”及其内在联系

张卓文 张定鑫 23

### ·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

21 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的四个新特征

黎庶乐 麦炬江 30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伦理思想的重构与超越

马凤阳 37

## 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近代以降岭南音乐家群的代际薪传与艺术贡献

闫骥爽 44

《点石斋画报》与书画传播：以任伯年为中心

陶小军 51

## 政法社会学

### · 健康中国与社会发展 ·

整体协同：仿制药替代的政策分析和治理重构

胡颖廉 陈晔 58

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证成与展开

刘玖林 66

### · 技术与社会 ·

“恐怖谷”抑或“恐惑谷”：概念廓清、理论溯源与价值探讨

曹博林 支冰洁 73

## 经济学 管理学

高龄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再审视

叶初升 韩睿怡 沈曼曼 82

——劳动市场与技术进步双重视角的研究述评

孙震 张可云 92

新时代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决策标准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实践路径及广东经验 史欣向 李善民 101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哲学 gzphil@126.com

经济 gzecon@126.com

政法 gzpol@126.com

历史 gzhist@126.com

文学 gzliter@126.com

## 历史学

“遗忘”与“重塑”：美国二战中缅印战区的战争记忆构建 雷娟利 何肖祎涵 张思齐 **109**

朝鲜王朝“镜城长白山”认识再考辨

——兼论穆克登查边定界前的朝鲜未管控区域

刘 阳 **124**

黑格尔哲学、生成式AI与概率论：历史研究的新工具与新思路

张 涛 **133**

## 文 学 语 言 学

中唐诗人的盛唐诗视域探讨

——以刘禹锡与李白的异时空间叠合为切入点

戴伟华 **142**

文人化的独径：论《聊斋志异》中个人意趣对志怪传统的重塑

王 昕 **153**

日本江户“地本”文化视域下的明清小说绘本出版

吴肖丹 **160**

学术史视野下“戏曲选本”的概念生成与跨学科研究

陈志勇 **169**

英文摘要

**177**

# Academic Research

## CONTENTS

No.8, 2025

---

The Modern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Zou Guangwen and Lin Jinbo	(1)
The Empower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Wu Yulin and Li Jinxia	(8)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Unfolding of a Civilization-Centric Practice and Its New Narrative Ethics	Li Jiansen and Yuan Yida	(16)
Three Foundational Pillar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ir Intrinsic Interconnections	Zhang Zhuowen and Zhang Dingxin	(23)
Four New Features of Capitalist Spatial Formations in the 21 <sup>st</sup> Century	Li Shule and Mai Jujiang	(30)
Marx's Reconstru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Epicurean Ethical Thought	Ma Fengyang	(37)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Artistic Contributions of Lingnan Musicians in Modern China	Yan Jishuang	(44)
Dianshizhai Pictorial and Circulation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ith a Focus on Ren Bonian	Tao Xiaojun	(51)
Holistic Collaboration: Policy Analysis and Governance Restructuring of Generic Drug Substitution in China	Hu Yinglian and Chen Ye	(58)
The Jus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unitive Damages in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or Accessible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Liu Jiulin	(66)
"Horrible" or "Uncanny" Valley: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Theoretical Origins, and Value Reflection	Cao Bolin and Zhi Bingjie	(73)
Revisiting the Employment of Older Workers		
—A Literature Review Based on Dual Perspectives of Labor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Ye Chusheng, Han Ruiyi and Shen Minmin	(82)
Research on the Decision-Making Criteria for Chines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in New Era	Sun Zhen and Zhang Keyun	(92)
The Theory, Implementation and Guangdong's Practic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hi Xinxiang and Li Shanmin	(101)
"Oblivion and Resha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War Memory in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during World War II	Lei Juanli, He Xiaoyihan and Zhang Sigi	(109)
A New Research on the Joseon Dynasty's Cognition of "Kyongsong's Changbai Mountain"	Liu Yang	(124)
Hegelian Philosophy, Generative AI, and Probability Theory: New Tools and Novel Approache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Zhang Tao	(133)
The High Tang Poetic Perspective in Mid-Tang Poets: A Study of the Diachronic Spatial Overlap Between Liu Yuxi and Li Bai	Dai Weihua	(142)
The Literati's Unique Path: On the Reshaping of the Strange Tales Tradition by Personal Interests in <i>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i>	Wang Xin	(153)
The Publication of Eho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ovels in the Context of "Jihon" Culture in Edo Japan	Wu Xiaodan	(160)
The Conceptual Formation of "Drama Anthologi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	Chen Zhiyong	(169)
English Main Abstracts		(177)

---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生成与特征<sup>\*</sup>

邹广文 林劲博

**[摘要]**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历经5000余年文明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根本文化力量，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向前发展中华文化的内在动力。而中华文化在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历经坎坷，完成了兼具历史经纬与时代脉搏的生成过程。中华文化主体性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艰辛探索，经历“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而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从历史传统的生成经历着眼，从现代性的展开过程着手，可以在多个维度深刻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生成与特征，并为中国未来的社会文化发展澄清前提与路向。

**[关键词]**中华文化主体性 中华文化 现代生成

**[中图分类号]** D61；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8-0001-07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sup>①</sup>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的内在核心与根本出发点，中华文化在其历史的实践中紧密围绕主体性而展开。纵观中华文明史，我们发现中华文化并非一盘散沙，而是由其文化价值内核逐步向外延展开的。如中华文明在漫长的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一体”的文化价值诉求，这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并积淀成为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从此出发，中国人既讲儒家的道德伦理与圣人追求，也讲道家的自然观与玄理，还注重佛家的心性论。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曾述及自己的治学经历：早年研读贾谊、陆贽的文章，探讨古今治乱之理；继而阅读《庄子》，及至后来研习佛家经典，深悟佛法真谛，再将佛理与儒道思想相参，学识愈见渊博，辩才无碍。而其文风的嬗变也大体是围绕这样的文化价值诉求而展现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遭受自然灾害，还是遇到王朝更迭，中华文化始终一脉相承，其主体性并未被消解，反而被逐渐雕塑成型，成为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钱穆先生曾提到：“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sup>②</sup>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其核心也就在于其鲜明的文化主体性。

应当注意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先发国家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不仅在物质层面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更在精神层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与价值危机。也正因此，“中华文化在现代应有怎样的定位？中华文化向何处去？”遂成为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最为严峻的课题。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主体性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辩证发展过程——它最初作为民族生存的自然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研究”(24&ZD2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邹广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劲博，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

②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74-75页。

态存在，而后通过知识分子的反思与人民群众的实践，逐渐升华为一种自觉的文化建构力量。显然，这一主体性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中国近代以来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多维度、多向度的探索而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内核与实践指南。

###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生成历程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生成历程，本质上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哲学层面上呈现为黑格尔“正反合”式的辩证运动——从传统主体性的自我肯定（正题），到遭遇西方现代性冲击后的自我否定（反题），再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合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主体性经历了一个“维护—否定—重构”的历史波动，也正是在此嬗变过程中完成了中华民族对文化主体性认知的深化与重构。

1840年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接连入侵中国，逼迫清政府签订多项不平等条约，中国人遭遇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都领先自己的文明冲击。这让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次必须找到全新的救国方案。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知识分子最初的反应是在“体用论”的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如魏源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sup>①</sup>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到：“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sup>②</sup>清末重臣张之洞首次将其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戊戌变法后，时任礼部尚书的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依然支持“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sup>③</sup>其本意都是在维护传统中华文化主体性不变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器物性的实用特点，以期达到救国的目的。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重要“指挥棒”的科举考试，虽然题目有所变化，逐渐吸收现代因素，但依然主要围绕传统儒家经典展开。直到1905年最后一场科举考试“甲辰恩科”时，考试内容分为三科，分别是史论、各国政治以及“四书五经”，而史论和“四书五经”的考试篇幅又远远超过各国政治。这也在思想上充分表明了清政府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对于维护传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态度，并未实际让中华文化主体性纳入新的现代活力源泉。这一不彻底的改良思想体现在清末进行的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改革中，诸多改革措施最终流于表面，如所谓的立宪运动，虽经各方博弈，在1910年终于成立了资政院，但其内阁构成中，内阁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奕劻，13名部院首长中，有6人为宗室子弟，1人为宗室远支，也因此被讽刺为“皇族内阁”，并未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视角来看，“中体西用”这一改良主义思潮本质上是一种试图在不触动封建制度根基的前提下进行局部调整的折衷方案，并未能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清政府接连遭遇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失利，甚至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沦为帝国主义列强角逐的战场。这一系列失败标志着“中体西用”改良路径的彻底破产，也印证了恩格斯关于“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的论断。在政治上，革命党的主张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海外华侨也逐渐倾向于支持革命党，并募集了大量资金，最终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政府与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走进了历史的尘烟。而在思想上，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便对“中体西用”的温和改良的思想提出了质疑，并逐渐演化出了“全盘西化”的极端激进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维新运动者樊锥对改良主义彻底失望，在《湘报》上大声疾呼“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sup>⑤</sup>辛亥革命后，中

① [清]魏源撰：《海国图志》，陈华等点校注释，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页。

② [清]冯桂芬、马建忠：《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郑大华点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4页。

③ 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五，上海：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年，第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4-655页。

⑤ [清]樊锥：《开诚篇三》，《湘报》1898年4月2日第24号。

国并未如愿迅速驶上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而内有袁世凯复辟，外又没能在巴黎和会上取得战胜国应有的待遇，中国的思想界迫不及待地需要一味猛药，而“全盘西化”的思潮也就在此时逐渐形成。1918年，钱玄同提出，“不可不先废汉文”；1929年，胡适提出“全盘西化”，认为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必须“死心塌地”地学习西方；1934年，陈序经再次提出“全盘西化”，认为中国必须彻底西化。“全盘西化”的思潮本质上是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一次巨大冲击，其全然不同于“中体西用”的观点，甚至走向另一极端，要求完全抛弃数千年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这其中虽然表现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心切，但实际上也是在屡遭挫折后中华文化主体性失落的表现。

在探索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塑也开始了全新的历程。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发展规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曾犯过“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机械照搬他国的革命经验，最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随后经过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艰辛探索，逐步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过去的革命经验时曾鲜明地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sup>①</sup>自此之后，“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致胜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最终走向成功。同样的，表现在中华文化主体性上，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sup>②</sup>对传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批评与重塑要彻底，对其的改革要深入，但这绝不是说我们要简单地遗弃历经千年形成的文化主体性，而是要实事求是、科学客观、批判发展地去清理传统中华文化主体性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部分，同时纳入新的文化活水，形成符合现代要求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注入了全新的理论活力，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形成的精神谱系，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也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到了巩固，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全民文化素养不断提升，诸多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充分展现了文化实践本质上是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人物铸就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重建，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兼具民族传统特色与时代革新动力，既保持了自身的民族特质，又获得了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从而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辩证发展。

##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阐释维度

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中国近代以来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实践中逐步转型与更新，并呈现出自身的发展特点。前面我们已经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梳理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生成过程，但还需要从横向的角度剖析理解其发展脉络。

总体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所呈现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既遵循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品格。就一般性的角度而言，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相对比有一定的共性。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人的对象性活动紧密相连，又会不断积累与进化，逐渐形成自身的自我演进与更新的能力。特别是在内化作为主体的人的特点之后则会逐渐形成自身的“主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体性”。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人类的不同社会构成群体与个体都在各自的实践中逐渐展开自身的本质，例如农民在实践中将自身的本质通过劳动展开为农业，而相应地在文化中形成农业文化的一部分，手工业者的本质也如此在文化体系中展开为手工业文化。无论是哪一国的文化，总是遵循“实践—对象化—再实践”的辩证发展逻辑。

而从特殊性的角度探析，中华文化主体性一方面具有中国数千年文化的底蕴，内化其中的儒释道一体与家国天下的观念已为其打上鲜明的底色。自古以来，华夏大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商朝出现甲骨文，周朝拟定礼乐制度，都彰显了这块热土上的人文气息。而在董仲舒谏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华文化主体性呈现出“一元主导，多元互补”的鲜明特征，逐渐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融合道家、佛家等诸多文化元素的发展脉络，形成以家国同构为骨架，融合“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多元文化理念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主体性中既强调个人修养，也主张社会责任，从数千年前的“天下为公”发轫，将个体、家庭、国家与天下紧密相连，已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注入了新的活力。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sup>①</sup>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化解了文化在古今中西之间的对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构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这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与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合一”的精神相契合，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相融通，人类解放理想与中国“天下为公”的理念相呼应，使得中华文化主体性焕发出勃勃生机。

我们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解，还要同时重视其在理论性与实践性上的不同展现。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华文化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从神话思维到理性自觉的演进过程。其向前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的神话故事，周朝的礼乐体系便作为早期的一种文化体系集中展现表达出来，其以体例性的方式形成了外在的规范（礼）与内在的情感（乐）的统一，以来源于人而又外在于人的文化氛围构成了秩序与修养的协调。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表达体系，儒家通过“仁—礼”辩证结构（孔子）、道家通过“道—德”本体论（老子）、法家通过“法—势”权力哲学（韩非）等，共同构建了多元互补的理论谱系。而随着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中华文化理论体系的主干进一步清晰化，在政治、教育、伦理等多个理论维度都展现出自身的特点。之后，儒学为主，佛道融入，中华文化理论体系有了新的提升，有效回应了诸多形而上的人生问题，使其生机与活力进一步展现。宋明以后，理学和心学的兴起更是延展了中华文化理论的思辨性，将个人修养与国家命运有力地结合起来，促成了中国人绵延千年的对己身与家国的重视。

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形成不仅源于理论上的思辨与演进，更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实践，例如周朝礼乐制度诞生的社会背景便是分封制的现实需要，在政治实践中，需要一类新的理论来解释与规定不同类别的人之间的区别，礼乐制度便在实践中逐渐构成了等级规定，明确了不同阶层的行为规范与社会地位，逐渐成形的礼乐制度也促进了社会生活实践，其被推广至各个诸侯国，周朝有力地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地方也有效地得到了中央在农业、冶金业、文艺等诸多领域的保障，从而促成了文化的传播与融合。而礼乐制度走向没落同样是由于社会实践步入了死胡同，即井田制瓦解和封建割据加剧，因此由上至下的礼乐制度也就不再被遵循。在对礼乐制度的反思与升华中，诸子百家都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其中影响中国最为深远的便是孔子从中提炼的“仁”的思想，实现了从“仪式伦理”到“心性伦理”的转变。显然，这种理论重构都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发展规律，即理论既源于对实践问题的反思，又指导新实践的开展。因此，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解要同时从理论性与实践性两个维度去展开，二者相互融合与浸润，理论赋予文化以深度和高度，实践赋予文化以活力和生命力，二者相生

---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

相随，才促成文化主体性的不断丰富与完善。

进一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也以自觉性与自为性的双重路径呈现。自觉性主要体现在主体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反思之中，主体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演进形成自身的本质规定性，其能够在此中感知到自身的本质、地位与特征，对自我之所以为我拥有更深刻的认识，形成“自知之明”，内在于中华文化之中的中国人也正是在世代的传承与叠加中才逐步构建了这种“自知之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sup>①</sup>

中华文化自觉性的形成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首先是先秦时期的“天命”意识，表现为《尚书》“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初步自觉；其次是汉唐时期的“道统”意识，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而形成的历史自觉；最后是宋明以降的“心性”自觉，体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张载）的主体性自觉。同时，文化主体性的延展则表现为自为性。自为性相较于强制性与被动性而言，更加强调主体本身作为活动主人的真正存在，其对自身的发展方向与趋势有着根本的决定权，可以通过自我抉择与自我决断来形成文化上的独特呈现。自为性所指向的是一个文化之所以能保有其特殊性，原因在于其既不被过去的旧有文化所束缚，而同时其又不被外来的文化所支配，文化主体性要求其能够挑选那些适合自身发展的部分，促成自身文化逐渐改善。一个主体必须“作为一个现实的东西、作为一个主体或一种自身转变活动而存在”“自己推动着自己的自身一致性。”<sup>②</sup>自为性强调的是文化主体在现实中进行自我创造与自我实现，在扬弃的过程中超越现实规定性。无论是文化整体还是文化个体，都需葆有中性智慧，对他者文化既不要盲目拒斥也不要全盘接受，而要基于自身独特性的需要，实现文化的更新与超越。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近代的发展中便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两分”式看法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两为”式发展，再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两创”式路径，这种自为地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追求，激活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自我更新与新陈代谢。

中华文化主体性还应从本源性与创新性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主体性立足于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相统一的基础之上，该基础将构建为整体的同一性，由于其重点回答的是“我是谁、我们是谁”的本源问题，赋予了个体的特殊性与整体的归属感，由此才进一步成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元素。中华传统文化肇始于伏羲时期，并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sup>③</sup>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必须植根于这种本来展现，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核心是其本源性的重要基石，其所指向的既是对天即自然的尊重，也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信任，因此，中华文化在本源上便洋溢着积极进取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在顺天应人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奋斗精神与理想主义。而文化的主体性也将促使自身文化拥有平等意识与地位，产生交流意识与互鉴可能。一种文化在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与定位后，应以平等的视角参与对话，这不仅体现在文化的外部交流中，也展现在文化内部的自我反思与创新之中。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实际经历了多次危机与重构，但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或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天下动乱，抑或是近代的百年屈辱史，作为民族脊梁的一代代中国人绝不会因一时一地的失败而数典忘祖、轻易放弃文化本体，正如钱穆先生所言：“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掺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合和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sup>④</sup>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便是强调对内的反思自省与对外的包容接纳，通过循环往复的积累与更新实现中华文化的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善于从历史与现实中共同吸收闪光之处，既坚持自身的本来特征，又不断锐意进取，如此才能够从昨天走到今天，也一定能够从今天走向明天。

① 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47页。

②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4年，第30页。

④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51-152页。

###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未来指向

中华文化主体性伴随着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发展而走向重构，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成为中华文明更新与演进的必由之路。中华文明在历史的新形势下能否守正创新？如何与时俱进？这无疑是中华民族能否真正拥有未来的时代之问。

第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要以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基因与活力，使中国在不断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一结合具有三重理论意涵：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引；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标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文化土壤；其三，二者的创造性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论基础。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一种分析中华文化主体性发展的历史方法论，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能够深入揭示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之间的本质关联。具体而言，中国近代以来文化主体性所遭遇的危机，其根源在于当时落后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一分析视角能够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理解中华文化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路径。其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其核心在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揭示事物发展中的复杂联系。这一思想在毛泽东的《矛盾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辩证法要求从具体问题出发，展开具体分析，从而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而后，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人的解放”，更始终关注最广大的无产阶级以及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本质上是全体人民共同创造与享有的精神财富。最后，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的根本出发点，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理论的锐意进取，更在于实践的不断演进。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构建过程中，文化实践是其落地的关键环节。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制定科学的文化政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及普及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实践探索，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中华文化才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

第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发展与巩固，必须在传承的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历经岁月磨炼而至今日，若要避免成为博物馆中的化石，就必须重新焕发时代的生命力。首先，在这一过程中，现代科技的应用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中国传统的文物与古籍需要主动拥抱现代科技的浪潮。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新技术手段，不仅可以更好地保存文物，避免物理损害，还能延展传播路径，拓宽传播范围。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在传统的单向传导基础上增添了互动体验的方式。例如，近年来各大博物馆相继上线各类数字化项目，将宝贵藏品与古代建筑以三维立体的方式呈现，使观众得以在虚拟环境中漫步历史，直观感受传统文化的厚重与瑰丽。这种数字化实践印证了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提出的“拟像”理论：数字技术创造的虚拟文化空间并非对原物的简单复制，而是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化体验方式。其次，传统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应当与现代艺术相结合，使文化产品既具有传统底蕴的厚度，又拥抱现代活力的宽度。近年来，诸多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被融入电影、电视剧与音乐舞蹈当中，形成“国潮”新时尚，例如，《哪吒 2》的票房一路走高，接连刷新影史诸多记录，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充分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依然保有旺盛的生命力。此外，如京剧这类传统艺术形式也开始逐步创造新的具有时代元素的剧本，以现代京剧《弄潮》为例，该剧不仅利用了诸多现代舞台技术，还将剧本设定聚焦在当下工业领域，从贴近生活的角度入手，引发民众共鸣，使民众更愿意接受这些艺术形式。这种创新实践印证了德国学者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的论断：传统艺术形式可以通过技术媒介获得新的生命力。最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还需要注重教育功能的发挥。在传承过程中，应当构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立体化体系。具体而言，各级大中小学正逐步开设各项传统文化课程，社会教育也在拓展传统文化讲座、展览等宣传方式，而家庭教育也

逐渐表现出对孩子传统文化素养培养的重视。这种多层次的教育实践，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中华文化主体性应始终展现包容性与创造性。这种包容性与创造性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首先，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拥有“和而不同”的包容传统。在个体层面，传统文化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整体层面，中华文化也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与其他文明展开交流互鉴。自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中国便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的变化，中华文化也因此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其次，在全球化语境下，这种包容性与创造性具有新的时代内涵：一方面要避免文化相对主义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另一方面要抵制文化霸权主义造成的单一性危机，通过文化交流实现文明互鉴。艺术领域的跨文化实践为理解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典型案例。以绘画为例，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在传统上走在表现与再现的不同道路上，由此形成了差异与多元性，中国画注重意境与情感的抒发，而西方画注重现实与神态的描绘，在交流中，中国画也可以进一步融入西方绘画的光影效果与色彩层次，使画面更具有立体感与现实感，从而将中国绘画的意境与韵味表现得更加充分。这种融合强调的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包容并不是简单的迁移或无原则的融入，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对话。它要求在中华文化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对外来文化敞开怀抱。中华文化应当在与世界文化的互动中，始终保持自身的主体性，既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也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与此同时，文化主体性的向前发展需要以创造性为核心动力。抱残守缺从不是发展正途，传统文化的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制与模仿，而是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其新的内涵与形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文化需要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与碰撞中，注重文化价值的当代重构，重新定位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诸多核心思想在当代可以有新的应用场域与表现路径，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思想，可以为全球生态治理、跨文化交流等当代议题提供独特的智慧与解决方案。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不仅能够在全球化语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为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提供坚实的价值基础。

中华文化主体性既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体现，也是文化生命体的本真属性。其现代生成过程历经沧桑与险阻，这一过程不仅伴随着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发掘与阐释，也促使中华传统文化的身份与价值在现代化与全球化浪潮中不断进行反思与重构。首先，在面对时代问题时，中华文化主体性既坚守与传承了自身文化传统，也在复杂的历史境遇下，通过吸收与融合外来文化实现自我调适与创新。其次，站在时代的岔路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生成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如何在保有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实现与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另一方面，如何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平衡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此外，如何在数字化时代中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与传承，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生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程，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长征。其来路艰险，其去路漫长。然而，正是历史的沉淀与创新的驱动，将真正促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屹立不倒，并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贡献独特的智慧与力量。

责任编辑：王冰

# 新质生产力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赋能 \*

吴育林 李金霞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把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际相结合，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重大论断。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新科技革命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赋能作用。新质生产力发展夯实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仅通过赋能社会治理主体功能的协同化、社会治理客体状况把握的整体化和社会治理平台的智识化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而且通过赋智时代新的治理思路、赋权社会新的治理机制和赋能政府新的治理方式等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中国式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 赋能

〔中图分类号〕F042.2; D0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8-0008-08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既是生产力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社会治理演进史。生产力理论构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国现代化跃升新台阶发展动力的需要，把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际相结合，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重大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sup>①</sup>所以，“要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sup>②</sup>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构成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治理是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与生产力具有内在的逻辑契合性。生产力是社会治理形态的最终生成基础，社会治理对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或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不仅能够助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而且能够通过赋智时代新的治理思路、赋权社会新的治理机制和赋能政府新的治理方式等，提供社会治理现代化新的实践途径，实现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赋能。

## 一、新质生产力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契合

以“数字”等新兴技术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直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命题，也是倒逼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改革命题。新质生产力将夯实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社会制度及其运作机制的保障，构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质生产力对唯物史观生产力的创新发展研究”(24BK506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育林，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金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275)。

①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86页。

## （一）生产力与社会治理的内聚关系

首先，生产力与社会治理之间是一种相互结合的内聚性关系。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sup>①</sup>随后，马克思又明确提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般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sup>②</sup>人类社会是一个巨系统，包含许多要素，各要素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其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层次、社会关系和发展的基本动力。而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法律、政策、制度等手段，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服务的过程，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实施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政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社会治理问题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属于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依赖于一定的生产力基础，又反映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秩序保障。

其次，生产力发展是社会治理变革的根本动因。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社会治理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的内聚性。生产力是社会有机体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也是决定社会治理状态和推动社会治理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变革始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变迁，逐渐对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全方位影响，最终推动上层建筑变革，从而引起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sup>③</sup>这种结果深深地内嵌于人类历史变迁过程中。例如，欧洲社会从封建领主时代到现代资本主义及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治理形态演进史，无不深刻反映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生产力发展印迹及其对社会结构的重大影响。正是工业、信息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质的发展，推动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结构、分配机制、组织方式等生产关系要素的深刻重塑，继而促进了社会治理理念、策略及实践方式的不断革新。

最后，社会治理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不仅是一种技术构成，也是一种社会构成。生产力既受到诸如劳动者素质、生产工具、设备、工艺流程等方面的影响，又受到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如劳动力的组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政府政策、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和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如果说生产力的技术构成决定了生产力的可能性水平，那么，以生产关系为核心内容并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关系则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现实性状况。所以马克思强调，研究生产必须研究“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sup>④</sup>而“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sup>⑤</sup>生产力必须表现为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共同活动的方式必然是有组织的社会管理中的活动，它既包括劳动单位内部的生产管理，也包括整个社会的组织管理，以实现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利益分配和社会秩序等关系。

## （二）新质生产力发展夯实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使社会治理成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对人力、物力、财力、组织等要素投入有着巨大需求，而且需要借助于新的科技手段形成新的治理形式。以“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为基本技术特征的新质生产力，通过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的迭代升级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催生新兴产业和创新动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增长。而这种高质量发展聚集的强大经济实力也为社会治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2-533页。

理技术与手段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

首先，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进步推动劳动生产过程智能化，提升劳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治理效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所推进的科技进步和孕育的新兴经济、新型业态，能够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劳动时长，减轻劳动强度，创造高质量的工作岗位，增加劳动者劳动过程的智能感和快乐感，激发劳动者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合作性、自律性等主体性品质，极大地减少劳动生产过程中“人际”和“人机”关系运行的内耗，形成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内驱性”社会治理效能。

其次，新质生产力推动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夯实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物质基础。社会治理的物质基础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这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石；也包括充足的财政收入支撑，它是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福利进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保障；还包括有力的国家储备，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物质基础，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和保障市场供应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新质生产力内蕴的科技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动能在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同时，还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国家储备的体系与结构，为更好地进行社会建设、构建优质民生工程、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创造雄厚的物质条件。

最后，新质生产力驱动的数字技术革命为构建社会治理良性互动架构奠定技术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sup>①</sup>有效实现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需要更加迅捷的信息渠道精准对接多样的社会需求和把握各种复杂的治理动向。而当前人工智能、5G/6G 移动通信、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正通过技术赋能重塑社会治理的底层逻辑。其在技术层面构建了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网络系统，在数据层面实现了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与优化配置，在应用层面形成了精准化、场景化与可持续的治理服务生态，从而搭建起政府智能决策系统、社会组织协同平台、公民数字参与通道的三元耦合架构，在治理秩序稳定性和社会创新活跃度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为社会治理良性互动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 （三）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运行机制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sup>②</sup>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的全新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推进了相关政策法律和管理服务的现代化改进，但也需要国家政策引导、法律规约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机制保障。

首先，社会治理现代化营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优良社会生态。新质生产力发展本质上是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优化组合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构建适配的生产关系和治理模式。现代化发展史表明，社会治理水平高低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环境，关系着发展动能能否充分释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协同创新的文化氛围，既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将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沃土”。

其次，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质生产力的有机构成。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它不是传统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对人力、资本、物资、技术、数据等要素资源的深层次优化和提升。这一概念深刻反映了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的生产力质变与结构升级，其发展依靠科技创新、产业转型与人才优化，并通过市场化、法治化与智能化重构要素配置，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与治理体系。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可以通过法律、制度和政策等上层建筑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而且能够通过协调各种资源形成整合力，通过各种机制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形成引导力，通过规范行为保障有序的生产活动形成规范力，通过促进人才培育提升整体素质形成开发力等，使社会治理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有机构成或制度生产力。

最后，社会治理现代化规约新质生产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价值目标。社会治理作为管理冲突、化解矛盾的上层建筑，包括治理思想、治理制度、治理机制，它内在地包含了推进新质生产力发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8-39页。

<sup>②</sup>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展的价值目标指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sup>①</sup>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构成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目标约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体制性改革举措属于上层建筑变革范畴，构成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这些制度创新既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又确保其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主体性价值目标。

##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正深刻影响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数字化、智能化核心技术在社会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使治理主体更加协同、治理客体更易整体把握和治理平台更加智识化，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主体功能协同化

现代化发展重塑了经济社会结构和民众生活方式，社会利益格局渐趋多元，民众参与意识显著提高，催生了社会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协同共建的治理需求。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sup>②</sup>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sup>③</sup>这就强调要充分运用新兴技术的支撑作用，促进社会沟通与共识凝聚，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以科技创新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这些顶层设计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擘画了主体功能协同的科学蓝图。

首先，新质生产力数字信息化技术助力凝聚社会共识。现代社会治理主体涵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方责任共同体，各主体在社会治理核心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是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基础。信息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其共享程度直接影响多元协同与共识形成的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sup>④</sup>推动治理信息共享，不仅需要健全信息公开制度与跨部门联动机制，更离不开信息技术的赋能。依托数字信息技术的政务平台具有覆盖广、便捷性强、传播多向等优势，能够大幅提升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效率，促进跨部门、跨领域数据互通与协同决策，使政府内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联动，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与所有相关主体有效沟通和无缝对接，从而增强社会共识凝聚，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其次，新质生产力促进治理主体的治理行动协调。在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治理主体呈现出显著的弥散化发展趋势，表现出多层级治理网络、全域空间分布与多重运行机制等特征。要实现复杂多极治理主体行动的有效协同，除了需要法定的职能确权，如确立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强化政府在社会公共资源管理、公共服务供给以及主体培育监管等方面的职责，激发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外，更需要建立高效的执行协同机制。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统筹推进信息化手段在乡村振兴、城市运行、医疗、养老、环保等领域的集成应用，能够有效破解治理主体间的信息壁垒、行动迟滞、职能交叉等问题，推动社会各治理主体之间实现无碍互动与畅通协作，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

最后，新质生产力激发治理主体参与的积极主动性。人是生产力中的主导因素，也是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因素。“人人有责”的社会治理理念，本质上是要求社会成员增强治理自觉性，具备参与合作共治

<sup>①</sup>《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页。

<sup>②</sup>《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sup>③</sup>《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44-45页。

<sup>④</sup>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0页。

的意愿、责任意识和能力。要实现全社会各方主体尤其是广大普通民众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必须着力构建公众参与的平台和载体，拓宽表达渠道，完善参与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公众参与的主人翁精神。而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运用，突破了传统治理在时空、技术和信息上的壁垒，极大赋能了治理主体参与的便利性和可操作性，进而有效增强了各类治理主体的社会治理热情。

##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客体把握整体化

社会治理客体是指社会治理主体的行为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即“治理什么”，包括国家、社会、政府、社区等，还有公共事务或具体事务。<sup>①</sup>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弥散化、智能化技术为治理主体从整体上精准化掌握治理客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首先，新质生产力提升社会治理问题的整体把握。社会治理问题是一个具有多层次性和动态性的系统，涉及家庭、社区、城市、网络空间等物理或虚拟空间，以及公共服务、收入分配、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各种民生问题。及时掌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民众的生活状况、矛盾隐患和突发事件等信息，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础。这既需要充足的物资保障和高效严密的组织体系，也依赖系统化的数据采集、存储及动态趋势分析，以全面把握治理对象的特征，深入剖析问题成因及影响机制，进而制定科学可行的治理策略。新质生产力驱动的信息技术体系是解决这些难题的有力支撑。大数据凭借其强大的关联分析和预测能力，能够深度挖掘多源异构数据中隐含的复杂关联规律，实现对社情民意的全天候监测与社会运行态势的多维感知。这种技术赋能使治理主体能够构建全域互联的数据网络，形成更深层次的社会认知图景，达成对治理问题的全景式把握。

其次，新质生产力助力治理对象的精准化。社会治理的对象是高度复杂的社会综合体，在人群方面，涵盖孤儿、事实孤儿、精神病患者、服刑人员、大病患者、失能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在事务治理方面，涉及社会秩序、公共安全、民生问题、社会矛盾、环境资源等领域。从社会脆弱性理论来看，家庭结构解体、情感支持缺失或监护功能弱化的人群普遍面临教育与基本生存保障不足等问题，其累积的生存压力若得不到有效缓解，极易诱发公共舆情。而通过精准帮扶可以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障失能残疾人人群的基本生活，促进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新质生产力推动的算力革命能够凭借数据分析精准识别特殊群体的需求，预判舆情响应的精准方向，实时监测公共安全、社区安全、民生及矛盾问题，提升政府科学决策机制和资源配置效率，显著增强政府及相关治理主体对治理对象的把握力和响应力。

最后，新质生产力提升社会矛盾化解机制适配化。构建契合不同层级和区域的矛盾化解机制，是有效治理社会的重要环节。社会治理矛盾化解机制包括信访制度、多元调解体系、社会心理干预等。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信访接待—法律研判—分类交办”三级响应机制，确保涉法涉诉事项依法导入司法程序，普通信访问题按职责分流办理。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在保障这一流程机制高效运转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全媒介普法矩阵和前端甄别机制，提升群众对“诉访分离”“司法终结”等制度的认知度；借助智能化手段实现诉求智能分类、责任精准指派，形成闭环管理。在创新维权服务模式方面，线上平台构建起集法律咨询、劳动争议调解、法律援助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确保24小时服务畅通，实现矛盾纠纷的快速处理和有效化解。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将更加深嵌于社会治理的矛盾化解机制构建中，使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能够及时适应社会治理问题与对象的变化和要求。

##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平台智识化

社会治理平台是指利用一定的信息技术，充分整合社会治理资源，构建集信息收集、处理、发布和反馈于一体的系统，以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现代社会治理平台的高度智识化与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为技术核心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

第一，新质生产力助力智识化社会治理平台的建造。与传统数字治理方式不同，现代社会治理平台不仅实现了治理要素的数字化，更通过建构数字化治理中枢系统实现对社会风险演化趋势的智能研判和

<sup>①</sup> 参见杨立华：《人民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的共同本质》，《学海》2021年第2期。

协同处置。这种新型治理方式具备精准识别、智慧化算法决策与自动化执行响应等功能，有效克服了传统治理中存在的滞后性、大水漫灌式、参与窄化等缺陷，推动社会治理效能完成范式跃升。当前，依托分布式算力网络、大数据资源池与智识分析模型，新一代社会治理平台正加速涌现。我国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已建成多种类型的智识化治理平台：如“城市大脑”等区域管理与应急指挥的基础设施平台，“一卡通办”等民生保障与政策畅达的政务平台，“社区议事圈”“物业报到”等社会动员与民心凝聚的服务平台，“一网统管”等社会救助与资源整合的共享平台等。这些平台的建设和应用，形成了精准对接群众诉求与公共关切的多元渠道和创新方式，显著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整体水平。

第二，新质生产力推动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智识治理氛围的形成。智识治理平台的搭建实现了治理过程的范式革新，降低了治理成本，提升了治理精度，将治理服务的最小单位从传统的社区/街道细化至个人/企业，建造起多方协同的治理网络。这一转变既有效整合了不同社会主体的治理优势，又大幅提升了民意吸纳效率与政策认同度，畅通了公众参与治理的表达渠道，为打造良性互动的多元共治系统创设了条件。从个体层面看，人机协同机制通过技术与社会需求的有机耦合效应强化了公众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群众满意度与幸福指数显著提高。从组织层面看，企业、社会团体以及各行各业不同利益群体的深度参与催生了智能协同的新型治理方式，衍生出“平台型社会组织”“算法驱动的虚拟治理联盟”等更具适应性的柔性治理形态。这些创新实践不仅推动了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实质性建构，更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转化为制度性成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

###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思路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治理现代化创新，要求“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sup>①</sup>实现治理现代化转型。新质生产力的数字信息智能技术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广泛运用，具有强大的治理赋能效应，能够推动社会治理形成新的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治理理念、机制和方式。

#### （一）新质生产力赋智时代社会治理新理念

新质生产力标志着数智时代的到来，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力革命”。在数智时代里，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交往和社会治理都深度嵌入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sup>②</sup>万物智能互联时代将重塑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促进社会治理实践完成由政治叙事主导的宏观治理向更为深广细致的日常生活领域治理的范式转换。

首先，赋能社会治理的源头预防。赋智时代是软件与网络、数据、硬件、内容深度结合，且具备智能思考与自我创造能力的时代。智能技术的深度嵌入，为源头治理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随着数据、算法、算力储备的全面提升，借助智能社会模拟器，可以实现对社会全要素的模拟和监测，助力政策制定者优化决策。具体而言，利用社会模拟器对拟出台政策进行模拟，可以预测其在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影响；通过模拟各类灾害、危机情境，测试应急响应机制的有效性，可在治理中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对复杂事件的能力；对城市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人口流动等进行模拟，则能优化城市规划方案，提升城市管理效率。

其次，催世人本社会治理理念。“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sup>③</sup>新质生产力的改革实践深度契合我国产业现代化演进的历史逻辑，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需要，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创新运动。这一过程通过充分调动和激发一切有价值因素的创新潜质，持续释放生产力跃升的深层潜能，重塑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为社会全体成员开辟新的发展机遇与成长空间，加速实现马克思曾预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sup>④</sup>随着物质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5页。

<sup>②</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96-197页。

<sup>③</sup>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00页。

条件的持续改善，高质量发展在满足人们安居、教育、医疗、交通等各领域的智慧化生存需求的同时，更为定制化、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与广阔的选择空间。这种发展将进一步提升民众的主体意识与精神品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现实条件，使社会治理真正回归人本价值。

最后，激发人民主体性精神。新质生产力改革成效为培育民主、平等、法治、正义等现代理性精神创造真正的孕生器皿，促使民众在更深的文化认知层面完成治理主体性的现代重塑，于价值共识与自主参与的有机耦合中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而“人们结成的共同体要比社会强大得多，也更富有生命力。共同体是持久的、真实的共同生活，……共同体本身应当被理解成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sup>①</sup>唯有在高度凝聚的意识共同体中才能真正激发人民主体性，才能经由日常生活场域的具体参与实践满足民众的真实社会需求，使社会治理既体现工具理性又彰显价值理性，最终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现代治理体系。与此同时，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思维和治理理念，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和相互之间配合协作能力的提升，降低了普通民众参与治理的门槛，培育出社会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和前瞻意识。而这种变革有助于内在地激发各治理主体对秩序和谐的追求，进而推动形成强大而持久的治理内生动力，展现出非凡的治理韧性。

## （二）新质生产力赋权社会治理新机制

“赋权是整个社会质量概念的中心”，<sup>②</sup>现代治理理念强调构建涵盖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其核心在于充分认知并激发社会内生力量，通过赋权与角色重构实现协同共治。现阶段，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sup>③</sup>民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社会共治系统日益完善。新质生产力的深入推进将持续为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催化形成新的治理机制与格局。

第一，新质生产力发展为释放多元微治理能量提供了重要机遇。新质生产力是通过技术—要素—制度三维重构实现生产方式跃迁的发展手段，其培育依赖多主体协同、多层次联动的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构建国家主导下创新链、产业链与资金链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这在国家层面应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枢纽，建设基础研究与交叉学科重点实验室，完善“学科—产业”双螺旋创新机制，在创新基础优越地区布局国家级示范区，打造“核心突破—区域辐射”的多级科研网络；在企业层面需激发其作为市场主体的创新动能优势，实施创新要素定向集聚政策，通过国企民企协同、大中小企业融通培育创新规模效应，重点激活“专精特新”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力；在个体层面要健全科研人员权益分享和评价体系，探索建立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政策支撑体系，鼓励敢闯会创的年轻群体组建创业团队与联盟等。这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必然推动制度创新和政策优化，形成协作共赢的治理模式，激发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的微治理潜能，最终构建高效灵活、良性自主的“研产一体化”治理体系。

第二，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治理权有序有效下沉提供了技术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sup>④</sup>要不断“推动管理重心下移，把经常性具体服务和管理职责落下去，把人财物和权责利对称下沉到基层”。<sup>⑤</sup>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解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问题，其涉及面广，内容庞杂。新质生产力的推广应用，如区块链、AI技术使行政指令跨层级高效流转，政务APP、社区智能终端使政策精准直达基层，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与3D打印技术提升了基层调配公共资源的能力，移动互联网搭建的线上议事平台则打通了干群互动的“最后一公里”等。这些创新路径通过技术穿透与治理资源重构降低了权力运行的科层依赖，提高了信

<sup>①</sup>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71页。

<sup>②</sup> [荷]劳伦·范德蒙森、[英]艾伦·沃克：《社会质量——从理论到指标》，冯希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64页。

<sup>③</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第134页。

<sup>④</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第127页。

<sup>⑤</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第129页。

息对称性与可及性，推动了社会治理的均等化发展。此外，包括骑手自治联盟、开源社区等微观社会单元的兴起亦催生了多元化的非科层治理主体，为倒逼行政权的合理让渡与酌情下放，构建“智慧联动、技术对接、点面一体”的社会治理新机制创设了条件。

###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政府社会治理新方式

随着以大数据、元宇宙、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纵深推进，“在政府的形态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即从工业化的‘物理空间’的政府形态向大数据时代的‘数字空间’的政府形态转型”。<sup>①</sup>智能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渗透，深刻改写了政府的整个治理生态和职能结构，使其运作方式渐趋智能化、精细化和公开化。

首先，助力政府社会治理手段智能化。由新质生产力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深刻重塑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运行模式，催生更具包容性的创新发展生态。这一变革促使政府治理模式从传统的分散型、经验型、防空型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敏捷治理转变。而由算力加持的智能电子设备、政务数据库、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手段的广泛应用，也为政府治理突破传统的由行政审批到执行的单一化固定思维，跃升为复合型智能化治理提供了坚实基础。具体而言，“城市大脑”建设中的数字孪生应用、政社数据融合等智慧场景，正是政府治理智能化的典型体现和实践成果。

其次，实现政府社会治理工作精细化。马克思关于“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sup>②</sup>的论断，深刻揭示了数学方法对实现治理精细化的关键价值。作为数学科学、计算机科学和电子信息科学的综合成果，云计算与智能信息技术为治理精细化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依托数据这一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通过海量数据自动挖掘、多源异构数据整合、智能分析预测、人机协同处理等技术手段，政府能够重构政务管理体系，形成“用数据对话、决策、服务、创新”的现代数字政府。如利用5G/6G通信、物联网与智能传感器等技术，政府能够实时地将纷繁复杂的民众需求转换为即时响应、可观测的社会治理资源，再借助大数据分析与信息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孤岛，以此盘活数据资产，助力政府科学施策，形成纵向的链条式分工治理与横向的扁平式协同治理相统一的治理系统，实现治理的高效能与精准化。

最后，推进政府社会治理流程公开化。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深刻指出：“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使自己“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sup>③</sup>是巴黎公社作为工人阶级政府的重要特征和广大工人群众随时监督政府的重要措施，它对遏制权力异化具有关键作用。而由新质生产力技术构建的数字化治理则为实现政务公开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路径：一是通过对公共服务的进展与效果进行全流程监管，建立问题快速诊断与预防机制，实现政府工作可视化评估；二是依托数字服务交付优化办事流程，运用数据驱动决策精准配置资源，借助开放数据平台促进信息公开与共享，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推动政务自动化；三是重点建设国家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完善电子证照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政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这些创新实践不仅提升了治理透明度与公信力，更推动监督范式从事后监督向全过程监督转变，有效压缩权力弹性空间，从技术层面构建起规范用权的制度屏障，为营造开放、透明、规范的政府治理生态提供了现实方案。

责任编辑：罗 萍

<sup>①</sup>米加宁、章昌平、李大宇等：《“数字空间”政府及其研究纲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致的政府形态变革》，《公共管理学报》2020年第1期。

<sup>②</sup>转引自[法]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sup>③</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4、196页。

# 中国式现代化：一种文明本位的实践新叙事伦理的开启<sup>\*</sup>

李建森 袁一达

**[摘要]**西方社会现代化模式是以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三重疏离为特征的，是以“冲突的伦理”“不平等的伦理”“非正义性的伦理”和“异化性生存伦理”为其伦理文化和道德价值根基的，因此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风险、动荡与冲突，以及愈演愈烈的伦理生活普遍失序和道德生活信念被解构的境况。中国式现代化依托优良的先进制度的优势，立足于人类伦理文化、伦理实践与伦理生活，着眼于合理形态的实践—制度—文化伦理构成，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意识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文明新路。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伦理创序 道德价值观 文明正当性

**[中图分类号]** B82-02;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8-0016-07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自始至终面临着启蒙现代性伦理文化和道德价值难题的深刻挑战。启蒙现代性理念支配下的西方社会现代化实践，推崇的是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以及财富最大化的强势群体的优势性生存通则，从而导致世界的意志和逻辑，只适应、满足了极小一部分群体的需要和愿望，其本质上是文明悖反性意义上的非伦理和反伦理。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sup>①</sup>立足于文化现代性辩证重建的视野和文明价值本位的高度，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从根本上与西方现代化的有关实践伦理新类型、文明辩证法新逻辑、人类道德新生活的典范性创制和超越性智慧。

## 一、启蒙现代性观念支配下的西方现代化伦理叙事的内在悖谬

现代性的理论叙事以及现代化的西方实践，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伦理理念内在冲突和道德价值自证逻辑之自相悖反。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

<sup>\*</sup>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资助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意义研究”(20&ZD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建森，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710127）；袁一达，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陕西 西安，710055）。

①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求是》2025年第1期。

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sup>①</sup>在财产私人占有的制度下，“资本文明”形塑、资本逻辑引领的现代化，追求的是资本主义伦理和道德价值，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社会伦理观念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土壤。受财产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逻辑主宰的社会生活所驱使，对人自身生存利益、财富最大化以及享乐主义的追求，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风尚。换言之，在这一社会形态中，“利益”取代了“伦理”，“财富最大化”僭越了“德性风尚”，个人价值相对于社会公共价值而言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实践及其所创生的新的伦理生活规制和范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向来持肯定、赞赏的态度。但是，值得警惕的是，表面上似乎愈来愈完善的市场化社会中，也会有这一体制的设计者和实践者之价值理性不及之处。这一点，只要回顾西方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实践的道德理性亏空及公共价值透支等现象，就不难得以证明。自亚当·斯密 1776 年出版《国富论》以来，有关市场经济制度优劣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市场拥护者主要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证明市场的优越性，把道德制高点留给了市场批评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式原本承载、承诺着一种有别于前现代文明的新的文明价值观念，“理性经济人假设”背后所追求、所表征的是现代个体的自主性范式。与“市场化”的个体利益本位和无休止的财富最大化行为不同，即使是完全市场化社会中的“道德”，其所具有、所推崇以及在交换实践中不断积累的内在价值（公平、诚信、良心等），依然具有独一无二和无比珍贵的重要性，而商品交换原则对于道德价值的侵入和渗透，其结果是悲剧性和灾难性的。

很显然，伦理文化关注的是人类历史、制度以及生存与生活的总体性，而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观所关注的，则是人类生存与生活方式的正当性之所以可能的深厚根基。被全面、正确理解了的伦理生活，是优良人性品质、崇高人生境界和高尚人格特质的淬炼，是对人类之为人类、文明之为文明的尊严的捍卫与守护。与此相比，市场社会的经济生活只是人为了实现伦理化生存的手段。市场化社会中屡屡发生的舍本逐末现象，直接根源就在于错置了经济和道德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伦理、道德在更高层次上指向作为人类最高价值的自由，个体之所以要接受、认同优良伦理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教化、熏陶，是为了使其依托规范，协调、掌控业已失调的身心，理解、体验全面发展的真义。

当代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指出，经历了启蒙现代性文化与价值观念的熏陶与规制，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世界无比丰富多彩。现代性尽管为自己确立了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轻易撼动的牢固根基，但是在精神生活、道德文化领域，如此理智、文明的人类却明显缺少充分的自信，从而需要对于自己何以如此存在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sup>②</sup>实用主义的倡导者威廉·詹姆斯认为，“如果一个人信念上反复无常，对待现实在其经验中呈现的秩序傲慢不恭，他就必遭不幸：这些信念将诱导他一无所成，或者只得出些虚假的联系。”<sup>③</sup>查尔斯·泰勒指出，启蒙运动“把人看做是独立于每一个他者的个体；但是它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视而不见。……所以，启蒙运动也仅仅看到了包围着我们世界的外在的个别的客体；它也没有把世界看做一个由上帝、精神或理性设置的秩序。”<sup>④</sup>

启蒙现代性观念主导和支配的西方现代化，就其核心伦理文化和价值观念而言，是以强调“最大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80 页。

② [ 波 ] 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年，第 193 页。

③ [ 美 ] 约瑟夫·P·德马科、理查德·M·福克斯编：《现代世界伦理学新趋向》，石毓彬、廖申白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年，第 152 页。

④ [ 加拿大 ] 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年，第 616 页。

数人利益最大化”为通则的功利主义。这样的伦理文化形态由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等奠基，其本质上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逐利本性和财富最大化逻辑之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作辩护。功利主义伦理文化在其现实化的过程中遭遇了许多理论难题和实践困境。它不仅仅全面颠覆了传统的伦理范式，而且试图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构一种适合于资本主义新世界的新的伦理。功利主义伦理文化所反映、所代表的是西方工业文明的理念，分离、对抗、孤立、原子化、离散性等，是其借以表征正当性的实质话语；其本质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抽象自由个人主义；其现实指向则是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是现代性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现实化。<sup>①</sup>西方社会现代化始终伴随着新的伦理价值观的产生、伦理实践方式的探索以及伦理文化形态的创造过程。没有优良的伦理文化奠基，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实践就会迷失方向，其所造就的就是“专家没有灵魂”与“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畸形道德存在者。西方社会现代化对人类发展进步新伦理的塑造，依照、遵循和服从的是资本的逻辑、财富无穷增值的逻辑以及自由个人主义世俗享乐的逻辑，产生并持续地承受着深刻的“反理性效应”及其后果。

## 二、澄清人类伦理文化的真实：确当性意义的道德价值本真叙事逻辑的生成

伦理从来不曾缺场或者退场，它一直在场。那么，伦理对于现代社会意味着什么？与现代化实践相适应的伦理文化范型和道德价值观念是什么？现代化证成了何种伦理，生成了何种新的伦理？这样的问题近乎常识，但是回答起来却实属不易。

### （一）宏大叙事的强势在场：真实的伦理主题的非明晰化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明确规定了伦理问题之思的最高主题和主旨“善”。依麦金泰尔之见，基于人性目的论的善才是真正的善：“每一种活动、每一种探究、每一种实践都旨在某种善；因为我们用‘善’来意指那种为人类本性所趋的目的。……人类，和所有其他物种的成员一样，有一种特殊的本性；这一本性决定了他们具有某些目的或目标，使他们自然地趋赴于一种特殊的目的（telos）。善就是基于他们的独有的特征来界定的。”<sup>②</sup>“善”本体论规制下的对良善生活信念的坚持和“良善生活”秩序的寻求，对足以承载和践行这一理想形态的伦理生活形态之道德主体的品格塑造，是古今伦理实践的基本目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善’是这样一些品质，拥有它们就会使一个人获得幸福（eudaimonia），缺少它们就会妨碍他达到这个目的（telos）。”<sup>③</sup>

现代社会伦理文明建设的最大难题表现为，由于自由个人主义伦理文化和道德意识形态的强大规约，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生活准则，几乎完全是功利主义、个体主义以及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被错误的道德理想误导了的道德个体，不承认有所谓普遍意义的道德本体、终极性的道德目标以及统一性的道德信念，从而使人们的道德生活陷入多元化、差异化和异质化的窘境。威廉·詹姆斯对此做了深刻剖析：“如果按实用主义来解释，多元论或承认多样化的学说，仅仅意味着现实的各个部分可能是外在地相互联系的。按照多元论观点，你能设想的任何事物，无论是多么广大、蕴涵多么丰富，都有某种数量的‘外部的’环境。事物是以许多方式相互‘与在’（are ‘with’ one another）的，没有任何事物能包含或支配一切事物。‘和’（and）这个词总在每个句子中出现。某些东西却总不在句子中出现。‘永不彻底’（ever not quite）这个短语必须这样来解释，它是在宇宙的某处做出的试图囊括一切的最佳努力。”<sup>④</sup>

① 现代性伦理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的特点和实质，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内容：（1）现代性伦理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的立足点，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市民资产阶级个人利益的最大化；（2）现代性伦理文化和道德价值之制度化实践的结果，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赖以存在的共同体的割裂、背弃与严重疏离，是道德生活主体的原子化和无根性生存；（3）受狭隘的工具理性支配，现代性伦理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所造就的是生活世界的遗忘；（4）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伦理，给整个世界带来了风险、动荡和非确定性。

② [美]A.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66-167页。

③ [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④ [美]约瑟夫·P·德马科、理查德·M·福克斯编：《现代世界伦理学新趋向》，第160页。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道德生活处在复杂性情境之中，遭遇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以及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的冲击，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中国思想文化持续地经历着严重的道德资源的流逝。迄今为止，中国伦理学界在一些基本性、基础性问题上，既缺少确定性的理念依循，更缺少共识性意义上的集体性道德行动方略。这表现在两方面问题上。一是科学、合理的道德生活新理念确立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普遍化和可接受性问题。置身于一个愈来愈“市场化的社会”的生存情景中，社会民众世俗化生活的核心关切，是财富的占有、利益最大化、当下的享乐等，而失去了一种对于人类长远性生存意义上更为根本、更为持久的道德形而上学关切。二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实践相一致的道德生活主体的塑造问题。这是对于一种现实性的道德生活逻辑的遵循问题。道义论逻辑从形式上讲，似乎占据了人类思维、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制高点，具有许多先天的优势，但就其实质而言，则有很多的难题。对中国式现代化做伦理文化审视和观照的核心和实质在于，这种现代化自一开始，就秉持着一种道义价值论的逻辑。道义价值论强调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公共价值逻辑，是共生的伦理，道义价值伦理的核心是伦理主体的人民性。

## （二）“道德性生存”的悖论：形式上在场与实质性疏离

在启蒙现代性的思想文化与理论语境中，伦理、道德是此一时代思想家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但是，这一时期学者们所关切的，本质上是道德的私人性特质，至于越出此一边界有无道德或者是否需要道德，就成了无人重视的问题。如此，道德的私人性内涵得以充分完善，而谈论社会的或者公共性的道德，成为很危险的事情。道德之于现代化，一直处于被辩护的尴尬而非正常的境地。道理不难理解，在公共空间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外在性的强制，是对秩序的遵守。也就是说，用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讲，道德主要是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的事情，至于公共领域的政治国家，则属于伦理化了的法的领地。同样是有感于市场化社会的道德生活难题，舒尔曼的分析更为直接和透彻：“一旦经济主义主宰了技术，利润取得了核心的意义，商品的生产就不再受到消费者的当前需要的支配。相反，需要是为了商业性原因而通过广告创造出来的。技术的产品甚至不经人们的追求而被强加于人们。”<sup>①</sup>

伦理与道德属于一种超越性的生存与生活智慧，真正的、真实的道德，其实根本不在世俗化的现实生活中。原因在于，道德生活的真实性、必要性问题，以及道德规范的有效性问题等，一直是一个难题。<sup>②</sup>不仅如此，和法律规范不一样，道德权利、道德权益一直是一种应然性意义的理性期许。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对于一个类群主体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抑或是对于特殊历史时代相对确定性的个体主体，“道德的”或是“非道德”的评判都显得很微弱。“道德心理学研究道德发展是什么的问题，道德哲学则考虑道德发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要为道德教育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就必须把心理学上的‘是’和哲学上的‘应该’这两种探讨结合起来。”<sup>③</sup>现代社会道德生活场景、方式等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现实生活中，一种观念和行为被谴责为“不道德的”，已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潜移默化的重要变化。面对变化了的道德生活情景，道德主体学会了依照自己认为正当的方式，重新寻找道德生活的准确方位，学会了自主性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一个极速变化着的时代，一个受资本逻辑支配的时代，没有人会关心普通民众真正的道德生活境遇、道德生活感受以及道德心理，做个道德上的好人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意义，没有人去认真体味。

人类自选择了市场经济之日起，就开始了“公共”与“私利”之间的艰难博弈，这一过程伴随着“私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善”，以及“民族国家利益”与“全人类普遍福祉”究竟应该以何种为本位或至上的理智论难题。所幸有古典经济学所谓“看不见的手”和现代制度经济学、公共伦理学所谓“看得

<sup>①</sup> [荷兰]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李小兵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

<sup>②</sup> William Foster, *Paradigms and Promises: New Approaches to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Prometheus Books, 1986, p.12.

<sup>③</sup> L. Kohlberg, “A Cognitive - Development Approach to Moral Education”, *Humanist*, vol.32, no.6, 1972.

见的手”之解释，有现代心理学、行为科学、管理学所谓“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文化人假设”“复杂人假设”“制度公益人假设”等的有力支撑，上述现象才勉强得到一定意义、一定程度的解释。

在《价值的颠覆》中，舍勒表达了自己对于重建现代性社会文明伦理和道德生活新形式的乐观态度和期许：“任何道德的内在倾向都极深地扩张自身的‘责任心’，超越自身位格的界限，尤其是超越一切具有某种生命依赖性（即依赖于自身生命）的人的界限；的确，任何道德都如此——只要其价值基于对自己的价值感到自信，对自己内心深处的自我与存在持肯定态度，生活于自己的精神财富的充盈之中。”<sup>①</sup>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面对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诸多非平等、非正义现象，伦理首先充当的是一种局外人意义上的“道德义愤”与评判的角色，对现实的非道德境遇现状的改变没有发挥多少效用。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伦理的思考和道德的介入，似乎是可有可无，甚至显得多余的。

### 三、文明本位的实践新叙事伦理：中国式现代化伦理正当性的典范性创制及世界性意义

在优良伦理生活共同体之集体性有效实践的意义上，历史进程中所确立、生成着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人类文明，其所捍卫和守护的，是现代社会之最可珍贵的德性品质。在麦金泰尔看来，“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sup>②</sup>对中国式现代化做伦理审视的核心与关键，在于明确这一伟大实践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所立足的道义实在论的制高点。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一种新的“伦理型文明”、一种“文明实践的伦理型新叙事”，为后全球化时代人类道德化生存与生活贡献了真理性识见。

#### （一）关注民众的“道德心智”：文明本位的实践新叙事伦理的出场

其一，文明本位的实践新叙事伦理的立足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和合观念所倡导的“并生”“共在”“共享”。这体现在基于辩证融通、澄明的立场，对“天地”“天人”“人我”“人人”等多重复杂关系真谛的理智把握和贯通之中。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天道、人伦之至理的深刻洞悉，是非常高明、非常睿智且具有超越性意义的、独特的伦理文化范型和道德生活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基于对传统的继承、改造和革新，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伦理型实践中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返本开新”，通过对21世纪人类生存与生活新的伦理现实的创新性解释，获得了当代性的在场逻辑和新的内涵。

其二，文明本位的实践新叙事伦理的理论特质是生存论—生活论道德生活智慧的回归。在这种新的超越性的伦理文化看来，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目标，是实现人对于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之所以具有伦理正当性和道德价值真理性的最直接、最深刻的理据。但是，现代化的西方或者西方的现代化却从根本上背离了这一基础性、根本性的伦理文化根基，其所推崇的恰恰是对物的占有，从而使人的道德人格丧失，即人失去了作为人所应有的伦理生活的丰富性与内在性。

其三，文明本位的实践新叙事伦理的目的是建立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公共性福祉最大化的共赢的伦理。它是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整个人类生存与生活总体性的开放的、生成性的“团结的伦理”“合作的伦理”。生成、实践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伦理，既具有中国文化特质、制度属性，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世界性、普遍性品格。它直面后全球化时代全人类道德生活的困境和难题，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勇气、胸襟和气度，基于从根本上逐渐变革启蒙现代性以来具有主导性意义的并非合理的伦理生活规制和格局的宗旨，先后提出了一些具有根本性伦理变革意义和宏大气魄的新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发展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无一不涵括全球伦理文化、全球伦理文明和全球正义、全球优良道德生活形态的追求，是引领人类伦理生活变革并体现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伦理创见。

① [德]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25页。

② [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第241页。

## (二) 人民主体性本位的合理逻辑：重置社会现代化的伦理根基

在先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历程中，曾经遭遇和面临过的以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形式出现的伦理实践与道德生活病症，譬如生态帝国主义、对共同体的疏离所导致的无根性，以及个体的绝对独立化所产生的生存的离散化等，不仅未能消除，而且在某种形式上愈演愈烈。

中国式现代化同样面临着属于自己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价值观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就是要矫正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方向，重置社会现代化的伦理根基。而要找到确当性的伦理根基，就必须找到超越性的新路径和伦理文化重建的有效方略，确立民族性的道德生活的核心架构，避免重蹈西方覆辙。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思想文化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是否有一种统一的道德价值遵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道义论”和“规范性”有机统一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所生成、秉承和践行的伦理，本质上是实践的、生成的、开放的，是基于人类共同福祉本位、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内在旨归的人民主体性的伦理。这一伦理文化新范式的实质，是以共生、共在、共享、共赢等为核心主张的。这样一种与制度相适应、相匹配的新的主导型的伦理文化观念始终在场，其所具有的典范性、超越性和引领性特质等，本身就考量着中国的道德思维智慧与社会制度伦理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sup>①</sup>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内在蕴涵着一以贯之的鲜明的超越性的伦理文化信念，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过程本身就是这一合理的伦理价值主张的具体践行。从范式和形态学意义上，就具体内容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伦理价值主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态正义性伦理。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追求生态共同体本位的以并生共在、互惠共享为核心的生态正义性伦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sup>②</sup>就其基本规定而言，生态观是特定历史时代人们认识和处理其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和主张。其现实关切和价值指向，在于调节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系统性失衡，唤醒现代社会的生态觉悟和生态意识。一方面，培育公民所必须具有的生态责任意识，以有效的生态行动，确保合理的自然资源储存率；另一方面，积极实施生态修复，补偿生态欠债，不断提升和改善生态品质，为代际生态正义共同体的动态接续奠定资源基础，切实推动整个社会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利益的公正分配。

二是合理性伦理。在社会发展的伦理观念问题上，超越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发展理念伦理，确立中国式现代化伦理的内在根基——由“增长”“发展”本位转向“生存”与“生活”。发展伦理学的奠基人德尼·古莱揭示了“发展”伦理的内含：“‘发展’一词可以指社会变革的目标或者指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指一种美好的生活的形象（物质上更富裕，体制上更‘现代’，技术上更有效率）或者指达成这种形象的一批方法。这些方法的范围包括从经济计划到动员活动，从旨在改变价值观、行为与社会结构的社会综合工程到多种多样的部门干预。”<sup>③</sup>阿马蒂亚·森指出：“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sup>④</sup>他在发展伦理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的新论断。基于此，阿马蒂亚·森认为：“狭隘的

<sup>①</sup> 参见《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19页。

<sup>②</sup>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9页。

<sup>③</sup>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导论第2页。

<sup>④</sup>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序第20页。

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sup>①</sup>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实践的最重要的理论成就和实践探索成果，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这是发展伦理观念问题上最具原创性贡献的中国智慧。新发展理念克服了现代性发展伦理的财富本位偏执，矫正了发展实践的伦理天平，着眼于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兼顾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当下与未来，让发展成为服务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手段。

三是人民主体性本位的美好的生活的伦理。即由单纯的“国家利益本位”转向“人民美好生活”本位的合理性关切。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最大的政治，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一种有效治理基础上的公序良俗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人民最核心、最直接的现实利益问题得到最大限度的关切和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sup>②</sup>

四是共同富裕的伦理。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公正伦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sup>③</sup>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实力显著提高，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但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还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在将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要完善分配制度，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就是说，需要切实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落到实处，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五是以合作促进发展的共赢伦理。基于主—主关系（主体间性）与平等逻辑的合作性伦理，由单一国家转向多元主体的并生共在。合作伦理体现在国家层面就是相互交往的国家之间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即团结合作、相互支援、优势互补、共赢共进。西方现代化进程充满着血腥的战争、野蛮的殖民和残酷的掠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sup>④</sup>

责任编辑：罗 萍

---

①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1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5页。

③《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9页。

④《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9页。

#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基点”及其内在联系\*

张卓文 张定鑫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三个“基点”，即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现代化、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三者是中国式现代化之“纲”，分别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客观参照对象、根本出发点，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规定、相互制约而形成紧密的内在联系。深刻认识这三个“基点”及其内在联系，有利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抓住其内在规律、纲要、主线或主攻方向，而不被细碎的枝节现象或表面的偶然现象所惑所扰。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 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从中国实际出发

**[中图分类号]** B0-0；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5)08-0023-07

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理论上就必须具体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问题。目前学界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方面从不同的学科、视角、维度、论域切入，给予了大量的研究与阐释。这些分“门”别“类”的探讨深入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但同时，学界也容易对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五个“中国特色”、九个“本质要求”和五个“重大原则”之要义作彼此孤立的“条块化”或“碎片化”理解。就理论思维而言，唯有运用辩证法并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思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问题，才能避免这些片面理解的产生。

## 一、中国式现代化基点之一：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sup>①</sup>这一唯物史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最终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全体中国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经济发展”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sup>②</sup>就此而言，党的二十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③</sup>这句话明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目的、所承载的使命。封建专制在近代中国极其严重地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跃进。正是这一社会历史原因造成了中华民族的落伍与懦弱、经济贫困与文化愚昧，而使中国仁人志士从近代开始在本国的现代化尝试屡遭挫败，以致于“国家蒙辱、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历史作用论述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6BKS002)、江西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南方谈话’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贡献研究”(24KS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卓文，江西农业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西 南昌，330045)；张定鑫，江西财经大学首席专家、教授(江西 南昌，330013)。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9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96页。

③《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页。

民蒙难、文明蒙尘”。<sup>①</sup>相反，西方现代化模式“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②</sup>对世界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现代化模式属于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它不仅造成一国之内的社会两极分化，而且造成各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对抗与冲突，那些以现代化武装起来的资本列强常常侵害、掠夺欠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则彻底否定了西方现代化之剥削性、压迫性、侵略性，从社会经济制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剥削、压迫、掠夺现象，最大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这便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之社会主义属性：“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sup>③</sup>“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sup>④</sup>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对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的形容词、修饰语，而是对现代化的定性和定位。”<sup>⑤</sup>

“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点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这种现代化必定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全面领导，才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拥有坚强的组织力量和领导力量，否则，中国式现代化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能局限于精神领域的空谈，或幻化为其他形式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点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前提，而且它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不再是社会主义传统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拓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获得了空前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获得了空前的增强。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含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原则，因为“改革开放”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基本点”，是“中国特色”中最鲜明的时代色泽。既然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种“中国特色”必定既传承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又凝练当代中国的实践经验。既然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原则，就必定“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sup>⑥</sup>

“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点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不限于经济领域，不只驻足于物质文明建设范畴。只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即建设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和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持续实现全体民众范围内的群策群力，才能唤起全体人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之民心民力民智的支持。这种政治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同经济上“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实乃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关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只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才能在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中彰显全体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在中国真正建成高度的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点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而“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sup>⑦</sup>“社会主义”在唯物史观逻辑上隶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209页。

⑤陶文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的学理探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8期。

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第13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539页。

阶段”，是一种“世界历史性存在”范畴。中国式现代化把中国的现代化置于全人类意义上的“共同体”之中，不仅要立足于无产阶级和劳动者阶层的解放事业，还要把全人类视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及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因而，“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崭新范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述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范畴相比较，前者侧重于生产方式范畴之生产者劳动组织或生产组织，侧重于在整个国际层面的现代化或现代性之“同一主题‘频道’上进行对话”；<sup>①</sup>后者则侧重于生产关系范畴即“全世界无产者”之阶级关系，其视野或覆盖面受限于特定的经济关系范畴。这样，在话语形式和传播方式上，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就更富有普惠性和吸附性。

## 二、中国式现代化基点之二：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现代化

我们从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运动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问题。一方面，要充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哲学意蕴，不能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或者以“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sup>②</sup>“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sup>③</sup>要坚定地守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不能轻忽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同世界各国现代化诸模式之间相异又相同的张力关系，要善于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赶超”对手的前提是学习对手，这是理性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极为微妙的“分寸”。依据唯物史观之世界历史理论，后发型现代化隶属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sup>④</sup>的现代性运动长历史过程，这种“相对意义”的现代化并非一国单纯的“自己运动”过程，而是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交往互鉴的动态过程。中国式现代化至今仍伴随着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借鉴或对其传统优势领域的“追赶”特征。中华民族在近代工业文明崛起过程中的后发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种与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同向的现代化属性，并始终处于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学习借鉴、交流交往的状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持续“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sup>⑤</sup>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这些成果直接得益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遵循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力行对外开放政策，善于发挥“后来者优势”的效应。用列宁的话说，即“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sup>⑥</sup>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sup>⑦</sup>“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sup>⑧</sup>况且“一个国家很难自己造出所有的尖端技术，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包打天下”，<sup>⑨</sup>所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充分汲取先发型现代化以及其他类型现代化的经验。同时，需要保持“学习”过程中的“中国特色”，要始终“善于”选择、“善于”取舍、善于“批判”。“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大潮中，闭关锁国不行，承认差距，虚心学习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明白学习什么。”<sup>⑩</sup>

① 韩庆祥：《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6期。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第27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第135页。

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1-382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89页。

⑧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84页。

⑨ 黄益平：《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林毅夫等：《新质生产力：中国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与内在逻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年，第168-169页。

⑩ 林毅夫：《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经济学的视角》，《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现代化”基点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尽管世界各国现代化都不否认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国外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现代化标准”便包括“较高程度地使用非生物能源，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长”，以及“通过个人对其环境的世俗性和日益科学化的选择，广泛普及文化知识”，<sup>①</sup>但现实中的西方现代化国家往往存在着对物质文明过度倚重的片面性。“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起来，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的巨大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出来”。<sup>②</sup>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求我们既要克服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片面性，又要深刻吸取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的教训；既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又使“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相协调、相促进，发挥人的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主角”作用，让“物的全面丰富”走向社会全面发展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

“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现代化”基点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尽管西方有识之士意识到经济发展的“极限”问题，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残酷面相是：把少数人或富贵阶层的物质利益凌驾在生态环境之上，把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繁荣建立在他国，特别是欠发达国家资源过度耗费、生态环境退化的基础之上——搞“绿色资本主义”。例如，美国《科学》杂志子刊《科学进展》曾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国2016年制造的塑料垃圾中只有不到一成被回收，海量垃圾被运往发展中国家。依据“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sup>③</sup>的论断，中国式现代化摒弃西方现代化的狭隘性，秉持“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sup>④</sup>的理念，协同推进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全人类的永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现代化”基点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诚然，西方现代化是追求效率的。马克思早就发现，“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集约式生产形式榨取的剩余价值属于“相对剩余价值”范畴，而非“绝对剩余价值”范畴。资产阶级把剩余价值的榨取建立在提高生产效率、管理效能的基础上，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强化了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生产受价值规律的盲目刺激与左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带着对劳动者或他者的剥削性，即人类之间的“自噬”性，其所实现的“高效率”即“高质量发展”仅限于微观层面或个别企业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高质量发展就其经济性质而言同样追求高效率，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这些同广大生产劳动者、消费者等群体的根本利益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可以实现全程意义上或全社会范围内的高质量发展。

“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现代化”基点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史上作为一种后发型现代化，能充分汲取人类历史上现代化既有的成就与经验，克服西方现代化出现的“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sup>⑤</sup>等弊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欠发达条件下的后发型现代化的文明之新形态，已经创造出自己的独特新品质。这就是以创新发展为动力、绿色发展为主基调、协调发展为平衡点、开放发展为方向、共享发展为归宿，在全社会范围内让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之间相互协调、相互贯通，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共享、人与自身的融合共在，即全面发展的境界。

### 三、中国式现代化基点之三：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

各国国情条件的民族差异性或特殊性在现代化逻辑上排除了世界各国各民族现代化模式的单一性。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或“现代化=资本主义”的教条。从中国式现代化与本国国情

<sup>①</sup> 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页。

<sup>②</sup>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6页。

<sup>③</sup>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第118页。

<sup>④</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8页。

<sup>⑤</sup>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

之间的关系看，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国国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是根本性的“出发点”。

所谓“中国实际”，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物质层面的含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尤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已经处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毕竟在历史上“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sup>①</sup>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在乡村更为突出。这一特有的现实国情决定我国发展现代化必须循序渐进，必须充分顾及国情条件与诸多制约因素。二是文化层面的含义。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或小生产的历史，小生产这一经济形式及其文化心理对民众影响深远，如推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均无贫”（《论语·季氏》）等理念。这就要求我们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之重公平、公道的同时，注意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极端平均主义心理。在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现代化，就是要认清楚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世界上还是发展中大国，对待世界上诸种关于现代化的成功理论、经验、方案都要以中国国情为取舍依据，而不能“邯郸学步”。近年来，“美国国会加紧推进相关法案，宣称要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美国这样做是因为担心被中国赶超，是为了遏制打压中国。美国宣称要与中国开展‘公平’竞争，而其所谓的‘公平’竟是单方面要求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这种做法是为了提高中国的发展成本，迫使中国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国际义务，给中国发展增添阻力”。<sup>②</sup>因而，中国式现代化要依凭国情条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勇于“探索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sup>③</sup>切实兑现现代化的预期奋斗目标，让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拥有可持续的幸福与成就，在世界现代化的“成果展”中历史性地呈现“中国特色”。

“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基点要求人们正视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世界上“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事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式现代化要整体实现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有利的一面是巨大人口所拥有的人力资源优势与潜能，即人才方面的“红利”和巨大的市场；不利的一面是巨大人口对资源、外部环境和发展条件所带来的异乎寻常的挑战与压力。历史上“中国的人口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历史传统的发展连续性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长，近百年来经历的内忧外患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深”。<sup>④</sup>可见，要完成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意味着要完成庞大数量的人的现代化，这一过程的艰巨性、长期性为世间所罕见。既然中国国情的一个“基本面”是中国人口达14亿多，存在着人口基数庞大与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必须紧紧以这14亿多人民大众为“中心”，在充分利用中国所拥有的人才资源这一“比较优势”过程中，统筹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真正地、可持续地惠及全体人民。

“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基点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属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一中国特色与中国之“天下为公”的历史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基点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必定是惠及全体中国人民的，尤其是要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注重“农业农村现代化”<sup>⑤</sup>的实效性、可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所进行的“现代化”属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能在中国搞少数人的、部分阶层的或部分区域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一切反动势力，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根本性原因就在于中国共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页。

② [加纳]保罗·弗林蓬：《美国企图剥夺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用心险恶》，《人民日报》2023年8月3日第3版。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第306页。

④ 罗荣渠：《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起步》，《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2期。

⑤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第201页。

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sup>①</sup>“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基点在这里同时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长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重大原则。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sup>②</sup>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文化教育为路径，极大增强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劳动者阶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显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是兑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根本途径。

“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基点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性视角看，“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实际上传承了“中国实际”之中的一个历史传统，即“和平性”传统，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周易·系辞上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论语·学而》曰：“和为贵”；《论语·季氏》曰：“和无寡，安无倾”；《国语·郑语》曰：“和实生物”；《孟子·公孙丑上》曰：“以德服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这种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中国式现代化否弃了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实行的“我赢你输”式的扩张和“国强必霸”的发展模式，走和平发展之路，属于“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sup>③</sup>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基点在纵向上的历史逻辑推展。显然，“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基因所固有的一大特质，因而能够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局限。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sup>④</sup>

#### 四、中国式现代化三个“基点”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主张科学的研究应在“充分地占有材料”基础上“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sup>⑤</sup>厌恶那种“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而把事物的“外表……当做最终的东西”<sup>⑥</sup>这类庸俗经济学家的做法。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三个“基点”，即“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现代化”“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它们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之“纲”，即质的规定性，而其中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内容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之“目”。“纲”举则“目”张——抓住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纲”，就可以更准确更完整地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

近代以来，因为“闭关锁国”和屡次战乱，中华民族错失了世界工业革命的机遇，经历了从“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德先生和赛先生”等漫长的摸索。中国共产党接续前人，为实现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探索和奋斗，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先进的工业国”（1956年），“四个现代化”（1964年），“中国式的现代化”（1979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0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2021年）等概念。“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凝练了这一系列不同历史时段提出的概念之意蕴的崭新范畴。它所蕴含的“社会主义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9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133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65页。

④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

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现代化”“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三个“基点”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点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命运息息相关，是“中国人民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是“动力源”所在，属于中国式现代化之生产关系维度。正是这一“基点”使中国式现代化为全体中国人民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崇高境界，创造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现代化”基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点在特定时空的展开，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运动，即世界近现代文明成果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内在贯通，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经验与启示，两者体现了人类现代化过程之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基点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同中国国情之间的现实联系、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渊源，渗透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

在中国式现代化之“纲”中，如果离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点，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失去其赖以实现的价值依据，即“动力源”，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精髓也将丧失。如果离开“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现代化”基点，中国现代化具体指向的确立或战略安排就失却了客观参照，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将狭窄化，甚至与世界隔离。如果离开“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基点，第一个“基点”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会变成单纯的理想主义。因而，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应该始终认清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的发展中大国这一国情。如果离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基点，第二个“基点”即“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现代化”就容易走歧路，使中国式现代化变成了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大杂烩”，或者彻底变质为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过度“西化”，以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要做足“中国式”这一“功课”，知己知彼——始终重视学习国外现代化的经验与技术而不盲目照搬照抄，充分相信本国的现代化力量而不“守旧”，充分借鉴本国的传统优势而不“复古”。“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现代化”这两个“基点”构成第三个“基点”——“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的两个基本规定，即分别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客观参照对象。具体地说，如果离开这两个约束条件，“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中的“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就会让人难以捉摸，而“从中国实际出发”便可能成为“从现象出发”或“怎么都行”。这就会导致“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要么变成不关中国人民痛痒的西方现代化——缩短中国式现代化“半径”，即让社会主义现代化半途而废；要么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路与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相背离而越走越狭窄——最后“行”不到最终目的地和理想境界。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绝非在中国降低作为世界现代化运动成果的现代化标准或质量要求，而是一个有原则有高度的现代化，即在世界现代化史上有其特定的价值性、科学性“指标”要求，因而区别于、超越于西方现代化，成为一种新型的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既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中国人民，也更加广泛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三个“基点”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规定而缺一不可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这些具体规定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具“刚性”的质的规定性，构成了人们进一步完整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目”之要义所含糊不得的“纲”。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些内在联系，将有利于人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紧紧抓住其内在规律、纲要、主线或主攻方向，把握住中国式现代化精髓，从而不被那些细碎的枝节现象或表面的偶然现象所惑所扰。

责任编辑：罗 萍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 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的四个新特征<sup>\*</sup>

黎庶乐 麦炬江

**[摘要]**不同时期的空间形态反映了社会空间变化的不同样态，因而空间形态的特征也成为把握相应社会空间的关键。如果说20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是以空间生产建构起来的资本逻辑与空间逻辑相耦合的整体逻辑，那么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则是以空间生产的纵深发展建构起来的多层级并且持续分化的多空间尺度的动态逻辑。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的核心不再是空间生产的单一尺度，而是多空间尺度。它在城市空间、国家空间、全球空间和主体空间的尺度生产，使得其空间形态呈现出尺度化特征，并最终形成了全球城市、新国家空间、新世界体系、共同性空间四个新特征。因此，把握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新特征，不仅有利于揭露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的实质，还可以揭示空间与资本的深层次矛盾，并为新一轮的空间革命提供可行的空间策略。

**[关键词]**空间生产 空间形态 空间尺度 尺度重构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8-0030-07

空间形态是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空间样态，其变化和发展与空间生产的历史演进相一致。空间生产的性质和范围规定了空间形态的基本尺度。资本主义在20世纪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逻辑转变，表现为资本对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进行空间殖民。尤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通过推进城市化与向消费社会转型，有意识地将空间纳入资本积累的逻辑之中，加速了资本的空间转移与空间生产方式建构。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对空间的自觉整合与建构，逐渐将其打造成为延续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支撑。自此，现代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从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其转变的结果便是资本逻辑与空间逻辑耦合成整体逻辑，建构起现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统治，这也是20世纪资本主义幸存的重要原因。随着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关注到从地方政治到国家乃至全球的尺度问题，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和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等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初步探讨空间尺度的生产问题。<sup>①</sup>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在各个空间尺度上的动态变化，使之呈现出一系列的新特征。资本主义通过全球空间生产，在不同层级的空间尺度上构成了统一的空间经济，并且使得各个空间尺度之间发生相互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使空间尺度处于持续地“分化—均衡”之中，这构成了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空间形态的尺度重构依赖于全球空间生产的实现，这意味着资产阶级可以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5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专项委托一般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黎庶乐，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麦炬江，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510006）。

① 黎庶乐：《国外左翼学者对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批判的四重维度》，《世界哲学》2025年第3期。

运用空间尺度来改变无产阶级在尺度结构中的位置。可见，争夺主导空间尺度的权力是21世纪城市斗争、空间管制和社会反抗的核心。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城市空间、国家空间、全球空间和主体空间的尺度生产，使得其空间形态呈现出尺度化特征，并最终形成了全球城市、新国家空间、新世界体系、共同性空间四个新特征。从根本上说，这也是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的核心与本质。因此，把握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新特征，不仅有利于揭露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的实质，还可以揭示空间与资本的深层次矛盾，并为新一轮的空间革命提供可行的空间策略。

### 一、空间形态在城市空间尺度上的重组：全球城市特征

城市空间是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组织场所，而城市空间尺度的重组表征着空间形态的差异化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即便是将外部地区吞并也不足以维持其内部空间的繁荣，于是资本主义转向通过空间生产推动面向地方、地域、国家乃至全球的城市化内部空间殖民。这使得城市逐渐成为社会空间形态的基本构型，而普遍城市化也就成为资本通过横向地理扩张与纵向空间重组来延缓过度积累危机的重要策略。此时，资本主义国家组织起大规模的空间生产与集体性的空间消费，推动“城市—区域”间的均衡发展，这最初并未使得空间形态分化出明显的空间尺度。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体系内滞涨危机的广泛发生，资本主义只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去管制化、城市住房私有化等措施促进资本的流动。过热的全球金融市场促使资本在空间尺度上同时出现向内破裂与向外爆发的二维扩张趋势，各国城市也由此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内部界限。其后果便是，“空间尺度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得我们越发应该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尺度组织看成是全球—地方互动的连续带”。<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城市问题已经转换成尺度重组问题。跨国公司从一国到多国水平扩散并集聚在某些城市空间中，这不仅拓展了其生产销售的空间尺度，还通过对城市空间尺度的分化，使其建立起具有等级序列的地域单元，从而强化自身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控制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的经济跨国化伴随着蔚为壮观的市场全球化，产生了所谓的‘世界城市’或者星球化城市”，<sup>②</sup> 这是资本在城市空间尺度上特有的地域形态。它“代表了一个战略空间，使全球化过程在国内得以实体化以及在国家制度安排中完成其动态过程”。<sup>③</sup> 然而，这一过程不仅没有使社会空间得以均衡发展，反而使得不平衡发展普遍存在于各个空间尺度之中。进入21世纪，资本的“时间—空间修复”策略难以维系，因为全球范围内已经难以找到足以吸纳过剩资本的空间。加之边缘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有力地冲击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非均衡空间中的优势位置。为了巩固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权力地理，资本主义通过重构或分化地域组织控制的空间尺度来修正社会空间的关系结构，以期最终实现对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sup>④</sup> 这使得空间形态在城市空间尺度上进行重组并表现出全球城市特征。

全球城市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佳空间尺度，其凭借自身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保障跨国公司资本的全球扩张。为了吸引跨国公司入驻全球城市，21世纪资本主义通过操控国家、城市等地域组织来实施差异化的空间生产战略，从而重构或分化地域组织控制的空间尺度。然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快速流动并不能完全脱离地域，相反，它必须通过相对固定的基础设施生产（城市化），重新在地方展开新一轮的循环，这表现为城市空间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所引发的原有资本循环模式的剧烈变化。可见，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的全球城市特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全球城市吸纳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不惜通过削减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投入

<sup>①</sup> [美]尼尔·博任纳：《城市，地域，星球：批判城市理论》，李志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50页。

<sup>②</sup> 刘怀玉、鲁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城市哲学总问题——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解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sup>③</sup> [美]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周振华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25页。

<sup>④</sup> 这里要区别于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参见许纪霖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和乡村基础设施建筑补贴来加速资本的全球循环。于是，失去经济补贴地区的农业生产者不得不进入全球商品市场以维持自身的发展，这却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去土地化”和国家政策的“去农业化”。第三世界“如今出现了许多资本集中的乡村和劳动力集中的工业城市的例子。……‘过度城市化’被贫困的再生产而不是就业机会的提供所驱动。”<sup>①</sup>在经济停滞和缺乏投资的情况下，这些新兴城市只能沦为资本主义全球城市的附庸。二是通过士绅化<sup>②</sup>复兴全球城市，增强其对全球空间经济的掌控力。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郊区化和住宅地产开发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城市内的士绅化建设。莎朗·佐金（Sharon Zukin）指出，重建全球城市士绅化可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20世纪末期以商业区为核心的“权力景观”建设，以及21世纪以来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全面空间殖民。这表明通过塑造景观改变城市空间尺度的边界，成为资本主义诱导空间消费和集中空间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史密斯看来，公共空间的同质化“是资本的周期运动在城市居住空间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表达。……表现了利润率与空间重建的相互作用”。<sup>③</sup>资本主义利用法律和金融工具加速旧城区的空间贬值，制造郊区与内城间的租金差距，以剥夺性积累掠夺空间资源。士绅化已然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基本策略之一。三是建构以全球城市为核心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马西认为，应该将资本主义在城市空间尺度的分化看作一种连通性的政治或权力几何，<sup>④</sup>最终形成以全球城市为核心的世界城市体系。然而，这样的权力地理网络并非稳定不变的，“每个城市都试图在自己的层级网络或最适合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往上爬”。<sup>⑤</sup>为此，各个城市必须以更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逻辑的方式来获取竞争优势，而地区、国家、城市间争夺发展资本的竞争更趋尖锐。

## 二、空间形态在国家空间尺度上的嬗变：新国家空间特征

为了维持城市空间尺度的稳定，21世纪资本主义需要通过基于国家空间尺度的嬗变而生产出的新国家空间，来巩固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时空关系。国家空间是协调资本循环与巩固资本积累时空关系的中轴，而国家空间尺度的嬗变则表征着空间形态动态化趋势。国家并非一开始就与空间生产活动相联系，这是因为以往国家地域仅仅将为资本的空间生产提供组织架构与制度平台当作手段，而非直接目标。自中世纪晚期欧洲封建等级制度解体，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承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形式，长期处于静态封闭的国家形式在全球范围内相互排斥，但在地理上处于连续的国家领域网格中。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指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范围是互相决定的，尽管边界代表国家政治意义上的“有限”，但在原则上则象征着“稳定”。因此，静态、稳固、有界的领土范围是国家政治制度空间嬗变过程中稳定的结构性基础。随着资本主义实现从“空间中物的生产”到“空间自身的生产”的转变，国家便逐渐与空间生产相交汇。“国家是权力实践的一种架构……不能被单独归于经济利益。也就是说，国家可以起作用，而且常常确实在起作用——在资本利益集团中——但它也能追逐它自己的利益，它往往加强对社会中民族—国家架构的控制。”<sup>⑥</sup>显然，在福特—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国家与空间

① [美]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潘纯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19页。

② “士绅化”（gentrification），由英文“gentry”（绅士、贵族、上层阶级）一词引申而来。它是指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新城市居民置换原有的低收入城市居民，并伴随资本再投资引发建成环境变化的过程。其变体gentrifier、super-gentrification、planetary gentrification以及generalized-gentrification等说明，在全球城市语境下，关于士绅化的研究日益拓展。国内译者在不同的文本中对该词有不同的译法：如在《裸城：原真性城市的真与死》中，gentrification被译作“中产阶层化”；在《全球城市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和《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中，gentrification则被译作“士绅化”。故本文亦沿用这一译法。

③ 谢富胜、巩潇然：《资本积累驱动下不同尺度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史密斯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探讨》，《地理学报》2018年第8期。

④ Doreen Massey, “Geographies of Responsibility”,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2004, vol.86, no.1, pp.5-18.

⑤ [英]多琳·马西等：《城市世界》，杨聪婷等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5页。

⑥ [美]马克·戈特迪纳：《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第二版）》，任晖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

的紧密相连。领土国家相对静态空间构型仍能有效地实现资本的持续积累，此时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政治尚未完全分离，因而也尚未取得独立的空间性表达。然而，随着资本灵活积累模式的崛起，动态的资本逻辑便开始与传统静态的领土国家逻辑相抵触。正如亚历克斯·科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所强调的：“国家为权力而战，资本为利润而战”。<sup>①</sup>20世纪70年代后，大规模生产行业的衰落与资本灵活生产系统的兴起正式将资本的空间生产推向顶峰，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国家空间尺度等级。国家权力的空心化导致其已无法再改善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以致引发了复杂的空间矛盾和地缘矛盾。国家内部的空间均衡发展策略让位于资本的全球空间生产积累策略。

进入21世纪，全球资本的加速积累过程致使国家空间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动态的全球资本积累作用于国家空间尺度上，从而产生了新的国家空间，包括超国家空间（如欧盟、东盟）和次国家空间（全球城市、都市连绵区）。因此，新国家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尺度嬗变的过程，它通过再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再边界化（reborderization）和尺度重组来实现。但这并没有削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反而通过新兴的“国家空间项目”（state spatial projects）和“国家空间战略”（state spatial strategies），维系着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增长与社会空间架构变化的动态平衡。21世纪资本主义也由此呈现出以下三点新国家空间特征。

首先，新国家空间不再是不证自明的自我封闭的僵化容器，而是多尺度下的多形态开放空间。“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非领域、无边界、超领域或领域分离过程”，<sup>②</sup>其中蕴含的空间逻辑与传统主权国家静态、稳固、有界的领土逻辑截然相反。正因如此，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强调，较之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时空环境，“国家政府正承受着各种各样的转变……这种损失反而造就了对超国家层面协调的需要和次国家层面复苏的空间”。<sup>③</sup>21世纪资本主义不再将单一的国家空间尺度视作全球空间生产的主要尺度，而是通过分化空间尺度调整国家权力，建构统一于多空间尺度内的空间经济。这具体表现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被下放至次国家空间尺度（城市、区域），另一部分则上移至超国家空间尺度（区域组织、多边组织等国际性组织）。这一过程使原有的国家空间同时经历着“内部外化”（本国内部的城市和区域的国际竞争）和“外部内化”（区域组织参与国家空间内部的管理与组织）的形变过程。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最终建构起能够容纳多元空间形态，具有多空间尺度的新国家空间。

其次，新国家空间“内—外”的辩证运动过程集中体现了社会空间形态不同尺度间相互耦合的特征。从外部来看，尼尔·戴维森（Neil Davidson）认为，新国家空间的边界是指“在特定空间内的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凝聚力”的极限。在这样的空间中，“资本可以在没有利润极限的情况下流通，资本的流动成本和时间将会超出社会必要的周转时间，并最终能建构一个相对连贯的劳动力市场”。<sup>④</sup>为了提升国家空间内部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同国家之间必然爆发激烈的外部地缘斗争。从内部来看，资本主义通过“国家空间工程”，建构起在全球—国家—城市空间尺度间可以灵活协调的生产模式，同时制定“国家空间战略”，将内部的国民经济发展嵌入外部的全球资本循环中。由此，激烈的资本空间竞争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总之，在新国家空间“内—外”的动态形变过程中，资本主义将自身的社会关系扩展到空白的民族国家领土区域上，并对边缘国家实行国际区位分工、不平等交换等殖民国家策略。

最后，新国家空间的建构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尺度修复”。新国家空间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对各种尺度的国家空间框架再现、修改或转化的产物。尼尔·博任纳（Neil Brenner）指出，“新国家空间的生产不能被视为对旧的政治地理的完全破坏和超越……新出现的国家空间工程和国家空间战略与旧的国家空

① 刘慧：《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批判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8期。

② [美]尼尔·博任纳：《新国家空间：城市治理与国家形态的尺度重构》，王晓阳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56页。

③ Bob Jessop, “Post-Fordism and the State”, Bent Greve, ed., *Comparative Welfare System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6, pp.177-178.

④ Neil Davidson, *Nation-States: Consciousness and Competition*, Haymarket Books, 2016, p.220.

间架构进行互动”。<sup>①</sup>这个过程不是“从一个稳定的管制框架到另一个稳定框架的简单线性过渡”，<sup>②</sup>而是“通过分层的（layering）过程将新的国家空间项目和策略叠加在原有的国家空间组织形态之上”。<sup>③</sup>国家空间尺度的嬗变正是通过这一相互作用生产出多层级的新国家空间。

### 三、空间形态在全球空间尺度上的重构：新世界体系特征

为了持续创造资本的盈余空间，资本主义通过在全球空间尺度上的重构，将微观的时空关系上升为宏观且非对称的空间秩序，最终建构起新世界体系。全球空间规定了资本与权力的流转范围，而全球空间尺度的重构则表征着空间形态的再中心化趋势。起初，资本主义整合外部发展不充分的空间，并将其转变为生产和积累的空间，通过市场扩张建构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雏形。史密斯认为，这种“经由市场而实现的空间整合的形式方面日渐被吸纳到实质空间整合的趋势之中”，尤其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和一战时期，世界体系把“处于不平衡发展核心的‘不发达的发展’”<sup>④</sup>生产出来。这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空间尺度上对空间进行实质性整合的尝试，推动了世界体系的扩张与发展。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基于国际劳动分工而确立的等级性国际结构，其核心逻辑是中心国家以自身优势对其他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进行控制、剥削等。国家之间相互交错的空间关联，将全球空间形塑为“核心—边缘”的二元空间格局。直到二战后，这种相对稳定的空间格局才被世界体系内中心国家间的权力博弈与空间重组打破，美国通过空间重组建立新的国际权力体系、削弱欧洲的实力并逐步夺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世界长期对峙，使世界体系向两极化趋势发展。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去管制调控模式，推动全球空间尺度内资本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些举措虽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但同时也瓦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而削弱了美国对全球空间的统治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两大阵营间的张力分散，导致全球空间格局朝着多元化的不平衡模式发展，加剧了全球空间尺度内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金融资本积累的分化持续削弱美国的中心地位，个别资本力量的崛起使世界体系逐渐呈现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通过在全球空间尺度上的重构，系统地改变了不同空间尺度上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旧模式。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是通过全球空间尺度持续的规定和分化组织起来的，全球空间尺度则是通过规定各地方性空间在全球空间尺度层级中的相对位置，从而建立起新世界体系的。由此，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主要体现出以下三点新世界体系特征。第一，多空间尺度打破了旧世界体系主权国家间相互制衡的空间格局。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指出，多重空间尺度“在许多方面……正在取代旧式第一、二、三世界的国际劳动划分，也取代关于核心和外围的流行隐喻：南北区分”。<sup>⑤</sup>科利尼科斯进一步表明，虽然多空间尺度增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活力，但却“不断改变着全球的权力分布”，<sup>⑥</sup>打破了以往主权国家间相互制衡的空间格局，最终将引发复杂的经济竞争和地缘冲突。这说明新世界体系不再以旧式领土国家主权范畴下的零和逻辑为基础，而是在多空间尺度相互融通的空间过程中建构新的社会空间框架。新世界体系的本质就是通过各尺度间的不平等关系重新确立起资本主义的空间霸权。第二，新世界体系以新帝国主义为核心，推动社会空间形态的再中心化。哈维强调，“资本的无限积累必然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以通过维持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sup>⑦</sup>资本的积累逻辑必然推动世界体系的再中心

① [美]尼尔·博任纳：《新国家空间：城市治理与国家形态的尺度重构》，第232页。

② [美]尼尔·博任纳：《城市，地域，星球：批判城市理论》，第82页。

③ 马学广、李鲁奇：《新国家空间理论的内涵与评价》，《人文地理》2017年第3期。

④ [英]尼尔·史密斯：《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与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42-243页。

⑤ [美]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8页。

⑥ Alex Callinicos, “Does Capitalism Need the State Syste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0, no.4, 2007, p.545.

⑦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化建构。埃伦·M·伍德 (Ellen M. Wood) 将如今的中心称为“资本的帝国”，并指出，“资本帝国主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寻求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不借助于政治统治而确立自己的经济霸权”。<sup>①</sup>这保障了威廉·罗宾逊 (William Robinson) 所说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三，在多边世界历史假象下，新世界体系是更深层次的霸权逻辑。彼得·斯洛特戴克 (Peter Sloterdijk) 认为，以往的世界体系体现了以欧洲单边主义为核心的历史逻辑。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文明单边突破的两个巨大尝试——美国和苏联”<sup>②</sup>后，世界体系才逐渐以多边的历史逻辑展开自身。然而，在这种多边世界历史逻辑假象下的，却是资本通过“经济权力在连续的空间中的流动”。<sup>③</sup>这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空间霸权的建构，还营造起普遍空间民主化的假象。在此基础上，马西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空间霸权就在于对不同社会空间层级的隐秘控制的实质。

#### 四、空间形态在主体空间尺度上的转换：共同性空间特征

当资本主义已无法利用新世界体系维持全球空间尺度的稳定时，那它便需要通过主体空间的尺度转换获取新的价值生产模式，以便调整资本的全球布展。主体空间是资本实现新价值生产的场域，而主体空间尺度的转换则表征着空间形态的共同化趋势。原来的工业资本集聚于固定的地域单元，为了生产而创设建成环境，将无产阶级集中并固定于某一空间尺度中。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利润率降低，资本主义开始用以固定资本投资为核心的次级循环取代资本的初级循环。对于劳动者来说，日益扩张的资本全球积累与不断分化的空间劳动分工强化了劳动者在各空间尺度上的流动。诺埃尔·卡斯特利 (Noel Castree) 着重指出，当资本主义将群体 (劳动力) “对于特定过程的责任——‘向上’或向下——转位到最适合它们的地理尺度的时候，这些‘尺度话语’就形成权力清单的重要部分”。<sup>④</sup>由此，资本主义将劳动力的大规模迁徙纳入资本空间积累的策略之中。迈克尔·沃拉斯 (Michael Wallace) 和大卫·布雷迪 (David Brady) 强调，劳动过程的空间重组与技术官僚控制系统的全球化是主体空间尺度流动的前提，是对劳动者更深层次的空间剥削。

21 世纪，资本主义通过不同的空间尺度管制大规模的劳动力迁徙，一方面将国际劳动力限制于某一空间尺度中，通过生产边缘区 (如贫民窟、种族飞地、封闭空间、牧区等) 实现社会分化与空间隔离；另一方面基于空间尺度“重新分层劳动力，并以一种按职业、行业、性别划分工人忠诚度的方式来调整工作报酬空间，利用劳动力的空间分工和搬迁的威胁来化解潜在的工人阻力，并沿着地区和国家的界限分散他们的利益”。<sup>⑤</sup>由此，资本主义将主体空间尺度塑造为管制多元离散的劳动者的空间性表达，表现为高度分化的空间劳动分工、非正义的空间隔离与多尺度的空间管制等方式。通过分化劳动者，资本主义逐渐建立起“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社会网络内部的价值生产模式。正是在非物质劳动中，主体通过合作、协作和交流的“共同性”实现了自身在空间尺度上的转换。这使资本主义不再凭借固定时空中的主体进行资本积累，而是代之以对离散多元的空间主体进行共同性的剥削。由此，21 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的共同性空间特征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共同性空间是由资本主义整合的多元离散的主体空间。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 和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指出，非物质劳动者是通过普遍智能联系起多元离散的空间主体，即将劳动者的语言、知识、情感等整合到资本剥削的社会网络过程之中。正是由此建构起来的以共同性 (the common) 为核心的新型社会关系，生产出新的公共空间。第二，共同

① [ 加 ] 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年，第 133 页。

② [ 德 ] 彼得·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常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261 页。

③ [ 英 ]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 24 页。

④ [ 英 ] 诺埃尔·卡斯特利等：《工作空间：全球资本主义与劳动力地理学》，刘淑红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118 页。

⑤ Michael Wallace, David Brady, “Globalization or Spatialization? The Worldwid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the Labor Process”, Terrence McDonough, et al., ed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39.

性空间将主体空间转化为资本主义实现新价值生产的场域。非物质劳动改变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是因为非物质劳动生产出的产品本质上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为了拓宽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来源，调整了自身的积累模式，使“剥削采取了剥夺共同性的形式”。<sup>①</sup>通过将公共财富转化为私有财产，将共同性财富（知识、信息、图像、情感和社会关系）转化为剥削对象，将大都市地租转化为无条件占有对象，资本主义完成了对共同性空间的全面剥削，使主体空间成为资本进行新价值生产的场域。第三，共同性空间是资本主义对所有空间主体进行生命政治剥削的空间。哈特和奈格里强调，资本主义对非物质劳动的剥削就是对劳动者的主体性与生命形式的剥削。正因如此，“没有质上的差异可以将穷人与就业工人区分开来，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条件和创造性活动定义了整个诸众。穷人、失业者、半就业者和移民的创造力和发明力对社会生产至关重要。正如今天的社会生产在工厂内部和外部均等地进行一样，在工作关系的内部和外部也均等地进行”。<sup>②</sup>换言之，资本主义通过共同性空间，将剥削的广度与深度延展至所有的主体空间，这最终将使“几乎人类的全部要么被吸纳入资本主义剥削之网，要么屈服于它”。<sup>③</sup>

## 五、结语

近年来，国外学界对“尺度问题”的空间研究探讨持续升温，这表明空间尺度（spatial scale）已经成为描述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动态转型的重要理论范畴。21世纪的资本主义空间一方面将以往层级分明的空间尺度相互融通，构建出总体性的社会空间新样态；另一方面又依托各空间尺度的差异性，建构起有机结合的多尺度空间构型。由此，空间形态在城市空间尺度、国家空间尺度、全球空间尺度和主体空间尺度四个层次上呈现出新的特征。第一，在城市空间尺度上，通过全球城市推动新一轮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消费，这不仅表征着空间形态差异化的趋势，也成为空间形态嬗变的逻辑起点。第二，在国家空间尺度上，通过新国家空间巩固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空间关系和协调全球资本循环的动态平衡，这不仅表征着空间形态动态化的趋势，也成为空间形态嬗变的逻辑中轴。第三，在全球空间尺度上，通过新世界体系将资本主义微观的时空关系上升为宏观的空间秩序，这不仅表征着空间形态再中心化的趋势，还是空间形态嬗变的逻辑展开。第四，在主体空间尺度上，通过对多元离散的空间主体进行共同性剥削，构建价值生产的新场域，以调整资本的全球布展，这是空间形态嬗变的逻辑旨归。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形态在以上四个空间尺度上所呈现出来的新特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而空间尺度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理论意义与研究价值。

责任编辑：徐博雅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37.

②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p.134-135.

③ [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页。

#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伦理思想的重构与超越 \*

马凤阳

**[摘要]**面对希腊城邦共有精神家园的衰落，伊壁鸠鲁以实践性疗愈哲学突破理性主义伦理学的自足，通过原子论与伦理学的融合，为个体构筑守护灵魂安宁的唯物主义根基。一方面，马克思为伊壁鸠鲁的伦理方案所深刻激励，坚持以实践性原则面向现实世界，基于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相统一的立场重塑好生活。另一方面，为了摆脱伊壁鸠鲁欲望疗愈术招致的困境，马克思以感性—理性、自然—社会、物质—精神三重统一的辩证需要观，将伊壁鸠鲁私人花园的自我治理提升为全人类解放的存在论革命。马克思对伊壁鸠鲁伦理思想的解读凸显了古典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可能性运用逻辑和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伊壁鸠鲁 欲望 需要 好生活

〔中图分类号〕A811；B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8-0037-07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曾创造性地将伊壁鸠鲁残篇中“自在地存在”转化为“自觉的体系存在”，<sup>①</sup>这一改造绝非表层的术语游戏，而是批判性重释古典伦理思想的奠基性宣言。纵观其思想历程，伊壁鸠鲁的实践性伦理基因持续内嵌于马克思的“好生活”筹划，并被提升为改造世界的革命行动。不仅如此，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感性—理性、自然—社会、物质—精神三重统一的辩证需要观，揭露了伊壁鸠鲁欲望疗愈术的虚妄性，将伊壁鸠鲁私人花园的自我治理提升为全人类解放的存在论革命，为好生活的通达指明了现实路径。

## 一、伊壁鸠鲁的伦理课题及其解决方案

希腊化时代初期，剧烈的社会变革打破了城邦本位的政治伦理，原先依附于城邦母体并受其庇佑的个体被抛入广阔的帝国空间。随着维系共同体认同的价值基础衰微，失序的政治实践不再激起个体的归属感，如何为个体在巨变中重铸生存价值与目的，成为伊壁鸠鲁等希腊化时期哲学家共同面对的伦理课题。

### （一）突破理性主义道德哲学的自足性，强调哲学的实践疗愈功能

为了解决希腊城邦文明由盛转衰的时代问题，苏格拉底最先把哲学从自然领域拉入人间，力图建立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继承这一主题，建立起以伦理原则为基础的政治学，他们强调人的自我实现（隐德莱希）、善、幸福与优良的城邦政制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但是，柏拉图的理念论预设了内在理智世界和外在自然世界之间的完美和谐，这在后期哲学派别的发展中导致了一系

\*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批判及其伦理筹划研究”（TJZXQN24-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马凤阳，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300384）。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82页。

列后果：取消了对理念的批判性分析和对客体的经验性考察，对道德的考察无法建立在自由自主的人格基础上，对普遍概念的追求无法弥合时代巨变下多样化利益倾向对共同体的撕裂等。因此，伊壁鸠鲁给自己的哲学规定的首要目的亦即品质是实践性的——必须走出理性的自我满足，在此岸、于感性世界中寻求获得幸福的坚实力。面对破碎的世界和人类的痛苦，伊壁鸠鲁提出，幸福就是快乐，快乐在于免除痛苦，获得心灵的宁静。而“人若不是过着智慧、高贵、公正的生活，就不可能快乐”。<sup>①</sup>在伊壁鸠鲁那里，德性被视为获得幸福与快乐的手段。

伊壁鸠鲁变革了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伦理观，这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他一反柏拉图理念论对感性的贬斥和对抽象观念的过分强调，主张重新恢复感性知觉的作用，即“必须完全遵循感觉，也就是直接印象，无论它是理智的还是其他某种感官的”。<sup>②</sup>伊壁鸠鲁所强调的感觉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避免陷入怀疑派的主观真理、相对真理，因为对真理的取消势必会损害正义的生活；另一方面倡导人们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实践的生活态度，在变动的生活世界中主动地追逐快乐和幸福，不消极避世。如果理性的自足性原则凌驾于此岸的感性世界，则“出人意表、语境性和特殊性的伦理价值”可能会丧失。意图让理智完全与情感隔离，“不仅使我们丧失了情感的机动力量和认知力量，而且也使我们丧失了它们对人类所具有的内在价值”。<sup>③</sup>在伊壁鸠鲁那里，感觉背后所指向的独特的伦理价值是不可通约的，这愈发证明了哲学的实践性功能与意义。当生活世界笼罩着悲观、怀疑、认命的迷雾，之前坚守的原则和信念逐渐坍塌时，伊壁鸠鲁抓住刻在人类基因中最初始的记忆，让众人重视当下生活感觉的有效性，守住自身的内在幸福。这一哲学原则不仅疗愈了希腊化时期一众迷茫、痛苦的灵魂，也为饱受虚无主义之苦的尼采带来了莫大的安慰。难怪尼采对伊壁鸠鲁的哲学曾发出如此感慨：“我也在阿卡狄亚”。在尼采眼中，伊壁鸠鲁是“英雄—田园诗般哲学思考方式的发明者”，给世人带来“伟大、宁静、明亮”。<sup>④</sup>

## （二）融合自然科学与伦理学，关照好生活得以实现的双重向度

尽管伊壁鸠鲁基于个体的幸福、快乐强调人的欲望疗愈和灵魂自足，但他的伦理思考并非仅是一种追求自我安慰而罔顾现实世界运转的心理学或唯意志论，也不是“一项为了知识或者为了获得控制自然和别人的权利而进行的无关紧要的社会研究”。<sup>⑤</sup>伊壁鸠鲁的伦理学的确建立于情感基础之上，但在他那里，快乐作为幸福的情感准则，渗透着对自然、社会、人生等各领域的科学认知，灵魂之安定被锚定在自然科学之善的基础上。这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认识具有内在一致性，“如果人的价值和优先性与客观正确的东西冲突，它们就会处在糟糕的生活中而不自知，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就会毫无意义”。<sup>⑥</sup>就本体论层次而言，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重返伊奥尼亚学派的“自然探究”传统，破除了神化自然传统的复魅。伊壁鸠鲁强调自然哲学的重要性，因为“它除去对自然奥秘的无知；提供自制，因为它解释了欲望的本性，区分了欲望的不同类型……确立了知识的规范和标准，提供辨别真假的方式”。<sup>⑦</sup>为此，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学说进行了重构，建立起新的自然哲学，为其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前提。

其一，伊壁鸠鲁的唯物论斩断了目的论神学锁链，这不仅解放了自然科学，更奠定了自然科学与伦

① [古罗马]西塞罗：《论至善和至恶》，石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② [古希腊]伊壁鸠鲁、[古罗马]卢克来修：《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包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③ [美]玛莎·C. 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徐向东、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480-481页。

④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8-559页。

⑤ [美]麦卡锡编：《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十九世纪德国社会理论与古典的时代》，郝亿春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5页。

⑥ [美]伍德：《黑格尔的伦理思想》，黄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90页。

⑦ [古罗马]西塞罗：《论至善和至恶》，第30页。

理学相统一的基石。在伊壁鸠鲁看来，“运动、位置、亏蚀、升起、降落以及诸如此类现象的发生，不是因为有一个享有一切福祉和不可毁灭的存在物在支配它们、安排它们”。<sup>①</sup>当自然哲学从世界自身的运动解释宇宙时，科学性认知得以确立，宗教侵扰旋即被驱逐。在此基础上，伊壁鸠鲁建立起实践理性优先的认识论思路，强调自然科学必须“为了人”，着力于实现心灵宁静。因此，伊壁鸠鲁破除的不仅是传统希腊哲学天体系统，更是实体哲学的精神桎梏。在伊壁鸠鲁那里，认识论、自然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唯物论通道得以打通，为新世界伦理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客观力量。

其二，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哲学是对机械因果论、实证主义自然科学的反抗，为个体的自由预留了理论空间。德谟克利特将原子运动简化为直线下落的必然性，使人完全受制于原子法则，其经验科学最终导向了封闭的实证主义。而伊壁鸠鲁引入的偏斜运动，不仅赋予原子质的规定性（如重量差异），更通过直线运动与偏斜运动之间的张力，揭示了“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与本质、物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sup>②</sup>这种矛盾使原子摆脱了单一必然性，在排斥与聚合中生成现象世界，从而沟通了感性经验与原子法则的可知性。这种“抽象可能性”与“现实可能性”间的辩证关系，既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又为自我意识的自由意志留下了空间——正如原子通过偏斜挣脱直线轨迹，人也能通过否定必然性获得自由。因此，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不是实证论的经验科学，而成为批判性科学的雏形：它通过原子概念的辩证运动，消解了决定论对个体的压制，使哲学从“内在之光”转向现实世界。

## 二、马克思对伊壁鸠鲁伦理原则的创造性转化

伊壁鸠鲁哲学之所以会进入马克思的思想视域，固然有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源于二者相似的时代境遇及其引发的跨时空思想共振。马克思身处德国观念论解体的危机时刻（“后黑格尔时代”），恰如伊壁鸠鲁处于希腊实体哲学崩塌的“精神解体”时期，二者皆需为原子化个体提供新的生活秩序与精神支持。正是这种对抗文明危机的同构性使命，使伊壁鸠鲁对传统哲学的反叛成为马克思超越黑格尔体系、批判旧文明的隐秘火种。博士论文完成后，伊壁鸠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并未退场。回溯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考察其内部隐藏的伦理思考，可以发现马克思自觉继承了伊壁鸠鲁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并将其转化为塑造新生活秩序的重要理论力量。

### （一）突出伦理原则的实践性，立足于现实世界筹划好生活

回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可知，在康德批判精神的照耀下，德国哲学中的理性探索以思想自身为批判对象，现象世界开始围绕理性旋转，人因道德意志的自我立法而被赋予自由和尊严。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提供的关于道德法则的普遍公式先验地钳制了个体，缺失社会历史空间所内嵌的具体普遍性指引。因此，黑格尔强调制度化的、客观的伦理秩序对个体生活的规范，但是在黑格尔那里，伦理生活被统摄于绝对精神的理性化进程中，概念上的“应当”消解了改革的动力。而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哲学残篇的创造性阅读，迈出了突破黑格尔构建的绝对理性秩序的第一步。伊壁鸠鲁作为“柏拉图政治表演的反对者和与科学结盟的高贵神学的作者”，<sup>③</sup>深刻地激励了马克思。实际上，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然以伊壁鸠鲁为名，开始驱逐黑格尔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他“砸碎了使精神同社会现实隔离开来的封闭圈，并且努力在哲学和现实的社会环境之间建立一种能动的、富有成果的关系”。<sup>④</sup>可以说，伊壁鸠鲁哲学彰显的自由精神和勇于打破传统理论秩序的哲学创造力，为马克思打破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哲学体系提供了启示，催促着马克思于世俗的现实中开启自由生活之门。

具体而言，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哲学体现出的战斗性及其对外在世界表面的统一性和强制性的突破，给予了青年马克思充沛的思想能量。“这种‘力量’，这种‘偏斜’，就是原子的反抗、顽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页。

③ Marcin Milkowski, “Idyllic Heroism: Nietzsche’s View of Epicurus”, *The Journal of Nietzsche Studies*, no.15, Spring 1998, pp.70-79.

④ 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284页。

就是它‘胸中的某种东西’；这种力量表明的对世界的态度并不是分裂的、机械的世界对单个人的态度。”<sup>①</sup>马克思于此处表达的正是打破思维与存在同质性的实践立场。他强调，自由的理论精神必须打破自身的内在自足和完整，去反思世界，在世界中实现自身。只有这样，理论才能变为现实。如果用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取消异质性的实在性，那么，知识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丰富和发展，人们将永远在无知的状态中。实际上，马克思从博士论文开始就已开启了超越思辨批判的道路。后来，马克思立足于内在批判与规范批判的双重立场，既没有把资本主义的秩序视为外在的“物自体”，也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运用同一性逻辑消解批判所蕴藏的真实力量，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分析和考察中，指明物化的社会结构得以自我打破的内在否定力量和现实力量。基于此，马克思对未来好生活提出一系列构想，这些构想并非纯粹的理论演绎，而是变革世界的力量。他主张，不能仅从认识论层面考察伦理原则，而应将其转化为共同的社会实践。实践才是幸福论、认识论的出路，好生活的通达依赖的是理论与现实的相互靠近，而不是消极地持守概念上的应当。相较于把批判的力量埋葬于自我意识哲学的德国批判，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英国和法国社会批判运动的主体：“这些劳累不堪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历史正在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sup>②</sup>这就是说，工人的革命性实践不仅改变了客观的现实条件，也会重新塑造自身的观念世界，拉近人与其应然生活状态间的距离，弥合概念与现实间的缝隙。

## （二）政治经济学与伦理学相统一，揭露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虚假合理性

在启蒙主义哲学家那里，科学与伦理学的融合是矛盾的、成问题的。他们仿照科学范式，先是为社会世界设置一个科学原点——原初状态的人，接着又以自然人的自我保存欲求为基础，层层设置一套建基于必然性的政治科学或社会科学体系。在这种规划中，人被当成最低限度的人，他们为了满足欲望、基本需要而相互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学逐渐为政治科学所取代，对好生活的追求逐渐让位于对合法的政治生活的探查。尤其是，随着近代以来部类科学的发展，伦理学逐渐同各门科学相分离，并逐渐独立为一门研究道德情感或道德规范的“科学”。这一方面导致了伦理学研究的困境——研究对象逐渐被其他部类科学抢夺，研究领域变得逐渐狭窄；另一方面也使各部类科学的发展逐渐远离了对人的内在生活状态的审视。而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研究，重新强调古希腊哲学传统中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紧密关联。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批判从早期到后来的发展，一直没有缺失对人的内在生活状态的审视。对人的自由、幸福等的价值预设始终没有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考察中离场，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始终交织着规范批判，形构了马克思关于好生活筹划的立体空间。

在马克思那里，个体好生活的获得并非仅取决于个体的主观状态或个体德性的修炼，而是一项综合性的科学（Wissenschaft）议题。马克思反对实证主义科学，因其只是对现象的表象再现——“他们只是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sup>③</sup>概念与事实之间的经验联结已然经历了心灵的审视，在社会世界及其范畴之间不仅存在着关于现象的实证连接，还潜藏着各种意义关系。真正的科学必然是批判的，在考察理想社会时，人的目光、伦理学的视野不可或缺。因此，马克思尤为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sup>④</sup>真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证主义科学给予的仅仅是认识论层面的“真”，而价值层面的“真”则需要突破工具理性视域。“真理是存在而非知识的特性，因为只有在对象成为其应然所是的时候才是真实的。”<sup>⑤</sup>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形成史和资本主义历史结构的批判与辩证重建，揭示了人的应然存在的真理，他关于好生活的思考，综合了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是真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⑤ George E. McCarthy, *Marx' Critique of Science and Positivism: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p.143.

的科学考察。一方面，马克思在对人的自由与自我实现进行思考时，不是仅仅基于一种规范考察，而是深入社会世界现实内部人的自由与特定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时，没有臣服于现存的意识形态——资本生产的合理性和永恒性神话，而是通过史料整理、工厂调研和数据运算，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所进行的科学批判，始终渗透着伦理批判，即揭露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结构对人的自由与自我实现的深层压制。在马克思看来，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实证科学研究所获得的规律性认识，实际上呈现的只是一种客观性的假象，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作既定事实的“价值”“资本”“平等交换”“市场正义”等，并非天然合理且永恒存在的。商品、货币和资本运动背后呈现的是尚未自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结合伦理批判穿透这种异己的客观性、机械的物化世界，个体异化和不自由的根源就永远无法找到。可以说，离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伦理学是空的，而离开了伦理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盲的。<sup>①</sup>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考察内在地形塑了其社会伦理立场。

### 三、马克思对伊壁鸠鲁伦理困境的超越

伊壁鸠鲁哲学中内蕴的革新精神和启蒙意义曾为马克思突破既定规范提供了精神力量。但是伊壁鸠鲁的欲望疗愈术以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为起点和终点，其对好生活的追求悬置了公共性，破坏了好生活得以培育的根基，最终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所吸纳，并固化为资本逻辑再生产中的一个环节。为了打破这一伦理困境，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通过历史唯物主义重构“需要”的本质，以私有制的扬弃和共同体的重建为根本路径，开辟通往好生活的现实通道。

#### (一) 伊壁鸠鲁的欲望疗愈术及其伦理困境

面对共同生活崩坏招致的“生存焦虑”，伊壁鸠鲁将伦理实践转向个体的欲望疗愈术。他认为，既然冷峻的逻各斯论证无法安顿灵魂，哲学就必须成为疗愈众生的实践医术。在伊壁鸠鲁的诊断中，问题的关键指向了欲望的管理。“在所有的欲望中，有的是自然的和必要的，有的是自然的但不是必要的；有的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要的，而是由于虚幻的意见产生的。”<sup>②</sup>痛苦根源于欲望的无限扩张，自然而然的欲望（如饥饿时摄入食物）可以祛除痛苦，但那些自然而非必要的欲望（如奢侈的财富）则是毫无意义的。唯有通过审慎的欲望管理，选择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方能实现灵魂自足，抵御恐惧。尽管伊壁鸠鲁试图通过其欲望疗愈哲学揭示众生不幸产生的根源，以平息灵魂的不安。但是，当“灵魂安宁”以悬置公共性为代价时，其欲望管理实践就堕入了双重困境。

其一，伊壁鸠鲁的欲望疗愈术无法调和感性根基与理性超越性之间的矛盾，个体的整全性伦理生活难以重建。康德曾揭示出伊壁鸠鲁伦理学的感性悖论：即使伊壁鸠鲁试图辨析快乐表象的知性来源，但其以愉悦情感作为意志规定根据的立场，本质上仍将道德降格为“与低级的欲求能力相适合的规定根据”。<sup>③</sup>这种感性原则即便崇尚简朴生活，也终将因依赖经验的偶然性而滑向纵欲主义，无法建立起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因此，康德主张纯粹理性应独立规定意志，斩断一切情感质料的羁绊，但这引发了更深刻的困境。对此，黑格尔尖锐地指出，康德形式主义的道德命令割裂了人的经验存在与理性存在，使应然道德沦为缺乏客观性的主观呓语，<sup>④</sup>无法重建整全性的伦理生活。为弥合裂痕，黑格尔提出应当通过对冲动的理性反思，将其纯化为“意志规定的合理体系”，<sup>⑤</sup>使欲望满足上升为“满足的总和”，在自由意志中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然而黑格尔的调和仍困囿于理念王国。实际上，康德和黑格尔都没有走出伊壁鸠鲁幸福论的盲区——脱离历史社会结构，在意识、精神内部寻找确定性。康德误将理

<sup>①</sup> 参见[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主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1页。

<sup>②</sup> [古希腊]伊壁鸠鲁、[古罗马]卢克莱修：《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第41页。

<sup>③</sup> 李秋零编：《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26页。

<sup>④</sup> 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金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40-141页。

<sup>⑤</sup>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9页。

性抽象为超历史法则，无视自我决定的方式已被社会所规定这一现实；黑格尔虽触及冲动的社会化摄取，却将自由意志的实践悬置于思辨领域。二者的理论困境共同倒向伊壁鸠鲁伦理思想的矛盾：当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始终停留在主体意识的内部循环时，个体将永远无法触及真正的“好生活”。

其二，伊壁鸠鲁所倡导的囿于个体精神内部的欲望管理术沦为资本主义规训工人的意识形态工具，摧毁了工人通达好生活的可能。伊壁鸠鲁的幸福论预设了一个超历史、原子化的孤立个体——其幸福仅需通过内在的欲望管理就可以实现，全然独立于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与阶级关系等条件的规制。这种去社会化的抽象自我治理术恰被资产阶级现代性话语捕获，扭曲为规训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器。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曾对伊壁鸠鲁的节制欲望理念进行阐释并指出，尽管“勤劳不懈、忍受痛苦、勇敢面对危险或死亡”<sup>①</sup>等不舒适的处境被人类天性所拒斥，但其却因能够避免不幸、羞耻和痛苦，赢得自由、财产、快乐、幸福和国家安定而值得欲求。伊壁鸠鲁主义对肉体快乐的追求基于效用逻辑，他认为，这具有一种“合宜性”。伊壁鸠鲁的欲望管理术在实践中被国民经济学家转译为规范工人行为的道德律令，贫困则被归咎为个体欲望管理的失败，这巧妙地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秘密。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其本质：当国民经济学家鼓吹伊壁鸠鲁式节制时，实则是“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sup>②</sup>至此，伊壁鸠鲁疗愈个体的哲学方案彻底悖反为资本压榨的伦理遮羞布——所谓“自然欲望”的纯洁性，在历史实践中沦为将工人阶级禁锢在生存底线上枷锁。

## （二）马克思对伊壁鸠鲁伦理困境的突围

伊壁鸠鲁哲学以原子偏斜般的自由意志对抗命运决定论，但是其欲望疗愈术却被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征用为规训工人阶级的“节俭”道德律令。这种悖谬向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深刻的伦理命题：当一种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哲学在实践中沦为压迫的工具时，何以重建解放路径，通达好生活？为此，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中，将“欲望疗愈”从原子化个体的精神训练转化为全人类解放的存在论革命。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自然主义欲望论的虚妄性，以历史唯物主义重构“需要”的辩证本质。在伊壁鸠鲁那里，欲望的实现指向人的自然需要，尤其是一种不受社会规定“污染”的自然正当性需要之满足，在他的思想视域中，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相对立。而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强调人的感性需要和理性需要、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内在地不可分割的。在马克思看来，不存在纯粹的前社会的自然欲望状态，“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客观地存在着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sup>③</sup>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动物性欲望已然经过社会条件所中介，呈现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统一，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却将这一统一撕裂。异化劳动迫使工人需要体系全面异化，当劳动沦为维系肉体生存的手段时，人的感性需要和理性需要相对立，社会需要被压缩为生存性的自然需要，精神需要为生存性的物质需要所全面取代。这种生存状态使得工人“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sup>④</sup>劳动与自由、幸福截然对立，从事劳动的工人阶级和享用全部文明成果的资产阶级相对立。针对此异化图景，马克思的“好生活”筹划直指整全性生活的通达，这种生活是对单向度生活、片面化生存状态的拒斥，是对资本增殖的需要凌驾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之逻辑的否定，是对人性繁盛需求的重新肯认。个体的整全生活不能被割裂为相互对立的两面，既不能执着于感性需要的满足而忽视智性、理性的丰富，也不能屈服于资本增殖的逻辑，将个体化约为可计算的抽象的一般价值，忽视个体自然禀赋的差异及其所导向的需要的差异性。好生活的通达要求保障个体在生产关系中的平等地位，以个体差异性的自由发展推动共同体全面性的生成，进而反哺个体普遍性的提升。

①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9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1页。

其次，马克思揭露了建基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欲望疗愈术的意识形态幻象，提出以私有制扬弃和共同体重建通达好生活。伊壁鸠鲁倡导的死亡恐惧疗愈与身体守护最终导向了自我隐退的花园哲学，这在实践中只会加剧个体的“原子化”状态，甚至沦为资本逻辑规训工人的意识形态工具。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条件下，个体生产实践和交往活动虽然是为了彼此的需要而进行的，但是它的实现是以“物”为中介的，<sup>①</sup>由此所导致的悖论是生产持续运转不是为了使用价值本身，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是为了“物”的积聚，生产端和需求端之间的鸿沟日趋扩大。为了弥合鸿沟，社会成员的物质欲望不断被制造出来，伊壁鸠鲁式的欲望管理术将无力与之相对抗。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基于私有制以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自由交换，塑造出一个“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占统治地位的“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sup>②</sup>个体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求会进一步固化资本逻辑的生产。质言之，以原子论个人主义预设为前提的伊壁鸠鲁式欲望管理术终将沦为资本自我实现的一个环节。

因此，马克思指出，扬弃私有制才能破除需要异化的物质基础。当附着在劳动过程中的不合理的形式规定得以驱逐，生产的增长重新服务于社会成员的真实需要，对交换价值的追逐为对劳动活动特殊性本身的关注所代替时，主体与客体、他我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才能随之得以重建。此时，劳动作为“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sup>③</sup>和对象化活动的统一，会重新成为个体自我实现的本质环节。诚然，个体的自然禀赋和需要存在差异，具有私人化、个性化的特质，但由个体相互交往生成的公共空间正是由于特殊性之间的碰撞才彰显出活力，并最终反作用于个体认知水平和实践素养的提升，促成好生活的通达。

此外，伊壁鸠鲁以抽象的“前社会的自然人”为出发点实施欲望疗愈术，将善锚定于自然需求，实际上拒斥了人在本质上是政治动物的亚里士多德式假定。此路径将公共性悬置于个体安宁之外，破坏了好生活得以通达的现实根基。而马克思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依赖于共同体生活的重建。在构想未来共同体时，马克思提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sup>④</sup>的原则。“各尽所能”强调的是在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中实现躯体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多维发展；“按需分配”亦非纵欲主义，它奠基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所保障的生存需求满足之上，旨在实现人的发展性需要与共同体进步之间的辩证统一。满足需要的实践活动不再被降格为维持肉体生存的工具性手段，而是人性得以塑造和确证的现实场域，此即构成了人之为人的“良善生活”的核心要义。人的丰富性的培育取决于人生活于其中同时又是人的活动的结果的社会存在状态，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sup>⑤</sup>在满足人的丰富性需要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生成着类本质的全面性，而这种全面性无论是作为过程还是结果，都滋养着人的个性的繁盛。

综上，马克思既继承了伊壁鸠鲁伦理学的实践性原则与科学—伦理学统一原则，使伦理实践从思辨领域跃出并深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土壤，又批判性地将其退隐花园的欲望疗愈术提升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革命行动。马克思对伊壁鸠鲁伦理思想的批判性超越启示我们，个体的幸福、好生活的实现势必被置于关系之中，自我克制、退隐田园固然可以守得暂时安宁，但终非根本解决之道，应当立足于人类解放的现实需要，在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通达好生活。

责任编辑：徐博雅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页。

## 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 近代以降岭南音乐家群的代际薪传与艺术贡献 \*

闫骥爽

**[摘要]**近代岭南得风气之先，士子文人率先引入西学西乐，新式学堂推行音乐教育，学子留学出洋，岭南音乐家群由此形成，开启中国近代音乐的新篇章。100年来，岭南音乐家群代际薪火相传，历经首代发韧、掀起留学热潮、投身救亡洪流、社会主义革新及引领乐坛多元化发展等阶段，在音乐理论、创作实践、乐器改良、美学创新等方面革故鼎新、折衷中西、融汇古今，建立民族交响体系，推动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变革与发展，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音乐流派。新时代，岭南音乐家群继续遵循艺术发展规律，赓续文化根脉，顺应社会变革，增强文化自信，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话语体系。

**[关键词]**岭南音乐家群 岭南乐派 美学思想 艺术贡献 代际传承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8-0044-07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岭南音乐家群跨越百年，成就斐然，地位特殊。他们在音乐理论、创作实践、乐器改良、美学创新等方面融中西文化，革故鼎新，代际传承，对西方音乐借鉴吸收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独具特色的音乐流派，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影响深远。

### 一、“西学东渐、西乐东鉴”为岭南音乐家群形成营造独特的社会文化氛围

#### (一) 岭南得“西学东渐”风气之先，为“西乐东鉴”提供丰厚土壤

岭南地区因其地缘优势，明清以降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成为西方音乐的早期传播者。早在1585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与利玛窦在肇庆建立了教堂，教堂中配建了管风琴，颇受当地人的青睐。“声调悠扬的新乐器……中国人也羡慕我们的乐器，他们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结构的新颖。”<sup>①</sup>传教士还在澳门、广州、肇庆、韶关等地建立了教堂和教会学校，传授西方音乐教育，引进了合唱、乐器演奏等音乐课，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sup>②</sup>

根据1922年《中华归主》统计的资料显示，岭南的基督教中学共有37所，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广东省教会中学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sup>③</sup>这些教会学校将音乐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例如，澳门圣若瑟修道院、香港马礼逊学堂、广州女子真光书院等学校将歌咏、乐器演奏、基本乐理作为正式课程内容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岭南文化项目“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岭南音乐家群的代际研究”(GD22LN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闫骥爽，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145)。

①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6页。

② 汤开建：《16—18世纪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洋音乐家考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57页。

供学童学习，改良了中国传统音乐口传心授的教育。<sup>①</sup>英国传教士普兰雅曾在香港和北京传教，发现岭南地区人民因得风气之先，更易接受西方音乐。<sup>②</sup>

### （二）士子文人关注西学、引入西乐，东西音乐交流探索初露锋芒

在“西学东渐”影响下，岭南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也开始关注西方音乐，并对中国新音乐进行探索。梁启超等人认为文学与音乐都是改造国民精神面貌的重要途径，并寄望于新音乐与新文学的相互革新。梁启超所作的近代戏剧《新罗马传奇》《劫灰梦传奇》和麦仲华在《新民丛报》发表的《血海花传奇》都是新文学戏剧的代表之作。丘鹤俦编著的音乐工具书《弦歌必读》，成为岭南民间音乐理论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之后他陆续编印了《琴学新编》《国乐新声》《琴谱精华》等著作，这些著作被认为是岭南现代音乐的启蒙之作，促进了传统音乐理论的整理、传承和发展，为后来的学者和音乐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考。

在此推动下，岭南民间音乐开始呈现明显的中西融合趋势。粤剧作为岭南传统戏曲的代表，在西方音乐的影响下吸纳了西方歌剧、舞剧的表现技巧。西方乐器如小提琴、钢琴、萨克斯等也逐渐在粤剧伴奏中占据一席之地，与传统的胡琴、梆子、板鼓等乐器相结合，丰富了粤剧的音色层次。甚至粤剧的重要领奏乐器高胡，也是由制琴家司徒梦岩及其学生吕文成在传统二胡的基础上，模仿小提琴高音改制而成。高胡音域比二胡更高，音色也更为清澈明丽，为粤剧注入了更强的艺术感染力。

### （三）新式学堂推行音乐教育，学子留学出洋，岭南音乐家群形成之滥觞

随着“西学东渐”的演进，一批新式学堂在岭南地区相继建立，如政府创办于1864年的广州同文馆和1887年的广雅书院，以及私立的万木草堂、南强公学和觉是学堂等。这些学堂率先将音乐纳入课程体系。例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中设立音乐课程，其时间较清政府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正式将音乐纳入课程体系的规定早逾10年。这些学校通过引入欧美及日本的曲调进行诗词填词，推动了学生读谱能力的培养和演唱活动的普及。这些举措提升了岭南地区的音乐水平，也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投身于音乐事业。

随着新式音乐教育的兴起，岭南地区的音乐人才渴望开拓国际视野，掀起了海外留学的热潮。这一趋势加强了岭南音乐与国际文化的交流，为近代中国音乐事业的腾飞注入了新动力。萧友梅便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幼年在澳门灌根草堂接受中西合璧的教育，并学习外语和西洋音乐，这为他日后赴德国深造并成为中国首位音乐博士奠定了基础。同样，冼星海在岭南大学中学部学习音乐基础知识，随后前往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深造，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事业的重要奠基者。留学经历为岭南音乐家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国际化的视角，促进了中国音乐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 二、“中西结合、革故鼎新”，推动岭南音乐家群代际薪传、青出于蓝

当前学界对代际研究的划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按照出生年代划分，相同年代的人因成长环境的相似性而展现出共同的特征与精神风貌；二是根据重大历史事件或思潮划分代际，如李泽厚等学者提出的“辛亥一代”“五四一代”等。本文综合采用这两种方法，以音乐家考入专业音乐院校的时间为基点，并结合中国音乐发展中的重要历史节点，从萧友梅1901年赴日本留学至2000年的百年历史划分为五个代际。

### （一）从留学兴起到“上海国立音乐院”创办，岭南音乐家群首代发韧（1901—1927）

萧友梅、廖尚果、王瑞娴、李树化是岭南音乐家群形成的奠基人。萧友梅，广东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人，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他先后留学日本、德国，1916年获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先后创立北大音乐传习所、上海国立音乐院。廖尚果，惠州府城（今惠州城区桥西）

<sup>①</sup> 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页。

<sup>②</sup> 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西国乐法东渐——从傅兰雅的教学实践看“主音嗖乏”教学法在晚清的传播》，《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2年第3期。

人，1912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法学，兼修钢琴和作曲理论。1927年因参与广州起义被通缉化名“青主”，在上海国立音乐院任职并编辑校刊和《乐艺》音乐杂志。王瑞娴出生于香港，1914年她以庚子赔款首批公费留美学习音乐，回国后先后在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和上海国立音乐院任教。

1927年11月，时任南京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的蔡元培和萧友梅一起创办了上海国立音乐院（1929年“国立音乐院”改组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56年改组为上海音乐学院），此乃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揭开了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史新的一页。萧友梅将当时能够找到的著名中外音乐家，或高薪聘请或苦言相劝，网罗在自己麾下。如前述廖尚果、王瑞娴，及旅美音乐家黄自、俄罗斯著名钢琴家查哈罗夫等。第一代音乐家群依托上海国立音乐院编撰了中国第一批经典音乐著作和音乐理论教材，首次详实地介绍了西方音乐体系，培养并影响了中国近代第一批专业音乐人才。这批音乐家也创作了多种体裁的音乐作品，如萧友梅的《哀悼进行曲》《问》和廖尚果的《大江东去》等。

### （二）借留学热潮之势，洋为中用擘划中国民族乐派新蓝图（1927—1937）

第二代岭南音乐家群多赴法勤工俭学，如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促进小提琴民族化进程第一人的马思聪、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第二任教务主任陈洪、中国第一代指挥家郑志声均有留法背景。谭小麟在美国耶鲁追随著名的新古典主义作曲家保罗·亨德米特学习作曲，回国后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成为中国近代为数不多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作曲家。他们和国内新成长起来的岭南音乐家林声翕、何士德、陆仲任、廖辅叔、何安东遥相互应，使第二代岭南音乐家群呈枝繁叶茂、欣欣向荣之势。

第二代岭南音乐家群效法俄罗斯的“国民乐派”，并借鉴西洋音乐理论与实践擘划中国民族乐派新蓝图。陈洪指出：“俄罗斯音乐以前一味模仿德国，近百年来才发达起来，产生五位杰出音乐家，形成国民乐派。”<sup>①</sup>受俄国学术思潮启发，第二代岭南音乐家群的作品形式和体裁逐渐丰富，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更加成熟。例如，马思聪的《内蒙组曲》和《山林之歌》分别融入了内蒙古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及云南少数民族山歌，展现了更为多元的艺术表现手法。冼星海在法国留学期间创作的单簧管作品《风》，不仅引起了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的赏识，还促使他成功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印象派大师拉威尔也对《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深刻展现了东方文明的独特魅力。<sup>②</sup>

### （三）投身抗日救亡洪流，积极探索实践“文艺大众化”（1937—1949）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为培养抗战文艺人才，于1938年在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延安鲁艺以短训班的形式办学，先后聘吕骥、冼星海为音乐系主任，培训了大批音乐人才，其中代表人物有李焕之、李凌、罗浪、韦虹、周国瑾、刘恒之、梁寒光、李鹰航、陈紫等，成为第三代岭南音乐家群的中坚力量。他们与同时期崭露头角的岭南音乐家叶纯之、黄飞立、施明新、陈培勋、司徒华城、司徒志文等一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文化大潮，为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文艺方针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三代岭南音乐家群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人民性。在众多抗战题材音乐作品中，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脱颖而出，其深厚的民族情感与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中国音乐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李焕之、陈紫等人参与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歌剧《白毛女》以独特的民族曲调展现人物性格，是大众文艺的巅峰之作。“全剧的音乐素材可分为民歌和戏曲两大类：民歌有河北民歌《小白菜》、《青阳传》、《太平调》，山西民歌《捡麦根》、《胡桃树开花》等；戏曲音乐素材有秦腔、山西梆子和河北梆子。”<sup>③</sup>

### （四）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推动音乐本土化革新（1949—19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四代岭南音乐家群借鉴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强调音乐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紧密结合。此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大高

<sup>①</sup> 翟颖慧：《新音乐运动的先行者》，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sup>②</sup> 盛夏：《“风”回路转，柳暗花明——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系列故事（三）》，《琴童》2020年第5期。

<sup>③</sup> 李诗原：《歌剧〈白毛女〉“延安版”初探》，《音乐研究》2021年第4期。

校，如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广州音乐专科学校等，包括陈肖容、叶佩英、赵宋光、肖民、杨庶正、黄日进、罗小平、李淇、林耀基、郑秋枫等人。他们通过音乐作品积极宣传党的施政纲领，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记录时代的变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展现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

第四代音乐家群在适应社会进步和人民精神需求的背景下，开创了中国音乐表演与创作的新局面。叶佩英首唱《我爱你中国》，以其真挚的情感使这首歌成为凝聚民族团结、弘扬家国情怀的重要作品。其创作者郑秋枫虽是辽宁人，但长期在岭南工作，为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第五届主席。电影音乐在此时期也蓬勃发展，张棣昌为《党的女儿》和《赵一曼》等电影配乐，并创作了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谈到电影歌曲创作，张棣昌认为，“电影音乐创作，首先要扎扎实实地到生活中去掌握第一手材料”。<sup>①</sup>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特点，为新中国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引领乐坛多元发展（1977—2000）

1977年，经过十年的中断，高考制度得以恢复，第五代岭南音乐家群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涵盖了叶小纲、陈怡、刘长安、陈小奇、李海鹰、刘为光、唐永葆、陈国产、周广平、莫华伦等。改革开放以来，岭南音乐家以开拓创新的精神，以民族情怀为基石，在国际乐坛彰显中国风格的独特韵味，为岭南音乐的全球传播注入了新活力。

第五代岭南音乐家群以与时俱进的国际视野，创作出一批引领乐坛多元发展的杰作。如叶小纲的《大地之歌》和《中国之诗》。“其个人的创作特点体现在深厚的西方传统作曲功底上，同时以出人意料却耐人寻味的整体布局、色彩化的五声结构和声、融入戏曲元素的行腔旋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个性化的音乐美学。”<sup>②</sup>陈怡的《春夜喜雨》和《胡琴组曲》巧妙结合了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语言，展现出独具一格的音乐风貌。刘长安创作的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入选《新中国舞台影视艺术精品选》，其作品因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浓厚的情感力量赢得广泛赞誉。李海鹰的代表作《弯弯的月亮》在流行与民族元素的融合中体现出卓越的艺术感染力。

### 三、“折衷中西、东西融汇”促使中国近现代音乐创新绽放艺术奇葩

#### （一）吸纳西乐创作技法，推动中国音乐变革

20世纪初，萧友梅、廖尚果等留德音乐家群体，将德奥和声体系引入并奠定了近代西方技法本土化的基础。萧友梅通过其《和声学》教材提出：“应另寻出适宜于中国音乐之和声……而在西乐和声，大小调之三度音均为不可缺者。”<sup>③</sup>黄自指出，该教材只介绍了传统和声，未涉及瓦格纳的九和弦、德彪西的全音音阶及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sup>④</sup>对此萧友梅回应，国乐的改良应采取渐进式引进策略，兼顾本土听觉习惯，优先引进基础和声体系，而现代派更激进的和声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因此先不做介绍。<sup>⑤</sup>

20世纪30年代末，留学法国和美国的学者将法国印象派与美国新古典主义的音乐技法引入国内。“比较拉威尔的管弦乐组曲《鹅妈妈》与马思聪的《山林之歌》可以发现，两首作品在多层织体写法、曲式风格、意境营造、管弦乐配器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sup>⑥</sup>在美国新古典主义大师亨德米特的影响下，谭小麟的音序理论更强调音程结构的组织性和功能性。在谭小麟的《小提琴与中提琴二重奏》中，作曲家继承了亨氏“二音序”的和声结构和纯五度与纯四度的音程构造原则，使传统五声调式在新古典主义和声框架内获得新的表现力。<sup>⑦</sup>

① 廖曙辉：《新中国电影音乐事业的开拓者张棣昌——纪念张棣昌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岭南音乐》2018年第4期。

② 张书皓：《叶小纲〈大地之歌〉“叶氏风格”创作分析》，《音乐创作》2023年第6期。

③ 萧友梅：《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443页。

④ 黄自：《和声学·序》，萧友梅：《和声学》，上海：商务印书房，1932年，第3页。

⑤ 萧友梅：《和声学》，第4页。

⑥ 曾宏：《马思聪、冼星海音乐美学思想比较研究》，《四川戏剧》2017年第11期。

⑦ 徐玺宝、杨春晖：《谭小麟〈小提琴与中提琴二重奏〉的创作特征》，《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改革开放后，表现主义与十二音体系等更丰富的作曲技术被引入国门。例如，叶小纲的《大地之歌》既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的内涵，又展现了现代音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旋律上将中国传统民歌与戏曲的元素巧妙融入其中。“在《宴陶家亭子》中，声乐旋律不仅借鉴了江西民歌《杜鹃花儿开》的音调，还融入了京剧《贵妃醉酒》中‘海岛冰轮初转腾’唱词的旋律骨干音高框架。”<sup>①</sup>在和声上，创新性地提出“半音化五声性和声”，为中国音乐注入了新的表现方式。<sup>②</sup>陈怡的《春夜喜雨》和《胡琴组曲》以京胡和二胡为核心，与西方管弦乐巧妙结合，打破了中西乐器分隔的传统局限。百年来，从功能和声的本土化改良到现代技法的创造性转化，岭南音乐家群体通过代际传承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体系。

### （二）折衷中西美学思想，创新人民音乐风格

20世纪中国音乐的现代转型，本质上是美学精神的觉醒与重构，岭南音乐家群的折衷主义音乐风格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折衷主义作为一种超越单一范式的综合方法，广泛应用于哲学、艺术等领域，其核心在于择优取用、融合互补，以适应特定文化语境和审美需求。如音乐的姊妹艺术“岭南画派”自诞生以来便以折衷为旨归，取法中西，以求融汇新变。<sup>③</sup>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岭南地区的美术和音乐家们在东西方美学对话中，通过折衷多种理论、方法与风格，重塑中国艺术，构建起兼具民族根性与全球视野的创新体系。

这种折衷思想不仅是作曲技术的融合，更在情感表达和形式结构上兼顾传统审美，使其更贴近听众的情感共鸣。如廖尚果所作的《大江东去》，巧妙地将舒伯特艺术歌曲的结构与宋词吟诵有机结合。作品通过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戏剧性对比，既保留了苏轼词作的古典气韵，又赋予歌曲交响化的情感张力。廖尚果曾形象地将国乐的改良比作民国时期的女性旗袍：虽然外形依旧是清朝旗袍，但在剪裁上借鉴了西式服装的设计，展现出现代感。如旗袍的改良，代际百余年的岭南音乐家群体虽然时代、背景、师承各异，但始终扎根民族传统，择优取用西方技法，融汇创新，创作契合时代文化语境与人民审美需求的音乐作品。

岭南音乐家群的美学思想植根于人民生活，展现鲜明的人民性和时代精神。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作为《讲话》的亲历者与忠实践行者，李焕之强调音乐创作要属于民族、属于时代、属于人民。<sup>④</sup>20世纪60年代，部分西方音乐体裁与演奏方法一度被视为“反民族风格”。李凌剖析了当时的认知偏差，倡导继续用折衷包容的视野开展音乐创作：“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音乐传统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学习西洋创作经验，以创作民族新声，和介绍人家的优秀曲作、乐器及唱法以丰富我们的音乐生活，同样也是我们的历史任务。”<sup>⑤</sup>这一主张突破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外来文化的对立，不仅捍卫了民族音乐的多样性与艺术生命力，也坚定地维护了岭南音乐家群折衷美学的思想价值。

### （三）创作民族音乐作品，记录近代社会变迁

岭南音乐家群的作品不仅是技法创新的载体，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象与时代叙事。萧友梅创办上海国立音乐院时，提出“一方输入世界音乐，一方从事整理国乐，期趋向于大同，而培植国民美与和的神志及其艺术”。<sup>⑥</sup>这一时期涌现出《问》《大江东去》《悲秋》等艺术歌曲以深邃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音乐表现力，不仅提升了大众的审美素养，还激发了民族意识，振奋了国民精神。抗战时期，音乐成为民族救亡的强大力量，《黄河大合唱》《民族解放交响乐》等作品以激昂旋律鼓舞士气，成为战斗动员的象

① 童颖：《叶小钢音乐创作中的和声技法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张书皓：《叶小钢〈大地之歌〉“叶氏风格”创作分析》，《音乐创作》2023年第6期。

③ 陈继春：《关于高剑僧》，《美术学报》2017年第3期。

④ 李焕之：《关于当前音乐创作的几点意见——在“音乐舞蹈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4期。

⑤ 李凌：《音乐的民族风格问题续谈》，《人民音乐》1957年第1期。

⑥ 王明辉：《十年〈申报〉音乐资料整理、分类及其作用探究》，上海音乐学院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征。冼星海曾亲自指挥《黄河大合唱》，伴奏队伍中李凌拉二胡，李鹰航弹三弦，李焕之拉手风琴，战士们听后深受触动，纷纷请战杀敌。

抗战结束后，岭南音乐家群的创作重心逐步转向红色文化与人民大众的深入表达，他们以民生疾苦与社会现实为题材，创作出一系列贴近生活、朴实真挚的作品。如李焕之、梁寒光、张鲁、陈紫等创作的《白毛女》《兰花花》《王贵与李香香》等歌剧，生动刻画人物形象，再现人民的生活与情感，深受群众喜爱，甚至有人带着干粮跟随观看鲁艺巡演，可见其广泛影响力。此外，《红旗的歌》《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春耕曲》等作品不仅面向知识分子，更服务于工农兵，成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歌声。这些音乐作品见证了民族觉醒与文化认同，推动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深远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岭南音乐家群通过传承创新、时代表达和跨文化交流，打造兼具民族特色与国际视野的音乐体系，以满足社会发展中人民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杨庶正创作交响组曲《岭南风情》和《春到深圳湾》，以交响乐形式展现岭南地域风貌和人文气息。叶小纲的《五色枇杷》《大地之歌》等作品登上维也纳音乐厅、纽约林肯中心等国际舞台。陈怡的《中国神话大合唱》通过国际音乐节传播，逐渐使岭南区域文化转化为世界共享的艺术语言。

#### （四）引入和改良乐器，创建现代民族交响乐团

1922年，萧友梅在成立北大音乐传习所后，组建了中国最早的交响乐团，为中西乐器的融合奠定了基础。萧友梅深刻认识到西方演奏体系的重要性，积极引进西方交响乐器，同时以钢琴为教学与排练的核心乐器。他亲自组织学生建设交响乐团，采用西方标准编制，演奏曲目涵盖西方经典与中西结合的原创作品。这支乐团不仅提升了公众对交响乐的认知，还成为中国交响乐发展的先行者，充分展现了萧友梅在音乐教育和文化融合方面的远见卓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音乐界在吸收西方管弦乐理论基础上，组建民族交响乐团，开启传统乐器的现代化改良。1960年，中央民族乐团在文化部批准下成立，由李焕之担任首任指挥，整合了笙、琵琶、二胡等传统乐器，填补了民族乐器纵向和声的空白。然而，传统乐器在律制、音域、音量等方面不统一，制约了发展。在中央音乐学院时任院长马思聪推动下，李元庆等人通过科技手段，将传统乐器调整为十二平均律，优化管乐器音孔位置并增加半音、提升音准和移调能力，同时改良弦乐器音量平衡乐队音响。通过这些改进，乐器表现力大幅提升，为民族交响乐团的标准化编制奠定了技术基础。

1962年，李焕之在《民族乐队的创作问题》一文提出：“一个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而又有丰富表现力的大型民族交响乐队，在不久的将来会以它完备的规模和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乐坛上。”<sup>①</sup>这种新型乐队为作曲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春节序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等作品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民族乐团的代表性剧目。同时，作曲家如约翰·凯奇和皮埃尔·布列兹等，将中国古琴、琵琶、笛子等民族乐器融入西方现代作品中，展现了浓厚的东方韵味，深化了中西音乐的对话与合作。

### 四、结语

岭南音乐家群根植于岭南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形式，形成了融合传统底蕴与创新精神的独特风格，推动了中国音乐现代化的进程。进入新时代，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扬岭南音乐家群创造性地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优势，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彰显文化自信的时代精神。

#### （一）赓续文化根脉，代际推陈出新，谱写中国音乐新章

岭南音乐家群在音乐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从早期的中国新音乐，到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岭南乐派”，通过折衷主义美学思想与兼收并蓄的艺术风格，为中国音乐创作开辟了新天地，推动了代际传承与发展，在多个层面实现了创新突破。在技法上，巧妙融合中西方作曲理论，推动音乐教育和创作的

<sup>①</sup> 赵洪斌：《20世纪民族器乐合奏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革新；在美学上，探索中西折衷风格，为中国音乐注入新的思想活力；在作品上，整理古今音乐，创作立足人民、回应时代的新作；在乐器改革上，改良民族乐器并尝试交响化呈现，推动民族管弦乐的发展。

萧友梅曾预言，中国音乐在引入统一的记谱法与和声体系后，将在保留民族情感的基础上焕发新生，成为中国人民世代相承的重要文化遗产。<sup>①</sup>回溯 20 世纪初的乐教启蒙，至当代活跃于国际舞台，其群体在传承中华优秀音乐传统的同时，积极吸纳西方音乐技法与现代思想，逐步形成了兼具中国各地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的音乐风格。

### （二）顺应社会变革，描绘时代风貌，构建民族音乐话语

岭南音乐家群活跃于各历史交汇点上，延续了民族音乐精髓，更创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音乐表达体系，在近现代中国音乐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新时代的语境中，岭南乐派愈加彰显了文化自信在现代音乐创作中的核心地位，深刻影响着音乐创作的方向与内涵。

岭南音乐家群在文化主体性建设及跨文化传播中的创新实践，充分展现了其在培育文化自信方面所提供的丰富实践案例和深刻思考。以李焕之的《春节序曲》为例，该作品将民间音乐展衍逻辑与西方变奏技法相结合，成功实现了民族音乐语言的现代化升级，既强化了听众的文化认同感，又提升了其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岭南音乐家群体通过不断的创作、推广与国际交流，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时代活力，其群体丰厚的艺术遗产无疑将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续写新的辉煌篇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阐释提供重要参考。

### （三）遵循艺术规律，借鉴画派理念，深化岭南乐派定位

从艺术流派发展的规律来看，其风格的形成与传播往往需要较长的积淀过程。哲学作为艺术思想的源头，通过解析审美理念、历史语境和价值体系，为各类艺术形式提供理论支撑，然后通过各门类学科渐次展示。以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为例，于 18 世纪末已影响文学和史学领域，继而影响到美术领域，而浪漫主义音乐的发展和成熟却延后数十年。

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岭南乐派的演进过程。岭南画派作为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流派，以“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艺术理念，实现了西方写实技法与中国传统笔墨韵味的有机结合，使其既承袭传统又体现创新，为中国画现代化开辟了新路径。与之对照，1984 年，时任星海音乐学院院长赵宋光提出“岭南乐派”的概念，并引发学界的热论，至今其内涵界定仍在不断深化。因此，对岭南音乐家群的研究可借鉴岭南画派研究模式，剖析其风格演变与传播机制，以推动学术认同与理论体系的构建，并通过与国内外乐派的对比分析揭示其文化身份与独特价值。

责任编辑：许 磊

---

<sup>①</sup> 萧友梅：《17 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陈聆群、齐毓怡编：《萧友梅全集·文论专著卷》，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年，第 46 页。

# 《点石斋画报》与书画传播：以任伯年为中心<sup>\*</sup>

陶小军

**[摘要]**晚清通过石印新技术出版的《点石斋画报》，作为一种图像叙事媒介，为书画作品的图像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的固定渠道和相对单一的受众圈层，由此带来了书画艺术的大众化普及。以《点石斋画报》与任伯年的互动为例，《点石斋画报》给以任伯年为代表的书画家群体提供书画宣传和鬻艺的多元平台；而任伯年则借助画报、画册等不同形式的“类艺术品”让自己的书画作品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场合，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宣传与传播形成极为便利的条件，借此宣传平台也进一步形塑了自己书画家的形象。

**[关键词]**画报 传播 任伯年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8-0051-07

## 一、近代石印技术与《点石斋画报》

石印技术传入中国与西方传教活动紧密相关。在近代中国活动的西方传教士为了扩大其影响力，便利用石印技术印制宗教读物以宣传教义。在此过程中，石印技术制版快捷对传统雕版印刷行业形成冲击，亦使得新兴文化刊物日渐兴隆，并影响到社会民众的生活方式。如韩琦所述：“在石印技术的初期传入阶段，对国人而言仍是新鲜事物，应用的范围十分有限……早期石印技术在上海地区的广泛传播与传教活动密切相关。1846年，麦都斯首先将石印技术引入上海，在上海墨海书馆印制众多正规性的宗教读物。”<sup>①</sup>

1876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所设的土山湾印书馆使用石印技术刊印出一批宣传天主教的书籍。这一时期，石印技术的传播和应用范围虽然有所突破，但仍以宗教宣传活动为主。1878年，点石斋书局创立，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石印技术印制书籍的商业出版机构。

石印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应用，使得中国传统绘画在保持原样的基础上可以快速及大量地印制。利用石印技术来印刷，能够最大程度接近原稿，具有快捷高效、成本低廉、图像精准等优势，还可以根据需要，完成大小不等的缩放印制，为图像高效复制、传播提供了可能。石斋书局大量印制各种中国传统书籍、字画，同时还专门印制各种供科举考试使用的参考书籍，图像的高效复制和传播使得阅读门槛大大降低，尤为适合大众阶层追求新奇、娱乐的文化需求。

1879年1月1日，申报馆在《申报》刊登了一则石印楹联出售启事，其中特别强调运用石印技术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丝绸之路视域下中欧绘画交流通史研究”(24JZD018)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晚清书画消费活动研究”(24FYB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陶小军，上海交通大学文创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0)。

① 韩琦：《晚清西方印刷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石印术的传入为例》，韩琦、[意]米盖拉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7页。

印制的书画作品与原迹不差毫厘，且印制速度高效快捷，数千百本即时便可完成，所耗费用极低，这实际上是一种宣传广告和营销策略。按《申报》所载：“本馆近从外洋购取照印字画新式机器一付，因特创点石斋精室，延请名师监印，凡字之波折、画之皴染，皆与原本不爽毫厘。兹先取古今名家法书楹联琴条等，用照相法照于石上，然后以墨水印入各笺，视之与濡毫染翰者无二。夫中国之字画皆以手摹者为贵，而刻板者不尚，然古人之名迹有限，斯世之珍庋无多，欲购一真迹，非数十金数百金不办，然犹有赝鼎之虞也。兹则无论年代之久远，但将原本一照于石，数千百本咄嗟立办，而浓淡深浅着手成春，此固中华开辟以来第一巧法也。”<sup>①</sup>由于具有方便快捷、价格低廉、图像保真的特点，石印技术逐渐被拓展至典籍、碑帖、书画、戏曲、小说等领域，也因为大众阶层的群体性消费，直接推动了商业美术时代的到来。

在众多石印画报中，《点石斋画报》的表现尤为突出。该报融合中西绘画技法，创作出极具视觉冲击效果的新式视觉文化产品，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和文化消费需求，并形成了持续性的画报热，“本馆印行画报，非徒以笔墨供人玩好，盖寓果报于书画，借书画为劝惩其事信而有征，其文浅而易晓。故士夫可读也，下而贩夫牧竖，亦可助科头跣足之倾谈，男子可观也……而且外洋新出一器，乍创一物，凡有利于国计民生者，立即绘图译说，以备官商采用。既扩见闻，亦资利益，故自开印以至今日，销售日盛一日”。<sup>②</sup>

画报作为一种新兴图像叙事媒介，具有知识普及、书画传播等兼具商业性、艺术性、知识性的特点，同样具有原初图像、文本的视觉感受、联想和想象等审美过程。并且画报的发行突破了传统书画经营机构、中介地域性的局限，依托其广泛的销售网络以及受众范围，成为书画家造势、书画推介的新兴载体，也促进了书画发展及其社会价值的多元生成。如按《申报》1895年8月29日所刊《论画报可以启蒙》载：“上海自通商以后，取效西法，日刊日报出售，欲使天下之人咸知世务，法至善也。然中国识字者少，不识字者多，安能人人尽阅报章，亦何能人人尽知报中之事？于是创设画报，月出数册。或取古人之事，绘之以为考据；或取报中近事，绘之以广见闻。况通商以后，天下一家，五洲之大，无奇不有。人之囿于乡曲，而得以稍知世事者，亦未始非画报之益。自来淫画之有千例禁者，因无论识字不识字之人，皆得败坏风俗，沉溺心志也；而今画报之可以畅销者，因无论识字不识字之人，皆得增其识见，扩其心胸也。”<sup>③</sup>

在文化消费带动下，以石印技术为主的画报、画册因其广泛的传播、普及功能，迅速成为市民阶层娱乐休闲、传播新知的重要方式与途径，也为文人的书画鬻艺提供新的机遇。同时，石印技术与原初作品之间在图像的复制、转刻中形成特殊的图像“转易”与“二次创作”，构成了别样的观看方式与审美体验。

## 二、《点石斋画报》的营销策略与书画宣传

《点石斋画报》虽然为商业性画报，但其出版定位并非仅停留在商业化经营方面。画报在传入中国之前，主要依托绘图传播社会新闻与时事，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在西方视角中成为传播先进科技、价值观念的重要媒介，而于中国社会而言，画报依托其图文形式将晦涩难懂的知识通俗化、世俗化，加快知识的普及。“且古往今来事事物物、形形色色之奇，有宣之于口而不能永者，则必以文传之。有笔之于文而不能罄者，则必以画达之，所以左史右图，古有明训。顾晚近来，中国书籍，汗牛充栋，幽奇俶诡，莫可名言，而图画则绝无而仅有。阅者知其名而不能究其状，此博物之所以难也”。<sup>④</sup>在出版发行中，《点石斋画报》选择中外异事、社会热点、时事动态等内容，极大满足了大众休闲娱乐的文化需求，因而阅报日渐成为大众生活的组成部分。

除了休闲娱乐之外，其丰富的图绘还为当时的儿童提供临摹图画的机会，充当德育与美育的启蒙书物。

① 《楹联出售》，《申报》1879年1月1日第1版。

② 申报馆主启：《第六号画报出售》，《申报》1884年6月26日第1版。

③ 《论画报可以启蒙》，《申报》1895年8月29日第1版。

④ 葛伯熙：《〈寰瀛画报〉考》，《新闻研究资料》1988年第1期。

在《点石斋画报》创刊 10 年后,《申报》于 1895 年 8 月 29 日刊载一篇题为《论画报可以启蒙》的文章,专门谈论画报的功能,特别论及了画报对于儿童群体的启蒙作用。“今画报之可以畅销者,因无论识字、不识字之人皆得增其识、扩其心胸也,不特士夫宜阅,商贾亦何不可阅,不特乡愚宜阅,妇女亦何不可阅。而余则谓最宜于小儿……殊非启蒙之道。现今画报盛行,宜家置一编,塾置一册,童子往往惮于读书,而喜于读画,识字不多不知文理,无怪读书之无味也,若画则有为其目之所尝见者,有为其目之所未尝见者,若者为人,若者为物,亦心焉识之,再经父兄指点之,塾师讲解之,初则但知其形,继则渐通其意。久之并可以知其事,童子记性最好,往往有幼时之事,至老不忘者,则此时所识之……且童子之质地聪颖者,初则喜看,后则喜摹,每见人家童子所摹之画,颇不恶劣,若不废弃,将来必成名手,始信有以诱之无,不可以成之也。”<sup>①</sup>画报作为儿童阅读的通俗性读物,比传统山塘图画更具有娱乐性,能够激发儿童阅读趣味,“激其志气、端正心术”,画报适合每家备置一册,作为儿童启蒙性刊物,已然成为晚清大众化日常生活的普及性读物。

《申报》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在当时具有较强号召力,美查<sup>②</sup>将《申报》与《点石斋画报》结合,依托《申报》发行网附赠销售画报,无疑进一步拓展了画报的阅读受众,为此,点石斋在全国各地拓展至 20 个分销点,以销售各式书籍、画报。如《点石斋各省分庄售书告白》刊载:“机器印书创自本斋,日渐恢扩,积盛于斯。历计十余年来,自印代印书籍,凡称书房习用者检点花名,应有尽有。兹于戊子己丑两年间各省皆设分庄以便士商就近购取,所有分售处所列后呈览:京都琉璃厂点石、汉口黄陂街点石、广东双门底点石、福建鼓楼前点石、苏州元妙观前点石、金陵东牌楼点石、杭州青云街点石、湖北三道街点石、湖南省府正街点石、四川重庆府陕西街点石、成都市城学道街点石、江西省城点石、山东省城点石、山西省城点石、河南省城鸿影菴街点石、陕西省城点石、云南省城点石、甘肃省城点石、广西省城点石、贵州省城点石。”<sup>③</sup>

美查灵活运用营销手段,将常规营售和特殊推销相结合,尤其借助《申报》的宣传力量,吸引消费者兴趣,激发需求。据《申报》于 1947 年 9 月 20 日所刊登的《七十五年来:本报的广告发行及其他》统计,至 1880 年《申报》发行已超过 5000 份,之后销数更是呈现累年递增的趋势。“同治十三年终,销数增加了一部,总数为一千二百份;光绪二年五月时,又增加了一倍,变为二千余份;翌年,又增加了一倍,变为五千份……到光绪六年时,依据本报记载,已有北京、天津、南京、武昌、汉口、南昌、九江、香港……等各处,都有本报发行,外埠各信局致代售本报,‘发行网’的组织,虽然不够健全严密,但着实算得相当广泛的了”。<sup>④</sup>点石斋分销点分布全国各大城市,且一般设立在各地市的经济、文化中心地带,有效促进了新兴视觉图像的传播、消费。

以郎世宁为代表的画家将中国传统笔墨手法与西方绘画技艺相糅合,极大影响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手法以及审美趣味。而《点石斋画报》在题材与表现形式上也糅合中西绘画手法,以体现都市生活、社会风尚,积极迎合市民阶层审美。与此同时,《点石斋画报》又根据实际需求,特别招聘、征求国内本土的书画家群体为画报绘图:“本斋新得奇书数种均属未经行世者,其事可惊可喜,而笔墨之精妙真所谓翩若惊鸿,矫若游龙。要非寻行数墨家所能望其项背。惟有说无图似欠全美,故特招请精于绘事者,照说绘图,襄成是事,如有丹青妙手,愿与此书并他者,即照前报所登画幅尺寸绘成样张,寄至上海点石斋账房,一经合用,当即函请至本斋面议一切,此布。”<sup>⑤</sup>

据资料显示,《点石斋画报》主绘者有吴友如、金蟾香、符良心、田子琳等人。吴友如作为《点石斋画报》的主笔者,同时亦创办了《飞影阁画报》,其对于石印图像深有感触:“古时经文皆勒石,孟蜀始以木板易;兹乃翻新更出奇,又从石上创新格;不用切磋与琢磨,不用雕镂与刻画;赤文青简顷刻成,

① 《论画报可以启蒙》,《申报》1895 年 8 月 29 日第 1 版。

② Ernest Major (美查) 是英国人、报业资本家,《申报》的主要创办者。

③ 《点石斋各省分庄售书告白》,《申报》1889 年 7 月 21 日第 1 版。

④ 《七十五年来:本报的广告发行及其他》,《申报》1947 年 9 月 20 日第 23 版。

⑤ 点石斋主人启:《招请名手绘图启》,《申报》1884 年 6 月 7 日第 1 版。

神工鬼斧泯无迹。”<sup>①</sup>与传统雕版印刷相比，石印技术不需要靡费人力、物力雕琢刻画，图像印制顷刻便可完成，亦可完美保留原迹图样。吴友如追求绘画创作跟随时代潮流，并以新兴画报文化刊物为中心，在题材选择上选取新兴事物和社会时风，同时革新绘画技法，绘画创作追求现代性，以迎合大众阶层的消费需求，如其所言：“蒙阅报诸君惠函，以谓画新闻，如应试诗文，虽极揣摩，终嫌时尚，似难留传。若绩册页，如名家著作，别开生面，独运精思，可资启迪，何不改弦易辙，弃短用长，以副同人之企望耶！”<sup>②</sup>与此同时，吴友如深感画报若专注于刊载新闻，难以紧随社会时尚风气而发展，而画家依托个人理解和想象，创造精巧而独具一格的艺术画册，犹如名家著作一般，更符合时人对雅俗共赏这一审美趣味的追求，亦可得以流传。

此外，点石斋还通过与海上画派群体合作，藉由图绘，招揽读者，极大地激发了购买者的消费需求，促使画报销路益盛。如《申报》于1885年4月11日所刊：“本斋画报之首于本年正月间，赠送画谱两图后，销路益形畅盛。可见名人手笔自是有目共赏。此次三十五号之罗汉图为阜长所绘，花卉图为伯年所绘。”<sup>③</sup>在此种经营下，《点石斋画报》创造出了极为符合市民阶层文化消费需求的新式视觉阅读图像，进一步推动画报的传播影响力。

### 三、《点石斋画报》与“海上名家”的书画宣传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其浓厚的商业氛围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吸引各地书画家汇集于此，开展书画鬻艺。而多元互动的消费需求促使海上书画家群体在承袭中国传统绘画笔墨手法、风格的同时，又汲取西方绘画技法、锐意革新，呈现出兼具中西文化特色、雅俗共赏的新式绘画面貌，尤为贴合市民阶层多样化的消费取向与审美需求。

1863年，任伯年初行上海，在古香室笺扇店以画扇面谋生，“(任伯年)初至沪渎，署名小楼，居豫园，极不得志”。<sup>④</sup>此后数年间，他又辗转于宁波、杭州、苏州等文化昌盛之地，以卖画治生。后来，经胡公寿的提携和赞助，得任阜长、张熊等人赏识，结识虚谷、吴昌硕等显要名士。同时他积极顺应书画市场需求，不断拓展绘画题材，“于画人像、人物、山水、花鸟、工写精写，莫不高妙”，<sup>⑤</sup>由此画声渐著，得以在书画市场中立足、发展。

从1869年始，任伯年寓居上海28年，此期成为其书画艺术发展的鼎盛阶段。任伯年早年间的市井生活和社交活动，使其充分吸收画工画、文人画，包括世俗类型等多方面的艺术素养，逐渐形成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任伯年的出现，在中国画坛是一个奇迹，任伯年的成就是划时代的，他的绘画深重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画创作”。<sup>⑥</sup>

当然，上海相对发达的经济文化环境，也为任伯年绘画艺术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其鬻艺期间，上海出版业的发展为书画作品的宣传、推销提供了新的载体，并逐渐成为书画家刊登商业广告的主流媒介。1879年8月28日，《申报》中刊登了一则由胡公寿、钱吉生、杨伯润、任伯年等海上书画名家联合绘制的册页，宣传出售的启事：“胡公寿花卉、钱吉生人物、杨伯润山水、胡铁梅山水、任伯年花鸟、朱梦庐花鸟、陶咏裳仕女以上寓沪诸公所绘册页数部，并皆精妙之作，各擅胜长，如有赏鉴家欲得而珍藏者，祈至二摆渡兆福里内鸳湖巢面谈可也。”<sup>⑦</sup>

1881年，点石斋书局运用石印技术缩印出版了颇便携带的《点石斋丛画》，<sup>⑧</sup>此画册涵盖古今中外的名家画作，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1882年11月21日，武林梦槐书屋又聘邀胡公寿、张子祥、任

① 吴友如：《申江胜景图》，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9页。

② 吴友如：《飞影阁画报小启》，《飞影阁画册》1893年9月第1号卷首。

③ 申报馆主人启：《三十五号画报出售》，《申报》1885年4月11日第1版。

④ 丁義元：《任伯年年譜》，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37页。

⑤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海派绘画研究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第717页。

⑥ 薛永年：《海派巨擘任伯年》，中国人物画研究会主编：《任伯年研究文集》，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⑦ 《名人画册》，《申报》1879年5月4日第1版。

⑧ 尊闻阁主人编：《点石斋丛画》，上海：点石斋书局石印，1885年。

阜长等精绘图画一百多幅，名为《海上名人画稿》，托付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出版，并于《申报》发表启事出售：“自有石印画本之法古今名作，俱可藉以不朽。通前人旧作，经俗手钩摹，便失庐山真面，或取使舟车缩作方寸小本，仅供儿童把玩，此近时石印诸画谱所以未臻尽善也。本斋不惜重资特求胡公寿、张子祥、邓铁仙、杨伯润、周云峰、任阜长、徐小仓、沈心海八大名家专为石印精绘各种人物、山水、双钩翎毛、草虫、竹石、花卉册页一百数十幅……属同文书局石印以公同好，其纸墨之精良，神采之生动，不特可为临池稿本，即以印成各叶，裱作屏幅、琴条、窗心、灯片均无不好，诚一举而两得，更物美而价廉，较之寻常画谱，判若天渊，惜所印不多，赏鉴家速向同文书局及各省书坊，争先快睹可也，每部价洋一元六角，如欲趸购，至上海法马路东兴圣街口大通布号面谈，其价格外折让。武林梦槐书屋主人谨白。”<sup>①</sup>

《海上名人画稿》一经推出便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1885年12月22日，畲经堂整合“海上名家”画作委托点石斋书局石印画册出售，并刊报云：“本堂珍藏名家书画多多，求蕊珠山长戴公评选跋美者胡公寿、钱吉生先生共十大家，托点石斋付诸石印以供高人清玩，可作屏条、灯片、窗心、册页诚一举两得，价廉物美之妙用也。每部洋三角，裱工外加托南北申昌各书坊发售，欲趸买者祈向屯镇胡开文墨庄面议可也。”<sup>②</sup>

上海石印产业的兴起与海上书画家群体的互动合作，推动了石印画册的流行与新式书画艺术传播媒介的形成，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艺术传播意义。任伯年是“海上画家”中较早与点石斋书局建立合作关系的书画家。1879年8月26日，点石斋书局运用石印技术印制包含任伯年在内的多位画家的绘画作品，并在《申报》中刊登商业广告，进行销售。其时虽然任伯年在海上画坛已经获得较高声誉，但经点石斋印制并发行后，无疑为其开展鬻艺、传播书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途径。当年11月22日，点石斋新印任伯年的《骑驴图》立轴，并在《申报》中发布出售启事：“本斋近又用石印照相法，印成任伯年先生所绘之《骑驴图》立轴是着色者，计洋一角正，已裱者加洋二角五分……以上两种皆极精妙，而收价甚廉，俱准于今十月初九日出售，海内赏鉴家向申报馆间壁之申昌书画室购取可也。”<sup>③</sup>任伯年作为绘画名手，其绘画作品限于创作数量和价格，对于普通大众阶层而言较难购求，而石印画作可以大量机械化复制，且价格甚低，更能够为大众阶层所接受。

石印机构印制出售的以画册为代表的诸多出版物与海上书画家群体之间的密切互动、合作，无疑提高了石印出版机构的销量，带来丰厚的利润，同时高效、大量的画册出版物也进一步提高海上书画家群体在书画市场中的份额占有率，对于提升其书画声誉具有显著作用。

#### 四、任伯年书画鬻艺与《点石斋画报》

《点石斋画报》的盛行与海上书画家群体之间构成密切的互利关系。《点石斋画报》依托海上画派名手绘图，以丰富的画报图像内容，迎合书画市场需求，提高销量；而画报广泛的销售网络和受众，不仅为书画家提供了鬻艺途径，同时亦可借助画报宣传、推介自身的书画艺术，提高其人在全国乃至海外的知名度。点石斋邀约任伯年、任阜长等名人画手为画报绘制插图，并特别将其所绘置于画报之首，可见点石斋对其人其画的重视，以及对于依托名人画手作为营销“噱头”的自信。

点石斋在《申报》刊载的《三十三号画报出售》的启事中，将任伯年所绘山水置于画报之首，盛赞任伯年画作超妙，可为鉴藏：“画报之待仍送益几两图，一为山水任君伯年所绘，一为人物沙君山春所绘，笔致超妙，大可宝贵，画报仍然九图末附《淞隐漫录图说》一则，阅者鉴之。此布。”<sup>④</sup>《点石斋画报》刊载的对于插图绘制者的画作评价，不失为一种新式的商业宣传广告，为书画家群体宣传书画艺术提供了新渠道。此后，点石斋三十七号画报又特地印入任伯年两幅画作，并写到“画报之首之画谱，一为《龙

<sup>①</sup> 武林梦槐书屋主人谨白：《海上名人画稿》，《申报》1885年11月21日第4版。

<sup>②</sup> 《石印画谱采新》，《申报》1885年12月22日第4版。

<sup>③</sup> 点石斋主人启：《新印名画出售》，《申报》1879年11月22日第1版。

<sup>④</sup> 申报馆主人启：《三十三号画报出售》，《申报》1885年3月22日第1版。

山落帽图》，一拟《欧阳子秋声赋意图》，俱系仕君伯年所绘，气象局古魄力沈雄迥非酣俗家所能彷彿准于十六日出售。画报仍然九图后附《淞隐漫录》一则，阅者鉴之。此布。”<sup>①</sup>画报之首所列任伯年画作增至两幅，应当是任伯年画作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喜好，取得较好反响。点石斋随后又在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七、五十、五十三号画报中持续刊印的两幅作品，皆为任伯年所创作的山水、人物、花鸟等题材的画作。《点石斋画报》与任伯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成为任伯年宣传自身书画艺术的重要平台。

《点石斋画报》极具商业经济意识和市场眼光，除了特地邀约海上画派名家为其持续性专门绘制画报插图外，亦善于发现市场热点，主动迎合大众文化消费需求。1880年初，时值年岁更新，大众皆以祭祀诸神为首要之事。点石斋特将任伯年所绘《山水总神图》石印应时出售：“催残腊鼓，岁将更新，万家报赛莫不以祀神为第一事……本斋曾以重润请任伯年先生用小李将军山水神轴之式绘成一幅，计长六尺，本斋石印而成。山水着以青绿秀色可餐，山水之间流云四布，长松插天，松下四神并立一城隍一土地一灶君一招财，惟井神则盘膝而坐，松旁有白石桥，一桥上为符神位，快马飞腾，神采发越，又左有杏花台，右有石藏画栏环绕，曲径通幽，山之巅则有天台一座，奇峰并峙，日月合璧，则帅位也。其画笔迥不犹人，凭诸中堂洵勘夺目。现本馆申昌书画室发售，计墨色者价洋五角，着色者一元，已裱者另加裱工洋六角正。此布。”<sup>②</sup>这则启事对任伯年的绘画技法、绘画题材、山水布局、风格特色进行详细介绍，以激发市民阶层的消费欲望，“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种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sup>③</sup>对于宣传任伯年绘画艺术具有重要作用。

此后，任伯年的绘画作品又陆续作为点石斋迎新时节的重要宣传进行刊印。如在1889年新年将近时，《点石斋画报》在启事中刊登即将印制任伯年所绘的《岁朝图》以应新年氛围，“明年第一期画报之首随送任伯年所绘《岁朝图》，阅者幸鉴及焉”“在一百七十七号画报中，画报按约刊印任伯年《岁朝图》，再附送任伯年《岁朝图》，前期已先告知，自呈雅鉴”。<sup>④⑤</sup>经此宣传，任伯年的《岁朝图》名气甚大，被社会广泛认可。“他（任伯年）的画艺名声很大，尤其是他画的‘岁朝清供图’，当年上海城内大户人家，几乎大半都有悬挂的”。<sup>⑥</sup>

另如1893年，《点石斋画报》刊印任伯年所绘制的传统吉祥图画《三羊开泰图》以庆贺新年：“爆竹声中倏更岁，序本斋仍循曩例聿献新图，如海舶之奇踪、香闺之艳迹，八老复耆英之会……及立春令节，儿童競作拖钩之戏事，既新异绘亦精良，准于初六日出售。另附任伯年先生《三阳开泰图》着色立轴一幅，随报分送不加分文，专肃布闻恭贺，年禧。”<sup>⑦</sup>

《点石斋画报》洞悉国人传统节日以及社会风俗，刊载传统习俗的风俗图，并邀约任伯年绘制，以迎合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消费需求。而对于任伯年而言，亦是展示自身书画艺术、提高鬻艺效率的重要契机。

受点石斋画报的影响，上海其他石印商家为扩大市场份额、激发消费力，提高产品竞争力，也开始寻求与任伯年合作，因此任伯年的绘画作品一时成为争相印制的对象。畲经堂整合海上名家画作，印制出售画册：“十大家画谱订成二本，一套计洋一元二角。其册页钱塘戴公钱吉生、张子祥先生每三角。胡公寿、任阜长、任伯年、朱梦庐、孙子书、余竹脩、周偆生先生每二角，裱成每加二角。托上海南北申昌及各书坊寄售，趸买祈向屯镇胡开文面议可也。畲经堂启。”<sup>⑧</sup>同文书局特地约请任伯年绘制《钟馗老君骑牛图》，付以石印出售：“本局特倩山阴任伯年先生绘成朱笔钟馗及老君骑牛图，任君久擅丹青，

① 申报馆主人启：《三十七号画报出售》，《申报》1885年4月30日第1版。

② 点石斋启：《任伯年绘山水总神图出售》，《申报》1880年1月23日第1版。

③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1页。

④ 点石斋启：《一百七十六号画报告白》，《申报》1889年1月27日第1版。

⑤ 《一百七十七号画报告白己丑正月初六日》，《申报》1889年2月5日第2版。

⑥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

⑦ 点石斋主人拜手：《三百二十七号画报告白》，《申报》1893年2月22日第1版。

⑧ 《石印画谱采新》，《申报》1885年12月22日第4版。

名扬中外，此两幅尤为得意之作。本局欲公同好，付石精印鬚眉活现，设色鲜妍，洵称妙品。钟馗仍用朱砂印成，每幅未裱实洋四角，裱成六尺堂轴者实洋六角，骑牛图价同，趸售格外从廉，请到本局账房面议可也。此布。同文书局谨启。”<sup>①</sup>

除了具有商业规模较大的书局之外，书画收藏家亦颇为注重搜集任伯年的绘画作品付以石印，并依托各大书画中介机构进行销售。在当时的上海书画市场中，扇面因大小合适、携带方便、价廉物美的特性成为热销一时的艺术消费品。嘉兴鼎华帽庄映雪斋主人不惜重资收集任伯年书画扇面付以石印，在上海各大笺纸店出售：“吴君鞠潭、任君伯年书画盛名中外珍重，兹不惜重价觅得二君书画扇面，付诸石印以公同好，每页只收工料洋二角，如欲趸售价当从廉，想诸鉴家必以先睹为快。寄售上海古香室、玉声堂、锦润堂、戏鸿堂，嘉兴鼎华帽庄映雪斋主人启。”<sup>②</sup>高效、精准的石印技术极大地拓展了任伯年的书画市场与消费受众，在此过程中，《点石斋画报》的流行无疑成就了任伯年在上海书画市场的地位。

## 五、结论

晚清时期，石印技术的传入与应用使得传统绘画艺术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此过程中，传统绘画作品经过石印技术的图像印刷，形成特有的欣赏方式和阅读趣味，并促使画家及其作品的观众达成相对稳定的审美互动。石印技术的引入和广泛运用，使得中国传统绘画在保持原样的基础上可以快速大量地印制，《点石斋画报》的盛行开启了晚清图像复制和图像大众化消费的新阶段。物质技术领域的革新促使大众精神领域形成了多元化的审美趣味，为文化消费兴盛提供了重要基础。市民阶层的崛起和文化消费的盛行，以画报等形式的书画作品宣传在大众阶层的流通和传播，推动了书画家及其艺术市场的构建，因而，以审美趣味为贯通渠道，画报有效搭建起审美交互的中介机制。《点石斋画报》的广泛传播，使得当时书画家的作品与大众审美趣味产生关联，新兴画报被赋予知识普及、提高审美、休闲娱乐、书画传播等多重价值。作为一种新兴图像叙事媒介，依托石印技术的高效影印和传播功能，画报突破了传统书画中介的地域性局限，使书画艺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书画家通过《点石斋画报》与大众阶层达成审美趣味的贯通，也直观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文艺产业传播的基本途径及其机制作用。

责任编辑：许磊

<sup>①</sup> 《石印任伯年画朱笔钟馗老君骑牛图》，《申报》1887年6月8日第4版。

<sup>②</sup> 《石印名人书画扇面》，《申报》1887年7月5日第5版。

政法社会学

·健康中国与社会发展·

# 整体协同：仿制药替代的政策分析和治理重构 \*

胡颖廉 陈晔

**[摘要]**仿制药替代是健康中国和质量强国两大战略的结合点，关乎人民生活品质。尽管受到超大规模医药市场激励以及最严格监管约束，我国依然长期面临仿制药质量风险。为此，需要客观评估仿制药替代政策效果，科学分析问题成因。我国仿制药替代政策形成了“强监管—强激励”格局，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产品安全有效、费用可负担、产业发展等政策目标；同时，仿制药替代政策特征与治理模式底层逻辑存在矛盾，体现在医药卫生体系上下游、监管体制和监管能力、供给侧和需求侧等方面，减弱甚至扭曲了激励和约束的作用。脱离治理谈政策并不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可基于整体治理理论，结合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原则，构建仿制药替代的“整体协同”治理模式。建议以药品带量集采政策优化医药产业结构，出台药品一致性评价和上市后监管政策组合以及完善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网络，持续优化仿制药替代的政策效果。

**[关键词]**仿制药替代 政策分析 整体治理理论 “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8-0058-08

## 一、问题提出

仿制药（Generic Drug）是指“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药品”。<sup>①</sup>用经过批准、具有相同临床效果的仿制药替代原研药（Generic Substitution），对于提高优质药品可及性和控制医药费用极为重要。<sup>②</sup>新时代以来，我国实施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等政策，有力推进了仿制药替代。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国家组织药品带量集采累计节省医保基金约4400亿元，其中的80%用于支持创新药研发；<sup>③</sup>以第一批集采药品用量为例，仿制药对原研药的总体替代率从2018年的50.5%增长到2023年的73.8%。<sup>④</sup>与此同时，仿制药替代也面临挑战，包括一致性评价异化为“一次性评价”，以及带量集采唯最低价中标。2025年初，媒体上掀起了一场关于集采药品质量风险的讨论，其背后是医生和患者对国产仿制药的复杂态度。尽管有关部门进行了回应，依然没能完全消除人们的疑虑。

实际上，针对仿制药替代政策效果偏差已有一些研究，总体形成4类解释。一是制度缺陷说，认为当前我国药品专利衔接制度、医保支付标准、药品上市后监管体系存在短板，制约仿制药替代的政

\* 本文系2024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研究”（2024MZD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颖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晔，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91）。

① 《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年第25号。

② Robert A. Lionberger, Jiang Wenlei and Gregory Geba, “Confidence in Generic Drug Substitution”, *Clinical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vol.94, no.4, 2013.

③ 《国家医保局召开“保障人民健康 赋能经济发展”新闻发布会》，国家医疗保障局网站：[https://www.nhsa.gov.cn/art/2025/1/17/art\\_52\\_15492.html](https://www.nhsa.gov.cn/art/2025/1/17/art_52_15492.html)，2025年1月17日。

④ 王浩扬、韩悦等：《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及接续政策对药品用量、价格及费用的影响研究》，《中国卫生经济》2024年第10期。

策效果。<sup>①</sup>二是技术决定说，主张生物等效性试验的标准和方法存在局限，健康志愿者单剂量试验也无法准确还原临床试验。<sup>②</sup>三是利益博弈说，指出在仿制药替代过程中，政府、医疗机构、药品企业、患者等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不一，直接影响政策效果。<sup>③</sup>四是社会认知说，认为患者对原研药的信任和依赖会影响其行为选择，并通过群体放大效应，增加仿制药替代政策的执行难度。<sup>④</sup>

上述观点揭示出仿制药替代政策的复杂性，启示我们这是一个多因素并发的结果。然而已有研究还停留于单一维度分析，缺少对仿制药替代政策的系统性审视，特别是无法回答在巨大医药市场激励和最严格监管约束下，为何仿制药质量风险还长期存在？本文将基于整体治理理论，评估仿制药替代的政策效果，探讨仿制药质量困境的生成逻辑，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 二、仿制药替代的国际经验和我国政策演进

仿制药替代政策一般有3方面内容。一是监管政策，包括药品审评审批和上市后监管，旨在保障仿制药质量安全。二是医疗保障政策，通过调整医保目录和支付方式，控制医疗费用和激励关键群体。三是产业政策，主要是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产业规划，以支持仿制药生产和储备。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疾病模式转变、医疗技术进步以及人口老龄化，发达国家医疗费用急剧上涨。各国政府纷纷制定政策，加大仿制药生产和使用力度。有观点认为，发达国家仿制药替代遵循了“接受仿制药—科学合理替代—持续反馈改进”的进程，并在实践中形成两类模式。

### （一）美日两国防制药替代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多方协作模式，其特点是政府监管、市场调节与社会参与联动。美国出台仿制药替代政策的直接动因，是药品价格高涨和仿制药审批困境，人们意识到原研药成本高昂远比仿制药质量问题更加迫切。<sup>⑤</sup>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药品价格竞争和专利补偿法案》( Hatch-Waxman Act )，各州也制定了鼓励仿制药替代的法律，多数还规定需要患者同意。具体而言，在监管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定期发布“橙皮书”列出可替代品种，同时建立严格的生物等效性标准以及仿制药替代监测评价体系，为决策提供参考。在市场端，集团采购组织（GPOs）作为中间商集成医院订单并开展竞争性采购，药品福利管理者（PBM）以处方分级管理来优化仿制药定价和使用，保险公司则通过报销比例引导患者选择更具性价比的药品。在使用端，医生在电子处方系统中开具仿制药，药剂师在配药费的激励下为患者积极调配仿制药，从而形成处方闭环。经过各方努力，2023年仿制药处方量在全美处方量中的占比达到90%，2014—2023年间共节省3.1万亿美元药费支出。<sup>⑥</sup>

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其特点是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仿制药替代。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医疗费用激增，日本政府于2007年制定《仿制药简便使用促进行动方案》( Action Program for Promotion of Easy-Mind Use of Generic Drugs )，统筹供给侧和需求侧，引导药品企业、医疗机构、行业协会共同推进仿制药替代。<sup>⑦</sup>为此，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开展3次药品再评价和1次品质审查，

<sup>①</sup> 颜建周、李大双等：《基于全周期管理的中美日仿制药替代促进政策对比研究》，《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23年第4期。

<sup>②</sup> Peter Meredith, “Bioequivalence and Other Unresolved Issues in Generic Drug Substitution”, *Clinical Therapeutics*, vol.25, no.11, 2003.

<sup>③</sup> 舒茜、姚峰蝶等：《药品带量采购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卫生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

<sup>④</sup> Qu Jinghan, Zuo Wei, Wang Shaohong, et al., “Knowledge,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of Pharmacists Regarding Generic Substitution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J Open*, no.11, 2021.

<sup>⑤</sup> Neil J. Facchinetto and W. Michael Dickson, “Access to Generic Drugs in The 1950s: The Politics of a Social Problem”,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72, no.5, 1982.

<sup>⑥</sup> “The U.S. Generic & Biosimilar Medicines Savings Report 2024”, Association for Accessible Medicines Website: <https://accessiblemeds.org/wp-content/uploads/2025/01/AAM-2024-Generic-Biosimilar-Medicines-Savings-Report.pdf>, March 2, 2025.

<sup>⑦</sup> Ryosuke Kurabayashi, Maki Matsuhama and Kenichi Mikami, “Regulation of Generic Drugs in Japa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The AAPS Journal*, vol.17, no.5, 2015.

确保仿制药质量安全。日本药品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负责监督仿制药上市后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跟踪调查仿制药质量信息，将有关评价信息汇编成技术指南。政府采用参考定价和动态调整相结合的方式，确保仿制药的价格优势。政府还投放公益广告，宣传仿制药与原研药一样安全，提高公众对仿制药的信任度。此外，日本仿制药协会（JGMA）和药品企业共同建立仿制药信息系统，为医疗机构和患者及时提供有关信息，提高医生开具仿制药的意愿。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2024年12月，日本仿制药替代原研药比例（按数量计算）达到90.8%，年均节省近1.3万亿日元。<sup>①</sup>

## （二）我国仿制药替代政策的格局

药品供应体系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四梁”之一，与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相并列，涵盖了药品生产经营、药品监管、医药行业管理以及新药创新等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食品药品供应体系始终围绕大安全目标，其重心从产业安全到质量安全再到创新安全，展现出国家对安全的自主追求。<sup>②</sup>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2024年末全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3亿人，<sup>③</sup>同时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超过3.1亿人。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价格高昂的原研药不可能成为药品供应体系的主流。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医药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国产仿制药质量还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仿制药替代政策呼之欲出，其旨在确保药品安全、有效和可及，并总体形成了“强监管—强激励”的格局。

一方面是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强监管”，包括遴选原研药等参比制剂以及采用生物等效性试验方法，通过提高技术和工艺门槛，保障仿制药安全性和有效性。我国是仿制药大国，医药产业长期存在企业多、规模小、结构散的特征。早期，仿制药只需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药品标准检验合格即可批准生产。2007年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仿制药需要与已经批准上市药品进行体内生物等效性试验，标志着监管重点从药品物质属性转向临床疗效。2015年《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参比制剂为原研药或国际公认的同种药品，从而实现与国际标准接轨。2018年后，评价范围从口服制剂扩展到注射剂和其他剂型。

另一方面是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强激励”，即通过量价挂钩和确保用量等政策，鼓励企业揭示真实成本，挤出药品流通领域水分，让人民群众以比较低廉的价格用上质量更高的药品。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河南省率先探索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之后该政策经历了医院和设区市招标采购、省级招标采购以及联盟带量采购等阶段。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试点范围包括4个直辖市在内的11个城市，首批25个中选药品平均降价幅度为52%。2019年，政策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国。2021年后药品带量集采进入提质扩面阶段，政策重点从低价转向质量，国家每年开展2—3批，截至2024年已经开展了10批。除国家层面外，地方集采也形成了省际联盟、省级、市际联盟、市级联动采购的立体架构。

## 三、仿制药替代的政策效果评估

根据一般逻辑，“强监管”约束加上“强激励”促进，会催生出强大的仿制药产业。那么上述举措的效果究竟如何？接下来将围绕安全有效、可负担、发展等政策目标，详细评估仿制药替代的政策效果。

### （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有所改善

政策对仿制药质量的影响表现为供给端的推动以及监管端的拉动。一方面，高准入门槛推动企业提高研发和生产水平，从源头保障药品质量。为赢得市场竞争优势，企业积极响应一致性评价要求。近年

<sup>①</sup> 《最近の調剤医療費（電算処理分）の動向（令和6年度12月号）》，日本厚生劳动省网站：<https://www.mhlw.go.jp/topics/medias/c-med/2024/12/dl/202412.pdf>，2025年5月9日。

<sup>②</sup> 胡颖廉：《从产业安全到营养安全：食品安全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以保健食品为例》，《学术研究》2023年第1期。

<sup>③</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2025年2月28日。

来，拥有过评仿制药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多，仅2023年就有811家。<sup>①</sup>同时根据图1所示，2017年以来化学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批准数量与注册申请数量比值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企业仿制水平逐步提高。另一方面，伴随企业水平提高，药品监管能力也不断加强。药监部门对集采中选企业和品种实行全覆盖检查和抽检，确保其质量安全。药监部门还与医保部门建立协同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风险的药品。《国家药品抽检年报》就表明，2019—2024年国家集采中选品种抽检合格率均为100%，<sup>②</sup>高于同期其他药品抽检合格率。

这种助推和倒逼的双向效应，提高了仿制药整体质量水平。根据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和主观评价，过评仿制药与原研药的实际临床疗效相似。以第二、第三批国家集采中选仿制药为例，其与原研药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相当，部分抗肿瘤药物临床疗效甚至略优于原研药。<sup>③</sup>从主观评价来看，一线医生普遍认可过评仿制药在普通病症、常规治疗中的疗效，认为其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达到与原研药相似的治疗效果；<sup>④</sup>民众对过评仿制药的接受度则普遍高于未过评仿制药。<sup>⑤</sup>这些都表明，一致性评价政策改善了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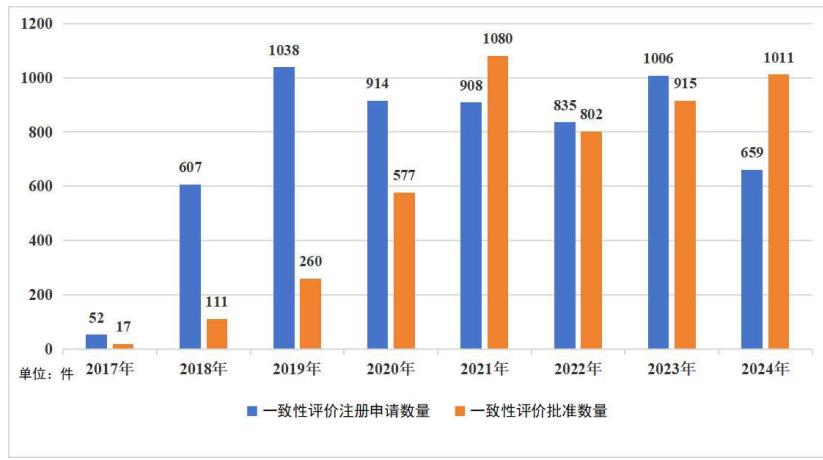


图1 2017—2024年我国化学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注册申请和批准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各年度药品审评报告，经作者整理。

## （二）药品可负担性显著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医药卫生体系存在药价虚高问题。有观点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政府管制失当使得公立医疗机构在药品使用环节获得双向垄断地位，并且具有抬高药品价格的权力。药品带量集采的本质在于医疗保障部门发挥团购作用，打破医疗机构垄断地位，用可预期的超大规模市场激励企业主动揭示药品真实成本，从而挤出药价虚高水分。换言之，“以量换价”切断了医疗机构与企业合谋的利益链条，大幅压缩药品流通环节成本，从两方面显著提高药品可负担性。一方面，集采政策节省了医保基金。有研究以前三批国家药品带量集采为例，认为相比政策实施前，集采每年可节省医保药品支出539亿元。<sup>⑥</sup>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数据进一步显示，前十批国家集采中选品种平均降价超过50%，有效提高了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实证研究还表明，集采政策不仅能够降低中选品种价格，还会产生波纹效应，带动未中选药

①《2023年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情况分析》，中国食品药品网：<http://www.cnpharm.com/c/2024-01-23/1036593.shtml>，2025年3月23日。

②《国家药品抽检年报（2024）》，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网站：<https://www.nifdc.org.cn/nifdc/bshff/gjchj/gjchjtzg/20250324175401137.html>，2025年3月24日。

③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仿制药疗效与安全性真实世界研究课题组：《国家集采仿制药疗效与安全性评价真实世界研究报告——以第二、三批集采为例》，《中国医疗保险》2023年第10期。

④Qu Jinghan, Zuo Wei, Roxane L. Took, et al., “A Nationwide Survey Exploring Physicians’ and Pharmacists’ Knowledge, Awareness and Perceptions Regarding Generic Medicines in China”,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vol.22, no.1, 2022.

⑤闫伟、周颖玉等：《中国居民对仿制药的认知及其相关因素的调查和分析》，《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22年第18期。

⑥陈志洪、徐宏：《中国药品集中采购政策解读与实证分析》，《系统管理学报》2021年第1期。

品降价。例如首轮国家集采后，未中选的 20 个原研药价格均呈现下降趋势，平均降幅超过 20%。<sup>①</sup> 另一方面，集采政策减少了患者药费支出。具体而言，有研究以首批国家药品带量集采中选药品为例，发现政策实施前患者使用中选药品一个疗程，平均支付费用约为 8.2 天的工资，而政策实施后只需 2.8 天的工资，减少了约三分之二。<sup>②</sup>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宏观数据也表明，2023 年全国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 26.90%，比 2018 年下降了 5.83 个百分点，而且是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一定程度上说明患者用药经济负担大幅度减轻。

### （三）国产仿制药市场份额大幅增长

仿制药替代政策对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体现在药品研制、经营和临床使用环节。一是在研制环节，政策推动企业从渠道创新向产品创新转变。我国药品企业的营销成本曾长期居高不下，如一些疫苗企业的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一度达到 38%，远高于国际同类水平。<sup>③</sup> 集采政策促使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扩大专利产出规模并且提升研发质量。<sup>④</sup> 以一致性评价过评品种数量最多的 5 家上市公司为例（按企业集团计），其 2024 年研发投入占比均高于 2017 年数值，销售费用占比则相应下降。<sup>⑤</sup> 二是在经营环节，政策提高过评品种的市场份额。由于政策优先将通过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纳入集采范围，使其占据优势地位。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官方机构公布的数据，2018—2023 年，销售额排名前 10 的企业始终占据化学仿制药市场规模约 20%，总体平稳；但其过评品种占总销售额的比例从 7% 持续上升到 36%，并且在 2021 年之后快速抬升，说明过评品种的市场份额大幅增长（图 2）。三是在临床使用环节，政策推动仿制药替代原研药。这既表现在集采中选品种的销售额上，也表现为仿制药的临床使用量。数据显示，2019—2023 年，被集采的过评品种在同品种院端市场的销售额占比持续提升，增长幅度超过 30%。<sup>⑥</sup> 如前文所述，首批国家集采中选品种采购量显著上升，原研药采购量则相应下降。仿制药数量替代率从 2018 年的 50.5% 提升至 2023 年的 73.8%，金额替代率也呈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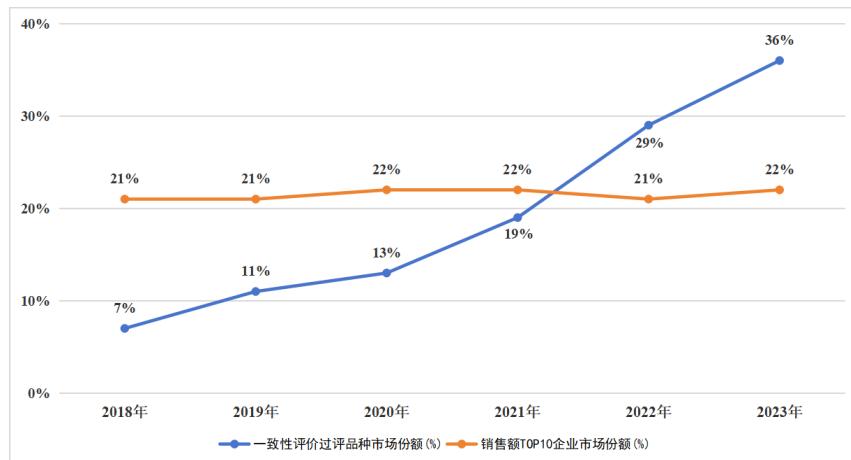


图 2 2017—2023 年我国化学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过评品种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编著的《中国仿制药发展报告（2023 年版）》，经作者整理。

① 谢金平、胡紫馨等：《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对四直辖市药品价格、费用及仿制药替代的影响分析》，《中国卫生经济》2021 年第 9 期。

② Yuan Jing, Lu Z. Kevin, Xiong Xiaomo, et al., “Lowering Drug Prices and Enhancing Pharmaceutical Affordability: An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Volume-Based Procurement (NVBP) Effect in China”, *BMJ Global Health*, no.6, 2021.

③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平衡监管和市场：疫苗安全的挑战和对策》，《中国行政管理》2018 年第 10 期。

④ 王少飞、张勇等：《药品集采政策与药企研发行为》，《经济问题》2025 年第 1 期。

⑤ 这 5 家上市公司分别是科伦药业、石药集团、人福医药、华海药业以及恒瑞医药，数据来源为“医药魔方”（<https://www.pharmcube.com>）。

⑥ 王森、王旭涛等：《一致性评价对中国仿制药行业的影响》，《中国医药工业杂志》2024 年第 11 期。

#### 四、仿制药替代政策特征和治理模式困境

尽管仿制药替代政策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在政策目标、政策主体和政策过程方面，呈现“三多三少”特征。一是目标设置多，价值兼容少。仿制药替代是一项系统工程，自始就包含了保障药品安全、促进药品可及、发展医药产业等多重目标。这些目标在理论上具有内在关联，但在政策实践中不易兼容。有关部门往往依据自身职能和特定目标函数制定仿制药替代政策，利益诉求在局部和短期并不一致，导致监管政策、医保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缺乏有效衔接。二是关注供方多，引导需方少。仿制药替代政策的着力点是供给侧的市场准入和质量监管，但忽视了需求侧的信任构建和使用激励。政策集中在药品审评审批、专利保护、采购和谈判价格等，但较少考虑医生、患者的认知和偏好。三是政府主导多，多元参与少。仿制药替代主要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行政科层的特征明显。如带量集采就是政府发挥医保基金战略性购买作用，直接干预药品价格形成；一致性评价则是政府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加强药品质量监管。虽然行政手段效率较高，但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市场机制和社会共治的空间。因此，我国仿制药替代水平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差距，部分集采仿制药疗效不佳，公众对仿制药质量的信心不足。归根到底，仿制药替代政策特征与治理模式底层逻辑存在矛盾，具体包括上下游、产管者、供需侧三方面。

##### （一）上下游：带量集采大批量化与医药产业“多小散”的矛盾

在我国医药卫生体系中，上游医药产业呈现企业多、规模小、分布散的特征，而下游医药卫生事业的资源和权力相对集中。这种上下游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制约了带量集采的政策效果，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规模不匹配。统计显示，2024年全球仿制药市场规模达4136亿美元。<sup>①</sup>根据国家药监局和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的数据，2023年我国仿制药市场规模近9000亿元，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多达4000余家，约80%为中小型企业且产品种类单一，难以适应带量集采的大批量化要求。过低的中标价格会影响行业生态，进一步制约产品质量和企业创新能力。西南某药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指出：“有些企业就靠一两个主打产品，集采是活下去的唯一办法，低于合理价格中标，再千方百计去降成本，你说质量能好吗？自己供不了货，还把别人的路给堵了”。（访谈资料：20250122）另一方面是优势不兼容。带量集采的初衷之一是提高医药市场集中度，但其嵌入到基础薄弱的医药产业，因此以挤占部分优质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为代价，非中选企业的市场份额被不断压缩，通俗说是“伤及无辜”。有研究还表明，在带量集采背景下，大多数中小型企业难以承受过低价格的压力，加之技术和议价能力的局限，无法形成保质保量的供应优势，从而面临更大的发展困境。这在短期会削弱供应链稳定性，长期可能制约医药产业的良性竞争。

##### （二）产管者：药品监管能力与属地管理体制的矛盾

药品安全重在监管。根据药品管理法，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和市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监工作。然而属地管理和综合执法体制带来政策目标内生冲突，监管事权与监管资源形成纵横结构错配，制约药品监管能力，<sup>②</sup>不利于持续监测评估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是从纵向看，属地分级管理容易催生地方保护，弱化仿制药监管。一致性评价的主要依据，是省级药监部门的研制现场核查、生产现场检查以及现场抽取的连续生产的三批样品检验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生产持续符合评价标准。例如2023年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检查中发现，湖北科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的集采中选品种不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依法暂停该品种的生产销售，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随即取消其中选资格。<sup>③</sup>特别是随着上市后变更审查等监管事权下放，地方监管部门的意愿和能力会影响仿制药疗效。华东某药品生产企业负责人表示：“有的（企业）过评后为了节省成本就变更工艺、辅料、包材，这会影

<sup>①</sup> “Generic Drugs Market Size & Share Analysis - Growth Trends & Forecasts (2025-2030)”, Mordor Intelligence Website: <https://www.mordorintelligence.com/zh-CN/industry-reports/generic-drugs-market>, February 21, 2025.

<sup>②</sup> 胡颖廉：《综合执法体制和提升食药监管能力的困境》，《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sup>③</sup> 陆悦、付佳：《湖北科益药业注射用药品无菌管理不合规 相关产品被取消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中选资格》，《中国医药报》2023年2月16日第2版。

响疗效，监管部门也把关不严，有时还要考虑税收和就业，其实心照不宣”。（访谈资料：20250123）因此有观点认为，要防止把一致性评价变成“一次性评价”。二是从横向看，综合执法稀释监管专业性，基层难以胜任仿制药监管工作。2018年以来，我国药品监管体制特征为“大市场—专药品”，暗含了综合执法与专业监管之间的张力。虽然综合执法整合了监管资源并且扩大监管覆盖面，但也冲淡了基层药品监管专业性。据统计，2023年底全国共有专职药品检查员约3500人，其中国家级药品专职检查员仅90余人，兼职药品检查员则高达2.6万人。<sup>①</sup>尽管国家和省级药监部门会开展飞行检查，但大部分日常监管工作仍由市县监管部门负责。有限的专业人员要面对数以几十万计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基层更是难以承担生物等效性试验等工作。

### （三）供给侧：患者需要日益增长与供给单一的矛盾

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体现在医药卫生领域，人民健康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向往更加强烈。随着疾病谱系日趋复杂，患者对药品的需要也更为多样，既希望用上低价仿制药，也希望更多进口药和原研药进入医保报销目录。按照带量集采政策及其关联机制设计，医疗机构除了完成基本协议量外，还拥有自主选择采购品牌的权力，特定用药还配有差异化考核方式。然而在医保控费的约束下，一些地方限制医生和患者对原研药的选择权。有研究表明，实行带量集采后，医疗机构使用集采药品的行政驱动明显。为完成规定用量，一些医疗机构倾向于只采购和使用中选品种，或是优先选择集采的国产仿制药，造成用药困难。<sup>②</sup>由于缺少选择权，单一供给渠道还会降低患者对仿制药的信任感，甚至对安全性产生疑虑。可见，供给侧的带量集采政策在实践中被异化，与需求侧的患者个性化用药之间产生冲突。

归纳而言，现行仿制药替代政策的协同性、专业性和包容性不足，引发政策特征与治理模式底层逻辑的冲突。因此要突破单一政府主导和供给侧改革，协调多方和平衡供需，重构仿制药治理模式，从整体上优化政策效果。

## 五、整体治理和“三医”协同：仿制药治理模式重构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仿制药替代是健康中国战略和质量强国建设的结合点，成为大势所趋。近30年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国家出台仿制药替代政策组合，提高了国产仿制药安全性、有效性和可负担性，仿制药对原研药的替代率不断提升。然而即便如此，仿制药质量风险依然长期存在，特别是一些医生和患者对集采仿制药的信心不足。究其原因，仿制药替代政策特征与治理模式底层逻辑相冲突，“多小散”的医药产业无法适应超大规模医药市场，最严格的监管在实践中层层衰减，从而减弱甚至扭曲了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作用。药品治理现代化既需要科学的政策设计，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因此仿制药治理模式亟待重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这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乃至健康中国建设明确了原则，体现为如下内涵。第一，医疗、医保、医药都属于卫生健康领域，其排序意味着医保和医药终究都要服务于医疗，这与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相契合，也就是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治好病。第二，“三医”协同区别于“三医”联动。联动是在承认“三医”各自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强调制度衔接和工作配合，因而政策之间的缝隙和张力不可避免；协同则从一开始就强调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相互依存和一致行动，把“三医”作为整体来应对复杂公共事务。第三，协同的目的是兼顾发展和治理，而不是有所偏废。可见，“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原则与整体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强调制度化、经常化和有效跨界合作以增进公共价值的观点相契合。一般认为，整体治理是通过横向、纵向协调的价值和行动，以实现预期利益的治理模式。其内涵包括排除相互破坏的政策情形，消除政策抵触和利用稀缺资源，促使同一政策领域内各利益相关方团结协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

<sup>①</sup> 蒋红瑜：《回望2023奋进路 药品监管能力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国医药报》2024年1月16日第1版。

<sup>②</sup> 刘苏苏、茅宁莹：《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药品供应保障的影响》，《中国药事》2021年第4期。

服务等。<sup>①</sup>整体治理的外延十分广泛，涉及各层级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不同政策领域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组织之间。因此可基于整体治理理论阐述“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原则，以此构建“整体协同”的仿制药治理模式。换言之，脱离治理谈政策并不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国家要整体性设计仿制药替代政策，并协同医疗保障、药品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的目标和行动，从而进一步优化仿制药替代政策效果。

一是以药品带量集采政策优化医药产业结构，筑牢仿制药质量之“基”。要全面认识医保的公共价值，其不仅是团购和付费的技术命题，更是重构和赋能的战略命题。也就是通过医保政策，倾向性支持国产仿制药提质增效，引导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要完善带量集采竞价规则，避免唯低价中标。可基于真实世界数据，在带量集采中引入科学的药品质量分层指标，为不同质量水平的药品赋予差异化的价格容忍度和加分权重，并设定有效报价和降幅的合理区间，真正激励企业提升药品质量。同时提高带量集采信息透明度，引导公众监督。特别是公开中选品种质量标准、生产工艺、临床疗效、有关医保基金使用情况等数据，并督促企业公开一致性评价研究报告、药品生产经营状况、变更审查和监督检查等信息。在此基础上，探索医药产业优化引导基金，鼓励企业并购和技术合作，加速原研药国产化落地，提升产业集中度。

二是出台一致性评价与上市后监管的政策组合，强化仿制药质量之“盾”。要准确认识药品监管职能转变，在监管事权下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方的真实意愿和承接能力，避免监管“空转”甚至监管“真空”，消除地方保护的影响。国家还应加强职业化、专业化药品检查员队伍建设，针对降脂降压药品、抗肿瘤药品等重点中选品种，建立跨区域联合检查机制，提升基层监管能力。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力量，开展常态化的仿制药质量评价和替代效果监测，引导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过评仿制药疗效的真实世界研究，并鼓励医生使用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信息平台。探索使用人工智能评估仿制药质量风险，整合药品抽检数据、不良反应报告、企业信用记录等信息，构建仿制药质量风险动态评估模型。

三是完善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政策，织密仿制药质量之“网”。要客观认识公众对国产仿制药质量的信心，在仿制药替代政策制定中充分考虑社会心态，通过各种手段引导理性认知和鼓励社会共治。例如在充分保障医生和患者用药选择权的基础上，制定仿制药处方激励和约束措施，对合理开具过评仿制药处方的医生以及过评仿制药处方量占比较高的医疗机构，给予适当经济支持。又如结合我国临床实际，可赋予执业药师一定权限，鼓励医生和药师共同推动仿制药替代。此外，拓展行业协会参与政策过程的空间，允许其在医保报销目录调整、带量集采规则制定中提供仿制药替代的技术建议。行业协会还可以牵头建立仿制药行业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原料药供应、生产工艺、生物等效性等数据，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

本文有如下可能的边际贡献。首先在研究内容上，科学评估我国仿制药替代政策的效果，发现其差异化提升了仿制药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可负担性，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对这一热点话题的疑虑。其次在观点提炼上，认为仿制药替代政策具有“三多三少”特征，进而阐述其与治理模式底层逻辑的矛盾。此外在理论建构上，基于整体治理理论提出“整体协同”的内涵和要素，从而为“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提供理论依据。当然在量化分析、案例深描等方面，研究还有诸多可拓展空间。

责任编辑：王冰

---

<sup>①</sup> Christopher Pollitt, “Joint-up Government: A Survey”,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1, no.1, 2003.

# 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 惩罚性赔偿的证成与展开<sup>\*</sup>

刘玖林

**[摘要]**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是激活其制度效能亟待回应的司法难题。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包括民事公益诉讼、综合文义、体系、法意等法律解释方法，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63条包括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无障碍环境权益的特殊性需要惩罚性赔偿强化预防性保护。遵循审慎谦抑原则，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限于侵权人主观故意并造成严重后果，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应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但不宜超过实际损失的2倍。惩罚性赔偿坚持法定主义原则，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化宜通过“检察公益诉讼法”实现。

**[关键词]**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民事公益诉讼 惩罚性赔偿 预防性公益诉讼 检察公益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15.2；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8-0066-07

作为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以下简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63条规定的检察公益诉讼对于残疾人、老年人等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可谓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最大亮点和创新之一。但促进型立法和基础性法律的目标定位决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条款不免存在过度概括或概括不足之憾。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存在提升法律预防功能之需，惩罚性赔偿具有增进法律威慑功能之益，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则是确保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亟待回应的司法难题。诚然，现有研究对于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及其优化路径有过宏观探讨，但就其诉讼形态是否包括民事公益诉讼、诉讼请求能否主张惩罚性赔偿尚无体系化的微观解析。为此，本文拟结合现行惩罚性赔偿规范体系框架，探明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法理基础及其实践路径。

## 一、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兼括民事公益诉讼的规范解释

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归根结底是要回答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故而廓清其诉讼形态乃先决问题。诚然，《民事诉讼法》第58条为民事公益诉讼的扩大适用留有制度空间，但民事公益诉讼在制度建设方面尤为强调“法律的具体规定”。<sup>①</sup>因此仅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的开放性，还不足以证成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合法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公私法交融视域下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解构与续造研究”(22CFX0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玖林，重庆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重庆，400044)。

①巩固：《公益诉讼的属性及立法完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 （一）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公益诉讼的文义解释

法律解释始于文义。公益诉讼是特定主体在法律授权的前提下针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在未有除外条款的明确规定下，若将民事公益诉讼排除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范畴之外，等同是对法律概念文义语项的恣意限缩。固然，《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 63 条规定的公益诉讼起诉人限于检察机关，制度建构更为接近行政公益诉讼，但不能据此否定民事公益诉讼乃其当然形态。一是公益诉讼形态的核心判准不在于公益诉讼发起人的范围及其类型；二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项不断发展的事业，公益诉讼发起人限于检察机关能够有效实现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平衡；三是公益诉讼检察已为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限于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讼实施权，更易于提高检察机关保护无障碍环境权益的效率。

### （二）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公益诉讼的体系解释

伴随检察公益诉讼的探索原则由“稳妥、积极”转向“积极、稳妥”，检察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呈快速扩张之势。梳理检察公益诉讼法律规范，除《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第 62 条、《安全生产法》第 74 条第 2 款、《反垄断法》第 60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公益诉讼的具体形态外，更多是采诸如“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概括规定，但此种立法模式并未引起民事公益诉讼系公益诉讼法定形态的解释难题。即便个别领域存在行政公益诉讼是否属法定公益诉讼形态的认识分歧，<sup>①</sup>但民事公益诉讼属公益诉讼当然形态几无争议。

### （三）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公益诉讼的法意解释

法律解释应当契合立法目的。公益诉讼入法因之一即为弥补行政监管缺陷，虽说行政公益诉讼能够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等执法偏见，但行政公益诉讼的本质系督促之诉而非追责之诉，依法行政原则统摄下的行政责任机制仍然难以有效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治理难题。何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法律化是对其试点经验的立法总结，而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颁行之前，深圳、珠海等地相关地方立法就已明确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无障碍环境建设民事公益诉讼。并且，深度参与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的专家学者特别强调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的实现路径包括民事和行政两种机制。<sup>②</sup>故此，把民事公益诉讼解释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范畴更为契合制度目的和立法意图。

综上所述，结合文义、体系、法意等法律解释方法可以发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 63 条规定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形态包括民事公益诉讼。

## 二、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理证成

惩罚性赔偿本质上属于准刑罚，<sup>③</sup>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长期遭受理论诘难。在质疑者看来，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缺乏经济激励的现实需求和取得额外赔偿的正当基础，适用惩罚性赔偿只会造成对行为人的重复惩罚。<sup>④</sup>研究发现，否定论者对于惩罚性赔偿的属性、功能以及请求权基础存在认识偏差。

### （一）微观之维：无障碍环境权益的特殊性需要惩罚性赔偿

一方面，无障碍环境权益属于基本人权范畴，处于人权体系的核心地位，值得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强力予以保护。基于权利内容分析，无障碍环境权益指向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的无障碍，对于公民平等享有生存权乃至发展权意义重大，可谓保障每个公民平等融入社会生活、便捷参与学习工作、深度共享发展成果的最为迫切的需求之一。基于权利主体分析，虽说一个人一生中至少有约 15% 的时间“行动不便”，<sup>⑤</sup>以致每个公民都是受益主体，但不同权益对于每个公民具有轻重缓急，

<sup>①</sup> 蒋红珍：《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公益诉讼》，《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

<sup>②</sup> 邱景辉：《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检察公益诉讼条款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检察》2023 年第 17 期。

<sup>③</sup> David C. Searle, “Keeping the Civil in Civil Litigation: The Need for a Punitive Damage-Actual Damage Link in Title VII Cases”, *Duke Law Journal*, vol.51, no.5, 2002.

<sup>④</sup> 高利红：《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严格审慎原则之适用》，《政治与法律》2023 年第 10 期。

<sup>⑤</sup> 杨方方：《风险流转下弱势群体的共同富裕之路》，《学术研究》2022 年第 9 期。

无障碍环境权益之于残疾人、老年人等存在长期性的无障碍需求者来说，是更为偏向生存型而非发展型、弱势者而非强势者的法益。正因如此，无障碍环境权益保护直接关乎民生建设和人权保障。然而，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治实践仍然面临执行力度总体偏软等现实不足。惩罚性赔偿具有威慑功能，能够有效提升无障碍环境权益保护力度，从而避免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沦为没有实效的“软法”。

另一方面，无障碍环境权益属于公共利益范畴，逻辑上对其保护力度既不应低于其他公共利益，也不应弱于私人利益。无障碍环境权益保护是文明国家和现代社会的重要测度，事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sup>①</sup>承载抽象的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对于维系一个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虽说我们不能断然地认为社会的唯一目的旨在维持共同体的“共同善”，但确信无疑的是，“共同善”是决定权利存在及其保护力度最为重要的理由。<sup>②</sup>何况，“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文明，它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同情和尊重人的尊严”。<sup>③</sup>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直接关系一个人是否为拥有人格的人，因此无障碍环境权益凝练着社会秩序公益。此外，无障碍环境是面向所有人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故而无障碍环境权益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然而囿于消费上的非排他性，无障碍环境建设往往缺乏建设和保护的主动意识。无障碍环境建设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有效避免“公地悲剧”。

## （二）中观之维：补偿性赔偿难以因应无障碍环境权益的预防性保护

首先，单凭补偿性赔偿难以回应无障碍环境建设对民事责任的制度诉求。基于无障碍环境权益的公共利益面向，占用、损坏无障碍设施对于单个无障碍环境权益人往往并不必然产生实际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害，此时也就不存在补偿性赔偿的适用空间。即便责任主体的积极作为或消极不作为致使有无障碍需求者的权益受损，但针对差额损害的填平赔偿仍未从根本上阻却行为人怠于履行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定义务、逃避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责任的投机心理。何况，公共利益的可赔偿性损害大小本就难以精确计算。<sup>④</sup>

其次，仅以补偿性赔偿策应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并不符合加强预防性公益诉讼的实践需求。从《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9条规定的“三同步”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12条规定的“五同步”，可以看出无障碍环境建设治理策略更为注重事前预防。倘若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拒斥惩罚性赔偿，立法逻辑仍属事后救济的治疗法学思维，关注焦点仍在赔偿受害人一方。对无障碍环境建设领域中的严重违法情形适用惩罚性赔偿，能够进一步突出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避免后续改造无障碍设施造成的资源浪费。

最后，固守单一的补偿性赔偿仍未改变无障碍环境建设中的违法成本过低的现实境况。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实践困境主要有二：一是通过积极作为占用、损坏无障碍设施，此类行为虽为法律所禁止，但违法面临的行政罚款总体偏低；二是通过消极不作为不予建设无障碍设施，规范层面对此类行为的规制总体模糊甚至缺位。在此制度语境下，即便频繁提起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但预期事故成本仍然始终低于预防成本，这样的制度设计显然难以激励责任主体积极履行法定义务。相反，引入惩罚性赔偿会大幅提高预防事故成本，消除行为人侵权获益可能，引导其严守法律、主动作为。

## （三）宏观之维：惩罚性赔偿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第一，惩罚性赔偿赋能无障碍环境建设有利于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规范效力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无障碍法治建设长期侧重公法责任、慢待私法责任，关注补偿性赔偿、忘却惩罚性赔偿，以致无障碍环境建设对公法调整产生严重路径依赖。作为公私法融合的产物，惩罚性赔偿具有弥合公私法二分鸿沟、推进公私法绝对分立走向公私法适度协同之效，可以有效防止重于过失侵权而轻于刑事犯罪

<sup>①</sup> Md. Mustafizur Rahman and Nobuaki Ohmori, “Barrier-Free Accessible Environment and Kamlapur Railway Station – Require to More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rts and Applications*, vol.3, no.2, 2017.

<sup>②</sup> 朱振：《共同善权利观的力度与限度》，《法学家》2018年第2期。

<sup>③</sup> [法]雅克·马里旦：《人权与自然法》，吴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4页。

<sup>④</sup> 毋爱斌：《个人信息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体系构建》，《理论探索》2023年第5期。

的不法行为不受惩罚。因此，惩罚性赔偿具有织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体系、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规范效力的制度效能。

第二，惩罚性赔偿赋能无障碍环境建设有利于构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多元共建机制。“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不是补偿被侵权人，而是惩罚恶意侵权人，阻止未来的不当行为，并表明社会的反对。”<sup>①</sup>面对严苛的违法责任，社会公众的无障碍环境认知尤其是建设保护意识势必得到快速提升，先前的损害者也极有可能转变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共建者。职是之故，惩罚性赔偿具有反向激励功能，有益于将建设阻力转化为建设动力，从而营造公私合作共建的良好氛围。

第三，惩罚性赔偿赋能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契合其属性和功能。《民法典》第179条第2款已然表明惩罚性赔偿系民事责任而非公法责任的规范立场。然而公益诉讼是实现惩罚性赔偿之威慑功能的最佳舞台，<sup>②</sup>在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适用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已有诸多示例，遂此并不成立所谓的重复惩罚。固然，惩罚性赔偿是以利益诱导激励私人执法，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缺乏经济激励的必要，但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并非只是一维的。惩罚性赔偿在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之中实则存在功能分化，私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在于激励私人发现并制止违法行为，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在于惩罚与威慑。<sup>③</sup>因此，笃信公益诉讼拒斥惩罚性赔偿实属线性思维对多元诉讼形态的简单化约处理。

综上所述，无障碍环境权益具有基本人权属性，遵循“同质救济”的补偿性赔偿难以实现对无障碍环境权益的预防性保护，惩罚性赔偿应用于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可谓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优化之策。

### 三、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制度构造

“清晰性要求是合法性的一项最基本的要素。”<sup>④</sup>为避免惩罚性赔偿裁判结果严重偏离行为人的可预见范围，立法还应就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建构作出具体安排。

#### （一）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责任成立要件

立法者为防止惩罚性赔偿的泛用和滥用，通常从侵权行为、主观过错、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等方面设置门槛更高的责任成立要件。<sup>⑤</sup>除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要求侵权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因果关系采行举证责任倒置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惩罚性赔偿要求存在欺诈行为之外，惩罚性赔偿责任成立的控制规则集中围绕主观过错和损害后果两个方面展开。考虑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63条已然明确“违反本法规定”系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的实体要件，故其制度建构再无必要讨论违法性要件。因果关系倾斜设计原本是因私益诉讼中的原告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将其径行应用于民事公益诉讼不免致使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和权利义务走向失衡，何况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与合理控制惩罚性赔偿的立法政策大相径庭，因此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原则上应当排斥因果关系倒置规则。<sup>⑥</sup>有鉴于此，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责任成立宜从主观过错和损害后果加以控制。

##### 1. 过错要件：侵权人具有主观故意。

惩罚性赔偿的合理空间应当限于主观故意。<sup>⑦</sup>究其根本，补偿性赔偿足以阻止非故意形态的过错，对于过失侵权施以惩罚有违公正。<sup>⑧</sup>相反，故意侵权行为不仅违反了某些明确的法律规则，而且通常构

<sup>①</sup> Catherine M. Sharkey, “Punitive Damages as Societal Damages”, *Yale Law Journal*, vol.113, no.2, 2003.

<sup>②</sup> 李艳芳、张舒：《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sup>③</sup> 杨会新：《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问题研究》，《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4期。

<sup>④</sup>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5页。

<sup>⑤</sup> 朱晓峰：《论〈民法典〉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控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1期。

<sup>⑥</sup> 刘玖林：《论耕地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现代法学》2025年第1期。

<sup>⑦</sup> Sylvia M. Demarest and David E. Jones, “Exemplary Damages as an Instrument of Social Policy: Is Tort Reform in the Public Interest”, *St. Mary's Law Journal*, vol.18, no.3, 1987.

<sup>⑧</sup> Robert D. Cooter, “Economic Analysis of Punitive Damages”,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56, no.1, 1982.

成对社会行为基本准则的严重违反。<sup>①</sup>为避免惩罚性赔偿产生威慑过度的“寒蝉效应”，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过错要件宜限于故意。

除食品安全、药品管理直接关系生命健康而未特别要求过错形态之外，其他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大多对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作出了特别规定。无障碍环境建设一般并不直接侵及人的生命健康，而惩罚性赔偿又是以侵权人过错为导向，<sup>②</sup>故对该领域惩罚性赔偿的过错要件作出更为严格的限制正当合理。就惩罚性赔偿的过错要件而言，主要存在明知、故意以及恶意三种方案。相形之下，限于“故意”更显科学。

首先，“明知”一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描述主观状态的术语，“故意”较于“明知”更为精准。其次，“恶意”的道德可责难性过高，若将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主观状态归为恶意，势必过分限缩该制度的适用空间，难免不会使其沦为具文。最后，《民法典》关于惩罚性赔偿的主观形态总体以“故意”表达，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过错要件定于“故意”更为契合整体法秩序以及立法发展趋势。<sup>③</sup>总括上述，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主观形态宜为“故意”。<sup>④</sup>

## 2. 结果要件：侵权人造成严重后果。

惩罚性赔偿是否以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为要件，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有议争。比较而言，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以造成严重后果为要件更为合理。

为何对结果要件作出特别要求，主要理据有三。其一，惩罚性赔偿主要适用于严重侵权行为，而损害后果是界定严重侵权行为的重要方面。其二，损害后果原则上与过错要件是互为异质的规范要素，<sup>⑤</sup>成立主观故意并不当然造成严重损害后果。其三，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以造成严重后果为责任构成要件，不仅可以避免动辄得咎以致宽泛适用，更是契合《民法典》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范立场。

至于结果要件的规范表达究竟为何，笔者认为“造成严重后果”更为适宜。一方面，若将严重后果限于“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不免过分限缩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空间，难以在承认与限制之间保持平衡。另一方面，与其说“情节严重”属于结果要件范畴，毋宁说其更具行为要件特征。实质上，情节严重的司法认定往往需要一体考量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因此，立法者宜通过“造成严重后果”规范表达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结果要件。

## （二）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确定方式

如果说加重构成要件是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频率的严格限制，那么明确数额确定方式则是避免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畸高畸低的合理控制。

### 1. 计算方法：弹性金额模式。

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三。一是无数额限制模式，即法律对惩罚性赔偿金未作任何限制，完全交由裁判者依个案情况自由裁量，如《民法典》第 1207 条。二是固定金额模式，即法律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或计算标准，裁判者对此没有任何自由裁量权，如《药品管理法》第 144 条。三是弹性金额模式，即法律对惩罚性赔偿金数额或倍数规定一定的上限或下限，允许裁判者结合案情适当裁量，如《种子法》第 72 条。

① David G. Owen, “Punitive Damages in Products Liability Litigation”, *Michigan Law Review*, vol.74, no.7, 1976.

② Volker Behr, “Punitive Damages in America and German Law-Tendencies towards Approximation of Apparently Irreconcilable Concepts”, *Chicago-Kent Law Review*, vol.78, no.1, 2003.

③ 刘玖林：《论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中的“故意”》，《新疆社会科学》2024 年第 2 期。

④ 王利明：《论我国民法典中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规则》，《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8 期。

⑤ 辜明安、梁田：《从〈民法典〉看惩罚性赔偿制度体系的完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

比较而言，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计算方法宜采弹性金额模式。一是无数额限制模式下司法自由裁量权过大，难以实现类案类判。二是固定金额模式下行为人的故意侵权成本极易实现内部化，这样不免偏离惩罚性赔偿的制裁和威慑目的。三是弹性金额模式契合动态系统论，突破了“全有或全无”的线性思维，既能保障惩罚目的得以实现，又能维护法的安定性。

弹性金额模式首先需要明确计算基数和上限倍数。就计算基数而言，立法方案存有实际损失标准和违法获益标准两种选择。考虑到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建立在与补偿性赔偿的关联性之上，<sup>①</sup>无障碍领域侵权或是积极作为侵占无障碍环境设施，或是消极不作为怠于履行无障碍环境建设义务。因此，计算基数原则上应以实际损害为原则，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所获利益或无障碍环境建设成本确定。就上限倍数而言，不同领域的惩罚倍数主要与相关侵权行为亟须被制止的迫切程度密切相关。除食品药品领域规定的惩罚倍数相对较高之外，其他未与生命健康紧密相连领域的惩罚倍数总体控制在5倍以下。然而无障碍领域侵权相较于知识产权领域侵权的违法获益毕竟存有较大悬殊，遂此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上限倍数不宜参酌知识产权领域中的5倍以下。考虑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5条已将“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确定为基本原则，因此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倍数宜借鉴《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0条规定的不超过2倍。

## 2. 考量因素：适当折抵罚款、罚金。

惩罚性赔偿赋能无障碍环境建设并非不加区分地推行重罚主义，否则不仅难以取得制度预期效果，而且严重背离社会主流导向。<sup>②</sup>为对侵权人实现有效威慑，惩罚倍数之确定应当综合考量过错形态、损害程度、获益大小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重建成本，理论几无争议。<sup>③</sup>但就侵权行为已受到相应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之际，惩罚性赔偿金之确定应否扣减相应公法金钱责任，学界却存肯定和否定之争。<sup>④</sup>对此，笔者认为应基于私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与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分化而作类型化考量，即私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与罚款、罚金不应折抵，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与罚款、罚金应当折抵。

究其根本，私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与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功能存有分殊，前者意在强调激励私人发现并制止违法，后者着重关注惩罚威慑不法行为。既然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主要发挥惩罚功能、后续用于维护公共利益目的，那么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与罚款、罚金的功能就具有同质性。<sup>⑤</sup>有鉴于此，允许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与罚款、罚金的折抵则是基于整体法秩序评价、避免重复惩罚的应然要求。相反，教条地以《民法典》第187条责任聚合规则否定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与罚款、罚金的折抵，不单忽略了惩罚性赔偿的公私法融合属性，更是偏离了检察公益诉讼系“行政管制的辅助机制”的基本定位。<sup>⑥</sup>无障碍中的侵权行为往往同时面临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确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金理应折抵扣减同一行为遭受的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

## 四、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表达

惩罚性赔偿面临失控风险。<sup>⑦</sup>为保证惩罚性赔偿不致异化成为侵蚀公民合法财产的“怪物”，<sup>⑧</sup>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需要合乎法律保留原则。

### (一)《民法典》第179条第2款并非无障碍环境建设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律依据

惩罚性赔偿进入民法典总则编规范体系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然建立起可供裁判独立援引的惩罚性赔偿

<sup>①</sup> Ashley Stamegna, “The Missing Civility in Civil Damages: A Proposed Guidelines Structure for Calculating Punitive Damages”, *Cornell Law Review*, vol.106, no.7, 2021.

<sup>②</sup> 刘长兴：《超越惩罚：环境法律责任的体系重整》，《现代法学》2021年第1期。

<sup>③</sup> 郑毓翰：《论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量定》，《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sup>④</sup> 相庆梅：《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逻辑建构》，《理论探索》2025年第1期。

<sup>⑤</sup> 杨会新：《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与既有责任体系的关系》，《检察日报》2023年6月5日第3版。

<sup>⑥</sup> 刘艺：《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检察公益诉讼》，《中国法学》2020年第2期。

<sup>⑦</sup> Anthony J. Sebok, “Punitive Damages: From Myth to Theory”, *Iowa Law Review*, vol.92, no.3, 2007.

<sup>⑧</sup> Andrew W. Marrero, “Punitive Damages: Why the Monster Thrives”,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105, no.3, 2017.

一般条款。基于《民法典》第179条第2款的文义分析，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还得端看有无“法律”的专门规定。至于惩罚性赔偿的合法性渊源是否限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肯定论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当以“法律”有特别规定为前提；<sup>①</sup>否定论者认为，基于司法解释或判例，同样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sup>②</sup>相形之下，笔者认为肯定论更显科学。《民法典》第179条第2款是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指引性规定，属于“不完整法条”，遂此司法层面并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适用逻辑。立法者强调惩罚性赔偿的法定主义，主要是“考虑到惩罚性赔偿是赔偿损失的一种特别赔偿”，<sup>③</sup>宽泛地解释“法律”的内在范畴有违严格审慎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初心。循此而论，《民法典》第179条第2款并非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权威”。

## （二）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检察公益诉讼法”表达

惩罚性赔偿坚持严格的法定原则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明确性原则，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从理论到实践仰赖法律的直接规定。结合现有立法规划，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法律化的可能思路有二。一是通过修改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增设惩罚性赔偿规则。此种方案虽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化和体系化，但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颁行不久即启动修法活动，势必侵损法律的权威。故而此种方案缺乏现实可能性，不足采撷。二是借助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立法契机，在规定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及其适用领域的同时，明确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基本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已将检察公益诉讼法列入“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探索建立“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遂此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借由检察公益诉讼法加以法律化必要且可行。循此而论，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化宜交检察公益诉讼法完成。结合前述业已得出的结论，检察公益诉讼法规范表达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宜方案应为如下内容。

第X条 对违反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故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请求行为人承担不超过实际损失二倍的惩罚性赔偿；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行为人因违法所获得的利益或者无障碍环境建设重建成本确定。

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应当综合考量行为人的过错程度、行为后果的严重程度、违法行为的获益大小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重建成本高低等主客观因素。

因同一行为已经被行政机关给予罚款或者被人民法院判处罚金，行为人主张减轻或者免除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金数额时应当折抵相应罚款、罚金。

责任编辑：王冰

① 张平华：《〈民法典〉上的惩罚性赔偿法定主义及其规范要求》，《法学杂志》2023年第4期。

② 石佳友：《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维度——兼论〈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5期。

③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解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586页。

·技术与社会·

# “恐怖谷”抑或“恐惑谷”： 概念廓清、理论溯源与价值探讨<sup>\*</sup>

曹博林 支冰洁

**[摘要]**作为人机传播领域的重要理论与热点议题，恐怖谷效应（Uncanny Valley Effect）虽然广被关注，但国内学界对其概念范畴与理论内涵的系统阐释较为有限，导致了诸多混淆及模糊之处。本文通过概念廓清与理论溯源，指出相较于通行译名“恐怖谷”“恐惑谷”一词更能精准传达该现象所蕴含的心理机制与认知困境。当前关于恐惑谷效应的理论演进主要沿着“相似性”与“类人性”两个维度展开，并探索出多元解释框架与理解路径。此外，该理论在当下的发展呈现出收敛和泛化的双重趋势，也受到复杂社会文化与媒介技术发展的时代影响。人机共生时代，对恐惑谷效应的讨论既需要重新明晰其理论适用边界，亦须注重其动态特征，避免因单方面强调技术威胁而陷入静态思维与人类中心主义陷阱。

**[关键词]**恐怖谷 恐惑谷 人机传播 机器人 类人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8-0073-09

## 一、问题的提出：恐怖谷效应的认知不齐

1970年，日本学者森政弘（Masahiro Mori）首次提出“恐怖谷”（Uncanny Valley）这一概念，他将这种“直觉性感受”描述为：“在机器人向着‘看起来更像人类’这一目标攀登的过程中，我们对它的亲和力感知也会增加，直到我们来到一个山谷。<sup>+</sup>我称这种关系为恐怖谷……当这种类人性继续增加时，我们会迎来第二高峰，并在达到健康人水平时达到第二高峰的顶点（图1）”。<sup>①</sup>

作为人机智能传播时代具有广泛知晓度的概念，“恐怖谷效应”是社会层面讨论人机互动时难以回避的话题之一。近年来，国内学者通过反思人机关系与交往逻辑回应了关注恐怖谷效应在人机时代的重要性，主要围绕“个体”与“群体”两个层面讨论恐怖谷效应所呈现的威胁性。个体层面的威胁性指从个体自身的体验和情绪出发，强调经由类人实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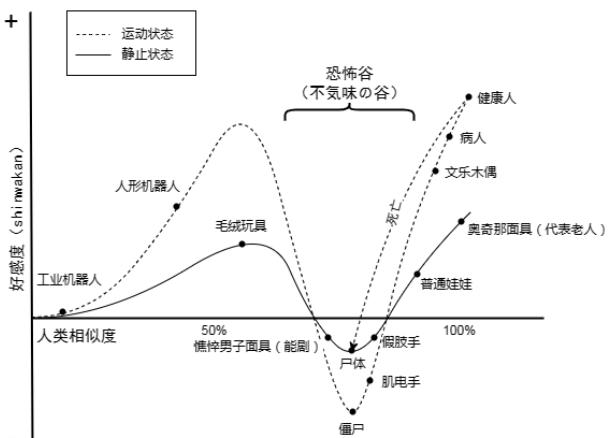


图1 森政弘绘制的“恐怖谷”关系图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AI人机互动促进心理健康的传播效能研究”（22CXW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曹博林，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支冰洁，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 深圳，518060）。

① 森政弘，“不氣味の谷”，*Energy*, vol.7, no.4, 1970.

相关刺激引发的感官层面的恐惧反应，从而在认知上陷入了所谓的恐怖谷。而人类群体层面的威胁性则强调强人工智能时代下从心灵层面所感受到的主体性威胁与替代性危机。基于此，恐怖谷议题的讨论常常伴随着人类重新思考“人的意义”，并试图在“技术崇拜”的浪潮中回归主体性问题的探讨。

然而，“恐怖谷效应”虽然广为人知，但对其进行深度探究和实证支撑的文献却较少，学者们大多“蜻蜓点水”般提及该效应，这使得该概念在阐释时存在诸多理解和认知上的差异，也导致恐怖谷效应的概念挪用现象较为明显。当前国内对于“恐怖谷效应”的研究大多默认其作为直觉性假说和现象呈现型理论，而缺乏对“恐怖谷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统一性认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无意识地陷入到“只要在人机传播的讨论情境中，人们对机器人产生的负面情绪都可以被归纳到恐怖谷问题的讨论范畴之内”的误区中。这些现状不仅加速着恐怖谷的理论泛化与模糊，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也使得对恐怖谷的探讨难以避免地落入“人类中心主义”陷阱，成为未来进一步研究人机传播与交互问题的一大阻碍。因此，对于恐怖谷效应的理论溯源与概念廓清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希望通过对比恐怖谷效应的概念梳理与关系厘清，回答以下问题：恐怖谷效应的本质是什么？它描述了一种怎样的关系与情绪体验？人们对它的理解经历了怎样的流变？恐怖谷效应在当下社会中该如何被理解与认识？

## 二、“恐怖”还是“恐惑”：概念廓清与锚定

### (一) 概念廓清：以“不氣味”为线索

森政弘曾在采访中表示，恐怖谷效应的提出源于自己幼时对人形蜡像及假手的诡异感知，他将这种感受描述为“不氣味（Bukimi）”。<sup>①</sup>在日语中，“不氣味”被解释为“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的”“因不安而感到害怕的”，是由对未知对象或情况的难以把控和不确定性的感知引发的困惑。<sup>②</sup>而在中文语境中，由于缺少现成词与之对应，“不氣味の谷”多被译为“恐怖谷”。尽管这一口语化的翻译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假说在国内的传播，但其对于恐怖谷现象的表达与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也将国内的恐怖谷研究引入了一大误区：即将恐怖谷效应等同于恐怖情绪。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恐怖”是“由于生命受到威胁而引起的恐惧”，这虽然能够部分解释人们面对刺激时害怕的情绪感受，但并未强调“不氣味”所蕴含的“怪异”与“困惑”的意涵。

由于国内对恐怖谷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晚，西方翻译中对“不氣味”内涵的理解能提供一定参照。2005年，美国机器人学家卡尔·麦克多曼（Karl MacDorman）及其同事首次将“不氣味の谷”原文进行英文翻译，其中，“不氣味”被译为英文“Uncanny”。<sup>③</sup>“Uncanny”一词译自德文 *Unheimliche*（非家），是一种不局限于审美的、用以表达一事物或环境带给人一种“莫名、轻微或模糊”的不安、恐惧、诡异等感受。<sup>④</sup>在西方语境中，对 *Uncanny* 感受的研究始于文学领域。1905年，德国心理学家恩斯特·詹池（Ernst Jentsch）最早在《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anny (论恐惑心理学)》一文中描述了人们对小说中机械人产生的不安感的现象，他将恐惑感的产生归结于“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广泛意义上的“陌生”紧密相关，如“未知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方向的迷失”都会带来恐惑感；此外，这种不确定同样体现为对于“心智或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如尸体、人偶，甚至野人在第一次看到自主运动的蒸汽机时都会产生此种感受，这也解释了德国作家霍夫曼小说《沙人》中的女机械人奥林匹娅的存在以及后来如同木偶般被拆解为何能够引发读者的恐惑感。<sup>⑤</sup>1919年，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在《论“恐惑”》一文中将恐惑理论化，并将恐惑包含的主题总结为：阉割的焦虑、被活埋的恐惧、幽灵的散

<sup>①</sup> Norri Kageki, “An Uncanny Mind: Masahiro Mori on the Uncanny Valley and Beyond”, *IEEE Spectrum*, vol.12, no.6, 2012.

<sup>②</sup> 程林：《“人转向”：为何机器人跌入的是恐惑谷而非恐怖谷？》，《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5期。

<sup>③</sup> Masaki Mori, “Bukimi no Tani [The Uncanny Valley]”, *Energy*, vol.7, 1970.

<sup>④</sup> 王素英：《“恐惑”理论的发展及当代意义》，《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1期。

<sup>⑤</sup> Ernst Jentsch, “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anny (1906)”, *Angelaki: Journal of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vol.2, no.1, 1997.

发、镜像的自我、复影（the double）、分离的身体部位、舞动的娃娃或木偶、蜡像、似曾相识（déjàvu）等。<sup>①</sup>他在德国学者詹池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恐惑感解释为“在熟悉与不熟悉的强迫与重复下引发的焦虑与恐惧”，<sup>②</sup>是“熟悉的陌生化”与“压抑思想的复现或强迫性重复”带来的、与新奇和陌生有关的恐惧感。对此，法国学者拉康针对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复影”主题进行进一步分析，并结合德国学者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提到的本体论焦虑概念，将恐惑解释为“模糊了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界线划分”，是想象（the imagine）与实在（the real）的结合所激发出的主体性焦虑感受。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恐惑理论”，恐惑内涵在这一演进过程中被描述为包括恐怖、神秘、分裂、怪异、奇幻等异质性情绪的集合。

“不气味”与“uncanny”的相遇，以及二者对于非人实体引发恐惑感的描述相似性使得“uncanny/恐惑”的翻译得到了西方学界与森政弘本人的认可与接受。不过，“恐惑谷效应”与“恐惑理论”内涵上的相似性虽然在极大程度上支持了“恐惑谷”译法对“不气味の谷”内涵的解释力，但这种将恐惑理论视为恐惑谷思想源头的讨论并不严谨，且缺乏证据证明二者的关联性。<sup>③</sup>首先，二者的问题域并不相同：恐惑谷最初的提出仅限于“类人实体”层面；而恐惑理论的研究中，学者们重视“恐惑情绪的唤起”，而至于“是什么唤起了恐惑感”则是一个开放性话题。其次，尽管二者都讨论了“高仿人”所带来的恐惑感受，但相较于恐惑理论所强调的“复影”与“异化自我”的生存危机叙事，恐惑谷更强调随着类人性的增加而产生的情绪变化过程，且这种情绪在相似性接近100%水平时会产生正向变化。本文的阐释旨在强调，无论从词义出发还是从词源出发，对“不气味”的理解应更多的偏向于“恐惑”，而非“恐怖”。为更好地表现其概念的内涵，本文也将使用“恐惑谷效应”译法进行后续讨论。

## （二）关系锚定：基于“情感效价”视角

“恐惑谷”的提出虽然是基于直觉而非实证研究，但却有着明确的变量之间的关系阐释。森氏在文中将恐惑谷理论阐释图的横轴定义为人类相似性，将人们对类人物的反应纵轴定义为“Shinwakan（好感度）”，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则被描述为恐惑谷效应。为了更为准确地验证这一直觉效应，后续的学者们采用量化的思路对恐惑谷效应进行了概念化与操作化研究。

作为一种正向效价情感，“Shinwakan”界定着恐惑谷为何为“谷”而非“山峰”，同时也承担着人们对于低程度的类人实体的好感解释功能。起初，这一概念被译作“熟悉感”，而谷底也被理解为熟悉感的缺失。<sup>④</sup>但随着对该效应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发现“熟悉感”作为一种认知层面的中立表达，并未体现出感知层面的正向和负向情绪。有学者将“Shinwakan”拆解为“亲和（Shinwa）”与“感觉（kan）”两个要素，进而建议以“亲和力”、“好感度”或“人际温暖”等含蓄情感的术语替代“熟悉感”。<sup>⑤</sup>这种解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类人性增强后人们好感度的变化，却难以充分体现和捕捉恐惑谷概念中的关键性质——“Bukimi（恐惑）”的感觉。有学者认为，恐惧（fear）、厌恶（disgust）、紧张（nervousness）、不喜欢（dislike）和震惊（shock）的综合情绪感受比奇怪（strangeness）更能解释“恐惑感”的真正内涵。<sup>⑥⑦</sup>基于这种认识，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包含讨人喜欢（likability）、值得信赖（trustworthiness）、可

① 关贞兰：《“恐惑”理论国内外研究述评》，《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② Rachele Benjamin and Steven J. Heine, “From Freud to Android: Constructing a Scale of Uncanny Feel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vol.105, no.1, 2023.

③ [日] 森政弘、江晖：《恐惑谷》，《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5期。

④ Masahiro Mori, Karl F. MacDorman and Norri Kageki, “The Uncanny Valley [From the Field]”, *IEEE Robotics & Automation Magazine*, vol.19, no.2, 2012.

⑤ Christoph Bartneck, Takayuki Kanda, Hiroshi Ishiguro, et al., “Is the Uncanny Valley an Uncanny Cliff?”, *RO-MAN 2007-The 16<sup>th</sup>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obot and Huma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2007.

⑥ Chin-Chang Ho, Karl F. MacDorman and Z. A. Dwi Pramono, “Human Emotion and the Uncanny Valley: A GLM, MDS, and Isomap Analysis of Robot Video Ratings”, *Proceedings of the 3<sup>rd</sup> ACM/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Robot Interaction*, 2008.

⑦ Chin-Chang Ho and Karl F. MacDorman, “Revisiting the Uncanny Valley Theory: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an Alternative to the Godspeed Indic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26, no.6, 2010.

怕 (scariness), 怪诞 (uncanniness), 令人毛骨悚然 (creepiness)、诡异 (eeriness) 六种不同情绪反应特征的正负情绪效价的多维情绪测定框架, 以更丰富、准确地测量和解释恐惑谷效应。<sup>①</sup>

在上述探索过程中, 人们对恐惑的测量逐渐超越了单维度图像上对纵坐标 Y 轴正负方向的理解, 而是扩展为“多维度、多 Y 轴”的复合性测量。学界对恐惑谷效应的讨论不再仅将其理解为简单的对刺激的恐怖评价与恐惧感受, 而是综合对刺激物的评价与感受进行多维度情绪反应评估与测量。恐惑谷效应所强调的曲线关系也与恐惑理论存在明显区别: 一方面, 相较于恐惑理论中所强调的“负向效价”的情绪集合, 恐惑谷效应在内涵上则更强调“双向效价”的作用; 另一方面, “恐惑谷”被划定为“由一事物相似性引发的相关情绪反应”, 而非广泛意义上的“某个点上的刺激引发的情绪反应”, 这种问题域的不同也使得其与恐惑理论的测量存在着明显差异。<sup>②</sup>

### 三、恐惑谷效应的理论演进与机制探索

恐惑谷的概念最初诞生于机器人领域, 受当时的技术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以及存在性证明问题, 该假说自提出以来并未得到人机交互领域的重视, 反而在流行文化领域散发出生命力。<sup>③</sup> 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及跨领域现象的积累, 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对此进行存在性验证研究以及相关阐释探索, 衍生出了对假说新的理解与变化, 这些演进大致沿着狭义的“类人性”路径与广义的“相似性”路径展开。

#### (一) 理论演进: 基于“类人性”认知的纵横发展

##### 1. 横向延展: 从“类人性”到“相似性”。

早期恐惑谷理解生发于森氏的原始描述, 认为恐惑谷效应是“类人性程度的变化”引发的相关恐惑效应。该路径下, 对“森氏假说是否成立”的验证是研究重点。类人性一般被解读为一种外在表征的物理相似性。早期研究中, 学者们通过筛选和整理现实中存在的、不同类人水平的刺激材料, 不断调试其与人类表征的相似层次, 让参与者对在外观、可动性等进行熟悉度或诡异程度等方面对其进行评分, 并据此绘制变化曲线以验证恐惑谷。这些研究以人为参照, 通过系统性操作, 将对“人类相似性”的主观理解扩展至客观层面的可量化指标, 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恐惑谷的存在。随着相关实验在多场景材料下的广泛开展, 学者们通过不同的刺激形式已经发现恐惑谷现象广泛存在于平面、3D 以及可交互场景中, 不同场景下人们对刺激实体的真实性感知不同, 因而所产生的恐惑谷效应也有所差异。<sup>④</sup> 这些研究扩大了恐惑谷效应研究实验材料的可用范围, 也为恐惑谷效应研究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可能性。对此, 一些学者尝试探索范围更为广泛的“相似性”路径。

广义相似性路径认为, 恐惑谷效应是由“某熟悉事物的陌生化偏移”引发的恐惑效应, 更多的关注“恐惑谷存在于哪些方面”这一核心问题。如有研究在人—非人形象、非人—非人形象的连续变形实验中均发现了恐惑谷效应, 并指出恐惑谷效应中的情感低点可能不是由刺激物本身的人类性决定的, 而是由一种更普遍的刺激形式引发的。<sup>⑤</sup> 除此之外, 一些学者也尝试从视觉以外的感官刺激方面进行探索研究: 如在给定一定线索的情况下, 触觉、<sup>⑥</sup> 听觉<sup>⑦</sup> 等同样能引发恐惑谷效应, 而在形象缺失的对

<sup>①</sup> Boyoung Kim, Ewart de Visser and Elizabeth Phillips, “Two Uncanny Valleys: Re-Evaluating the Uncanny Valley Across the Full Spectrum of Real-World Human-Like Robo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135, 2022.

<sup>②</sup> Rachele Benjamin and Steven J. Heine, “From Freud to Android: Constructing a Scale of Uncanny Feel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vol.105, no.1, 2023.

<sup>③</sup> Tom Geller, “Overcoming the Uncanny Valley”, *IEEE Computer Graphics and Applications*, vol.28, no.4, 2008.

<sup>④</sup> 范秀云:《恐怖谷理论与动画电影中的逼真人物形象》,《当代电影》2014年第6期。

<sup>⑤</sup> Anne E. Ferrey, Tuler J. Burleigh and Mark J. Fenske, “Stimulus-Category Competition, Inhibition, and Affective Devaluation: A Novel Account of the Uncanny Valle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6, 2015.

<sup>⑥</sup> Christopher C. Berger, Mar Gonzalez-Franco, Eyal Ofek, et al., “The Uncanny Valley of Haptic”, *Science Robotics*, vol.3, no.17, 2018.

<sup>⑦</sup> M. D’Alonzo, A. Mioli, D. Formica, et al., “Different Level of Virtualization of Sight and Touch Produces the Uncanny Valley of Avatar’s Hand Embodiment”, *Scientific Reports*, vol.9, no.1, 2019.

话交互情景与听觉的实证研究中，类似反应的证明则存在较大的结果差异。对此，研究普遍认为恐惑谷现象广泛的存在于人们的不同感觉中，但多感官的参与与配合能够更易或更强烈地引发恐惑谷效应。<sup>①</sup>这些发现进一步拓宽了恐惑谷的理论解释范围，使得恐惑谷由一种人机领域的特殊现象扩展为一种广泛存在的心理机制。

## 2. 纵向深入：从“表征感知”到“心灵感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无身体的智能的广泛应用使得个体对智能对象的视觉感知被界面区隔，对话成为了人们感知其社会线索的重要方式。随着恐惑谷研究以及“类人性”思考的进一步扩展与深入，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人类相似性操作时不应当试图“再现”人类的身体表征，而是应当关注“人究竟基于何种线索将彼此视为人类”这一核心问题。对于该问题的探索使得恐惑研究重点呈现出由“表征感知”到“心灵感知”的纵深探索趋势。如有研究发现，即使没有类人的外表，一台有“经验”的机器也会令人不安。<sup>②</sup>这似乎表明恐惑谷效应可以脱离视觉存在。但更多研究指出，形象缺失情况下，仅凭经验的类人性感知并不易引发人们的恐惑谷效应；<sup>③</sup>而当有外观参考时，高心智感知的机器人也更容易引发恐惑谷效应，且相关反应更为明显。

从恐惑谷效应的演进发展来看，当前“物理相似性”路径下的国外实证研究大多自称证明了恐惑谷的广泛存在性，但针对“非物质性”层面的恐惑谷存在性验证并不充足，而心灵感知层面的威胁则是作为国内探讨恐惑谷效应的核心思辨视角；这也使得国内外在恐惑谷研究上缺乏一定的深层次互动。

## （二）机制探索：恐惑谷的多元解释模型

恐惑谷效应何以产生？在该理论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不同理论导向的学者为其提供了解释性框架。尽管相关讨论尚未呈现出“派别”的争鸣之态，但从中仍可以窥见两大较为明晰的解释思路。

### 1. 基于“异质比较”的差异性探索路径。

基于“异质比较”的解释模型主要通过探究对象与人类的核心差异来解释恐惑谷效应的成因。在早期的解释模型中，森政弘推测，恐惑谷的产生与人类面对威胁情境时的自我保护本能有关。<sup>④</sup>基于此的进化心理学认为，生物有其先天性的威胁回避与审美选择趋向，因此恐惑谷现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刺激驱动下的感知处理过程。<sup>⑤</sup>不过，由于缺乏实证支撑，进化心理学阐释一直饱受争议，因而更多学者倡导以实证方法支撑进行差异探究。

以实证方法为支撑的相关假说主要将这种差异归结为一种“不匹配”。如期待违背假说（Violation of Expectation Hypothesis）将恐惑谷的产生归结于类人实体的表现与人类期待失配。然而，该假说对于“期待”这一前提条件的依赖以及其存在的情感效价的多向性问题使得其在相关讨论中的解释力有限。<sup>⑥</sup>感知不匹配假说（Perceptual Mismatch Hypothesis）虽然长期以来被纳入期待违背假说中考察，但其并不以人们的期待为前提，而是强调恐惑谷的出现与人们的线索感知能力和认知冲突的发生有关。<sup>⑦</sup>在相似性路径中，这种“不匹配”表现为一种非典型性，它一方面包括相关特征线索的错配，强调人类对

<sup>①</sup> Wade J. Mitchell, Kevin A Szerszen Sr, Amy Shirong Lu, et al., “A Mismatch in the Human Realism of Face and Voice Produces an Uncanny Valley”, *I-Perception*, vol.2,no.1, 2011.

<sup>②</sup> Kurt Gray and Daniel M. Wegner, “Feeling Robots and Human Zombies: Mind Perception and the Uncanny Valley”, *Cognition*, vol.125, no.1, 2012.

<sup>③</sup> Leon Ciechanowski, Aleksandra Przegalinska, Mikolaj Magnuski, et al., “In the Shades of the Uncanny Valley: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Human–Chatbot Interaction”,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vol.92, 2019.

<sup>④</sup> Masahiro Mori, Karl F. MacDorman and Norri Kageki, “The Uncanny Valley [From the Field]”, *IEEE Robotics & Automation Magazine*, vol.19, no.2, 2012.

<sup>⑤</sup> Paul Rozin and April. E.Fallon, “A Perspective on Disgust”,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94, no.1, 1987.

<sup>⑥</sup> G. Mark Grimes, Ryan M. Schuetzler and Justin Scott Giboney, “Mental Models and Expectation Violations in Conversational AI Interaction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vol.144, 2021.

<sup>⑦</sup> Jari Katsyri, Klaus törger, Meori MäKäräinen, et al., “A Review of Empirical Evidence on Different Uncanny Valley Hypotheses: Support for Perceptual Mismatch as one Road to the Valley of Eerines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6, 2015.

实体偏离典型规范的排斥；<sup>①</sup>另一方面包括配置模式的偏差，如眼睛距离、鼻子位置等原有特征的位置偏离或倒置，这些与现实标准不一致的特征使得相关面孔显得陌生和不真实，进而引发恐惑效应。<sup>②</sup>而在类人性路径中，这种不匹配主要表现为对“非人化”的排斥，即人们通过感受人类或类人实体的动物性与机械性判断对方的心智与人性，<sup>③</sup>从而确定是否将其“剔除”出人类范围。心灵感知假说（Mind Perception Hypothesis）将思想作为人类区别于他物的根本，认为真正引发人们对类人物恐惑感的是人们对其“拥有感觉和经验”的感知。<sup>④</sup>不过，也有学者将心灵感知过程归于更广泛的“泛灵论”，即将人类的部分特征赋予其他生物或无生命物，以此合理化其存在与行为，本质上是人类的主观经验被归因至其他无生命物或有生命物所产生的结果，<sup>⑤</sup>难以解释恐惑谷的产生机制。

## 2. 基于“相似控制”的连续性探索路径。

基于相似控制的解释模型主要通过探究人类相似性的增加过程中，恐惑谷会出现在何处，因而更强调图像“连续性”的保证。分类不确定性假说（Categorical Uncertainty Hypothesis）作为该思路下的代表性解释模型，将恐惑谷的产生归因于类别边界的模糊和不确定。<sup>⑥</sup>当刺激物接近类别边界会增加分类的不确定性，易引发人们的认知与判断混乱，感知上区分模棱两可的实体难度会影响负面情绪的强弱，<sup>⑦</sup>因而该假说的验证往往采用相似性连续变形体的刺激测试人们在模糊边界上的情绪反应。但也有学者对该假说提出质疑：如有研究发现恐惑谷与“机器人—人类”类别边界所出现的位置并不重合，“谷底”反而出现在人们“能够明确识别机器面孔”的位置。<sup>⑧</sup>此外，人类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并不乏分类模糊范畴的神话形象（如狮鹫等），<sup>⑨</sup>分类模糊更可能带来一种“新族群”的划分认知，正如人类对外星生命的恐惧一般。因此该假说在“连续性”逻辑上的确更贴合恐惑谷形态，但在解释力方面仍然存在争议。

这些基于不同思路的机制解释模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解恐惑谷效应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但不同思路下所存在的验证难题同时影响着其对恐惑谷的解释力。在差异性探索路径下，大多数研究顺延森氏谷的“举例法”思路，但在类人维度的实践操作中，研究者们难以达成共识：首先，现有不同机器人形象选择存在着社会线索提示、审美等诸多差异，因此难以确定人们的恐惑感生发于何处；其次，现有机器人实验材料间的类人性“间距”并不相同，不少研究仅是选取类人性上的某几个点，测量其与正负情绪效价之间的关系，这种“点式测量”并不能呈现出恐惑谷的全貌，且难以证明曲线的连续性。而在连续性探索路径下，部分学者尝试以“模糊分类”或“针对某一人类特征”为标准对统一形象进行“连续变形”，以避免其他因素干扰以及保证“人类相似性”标准的客观性，但其相关研究结果存在着较大差异。如有研究发现，尽管类人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带来负面情绪，但到达“谷底”之后，类人性的增强并不一定能再带来正面态度的攀升，因而整体图像看起来更像一个“恐惑悬崖”，而非“恐惑谷”。<sup>⑩</sup>这

① Seo-Young J. Chu, “I, Stereotype: Detained in the Uncanny Valley”, *Techno-Orientalism: Imagining Asia in Speculative Fiction, History, and Media*, 2015.

② Alexancler Diel and Karl F. MacDorman, “Creepy Cats and Strange High Houses: Support for Configural Processing in Testing Predictions of Nine Uncanny Valley Theories”, *Journal of Vision*, vol.21, no.4, 2021.

③ Paul Bain, Joonku Park, Christopher Kwok, et al., “Attributing Human Uniqueness and Human Nature to Cultural Groups: Distinct Forms of Subtle Dehumanization”,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vol.12, no.6, 2009.

④ Nick Haslam, Paul Bain, Lauren Douge, et al., “More Human than You: Attributing Humanness to Self and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89, no.6, 2005.

⑤ Brian R. Duffy, “Anthropomorphism and the Social Robot”, *Robotics and Autonomous Systems*, vol.42, no.3-4, 2003.

⑥ Tyler J. Burleigh and Jordan R. Schoenherr, “A Reappraisal of the Uncanny Valley: Categorical Perception or Frequency-Based Sensitiz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5, 2015.

⑦ Marcus Cheetham, Pascal Suter and Luts Jancke, “Perceptual Discrimination Difficulty and Familiarity in the Uncanny Valley: More Like a ‘Happy Valle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5, 2014.

⑧ Maya B. Mathur, DaUid B. Reichling, Francesca Lunardini, et al., “Uncanny but not Confusing: Multisite Study of Perceptual Category Confusion in the Uncanny Valle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103, 2020.

⑨ 戴茂堂、赵红梅：《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另一种哲学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⑩ Christoph Bartneck, Takayuki Kanda, Hiroshi Ishiguro, et al., “Is the Uncanny Valley an Uncanny Cliff?”, *RO-MAN 2007-The 16<sup>th</sup>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obot and Huma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2007.

些声称验证了恐惑谷效应的研究事实上可能只是部分地支撑了恐惑谷效应，未来研究可能需要结合“相似连续性”与“恐惑谷效应特征”，分情境、刺激类型等整合不同假说，以更全面地解释恐惑谷的深层机制。

#### 四、恐惑谷效应的现代发展：人机时代的理论再思考

##### (一) 收敛与泛化：人机互动时代的恐惑谷讨论

恐惑谷效应的发展经历了由人机领域的特殊现象扩展为一种广泛存在的心理机制，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又向人机领域的收敛。人工智能和情感计算领域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对于跨越恐惑谷的追求越发强烈。然而，“高现实/高相似性”技术的发展与研究讨论带来了“超现实”技术的恐惧：<sup>①</sup>一方面，部分学者将恐惑谷视为技术强大的代名词或将其看做技术发展的某一时间性阶段进程；<sup>②</sup>另一方面，在强机器智能的趋势下，学者们着力于寻找“人之为人”的答案，这种困惑也进一步引发着人的被替代性恐惧与生存性焦虑，进而产生了对“非人主体”的恐惑谷讨论。<sup>③</sup>人们担心机器的智能化发展可能在极大程度上压制人的主体性，尝试用“恐惑谷效应”来表示出于对技术失控的焦虑，以及机器人获得“意识”并且“拥有超人的能力”时所可能引发的对人类主导权的僭越风险。<sup>④</sup>这种风险担忧暗含着对“恐惑谷效应”与“恐惑理论”的混淆。首先，如图2所示，“超人”能力的非人智能主体讨论范围突破了森氏谷中划定的“相似性的100%”，是在“镜像人”甚至“超人”路径中的“恐惑崖”，偏向于恐惑理论中对“复影(the double)”的探讨，本质上是对现代媒介技术对人之异化与对人造“新物种”可能的“想象恐惧”，<sup>⑤</sup>与恐惑谷理论中评价达到谷底并再度形成“第二高峰”的攀升并不相符。其次，当下对机器人主体性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机器人在现实中的类人情况，即恐惑感并不一定是由机器人的类人性而引发的，而是对社会范围内技术“集合”威胁的广义恐惧与焦虑以机器人为媒介进行扩散的形式，其作为一种技术背景下现代性危机外现，本质上是恐惑谷效应的泛化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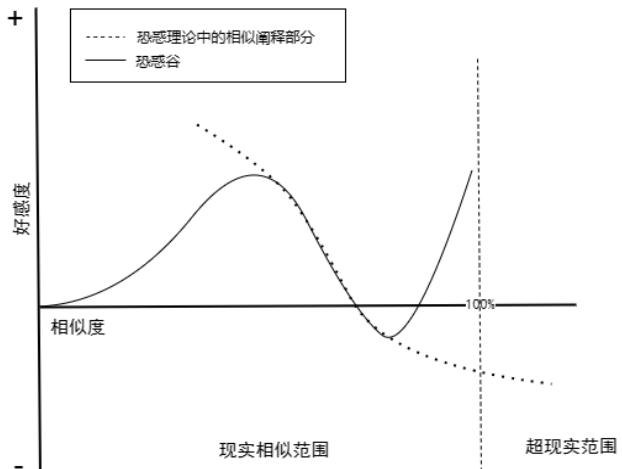


图2 恐惑谷效应、恐惑理论、与恐惑谷效应的泛化

诚然，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飞速的当下，将恐惑谷效应的讨论收敛回人机互动领域有助于回到其关注本源，启发关于机器人设计与人机传播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但关于恐惑谷理论的泛化性讨论需要警惕是否存在将当下技术领域发展带来的主体性危机过度演绎、错误嫁接的问题，这也就需要将恐惑谷问题放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与技术发展的动态情境中考察。

##### (二) 动态与协商：恐惑谷与当代文化的交合

恐惑谷效应的技术演进思路和丰富的社会心理内涵表明其并非一种简单的“数学函数”，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人机传播时代，恐惑谷效应的新发展也体现出技术、社会与文化的交互影响，在动态发展中呈现出交合和协商的关系。横向视角下，社会文化差异影响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理解与技术接受度，也影响着人们对恐惑谷的敏感性与反应程度。在西方机器人文化中，“机

① 赵静宜：《人机协同与虚实互联：论智能传播效应的表现形式及发展目标》，《编辑之友》2022年第3期。

② 柳嘉：《AI参演娱乐节目发展现状及趋势》，《传媒》2023年第16期。

③ 陈小平：《人工智能：技术条件、风险分析和创新模式升级》，《科学与社会》2021年第2期。

④ 邢冬梅、赵艺涵：《AI“恐怖谷”蕴含的主体性困境及其重塑》，《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⑤ 袁光锋、赵扬：《“恐惧文化”的社会建构及其政治社会后果》，《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器恐惧”与“人机关系不和谐”的思想占据更为主导的思想地位，这使得其对于恐惑谷的关注更倾向于现象维度的“异族”偏见与想象维度的人造物反叛讨论。<sup>①</sup>而在日本文化中，人机关系呈现佛教式特征，主流的技术想象蕴含“技术取决于人之取舍”的思想，因而在恐惑谷的讨论中也更加偏向于外观设计层面的萌化。日本这种立场描述与其所承载的人机共生、技术佛性思想等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以奥特曼、阿童木等为代表的拥有类人外形、运动能力以及心智能力的人形智能体为何并未能引发恐惑谷效应。<sup>②</sup>中国虽然拥有着悠久的“人造人”、机关术及鬼神叙事历史，但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机器人文化并未形成完整体系。中国传统儒道文化影响下的机器人叙事更多地呈现出“视之为器”的思想内核——即宽容地接纳他物之存在，“人造人”仅作为“乐人之物”或提升生产力的“器具”，因而在人机关系中倾向于将其视为“同事/工具”而非敌友。<sup>③</sup>在这种实用主义思维的指引下，人们对于其技术创新本身的好奇与应用性关注胜于对技术本身的抵触，故相较于对智能技术本身的外在呈现，人们更加关心其背后的算法运作机制及应用边界。此外，这种差异与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人”的认知差异同样相关：中国语境下的“人”之定义更关注其社会性与环境互动性，因而真正引发恐惑的往往不是人工智能本身，而是技术伦理规制的缺失或偏移所导致的对既有社会规范或人类秩序的冲击，<sup>④</sup>本质上是对人工智能与“社会关系”的互动问题的关注。这也就意味着本土背景下的恐惑谷研究与人机关系探索可能需要更加重视关系实践维度的探索。

伴随着全球文化发展交流与思想碰撞，这种差异也同样表现在纵向发展中。作为浸润在技术文化中成长起的一代，“Z世代”对于虚拟角色、智能体等文化技术产品的接受度与看法相对更为开放，<sup>⑤</sup>这在极大程度上与多元变化的社会文化与开放媒介环境有关。<sup>⑥</sup>从现代文化的角度来说，社会焦虑情绪与亚文化的盛行使得近年来的恐怖文化、审丑文化以及病态好奇心等成为潮流：<sup>⑦</sup>如作为曾经恐惑谷效应实验的经典材料，儿童仿生机器人CB2常被认为是病态、死相的，然而如今的CB2却以表情包等方式被大众重新接受，甚至因其呈现出的“精神状态”而受到了年轻人的广泛喜爱。<sup>⑧</sup>一方面，人们对于恐惑感受的追求呈现出多元独特的娱乐性偏好似乎预示着，在设计中回避恐惑谷已然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相较于对“拟人性”的追求，这种人与异质智能体的“跨物种共情”似乎在人机互动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通过提升“拟人性”以“跨越恐惑谷”在当下似乎也并非是更有价值的路径。

此外，未来技术与人类认知的发展下，恐惑谷也可能存在更多新的变化与值得探究问题。如当批量生产仿真机器人成为可能，克隆效应下恐惑谷效应将呈现怎样的形态，<sup>⑨</sup>人们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判别人与非人的分类？已有恐惑谷效应研究呈现的是对人正向能力相似性的讨论，但当智能体对于人的负向能力产生较强相似性时（如负面情绪、示弱等），恐惑谷效应又会有何变化？此外，虚拟现实技术的应

① 程林：《德、日机器人文化探析及中国“第三种机器人文化”构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② Selma Šabanović, “Inventing Japan’s ‘Robotics Culture’: The Repeated Assembl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Social Robotic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44, no.3, 2014.

③ 程林：《中国机器人伦理初探：一个跨文化的视角》，《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④ 姚伟：《人工智能与人的本质发展——兼论社会制度系统的适应性变革》，《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10期。

⑤ Benjamin Noah and Arathi Sethumadhava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rust in Digital Assistants”, *Proceedings of the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 Annual Meeting. Sage CA: Los Angeles, CA: SAGE Publications*, vol.63, no.1, 2019.

⑥ Matthieu Destephe, Massimiliano Zecca, Kenji Hashimoto, et al., “Uncanny Valley, Robot and Autism: Perception of the Uncanniness in an Emotional Gait”, *2014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nd Biomimetics (ROBIO 2014)*. IEEE, 2014.

⑦ Coltan Scrivner, “The Psychology of Morbid Curiosity: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Morbid Curiosity 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183, 2021.

⑧ GrwArk:《CB2儿童仿生机器人》，哔哩哔哩网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e411P7xM/?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75cc2d5de4dc4d620b5c63a2a47f0a6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e411P7xM/?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75cc2d5de4dc4d620b5c63a2a47f0a60), 2023年10月25日。

⑨ Funriya Yonemitsu, Kyoshiro Sasaki, Akihiko Gobara, et al., “The Clone Devaluation Effect: A New Uncanny Phenomenon Concerning Facial Identity”, *Plos One*, vol.16, no.7, 2021.

用等使得场景沉浸成为可能，现实与虚拟距离的拉近与“界限的消失”又是否会影响、怎样影响恐惑谷效应？<sup>①</sup>最后，延承以上的技术文化视角，亚文化以及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情绪又与恐惑谷效应有着怎样的互动？在中国传统儒道文化观的影响下，人们在恐惑谷效应认识上呈现出了哪些认知上的中国特色？这些问题都具有着丰富的理论和现实张力，有待深入探讨。在未来的人机共存时代，恐惑谷效应的相关研究既需要考虑技术本身的发展趋势与伦理引导，同时也不能忽视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人们心态与认知的影响与改变。如何以动态的视角看待技术与人类认知协商下的恐惑谷发展与流变问题，也成为人机共存时代的新问题。

## 五、结语

恐惑谷效应研究自1970年至今不过50余年，在紧凑的发展与演进过程中，其核心概念、实证测量和理论内涵皆经历了一定的流变。本文首先通过对恐惑谷概念的重新锚定与梳理，对其核心“恐惑”进行界定，并试图将长期以来被混淆的“恐惑感”与“恐惧情绪”、“恐怖谷效应”与“恐惑理论”进行区分。其次，通过对核心变量及其关系的重新厘清，展现了“恐惑”的测量并非对单一情绪的呈现，而是综合性地对刺激物进行多维度情绪反应评估与测量。同时，本文也明确恐惑谷并非X-Y的简单线性关系，也并非某一静态精确的曲线函数图像，而是在复杂因素的影响下而动态变化的。再次，通过对恐惑谷效应的内涵机制梳理，剖析了恐惑谷效应的解释路径和作用机制。最后，本文认为，智能时代下恐惑谷效应的讨论向人机领域的收敛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人机互动中的阻碍性问题，但对主体性威胁讨论的纳入同样带来了理论应用的泛化问题。对此，需要回归到现实语境中将恐惑谷研究放置于新的时代背景与本土社会文化下加以考察。

“恐惑谷”作为人机传播领域少有的被概念化的、对负面现象的问题性概念描述，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担着人们描述人机传播问题的媒介。其在当下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来并经历泛化，这本身反映着人们在智能时代下对于人机关系的好奇、反思与谨慎。本文无意对此进行批判，而是希望通过划定和厘清其概念与问题域，避免在“神话”或“弱化”人类能力与定位中过度放大或忽视技术威胁，将注意力从对技术角色本身的关注和恐惧中，回归到技术参与下的社会关系实践中来，探索人机共存的有效路径。这也提示我们须从单纯的人机二元关系的视角中跳脱出来，将恐惑谷问题放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与技术发展中考察，才能真正逃离泛化理论下的“主体性困境”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漩涡，重新思考人机共存与传播问题。

责任编辑：许磊

---

<sup>①</sup> 胡泳：《界限的消失：活在时代的夹缝里》，《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6期。

# 高龄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再审视

——劳动市场与技术进步双重视角的研究述评<sup>\*</sup>

叶初升 韩睿怡 沈旻昊

**[摘要]**在全球老龄化浪潮加速的背景下，高龄劳动力就业已从个体选择上升为国家战略议题。本文从劳动市场与技术进步的双重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了高龄劳动力就业的研究进展，揭示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性与新范式的转型可能。通过反思研究文献发现，高龄劳动力与青年就业并非“零和博弈”，代际间存在显著的行业隔离与互补效应。在供给端，高龄劳动者面临体力与教育的双重约束，但医疗进步与终身教育体系能显著缓解其生理劣势，提升人力资本基线；适老化岗位和社保激励可将高龄劳动者的经验资本转化为生产力优势。在需求端，存在岗位适配性悖论、年龄生产率误判及代际替代弹性争议，但引入技术要素则可重构劳动供求关系。技术进步在短期内替代低技能岗位，长期则通过效率提升创造新业态。高龄群体在认知密集型任务中的经验优势与技术互补，能形成“经验增强型”竞争优势。在技术赋能场景下高龄劳动力与青年劳动力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可以形成代际间的知识传递与技能互补的协同发展格局。未来研究应聚焦经验资本量化、红利行业识别及制度创新路径，发掘老龄化社会的人力资本红利。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高龄劳动力就业 技术进步 经验资本 老年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8-0082-10

##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重塑劳动市场的基本格局。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预测，到21世纪70年代末，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22亿，超过18岁以下人口。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sup>①</sup>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量首次突破3亿，达到3.1亿，占全国人口的22%。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5.6%，<sup>②</sup>超过全球老龄化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动能、社会保障体系、资源代际分配等都提出深刻挑战。<sup>③</sup>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高龄劳动力<sup>④</sup>就业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伟大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21&ZD07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叶初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韩睿怡，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沈旻昊（通讯作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430072）。

①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Summary of Results*, 2024.

②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2025年7月24日。

③ 齐红倩、闫海春：《人口老龄化抑制中国经济增长了吗？》，《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

④ Acemoglu and Restrepo (2022) 将高龄劳动力定义为55周岁以上劳动者。在中国，55周岁与强制退休年龄有交叠，因此我们参照张明昂和吴楠（2024）的观点，将50周岁以上的劳动者界定为高龄劳动力。Daron Acemoglu, Pascual Restrepo, “Demographics and Autom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89, no.1, 2022, pp.1-44；张明昂、吴楠：《劳动力人口高龄化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经济学（季刊）》2024年第4期。

已从个体生命周期中的就业规划问题，跃升为关乎国家经济韧性、社会公平及技术变革包容性的战略性议题。

长期以来，经济学将老龄人口视为“被赡养者”，强调其对社会福利体系的依赖，将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收缩、<sup>①</sup>储蓄率下降及财政负担加重直接关联，<sup>②</sup>视高龄群体为经济增长的“成本项”，<sup>③</sup>关于高龄劳动力的分析也多为“人口红利”消减的悲观叙事。经典索洛模型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视为外生变量，隐含假定高龄劳动者因体能衰退、技能老化而逐渐退出生产函数。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与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化，学界开始重新审视高龄劳动者的经济价值。内生增长理论揭示，劳动者的经验积累、隐性知识与代际技能传递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sup>④⑤</sup>这一发现为高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再开发”提供了理论支点，即通过技术适配与制度优化，<sup>⑥</sup>高龄劳动者的经验优势或可转化为持续的生产力贡献。<sup>⑦</sup>这种视角转换标志着研究范式从“负担论”向“资源论”转型，高龄劳动力不再被视为“退出序列的冗余者”，而是“人力资本存量的持有者”，成为缓解技术断层、维持产业链稳定的关键群体。

本文将从高龄劳动者与青年劳动者（16—24周岁）之间就业关系、劳动市场供给与需求两侧关于高龄劳动力就业的理性决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高龄劳动力就业带来的机遇与冲击等不同角度，梳理、辨析与评论最新相关研究文献，在洞悉前沿研究的基础上引出对高龄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深入思考，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二、高龄劳动力就业与青年就业

从现实数据看，我国高龄劳动力（50周岁以上）就业占比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18.1%攀升至2023年的36.5%；与此同时，青年劳动力（16—24周岁）就业占比却呈反向下滑趋势，同期从15.1%下降至5.8%。<sup>⑧</sup>这一升一降的鲜明对比，不免引发社会对就业结构变化的关切，担心延迟退休年龄等政策增加了高龄劳动力供给，会挤压青年劳动力的就业空间。

学界同样关注高龄劳动力就业与青年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岗位挤出论”与“就业互补论”的认识分歧。“岗位挤出论”认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可能会降低整体就业水平，<sup>⑨</sup>其会通过跨市场匹配渠道提高年轻工人的失业率。<sup>⑩</sup>这部分文献基于劳动岗位恒定的隐含假设，以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分析劳动市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岗位总量恒定的情况下，增加高龄劳动力供给必然会挤出青年群体就业，进而推高其失业风险。在我们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岗位的激烈竞争中，相对于身体强健、思维敏捷的青年群体，高龄劳动者的优勢何在？

① David E. Bloom, Jeffrey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12, no.3, 1998, pp.419-455.

② Jonathan Gruber, David Wise, “Social Security and Retirement: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8, no.2, 1998, pp.158-163.

③ Ronald Lee, Andrew Mason, “What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43, no.3, 2006, pp.16-17.

④ Paul M. 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5, 1990, pp.71-102.

⑤ Robert E. 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22, no.1, 1988, pp.3-42.

⑥ Jesus Candela, Matthew Dutton, Steve Johnson, Colin Lindsay, Ronald MacQuaid, Robert Raeside, “Ageing, Skills and Participation in Work-Related Training in Britain: Assessing the Position of Older Workers”,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vol.26, no.1, 2012, pp.42-60.

⑦ Axel Börsch-Supan, Matthias Weiss, “Productivity and Age: Evidence from Work Teams at the Assembly Line”, *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vol.7, 2016, pp.30-42.

⑧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2024》。

⑨ Franklin A. Michello, William F. Ford, “The Unemployment Effects of Proposed Changes in Social Security’s ‘Normal Retirement Age’”, *Business Economics*, vol.41, no.2, 2006, pp.38-46.

⑩ Tiantian Dai, Hua Fan, Xiangbo Liu, Chao Ma,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and Unemployment Rate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vol.71, 2022, p.103387.

“就业互补论”认为高龄劳动力就业率提升反而能够促进青年劳动力就业，并且促使青年失业率下降和劳动力参与率上升。<sup>①②</sup>不论是从行业异质性，还是劳动岗位非同质化特征出发，<sup>③④</sup>高龄劳动力与青年劳动力之间都存在互补性与非竞争性。高龄劳动力往往沉淀于传统制造业、公共服务业等资本密集型领域，而青年群体则集中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兴业态，形成了“代际就业隔离”。<sup>⑤</sup>这说明高龄与青年两类群体在人力资本结构、职业选择偏好等方面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使得代际就业更多呈现“错位工作”而非“直接竞争”的特征。因此，在制定就业政策时，可以根据两类人群的比较优势安置工作岗位。

高龄劳动力与青年劳动力的非竞争性不仅体现在行业分布上，也体现在通过经验传承与知识扩散而形成的协同效应上。高龄劳动力持续就业可通过“干中学”机制促进青年劳动力的技能提升，<sup>⑥</sup>尤其在师徒制普遍的传统制造业与手工业中，高龄劳动者积累的工作经验为青年劳动者提供了重要的学习资源，而且企业内高龄技术专家与青年工程师的合作，往往能缩短技术迭代周期，推动创新成果的落地。

此外，高龄劳动力就业还可能通过扩大消费需求间接地创造青年就业机会。延迟退休政策通过增加社会总产出刺激需求扩张，从而推动劳动需求曲线右移，最终提升整体就业水平。<sup>⑦</sup>这一机制在服务业中表现尤为突出：高龄劳动者的收入增加能带动医疗、养老等消费需求，进而催生相关行业的岗位增长，而这些岗位往往由青年劳动力填补。上述实证研究否定了“岗位挤出”的简单逻辑，揭示了代际人力资源配置的复杂性。

尽管高龄劳动力就业不会直接挤占青年就业机会，但青年失业问题仍不容忽视。青年失业的根源在于劳动市场的结构性失衡。首先，经济周期波动对青年就业的影响最为显著。经济衰退期间企业倾向于削减新员工招聘规模，导致青年失业率大幅上升。<sup>⑧</sup>其次，技能错配问题日益突出，教育体系与劳动市场需求的结构性脱节成为关键症结。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可能是过度教育和教育信号（即教育是劳动者能力的信号）减弱导致的。<sup>⑨</sup>毕业生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和挑战，折射出“学历通胀”与“技能赤字”并存问题：一方面，高等教育扩张导致学历供给与岗位需求脱节；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体系滞后使得青年难以掌握新兴产业所需的技术能力。例如，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算法工程师岗位，但相关专业毕业生却因实践经验匮乏而面临就业困难问题。最后，“自愿失业”现象进一步加剧了青年失业的复杂性。“NEET 族”概念（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由此产生，其指代不升学、不就业、不培训的青年群体，揭示当前高学历青年“择业观望”、低学历青年“消极退出”现象：<sup>⑩</sup>高学历青年因对薪资与职业发展期望过高，拒绝接受低层次岗位，而低技能青年则因最低工资保障不足或工作条件恶劣选择退出劳动市场。这种结构性失业与制度层面的劳动权益保障缺失密切相关。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发现，青年劳动力失业主要源于结构性因素，并不是高龄劳动力就业造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高龄劳动力就业“岗位挤出”效应。

① Paul Mohnen, “The Impact of the Retirement Slowdown on the US Youth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ol.43, no.1, 2025, pp.203-246.

② 张川川、赵耀辉：《老年人就业和年轻人就业的关系：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14年第5期。

③ 李磊、席恒：《我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青年人的就业效应研究》，《管理评论》2019年第1期。

④ 肖严华：《延迟退休年龄：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上海经济研究》2023年第9期。

⑤ 范琦、冯经纶：《延迟退休对青年群体就业的挤出效应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

⑥ Ulrike Fasbender, Fabiola H. Gerpott, “Knowledge Transfer Between Younger and Older Employees: A Temporal Social Comparison Model”, *Work, Aging and Retirement*, vol.8, no.2, 2022, pp.146-162.

⑦ 于小雨、孙英隽：《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⑧ 郭达：《国际视野下青年失业问题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9年第3期。

⑨ Bingbing Zhang, Qinggen Zhang, Congli Yao, Zhiyuan Liu, “The Signaling Paradox: Revisiting the Impacts of Over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Education Sciences*, vol.14, no.8, 2024, p.900.

⑩ Paula Rodriguez-Modroño, “Youth Unemployment, NEETs and Structural Inequality in Sp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vol.40, no.3, 2019, pp.433-448.

### 三、劳动市场供给端的个体决策

作为劳动市场的供给方，劳动者通过付出劳动获取收入。研究文献在分析高龄劳动者的就业决策时，通常聚焦于人力资本特征与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相较于青年劳动力，高龄劳动力群体具备独特的禀赋结构：虽然体力机能与正规教育水平处于相对劣势，但拥有青年劳动力难以企及的经验资本积累。就业保护、社会保障等劳动就业方面的制度因素以及技术进步，决定了高龄劳动力是否能够继续就业及其就业的质量。

#### （一）高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双重约束

高龄劳动力就业的人力资本约束主要体现在生理机能衰退与教育水平偏低两方面。一方面，在体力要求高的工作岗位上，提前退休的现象比较普遍。<sup>①</sup>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HRS）的微观证据表明，65岁以上的劳动者在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工作场景中选择不工作的概率，比低体力需求的工作环境下选择不工作的概率要高1.36—1.48倍。<sup>②</sup>个人身体健康是高龄劳动者选择是否继续工作的关键因素。若高龄劳动者日常自理能力欠缺，相比于没有身体限制的劳动者，其退休可能性更大。<sup>③</sup>这种生理约束会直接反映在职业选择偏好上，高龄劳动者对具有灵活工时、居家办公及低体力消耗等特征的岗位更为偏好。<sup>④</sup>中国情境下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机制，当健康存量每提升1个单位，城镇劳动者就业概率就增加37.2%。<sup>⑤</sup>由此可见，健康水平对于高龄劳动力的就业结果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技术进步的加速，劳动市场对高技能、高学历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sup>⑥</sup>受历史原因影响，<sup>⑦</sup>高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往往与青年劳动力存在显著差距，<sup>⑧</sup>加之过去所学知识逐渐老化也更难满足现代岗位对技能和知识的要求，对高龄劳动力延迟退休或重新进入劳动市场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提升高龄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技能储备，是改善其就业状况的关键举措。<sup>⑨</sup>

不过，现代社会技术进步与医疗事业发展正在改变这些约束。在生物医学、人工智能与精密制造的共同驱动下，现代医疗已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体系。2023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sup>⑩</sup>相比2000年的71.4岁提升了7.2岁。<sup>⑪</sup>这种生理资本的改善通过双重机制影响劳动供给：直接效应体现为工作耐力提升，间接效应则表现为降低体力要求、降低职业伤害风险而扩大就业选择集。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较快，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缺口有可能部分被有潜力的高龄劳动群体填补。改善健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高龄劳动力的体力劣势，更关键的是，教育扩张带来的代际人

<sup>①</sup> Johanna Stengård, Marianna Virtanen, Constanze Leineweber, Hugo Westerlund, Hui-Xin Wang, “The Implication of Physically Demanding and Hazardous Work on Retirement Tim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vol.19, no.13, 2022, p.8123.

<sup>②</sup> Joanne Song McLaughlin, David Neumark, “Barriers to Later Retirement for Men: Physical Challenges of Work and Increases in the Full Retirement Age”, *Research on Aging*, vol.40, no.3, 2018, pp.232-256.

<sup>③</sup> Hanne De Preter, Dorien Van Looy, Dimitri Mortelmans,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Push and Pull Factors as Predictors of Retirement Timing in Europe: A Multi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vol.27, no.4, 2013, pp.299-307.

<sup>④</sup> Nicole Maestas, Kathleen J. Mullen, David Powell, Till von Wachter, Jeffrey B. Wenger, “The Value of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ucture of Wag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13, no.7, 2023, pp.2007-2047.

<sup>⑤</sup> 曹乾、杜雯雯：《健康的就业效应与收入效应：基于 Heckman 模型的检验》，《经济问题探索》2010年第1期。

<sup>⑥</sup> Gerbrand Tholen, “The Mea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Credentials in Graduate Occupations: The View of Recruitment Consultants”,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vol.36, no.1, 2023, pp.9-21.

<sup>⑦</sup> Wolfgang Lutz, Jesus Crespo Cuaresma, Warren Sanderson, “The Demography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Science*, vol.319, no.5866, 2008, pp.1047-1048.

<sup>⑧</sup> 刘万：《中国不同年龄组别的城镇劳动者产出效率研究——兼谈对合理延迟退休年龄的启示》，《经济评论》2018年第4期。

<sup>⑨</sup> OECD, *Working Better with Age: Ageing and Employment Policie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9, p.67.

<sup>⑩</sup>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8月29日。

<sup>⑪</sup>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2024》。

力资本提升正在改变高龄劳动力的竞争势能。2000—2022年，中国50岁以上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6年上涨至8.2年，提升了46.4%。<sup>①</sup>提高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延长退休年龄，高龄就业的可能性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sup>②</sup>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较好、地位较高、工作报酬较高的劳动者具有更长远的计划和控制就业的能力，并拥有更高的技能和更好的机会结构应对老年时期与工作相关的挑战。<sup>③</sup>因此，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对释放高龄人力资本红利具有帕累托改进意义，教育扩张为充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实现积极老龄化提供了可行路径。

## （二）高龄劳动力经验资本与制度安排

高龄劳动力的经验资本具有独特的市场价值。高龄劳动力三维分析框架揭示，高龄群体的经验优势表现为生产性知识积累，即知识经验优势、社会资本优势、人才成本优势。<sup>④</sup>其中，知识经验优势在农业部门表现最为显著：60岁以上务农者的技术效率指数达到0.82，较30岁以下群体高出17%，<sup>⑤</sup>这种优势在小麦等精耕作物种植中尤为显著。<sup>⑥</sup>在此基础上，工作岗位的适老化以及社会保障为高龄劳动力就业及其发挥经验优势提供了保障与激励。1990—2020年间美国75%的岗位通过降低体力负荷、优化工作节奏等方式提升高龄劳动者适配度，直接推动50岁以上劳动力就业占比提升9.2%。<sup>⑦</sup>制度环境的改善则为发挥经验优势提供了激励相容框架。美国社保改革使得65—69周岁劳动者的隐性税率下降了约15%，激发了老年人参与工作的积极性。<sup>⑧</sup>这种结构性调整揭示了高龄人力资本再开发的双重制度逻辑：一方面，岗位适老化为捕获高龄劳动力经验资本提供了环境保障；另一方面，社保激励则重塑了生命周期内劳动决策的预算约束线，激励高龄劳动力延长工作时长。

综上，高龄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决策受人力资本特征与制度安排的影响。医疗水平提升与健康改善补足了生理资本短板，教育扩展提升了人力资本基线，而工作岗位适老化和社保改革则构建了高龄劳动力发挥经验优势的制度通道。这种多维度的动态调整机制，为理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高龄劳动力就业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 四、劳动市场需求端的企业雇佣选择

在劳动市场需求端，关于企业对高龄劳动力雇佣选择的研究主要围绕岗位适配性、年龄生产率曲线、代际替代效应三个维度展开。既有文献表明，结构性岗位特征偏好、相对较低的高龄生产率、代际替代弹性共同构成了高龄劳动力就业的“三重约束”。

### （一）岗位适配性悖论：制度激励与市场选择的背离

基于劳动供给视角的岗位适老化改造，被视为促进高龄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制度设计，但在实践中也带来了“制度激励—市场响应”的非对称效应：老年友好型岗位的主要受益群体并非高龄劳动者，而是年轻女性（就业概率提升超16%）与高学历青年群体（就业概率提升超25%）。这种“适老化”岗位异

<sup>①</sup> 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2001》与《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2023》。按照现行学制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即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按16年计算，高中12年，初中9年，小学6年，文盲0年。

<sup>②</sup> Anna Amilon, Mona Larsen, “Increasing Retirement Ages in Denmark: Do Changes in Gender, Education, Employment Status and Health Matter?”, *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vol.20, no.1, 2023, p.24.

<sup>③</sup> Konrad Turek, Kène Henkens, Matthijs Kalmijn, “Gender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in Extending Working Lives: Late-Life Employment Trajectories Across Three Decades in Seven Countries”, *Work, Aging and Retirement*, vol.10, no.2, 2024, pp.100-122.

<sup>④</sup> 潘静静、程承坪：《中国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当代经济管理》2013年第3期。

<sup>⑤</sup> 郭晓鸣、左喆瑜：《基于老龄化视角的传统农区农户生产技术选择与技术效率分析——来自四川省富顺、安岳、中江3县的农户微观数据》，《农业技术经济》2015年第1期。

<sup>⑥</sup> 高升、邓峰：《农村人口老龄化、农业机械化与小麦两阶段生产效率》，《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第10期。

<sup>⑦</sup> Daron Acemoglu, Nicolaj Søndergaard Mühlbach, Andrew J. Scott, “The Rise of Age-Friendly Jobs”, *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vol.23, 2022, p.100416.

<sup>⑧</sup> Axel Börsch-Supan, Courtney C. Coile,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and Retirement around the World: Reforms and Retirement Incent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pp.435-460.

化为“适女性化”和“适年轻化”，其实质在于两种机制：其一，体力强度低、工作环境舒适度高等岗位特质并不具有排他性，其传递的人力资本信号除吸引高龄劳动力外，也会吸引女性与青年群体；其二，在劳动力市场中，愿意雇佣45岁以上劳动者的雇主仅占35%，较中年群体低12%。高龄劳动者失业后再就业概率远低于青年群体，并且其职业转换成功概率仅为年轻从业者的一半。<sup>①</sup>以上两种机制共同作用造就了“岗位适配性悖论”：制度设计虽在理论上扩展了高龄劳动力的就业空间与可能，但由于潜在的年龄歧视限制<sup>②</sup>与职业流动性“陷阱”，实际劳动市场中高龄劳动力就业占比提升并不显著。

## （二）年龄生产率曲线的理论困境：测量偏误与科技冲击

随着劳动力年龄增长，劳动者的身体机能会逐步退化，<sup>③</sup>劳动生产率也随之降低。<sup>④</sup>当劳动者的生产率未出现明显提高，而其福利与工资却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时，<sup>⑤</sup>企业就会减少对高龄劳动力的雇佣。

从宏观视角看，传统研究普遍支持年龄—生产率关系的“倒U型曲线”假说。中国流动人口生产率峰值出现在30—34岁组，50岁以上群体边际产出明显下降。<sup>⑥</sup>而根据中国人口普查资料测算的结果更悲观，中老年劳动力（45—64岁）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负值。<sup>⑦</sup>但这类研究及其结论面临双重挑战：一是方法层面，上述文献对劳动生产率的衡量主要是以工资水平表征或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得到，而工资水平对劳动生产率的刻画并不精准，生产函数法则因未纳入技术要素而失之准确；二是现实层面，自动化等技术能部分抵消高龄劳动力体力衰退的负面效应。<sup>⑧</sup>这意味着，传统年龄—生产率理论可能低估了现代技术对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运用所产生的影响。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新，通过智能化工具的应用能有效缓解劳动者体力下降等自然劣势，<sup>⑨</sup>而高龄劳动者在长期工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人际协调与管理能力，凭借技术的加持，能够转化为显著的生产力优势（潘静静、程承坪，2013），实现经验与技术的协同增效，从而重塑生产率的年龄分布。因此，年龄生产率曲线的变化更为复杂，还有待进一步探究与考察。

## （三）代际替代弹性重构：技术要素推动关系嬗变

现有研究文献对不同代际间劳动力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一些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年长员工与年轻员工之间具有替代关系的结论。<sup>⑩⑪</sup>与此相反，另一部分研究则发现，高龄劳动力与青年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即高龄劳动力就业不仅不会“挤出”青年劳动力，反而会促进青年劳动力就业（张川川、赵耀辉，2014）。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青年劳动力与高龄劳动力之间既不存在替代关系，也不存在

① Andrew Aitken, Shruti Singh, “Time to Change? Promoting Mobility at Older Ages to Support Longer Working Lives”, *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vol.24, 2023, p.100437.

② David Neumark, Ian Burn, Patrick Button, “Is It Harder for Older Workers to Find Jobs? New and Improved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27, no.2, 2019, pp.922-970.

③ Walter C. Borman, Jerry W. Hedg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k and Ag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281-297.

④ Nicole Maestas, Kathleen J. Mullen, David Powell,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Economic Growth, the Labor Force and Produ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15, no.2, 2023, pp.306-332.

⑤ Kadija Charni, “Can Cohort Effects Explain the Decline of Earnings for Older Workers? Evidence from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Labour*, vol.33, no.3, 2019, pp.306-350.

⑥ 刘成坤、赵昕东：《不同年龄组流动人口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人口与经济》2020年第2期。

⑦ 汪伟、刘玉飞、徐炎：《劳动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动态演化》，《学术月刊》2019年第8期。

⑧ Daron Acemoglu, Pascual Restrepo, “Secular Stagnation? The Effect of Aging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7, no.5, 2017, pp.174-179.

⑨ 陈尧、王宝珠：《替代与推升：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影响》，《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7期。

⑩ Daniel S. Hamermesh, *Labor Dem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61-136.

⑪ Quoc Hung Nguyen,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Older and Younger Worker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Jap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vol.44, no.8, 2023, pp.1472-1491.

在互补关系。<sup>①②</sup>

这种分歧可能源于模型设定中技术要素讨论不足。上述研究普遍忽视了技术进步这一关键要素，导致最终结论存在偏差。当生产函数仅包括青年劳动力与高龄劳动力两种投入要素时，二者之间仅存在替代关系，但引入信息技术或科技水平等要素时，青年劳动力与高龄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可能从单纯的替代关系转变为互补关系，并且技术进步也可能成为高龄劳动力的补充性要素。<sup>③</sup>尽管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仍需进一步验证，但这一观点为分析高龄劳动力就业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框架。

总体上，从劳动需求的视角研究高龄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文献，偏重结构性岗位特征偏好、相对较低的高龄生产率及代际替代弹性对高龄劳动力的就业约束。这些分析与当前高龄劳动力就业比重迅速提升的现实存在显著偏差，也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释放老年人口红利的政策目标方枘圆凿。本文后续将重点梳理技术进步对传统就业理论的冲击，期望通过新的视角革新范式、重构理论，以更好理解现实中高龄劳动力就业占比上升的现象，并为释放老年人口红利提出可能的理论解释。

## 五、技术进步与高龄劳动力就业

技术进步能否通过赋能经验积累形成人力资本补偿效应，重塑高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进而改变劳动市场对高龄群体的需求结构？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厘清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市场的一般规律，然后在此基础上理解高龄劳动力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共生演化关系。

### （一）技术进步对劳动市场的重构

关于自动化技术的就业效应，学术界存在明显的认识分歧。机器人渗透率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通勤区每增加1个工业机器人将导致6个就业岗位流失与小时工资率的下降，其中低技能劳动者首当其冲。<sup>④</sup>不过，该研究存在局限性：其一，技术扩散的“同质化”假设忽略了地区间技术吸收能力的差异，仅依据劳动力规模测算地区自动化水平，其准确度具有一定争议；其二，将自动化水平简化为机器人数量这一单维指标，难以捕捉技术异质性特别是智能水平对劳动市场的复杂影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于法国雇员—雇主匹配数据显示，不管是微观层面还是行业宏观层面，自动化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均为积极的。其机制在于，自动化促使企业增加利润，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产生就业创造效应。<sup>⑤</sup>

关于技术进步对劳动就业产生截然相反的效应，离岸—返岸的理论分析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当技术进步促进生产率提升有限时，企业为降低贸易成本选择将生产外包给低工资国家，但当技术不断突破并助推生产率持续提高时，国内使用先进技术的生产效率将高于国外，返岸激励增加。<sup>⑥</sup>也就是说，当技术突破临界阈值时，自动化企业将从离岸外包转向本土返岸，因而技术强度与就业效应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这意味着高龄劳动力的就业前景取决于技术发展所处的阶段，不能一言蔽之。

### （二）高龄劳动力与技术进步的共生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技术冲击的年龄异质性影响。在计算机普及初期（1984—2000年），高龄劳动力的技术适应性滞后使其工资下降，退休概率在原8%的基础上增加1%—1.4%。<sup>⑦</sup>这种“技术

① Jacques Wels, “The Impact of Extending Working Lives on Youth Employment in Great Britain”, *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vol.18, no.1, 2020, pp.31-47.

② Jonathan Gruber, David A. Wise,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and Retirement around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to Youth Employ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345-360.

③ Steven G. Allen, “Demand for Older Workers: What Do We Know? What Do We Need to Learn?”, *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vol.24, 2023, p.100414.

④ Daron Acemoglu, Pascual Restrepo,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28, no.6, 2020, pp.2188-2244.

⑤ Philippe Aghion, Céline Antonin, Simon Bunel, Xavier Jaravel, “What Are the Labor and Product Market Effects of Automation? New Evidence from France”, *Research Briefs in Economic Policy*, 2020, pp.1-2.

⑥ Astrid Krenz, Klaus Prettner, Holger Strulik, “Robots, Reshoring, and the Lot of Low-Skilled Work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136, 2021, p.103744.

⑦ Péter Hudomiet, Robert J. Willis, “Computerization, Obsolescence and the Length of Working Life”, *Labour Economics*, vol.77, 2022, p.102005.

“鸿沟”在低技能群体中尤为突出。中国情境下的研究也有相似的发现。机器人普及会恶化高龄劳动力的就业环境、加剧老年人的老龄观念，实证证据显示工业机器人渗透率每增加1台/万人，高龄劳动力就业概率下降13.7%。但是，基于补偿视角的研究则发现完全相反的现象。<sup>①</sup>内生技术选择模型说明，自动化提高了专门从事非生产性服务的高龄劳动力的生产率。随着中老年人比例的上升，在机器人部署增幅最大的通勤区，工资和就业水平在35—54岁劳动力中降幅最大，在55—64岁劳动力中降幅较小，在65岁及以上劳动力中几乎没有变化(Acemoglu and Restrepo, 2022)。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渗透可以作为高龄劳动力的补充、青年劳动力的替代。上述研究结论分歧提示我们，单纯用“替代”或“互补”等难以准确捕捉技术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必须结合具体技术特征、应用场景等多维度考察其微观作用机制。

高龄劳动力的就业并非由技术冲击单向决定，而是技术路径、行业特征与人力资本等不同维度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技术发展进入经验增强型阶段，高龄群体依“干中学”积累的默会知识，完全有可能通过与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的协同实现职业生涯的“第二曲线”。

### (三) 任务偏向性视角下技术进步与劳动市场

当前技术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加速向人工智能迁移——不同于既往技术对体力劳动的线性替代，人工智能通过解构工作岗位的任务属性，正在触发更深层次的劳动市场重构。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具有“双面”作用，<sup>②</sup>即负向的替代效应<sup>③</sup>和积极的创造效应。<sup>④⑤</sup>

人工智能技术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呈现出显著的任务异质性，因此学界多从任务偏向性视角展开研究。基于机器学习的职业替代风险测度表明，体力密集型行业(采矿/制造)替代率高达20%以上，认知密集型行业(教育/科研)不足5%。技术主要通过替代繁重的重复性任务缩减工时，实现工作强度降低与生产效率提升。<sup>⑥</sup>更深入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不仅改变职业数量结构，更驱动职业质量变革——通过任务属性重构推动职业向非繁重化、精简化、自由化方向演进。<sup>⑦</sup>这种变革对劳动市场产生两个层面的筛选效应：在微观层面，常规体力型工作加速消亡，非常规认知型岗位持续扩张；在宏观层面，产业智能化催生的数字职业群形成新的就业增长极。这种技术偏向性在微观任务层面更为凸显：人工智能渗透会挤出常规型职业(多流程性的重复任务)，而对非常规认知型职业，人工智能渗透度提升1个单位，非常规职业人数增长42.7%。<sup>⑧</sup>这种非对称影响机制或许暗示，高龄劳动力凭借其丰富的非常规认知经验，可能在新兴职业生态中占据独特的优势地位。因为作为默会知识的一类，非常规认知经验本质上是内嵌于实践行动的知识体系，它是在长期实践中经过积累和沉淀最终内化形成的个体能力。<sup>⑨</sup>相较于青年劳动力，高龄劳动者因更长的职业生命周期而拥有更丰富的实践累积，成为这类默会知识的重要载体。这一特点促使高龄劳动力或许能够与先进技术形成协同效应，在劳动力市场中具备竞争优势。医

①蔚金霞、李民、倪晨旭、高文书：《机器人普及与低龄老年人就业挤出：事实、机制与政策含义》，《兰州学刊》2024年第9期。

②汪前元、魏守道、金山、陈辉：《工业智能化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劳动者技能和性别的空间计量分析》，《管理世界》2022年第10期。

③王永钦、董雯：《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

④李磊、王小霞、包群：《机器人的就业效应：机制与中国经验》，《管理世界》2021年第9期。

⑤李小瑛、张宇平：《机器人如何塑造企业技能结构？——兼析机器人技术进步的偏向》，《经济评论》2024年第4期。

⑥王林辉、胡晟明、董直庆：《人工智能技术、任务属性与职业可替代风险：来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2年第7期。

⑦王林辉、钱圆圆、周慧琳、董直庆：《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和中国职业变迁方向》，《管理世界》2023年第11期。

⑧陈琳、高悦蓬、余林微：《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来自招聘平台大数据的分析》，《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⑨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58-75.

疗编码领域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该研究在分析了超过 112 万份医疗图表数据后发现，任务经验显著增强了编码员与 AI 工具协同时的工作效率，印证了劳动力经验在技术协同场景中的价值赋能效应。<sup>①</sup>

更值得关注的是，技术革新正在重塑职业任务图谱——人工智能不仅替代了常规体力型任务，更催生了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范式，放大经验积累型任务的价值。<sup>②</sup>这种技术—任务的动态匹配机制为高龄劳动力的经验资本化提供了可能：当隐性知识、模式识别等“缄默技能”成为人机分工的关键界面时，高龄劳动者长达数十年的经验沉淀将转化为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

## 六、评论与研究展望

中国当前正面临“少子老龄化”的严峻考验，人口结构少子化和老龄化演变正在引发劳动市场深层震荡。全国 50 岁及以上高龄劳动力就业占比持续攀升，2023 年已达 36.5%，其中 65 岁及以上高龄劳动力占比约 8.3%，超过 24 岁以下青年劳动力占比（5.8%）2.5 个百分点。<sup>③</sup>进一步分行业观察发现，这一趋势在农、林、牧、渔业（高龄劳动力占比 68.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48.8%），建筑业（33.8%）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33.5%）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尤为突出。这种“年龄结构倒置”现象引发了学界对劳动市场演变机制的深入思考：究竟是何种力量推动着高龄劳动力占比的持续扩张？高龄劳动力占比的提升是否有效释放了老年人口红利？

基于劳动市场供需框架的文献梳理显示，供给端与需求端存在显著的机制差异。在供给端，医疗技术进步显著改善了高龄劳动力的健康资本，有效缓解了其体力衰退对就业的制约；代际人力资本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高龄劳动力的竞争能力；更为关键的是，高龄劳动力在实践中通过“干中学”形成的工作专有技能与组织记忆，即积累的经验资本，构成高龄劳动力在知识密集型行业中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sup>④</sup>岗位适老化与养老金制度改革产生的“激励兼容”效应亦显著提升了高龄劳动力的劳动参与意愿。在需求端，高龄劳动力就业参与显示出更为复杂的图景。一些研究显示，结构性岗位特征偏好、相对较低的高龄生产率及代际替代弹性构成了高龄劳动力就业的“三重约束”。但这些研究忽略了技术进步的影响，难以解释当前高龄劳动力就业比重提升的现象。

技术冲击的异质性为理解高龄劳动力就业提供了新的视角。技术进步既对高龄劳动力生理机能衰退等“劣势”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又能为高龄劳动力经验优势的发挥提供保障。第一，技术进步有利于提升高龄劳动力的生产率，特别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高龄劳动力生产率。在不断进步的技术加持下，高龄劳动者的体力劣势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得以缓解或降低，其经验优势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在工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人际协调与管理能力能够大幅提升高龄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第二，技术进步促使部分有能力的高龄劳动力继续留在职场，为高龄劳动力与青年劳动力的互补创造条件。从微观视角来看，青年劳动力可以凭借“老带新”的方式高效吸收高龄劳动力的工作经验，承接经验红利外溢效应。这种代际间的知识传递与技能互补，将促成新老两类劳动力在技术赋能场景下形成协同互补的格局。第三，技术进步能够打破就业壁垒。短期内，技术进步对于劳动力，特别是从事程序性工作的劳动力具有一定替代效应，但长期来看，技术进步能够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劳动力需求。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由数量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逐渐消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赶不上人

<sup>①</sup> Weiguang Wang, Guodong Gao, Ritu Agarwal, “Friend or Foe? Teaming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Workers with Variation in Experience”, *Management Science*, vol.70, no.9, 2024, pp.5753-5775.

<sup>②</sup> David H. Autor, “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29, no.3, 2015, pp.3-30.

<sup>③</sup>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2024》。

<sup>④</sup> Yixuan Li, Yiduo Shao, Mo Wang, Yanran Fang, Yaping Gong, Chang Li, “From Inclusive Climate to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Examin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ablers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city”, *Th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107, no.12, 2022, pp.2285-2305.

口结构的转变速度，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sup>①</sup>学界通常将人口数量优势带来的红利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sup>②</sup>而将挖掘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与消费需求看作是第二次人口红利。<sup>③④</sup>健康改善与教育水平提升为释放老年人力资本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延迟退休政策则为开发高龄劳动力的“经验资本”提供了渠道与空间。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或许延迟退休可以从政策性行为转变为市场化行为。当技术进步能够补足高龄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的体力劣势时，部分需要“经验红利”的行业会在一定程度上偏向聘用高龄劳动力。

当前，关于高龄劳动力就业与老年人口红利开发与利用的研究较为有限，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拓展：第一，老年人口红利的实证分析。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利于补足高龄劳动力的体力劣势，并与高龄劳动力的经验优势形成互补，释放高龄劳动力人口红利。国内关于老年人口红利的实证分析尚显不足。第二，促进老年人口红利释放的制度安排。技术进步对高龄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依赖于制度环境的适配性。弹性延迟退休政策能够延长高龄劳动力的职业生命周期，为高龄劳动力就业、释放老年人口红利提供制度前提。但仅靠单一政策难以完全释放老年人口红利，需要完善的制度环境为高龄劳动力就业提供坚实保障，根据技术进步与高龄劳动力就业之间实际状态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以实现高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第三，老年人口红利的行业分布研究。老年人口红利主要来源于高龄劳动力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资本，但并非所有高龄劳动力都具有老年人口红利，也并非所有行业均存在老年人口红利。哪些行业存在释放老年人口红利潜力，如何促进老年人口红利释放等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第四，经验资本的量化评估。现有文献大多以受教育水平刻画人力资本。但老年人口红利蕴含的“经验资本”来源于工作实践的积累，无法由受教育水平这一指标完全体现。虽然工作年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者的工作经验，但还是存在较大的偏差（Wang et al., 2024）。因此，关于高龄劳动者经验资本的量化问题还有待于深入分析探讨。

责任编辑：成奕莹

①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② 耿志祥、孙祁祥：《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与二次人口红利》，《金融研究》2017年第1期。

③ 蔡昉：《如何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

④ 王树：《“第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理论渊源、作用机制与数值模拟》，《人口研究》2021年第1期。

# 新时代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决策标准研究

孙震 张可云

**[摘要]**科学的行政区划调整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目前行政区划调整工作仍需进一步完善。本文在梳理现行行政区划调整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基于经济发展、城乡差距、资源配置和城市环境等多个维度构建行政区划调整参考指标体系，并使用2001—2020年中国各省份行政区划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行政区划设置对行政区划调整参考指标的影响。研究表明，合理的行政区划设置与本地经济增长、城市环境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对弥合城乡收入差距、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有一定作用。通过进一步的聚类分析，本文确定了各决策指标不同水平下所对应的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率合理区间，构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行政区划调整决策标准。各地区可根据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确定核心决策指标，匹配最优城市化管理率水平，以衡量是否具备行政区划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具体而言，进行撤县（市）设区的调整决策时应综合考虑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资源配置效率和城市环境改善等情况，撤乡（镇）设街道时更应关注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

**[关键词]**行政区划调整 参考指标 决策标准 城市化管理水平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8-0092-09

## 一、引言

行政区划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权力再分配和政策制定的基础。<sup>①</sup>从本质上讲，行政区划隶属于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制度。自国家产生以来，行政区划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服务于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行政区划得当与否，不仅会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关系着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尺度不断细化。<sup>②</sup>2019年之前，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参考依据是国务院于1985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2018年国务院出台《行政区划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行政区划管理工作。根据《行政区划管理条例》，乡、民族乡、镇的设立、撤销、更名，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这对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开展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全国层面而言，什么时候需要进行行政区划调整，进行什么样的行政区划调整，并没有一致的标准可以依据。在此情况下，容易出现行政区划调整过度滞后或过度超前的问题，特别是撤乡（镇）设街道等涉及较大决策权的调整，更可能导致行政区划调整无法充分适应地区发展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国家发展的新历史方位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行政区划调整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

---

**作者简介** 孙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可云（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① 马春笋、张可云：《我国行政区划基本问题与走向探讨》，《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3期。

② 张可云、李晨：《新中国70年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特征与展望》，《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1期。

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实践证明，行政区划的科学设置是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之一。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与变革，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愈发明显，功能属性愈发完善和成熟。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sup>①</sup> 2021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破除资源流动障碍，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行政区划调整的高度重视。作为行政管理的空间基础，行政区划科学、适时的调整对防范化解治理风险、提升区域发展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科学的行政区划调整必须权衡好“引领发展”与“解决问题”，既不能脱离实际、超前调整，也不能长期僵化、停滞不前。2022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强调，“要坚持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定，做到非必要的不调、拿不准的不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不改。要完善行政区划调整标准体系，加强行政区划同相关政策、规划、标准的协调衔接，依法加强行政区划管理。”这意味着应该进一步完善行政区划的调整依据，规范行政区划调整的全过程。因此，本文拟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丰富现有行政区划调整的参考指标，并建立行政区划调整的决策标准，为行政区划调整工作提供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结论与建议。

## 二、行政区划调整的分析起点和改进方向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本节将对新时代行政区划调整的分析起点与改进方向进行梳理，为提出具体的行政区划调整改进方案奠定基础。

### （一）行政区划法律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目前，中国行政区划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文简称《宪法》）规定了中国以三级为主的多层次地方行政层级体制，奠定了中国行政区划制度的基本框架。行政区划管理的主要依据是《宪法》和国务院于 2018 年出台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其中，《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在法律层面还没有关于行政区划的统一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虽然对设立派出机关做出了相关规定，但并不属于专门的行政区划法律，且行政法规囿于自身法律层级的限制，难以覆盖行政区划的全部方面。《行政区划管理条例》的出台提高了行政区划管理的法治化水平，但行政区划问题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需要。从法律体系的完整性角度来看，宪法和行政法规之间存在法律真空和体系断层。除了宪法和行政法规外，我国关于行政区划的依据主要有《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关于地名命名的暂行规定》《关于调整设镇标准的报告》《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关于调整设市标准的报告》等文件。<sup>②</sup> 这些规章法律层次较低，且颁布时间较早，难以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客观需要，不能及时解决行政区划管理中面临的新问题，行政区划法律制度建设亟待加快。

### （二）行政区划调整标准应进一步规范

由法律对实体性的变更标准做出规定是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中国目前对行政区划调整标准做出规定的规章制度仍不够系统规范，难以适应新时代行政区划实践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说，行政区划调整标准存在以下缺陷：

一是设市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进一步细化设市标准的意义在于，严格规范设市条件，避免新设城市井喷式增长，提升行政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要探索不同的设市模式，在设市的过程中将严格坚持标准与适当放宽程序相结合，建立科学、系统、稳定的设市标准。目前，我国的设市标准较为单一，难以满足不同城市化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地区的城市建设需要。《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增加了相对水平的考核是设市新标准的一大亮点，<sup>③</sup> 未来应进一步细化。

二是市辖区设置标准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市辖区设置的主要依据为 1993 年 38 号文件《国务院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250 页。

<sup>②</sup> 马怀德：《行政区划变更的法治问题》，《行政法学研究》2016 年第 1 期。

<sup>③</sup> 范逢春、周森然：《撤县设市政策的变迁：历程、逻辑与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5 期。

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报告的通知》及 2014 年民政部出台的《市辖区设置标准（征求意见稿）》，有关市辖区设置标准的正式文件仍未出台。市辖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市辖区设置标准不够系统规范，将会阻碍行政管理效能的提升、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区域空间结构的改善，严重影响行政区划体系的规范化和法治化。

三是镇、街道设立标准需要进一步规范。根据《行政区划管理条例》的规定，镇、街道的设立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拟订，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2019 年《行政区划管理条例》施行后，各省先后出台了《镇、街道设立标准》，根据城镇发展规律和本省的具体特征，制定本省设立镇、街道的总体要求和基本条件。由于省级政府属于地方机关，存在因囿于地方利益的考量而忽略行政区划变更的整体性风险，<sup>①</sup> 应进一步加强对地方行政区划设置方案的备案审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 （三）行政区划调整程序可进一步改进

行政区划调整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正式划分为行为，<sup>②</sup> 是国家基于发挥行政权力效能对国家领土进行划分的结果，对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具有重大影响，因此需要完善行政区划的调整程序。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程序主要存在以下可改进之处：

一是行政区划管理主体需要适当调整。目前，省级以下地方的行政机构设置权归属于负责执行和管理的行政机构，这一权力分配忽视了地方权力机关的自主决策权。《宪法》规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关系城镇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区域重大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行政区划的重大改革、重要政策、重大调整由党中央研究决策。”新时代要加强党中央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对行政区划重大工作的全面指导，加强各级党委对本地行政区划工作的科学研判，强化地方权力机关的参与，更好地满足行政区划变更的科学性需求。

二是行政区划调整的申请、审批和评估程序存在不健全之处。目前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的申请和审批程序的依据主要为《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及 2004 年《民政部关于行政区划调整变更审批程序和纪律的规定》。前者对审批主体进行了划分，后者对审批程序作了原则上的规定，把审批程序分为制定计划、审核、批准、建档和监督等步骤，<sup>③</sup> 但缺乏对行政区划调整申请、审批和评估程序更细致的说明，需要结合新时代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的具体形势出台相应的细则。

## 三、行政区划调整决策参考指标体系的确定

在总结新时代中国行政区划调整改进方向的基础上，为对行政区划调整工作提供具有政策价值的有益补充，本节建立适用于撤县（市）设区和撤乡（镇）设街道的参考指标体系。

### （一）适用范围的确定

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多种形式：行政区划的设立、撤销、隶属关系变更，行政区域界线调整，人民政府驻地调整及行政区划名称的变更等。其中，行政区划的设立与撤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行政区划调整的典型措施。因此，本文将研究范围聚焦在行政区划的设立与撤销。此外，由于跨行政级别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地方政府获取政策与资源的能力会产生较大影响，<sup>④⑤</sup> 政治逻辑是此类调整的深层次动因，故本文主要研究行政级别不变情况下行政区划的设立和撤销，具体为撤县（市）设区和撤乡（镇）设街道。

① 吴志刚：《国务院、省级政府行政区划变更决策机制法治化问题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

② 吴庚祐、周佑勇：《行政区划变更基本原则的反思与重构——以〈行政区划管理条例〉第 2 条为中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 2 期。

③ 张弛：《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审批程序研究》，《管理观察》2014 年第 11 期。

④ 周伟林、郝前进、周吉节：《行政区划调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长江三角洲为例》，《世界经济文汇》2007 年第 5 期。

⑤ 张可云、王洋志、孙三百：《行政级别、财政支持与城市创新能力——兼论不同区域发展战略的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2 期。

行政区划调整的决策标准必须适应行政区划调整的阶段性特征。2003年以后，地级及以上的行政区划调整基本告一段落，县乡两级的行政区划调整稳步推进。2000—2020年，中国的县级行政区划总数趋于稳定，但县由1503个下降到1312个，市辖区由787个增长至973个。乡镇级区划总数由49668个下降到38741个，而街道办事处由5902个增长至8773个。撤县（市）设区和撤乡（镇）设街道是这一时期行政区划调整的总基调。202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4.72%，根据城镇化发展规律，我国城镇化仍处于扩张期。<sup>①</sup>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在保持行政区划总体稳定的要求下，结合逆全球化思潮再起、经济发展“新常态”、人口结构变迁等背景，持续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仍将是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内国家治理的主要任务。在调整的层级分布方面，考虑到地级市层面的行政区划相对稳定，区县（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乡（镇）街道是优化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故本文将重点探究健全撤县（市）设区和撤乡（镇）设街道的调整决策标准和参照依据。

## （二）参考指标的确定

新时代以来，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呈现“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新格局，已经经历了由政治逻辑到发展逻辑的变迁，并朝着治理逻辑转变。<sup>②</sup>以撤县设区为参照，就撤县设区实施城市的调整论证方案而言，其主要目标大多以优化城市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并对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议题进行持续关注。《行政区划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行政区划的设立、撤销以及变更隶属关系或者行政区域界线时，应当考虑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人文历史、地形地貌、治理能力等情况。”这些因素对各种形式的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具有不同的参考价值。一般而言，人文历史对于行政区划名称的变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地形地貌对于行政边界确定与变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两个因素相对稳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较大变化。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较为明显的变化，行政区划调整也会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的改善，因此这类因素应纳入行政区划调整的参考指标体系。

综上所述，行政区划调整参考指标的选择应坚持两个导向：一是目标导向。高质量发展是推动行政区划调整的根本原因，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工作时，必须坚持目标导向，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使这项工作与区域发展战略协调一致。二是问题导向。在现实中，不少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在问题推动下进行的，现行行政区划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更为常见。除收入差距问题外，错配问题还出现在资源配置效率和城市生态环境等方面。这意味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明确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进行调整，才能进行科学的调整。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根据《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和行政区划调整本身的特质，从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两个维度，可以建立涵盖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方面、适应地区发展方向和发展需求的参考指标体系。具体而言，坚持目标导向，以经济发展为主线，涵盖经济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等两个维度；聚焦问题导向，从消弭城乡收入差距、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等方面入手，见表1。

表1 行政区划调整参考指标体系

一级	二级	三级	代理变量
目标导向	经济发展	经济水平提升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问题导向	城乡差距	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效率	资源错配指数（取绝对值）
		城市宜居度	人均城市绿地面积
	城市环境	拥堵效应	市辖区与行政区人口密度之比
		事故发生率	人均交通事故发生次数

<sup>①</sup> 张可云：《正确认识撤县设区》，《人民日报》2021年2月8日第9版。

<sup>②</sup> 叶林、杨宇泽：《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三重逻辑：一个研究评述》，《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4期。

#### 四、研究思路、数据与方法

量化行政区划设置或调整是通过统计手段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活动影响的前提。本节使用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对行政区划设置进行量化。

##### (一) 研究思路

学术界对行政区划调整研究的现状充分说明,相较于撤乡(镇)设街道,撤县(市)设区会带来更大的影响。管理权限和管辖范围不同是造成二者间差异的重要原因,也意味着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参照重点应该有所区别。因此,应首先确定各参考指标与两级行政区划调整之间的关系,再将与行政区划调整最相关的指标纳入相应层级的参照依据中。然后,确定行政区划调整的参照点,<sup>①</sup>并进一步整合形成行政区划调整决策标准。

上述分析过程中,有两个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一是选择合适的方法分析各参考指标与行政区划调整之间的关系并确定参照点。在分析相关关系时,应充分立足各地区实际情况和行政区划调整基础,剔除其他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反映出参考指标与行政区划调整之间的“净”联系。基于此,本文引入计量经济学中的参数估计法进行分析。二是选择合适的指标反映行政区划调整程度,最简单的指标是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次数或个数。但这种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不同地区所管辖的下级行政区域数量相差甚大,而行政区域数量与调整次数存在相关性,这使得利用调整的绝对量来分析同步性缺乏科学性;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城镇化的进程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脱离地区城镇化水平而刻意追求同步性没有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张可云(2015)提出的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作为行政区划调整进程的代理变量,<sup>②</sup>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可表述为:

$$RUM_i = \frac{NJD_i}{NXJ_i} \quad (1)$$

$$IUM_i = \frac{RUM_i}{RU_i} = \frac{\frac{NJD_i}{NXJ_i}}{\frac{NC_i}{NP_i}} \quad (2)$$

式(1)和(2)中,  $RUM_i$  和  $IUM_i$  分别代表区域  $i$  的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  $NJD_i$  代表区域  $i$  的城市型政区数量, 县级为市辖区和县级市数量, 乡级为街道数量,  $NXJ_i$  代表县级或乡级行政区划总数,  $NC_i$  和  $NP_i$  分别代表区域  $i$  城镇常住人口和总人口数量。使用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考察区域城市化管理水平,可避免单个指标的片面性(张可云, 2015),也可以消除由地区行政区划基数不同所造成的不可比性。此外,城市化管理指数是基于行政区划设置和城镇化水平测算的,更能反映行政区划调整的质量。

##### (二) 数据

自“十五”计划以来,行政区划调整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县乡两级。基于此,本文将研究区间聚焦在2001—2020年。考虑到从相对高层次的视角进行研究可准确把握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战略意图,本文将研究对象确定为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本文所使用行政区划相关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参照指标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其他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三) 研究方法

为确定各参照指标与行政区划调整间的“净”联系,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具体来说,将各参照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行政区划调整(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加入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影响的指标以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行回归。当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统计上显著时,可视为对应的参照指标与行政区划调整具有显著联系,可进一步纳入参照依据中。遵循上述思路,设定如下模型进行OLS估计:

<sup>①</sup>当参照指标处于某一值时,行政区划应当进行调整,此值即为对应行政区划调整的参照点。

<sup>②</sup>张可云:《中国区域城市化管理水平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y_{it} = \beta_1 XZ_{it} + \beta_2 X_{it} + \gamma_t + \mu_p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y_{it}$  为被解释变量, 即各参考指标取值;  $XZ_{it}$  为行政区划调整进程, 包括县级和乡级的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 在进行回归时单独引入;  $X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人口密度、人口总量、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城镇化率、财政积极性、产业结构等指标; <sup>①</sup>  $\gamma_t$  和  $\mu_p$  分别代表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  $i$  和  $t$  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

## 五、结果与分析

本节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确定行政区划调整的决策指标, 首先从县乡两级考察行政区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各指标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相关指标进行分类, 确定行政区划调整的决策指标。

### (一) 行政区划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

表 2 展示了以县级城市化管理率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 县级城市化管理率与经济发展、收入差距、资源配置、城市环境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具体来说, 县级城市化管理率每提升 1 个单位,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提升 0.485%,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提升 0.263%,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0.815%, 资源错配程度下降 7.22%, 城市宜居度提升 0.01%, 拥堵效应下降 5.275%, 交通条件改善 4.37%。考虑到即使是少数撤县(市)设区均可带来县级城市化管理率的大幅提升, 上述结果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总体来说,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县级城市化管理率更高的地区, 有着更强的经济增长、更协调的城乡发展、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和更佳的城市环境。

表 2 县级城市化管理率与经济社会发展估计结果

变量	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1)	(2)	(3)	(4)	(5)	(6)	(7)
	经济发展		城乡差距	资源配置	城市环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资源错配指数	人均城市绿地面积	市辖区与行政区人口密度之比	人均交通事故发生次数
城市化管理率	0.485* (0.263)	0.263* (0.156)	-0.815** (0.332)	-0.722** (0.344)	0.010* (0.005)	-5.275* (2.955)	-4.370*** (1.456)
常数项	8.963*** (0.794)	0.401 (0.461)	2.562** (1.018)	0.069 (0.093)	0.035 (0.030)	13.070*** (4.685)	-4.165 (8.31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0	330	330	330	298	330	330
R <sup>2</sup>	0.999	0.964	0.968	0.872	0.736	0.956	0.898

注: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下同。

尽管表 2 的回归结果并不能说明地区的各方面改善和县级城市化管理提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但通过城市化管理率的本质可以看出上述各结果具有合理性。县向市辖区的转变将塑造更加有活力的地级市政府, 同时扩大地级市内部增长极的体量与覆盖范围, 能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此类改革可以降低整个地级市的资源错配程度, <sup>②</sup> 促进经济增长。此外, 覆盖范围的扩大意味着发展空间拓展, 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将更加自由, 从而改善城市拥挤等“内城”问题。

表 2 的结果直观地展示了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对于撤县(市)设区和撤乡(镇)设街道此类行政区划调整而言, 与地区城镇化进程协调推进是保障调整质量的关键。与城市化管理率相比, 城市化管理指数可以反映按照地区发展现状进行标准化后的行政区划调整进程。

表 3 展示了以城市化管理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表 2 结果显著的区别是, 县级城市化管理指数的系数估计值仅在以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中呈现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表明县级城

① 由于需要对多个参照指标进行估计, 当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出现重复时, 将重复的控制变量剔除。

② Shiyu Bo, “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Political Hierarchy Reform to Create C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115, 2020.

表3 县级城市管理指数与经济社会发展估计结果

变量	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1)	(2)	(3)	(4)	(5)	(6)	(7)
	经济发展		城乡差距	资源配置	城市环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资源错配指数	人均城市绿地面积	市辖区与行政区人口密度之比	人均交通事故发生次数
城市化管理指数	0.037 (0.039)	-0.031 (0.022)	-0.151** (0.062)	-0.322 (0.373)	0.001 (0.0008)	-0.425 (0.293)	-0.459 (0.371)
常数项	9.085*** (0.791)	0.646 (0.465)	2.902*** (1.0870)	0.086 (0.081)	0.035 (0.030)	12.86*** (4.944)	-9.368 (10.29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0	330	330	330	298	330	330
R <sup>2</sup>	0.999	0.964	0.968	0.876	0.734	0.953	0.910

市化管理指数越高的地区有着更协调的城乡发展。其他估计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城市化管理指数除了反映标准化后的调整进程以外，还可能反映的是行政区划调整超前或滞后于城市化的程度。这很可能是由调整不够系统造成的，致使无法和参考指标建立起联系。事实上，减弱这种“不系统”正是本文研究的应用方向。从这方面考虑，表3的估计结果指向一个更具启示意义的结论：行政区划调整滞后于城市化进程，很可能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原因非常直观：相较于市辖区，县主管农村事务的功能更加突出。当地区城市化水平已经较高，而县级行政区多为县时，这种管理职能与现状的不匹配可能造成农村事务管理质量下降，使得城市发展相对不协调。

表4和表5展示了乡级层面行政区划调整进程与各参考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与县级层面的估计结果相比，其有两处明显区别：一是行政区划调整进程仅和经济发展、城乡差距、城市环境中个别指标等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且在以人均城市公共绿地面积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中，城市化管理率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二是在以城市化管理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中，乡级城市管理指数与经济效率、结构优化、城市宜居度显著相关。这充分说明中国行政区划调整重心下移的战略正确性。在乡级层面的估计中，行政区划调整进程与地区整体人口集聚、治理能力之间并没有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在于，乡级行政区数量较多但管辖面积较小，对上述因素的影响难以形成整体效应。这表明，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应保持一定的同步性才能取得最佳的调整效果。

表4 乡级城市管理率与经济社会发展估计结果

变量	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1)	(2)	(3)	(4)	(5)	(6)	(7)
	经济发展		城乡差距	资源配置	城市环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资源错配指数	人均城市绿地面积	市辖区与行政区人口密度之比	人均交通事故发生次数
城市化管理率	0.198** (0.100)	0.080* (0.045)	-0.072 (0.111)	-0.190 (0.206)	-0.004* (0.002)	-0.072 (0.300)	-0.331 (0.698)
常数项	9.242*** (0.791)	0.560 (0.463)	2.192** (1.024)	0.005* (0.003)	0.033 (0.031)	10.900** (4.295)	-11.602 (10.69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0	330	330	330	298	330	330
R <sup>2</sup>	0.999	0.964	0.968	0.872	0.737	0.952	0.905

基于表2至表5的回归结果显著性，可以确定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决策指标，而其中各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则可以用来判断行政区划调整对应的响应方向。整理可得表6所示的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决策参照指标与响应方向。其中，正向响应和负向响应分别代表以城市化管理率（或管理指数）衡量的行政区划调整进程应朝着增大和减弱对应指标的方向进行。

表5 乡级城市管理指数与经济社会发展估计结果

变量	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1)	(2)	(3)	(4)	(5)	(6)	(7)
	经济发展		城乡差距	资源配置	城市环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资源错配指数	人均城市绿地面积	市辖区与行政区人口密度之比	人均交通事故发生次数	
城市化管理指数	0.185*** (0.061)	0.068*** (0.021)	-0.129** (0.055)	-0.003 (0.003)	-0.002* (0.001)	-0.023 (0.132)	0.351 (0.449)
常数项	8.795*** (0.709)	0.534 (0.454)	2.158** (1.038)	-0.864** (0.398)	0.036 (0.030)	10.930** (4.300)	-11.172 (10.49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0	330	330	330	298	330	330
R <sup>2</sup>	0.999	0.965	0.968	0.876	0.736	0.952	0.906

表6 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决策指标

层级	决策指标							
	正向响应			负向响应				
县级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人均城市公共绿地面积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资源错配指数、市辖区与行政区人口密度之比、人均交通事故次数			
乡级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人均城市绿地面积				

表7 行政区划调整决策标准参考值

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决策标准参考值								
组别	经济发展				城乡差距		资源配置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城市化管理率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城市化管理率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城市化管理率	资源错配指数	城市化管理率
1	81674	0.88—0.94	2.69	0.89—0.95	2.14	0.89—0.95	0.202	0.88—0.95
2	61452	0.64—0.78	2.40	0.66—0.78	2.34	0.62—0.78	0.265	0.66—0.78
3	52025	0.50—0.64	2.34	0.53—0.66	2.56	0.40—0.67	0.287	0.50—0.66
4	28453	0.30—0.50	2.30	0.38—0.50	3.32	0.27—0.50	0.292	0.30—0.50
组别	城市环境							
	人均城市绿地面积( m <sup>2</sup> )	城市化管理率	市辖区与行政区人口密度之比	城市化管理率	人均交通事故发生次数	城市化管理率		
1	29.3	0.89—0.95	1.09	0.89—0.95	1.35	0.62—0.78		
2	23.2	0.62—0.78	1.54	0.66—0.78	1.45	0.51—0.62		
3	12.7	0.40—0.62	1.87	0.55—0.66	1.74	0.40—0.50		
4	10.4	0.27—0.50	2.46	0.30—0.50	2.67	0.28—0.40		
乡级行政区划调整决策标准参考值								
组别	经济发展				城乡差距		城市环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城市化管理率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城市化管理率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城市化管理率	人均城市绿地面积( m <sup>2</sup> )	城市化管理率
1	81674	0.45—0.49	2.69	0.45—0.48	2.14	0.44—0.49	29.3	0.08—0.12
2	61452	0.30—0.45	2.40	0.30—0.43	2.34	0.28—0.43	27.3	0.12—0.18
3	52025	0.27—0.30	2.34	0.20—0.30	2.56	0.18—0.28	12.8	0.20—0.28
4	28453	0.13—0.27	2.29	0.13—0.20	3.15	0.12—0.18	9.3	0.30—0.41

## (二) 行政区划调整决策标准

理想的行政区划调整是每次调整都能取得最佳的效果，即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使资源配置更高效、使城市环境更优化等。但不同程度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应的最佳效果难以通过理论推导而得。基于此，本文从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实践出发寻找行政区划调整的最优解。具体思

路如下：首先将各个地区样本根据各项经济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组内各指标高度相似的样本组，每个样本组代表以各经济指标衡量的不同发展阶段。接着分组导出决策指标均值和县级或乡级城市化管理率的均值和最大值，分别对应在不同发展阶段下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率设置的一般水平和最优水平，由管理率均值和最大值组成的区间，即为地区在发展水平处于对应决策指标值左右时行政区划调整的可行范围。<sup>①</sup>表7给出了县级和乡级不同决策指标值对应的城市化管理率目标区间。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该决策指标为例，处于81674元水平左右的地区对应的城市化管理率调整区间为0.88—0.94，城市化管理率处于此区间则为合理水平。

表7指导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的现实意义是，各地区可根据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确定决策指标。当该决策指标达到特定水平或朝着特定水平迈进时，为进一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将城市化管理率现状与相应水平所对应的城市化管理率进行比较。若城市化管理率现状低于或高于对应最佳城市化管理率，则具备行政区划帕累托调整的空间。该表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丰富了行政区划调整可参照的指标体系，使得行政区划调整的前期论证更加全面客观，也使建立长期、科学的行政区划调整方案成为可能。

## 六、总结与讨论

行政区划的合理设置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但行政区划的无序扩张与调整既容易催生治理难题，也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sup>②</sup>《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指出“慎重从严把握撤县（市）改区，确需调整的要严格程序、充分论证”。基于丰富行政区划调整参考体系的目的，本文以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构建涵盖经济增长、城乡差距、资源配置和城市环境等多方面的指标体系，以2001—2020年中国各省份相关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行政区划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可纳入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参考体系的决策指标，最后使用聚类分析得到适用于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决策标准。主要结论如下：（1）对于撤县（市）设区类的行政区划调整而言，行政区划调整滞后于城市化进程，很可能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合理的调整能够塑造更有活力的地方政府、扩大城市内部增长极的规模与范围以及改善资源错配。（2）对于撤乡（镇）设街道类的行政区划调整而言，单一对乡级行政区划的调整难以在城市层面形成整体效应，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应保持一定的同步性才能取得最佳的调整效果。（3）根据本文构造的行政区划调整决策标准，各地区可匹配各发展阶段最优城市化管理率水平来衡量是否具备行政区划帕累托调整的空间。具体而言，进行撤县（市）设区的调整决策时应综合考量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资源配置效率和城市环境改善等情况，撤乡（镇）设街道时更应关注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并兼顾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政策启示如下：（1）行政区划调整应服务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省份，应因地制宜，根据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确定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向，在县级行政区划体系较为完备的地区，要基于更微观层级的视角，注重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以获得整体效应；在城市化管理水平发展整体相对滞后的地区，应提高县级城市化管理水平以匹配城市化发展进程。（2）加强行政区划设置的顶层设计。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容易过度超前或滞后，地方政府可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相关指标预期，制定互为支撑的行政区划调整规划，实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同步迈进。（3）注重行政区划调整的时效性和适用性。在保持行政区划总体稳定的要求下，应加强对县乡二级行政区划设置的统筹同步谋划，实现同步调整的科学合理性，也要注重行政区划调整的时效性，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制度规范要充分适应城市化发展需求，避免超前或者滞后调整，造成过度调整的不良后果。

责任编辑：张超

<sup>①</sup>聚类分析的初步结果存在决策指标与对应管理率之间非严格单调相关的关系，本文根据单调相关和最小调整成本原则进行了精简。

<sup>②</sup>张可云、戴美卉、王洋志：《中国城市型政区调整与城市化的适应性分析》，《地理学报》2023年第12期。

#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实践路径及广东经验<sup>\*</sup>

史欣向 李善民

**[摘要]**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共冶一炉”，形成了与西方式现代化不同的发展道路。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高质量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是回归发展本真性质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不同。本文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提出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运行逻辑：企业是实施主体，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践载体，创新是动力机制，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路径是，把党的二十大报告作为最高顶层设计，处理好战略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的关系，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进制度型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榜样”的力量牵引。广东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广东经验”可以概括为：以“走在前列”重要指示为精神指引和工作方法，坚持制造业当家战略，强化当家产业、当家企业竞争优势；举全省之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横琴、前海、南沙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经济思想 广东经验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8-0101-08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世界变局和历史进程的具象化就是，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全新的模式选择。实现现代化必须走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这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量变质变规律揭示的必然结果。然而，如何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各国道路和方式不同，由此也区别开来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情景下讲经济高质量发展，隐含了一个前提，即“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的”。新时代中国发展道路本质上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统一。这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视阈来研究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原因。基于此，本文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研究高质量发展所展现出的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及价值意蕴，依此建构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运行逻辑，并提出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路径，最后将上述理论和机制应用于分析广东推进中

<sup>\*</sup>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广东自贸试验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制度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视角”(GD25CXY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史欣向，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善民，中山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管理学院教授、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理事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275）。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总结形成“广东经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研究。

##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阐释

### (一) 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高质量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针对这个问题，江泽民在《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了科学回答。尽管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绝不是一种永恒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在私有制所允许的范围内，对上层建筑进行一系列的自我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私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有限的条件。资本主义社会不会“永存”，无论它怎样自我调节，其固有的基本矛盾不会改变，最终必将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sup>①</sup>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了粗放式的经济发展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的经济正处在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我国的高质量发展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存在本质区别。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现代化最早始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西方现代化是以殖民掠夺为起点、以西方为中心、资产阶级独享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则不同。我国的现代化虽然起步比西方晚，发展水平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sup>②</sup>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是以少数阶级或阶层利益为中心的现代化，其必然要求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质态，也将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跨越经济发展关口，实现现代化提供新模式、新方案。<sup>③</sup>

### (二) 回归发展本真性质的高质量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将人的发展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sup>④</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sup>⑤</sup>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我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真正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sup>⑥</sup>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受条件限制，人的发展目标是生存下来，即“解决温饱问题”，表现为更多地关心商品的使用价值，“消费”主要考虑使用价值属性，逐渐形成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而当物质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发展目标则会转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即“活得更好”，自然会更关心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使用价值“质量”提升，蕴含在商品中的价值会随之提高，“消费”将主要考虑价值属性，表现为质量主义（质量优先）价值观倾向。这种转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本质上是在

<sup>①</sup>《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9页。

<sup>②</sup>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sup>③</sup>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sup>④</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sup>⑤</su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sup>⑥</sup>《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日报》2021年3月11日第10版。

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现工具理性与人类价值目标的契合。<sup>①</sup>

### （三）体现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sup>②</sup>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没有涉及、没有研究过的，自然在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答案。因而，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同时辩证地看待西方经济学，借鉴其中合理的部分为我所用。高质量发展也不能延用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理念。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发展环境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重视数量”转向“提升质量”，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sup>③</sup> 盲目追求高速度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所以，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

高质量发展蕴含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sup>④</sup> 高质量发展不是为了满足少部分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满足最广大人民的需求。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必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从基本国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而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创新是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守正与创新并重才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提升，更加强调整体性推进和系统性协同，逐步克服局部失衡或区域发展不协调。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是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的角度认识和处理我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路径选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二、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运行逻辑

### （一）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实施主体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sup>⑤</sup>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体。高质量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实现全体人民共建和共享。<sup>⑥</sup> 人是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高质量发展是一场攻坚战，必须有效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方可成功。<sup>⑦</sup> 企业是组织众多个人开展经济活动的一种方式，富有竞争力的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sup>⑧</sup> 当前，我国进入世界 500 强的企业数量居于全球首位，其发展规模、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同时，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市场活力不断释放，民营企业更加专注于“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成为很多行业的“隐形冠军”。国有企业不断深化改革，提升市场竞争力。外资企业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仍是国内企业学习和追赶的对象。各类市场主体在更高水平竞争中创造价值、实现互利共赢，构成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

###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载体

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经济体系转换的过程，即从适应高速增长的传统经济体系转换到适应高

<sup>①</sup> 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sup>②</sup>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4页。

<sup>③</sup> 林侃：《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福建日报》2022年3月6日第5版。

<sup>④</sup> 刘建军：《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4月17日第1版。

<sup>⑤</sup>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求是》2023年第11期。

<sup>⑥</sup> 文丰安：《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与创新路径研究》，《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4期。

<sup>⑦</sup> 周建军、鞠方：《以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光明日报》2022年11月1日第11版。

<sup>⑧</sup> 刘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4日第6版。

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sup>①</sup>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都是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这是新时代稳定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治本良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只有实体经济才能创造价值，提高国家竞争力必须靠发展实体经济。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具有重要地位，其价值链长、关联性强、带动力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代产业的发展水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合作共赢、高度包容的体系。发展开放型经济，进行制度型开放，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提高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是必然要求。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就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两者统一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

### （三）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

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的定义性特征，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只有创新驱动才能推动我国经济从外延式扩张上升为内涵式发展。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创新带来的边际效益提升来实现集约化的增长方式，用技术变革提高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具体而言，就是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的目的是，在狭义上要求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质量瓶颈、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广义上要求全面提高国民经济各领域各环节发展水平，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发展新优势。效率变革的核心在于优化要素配置结构、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力争在更短时间、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点在于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效率提升的障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要素的功能。实现动力变革，就是要在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后，适应高质量、高效率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要，加快劳动力数量红利到质量红利的转换。这种动力变革本质上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 （四）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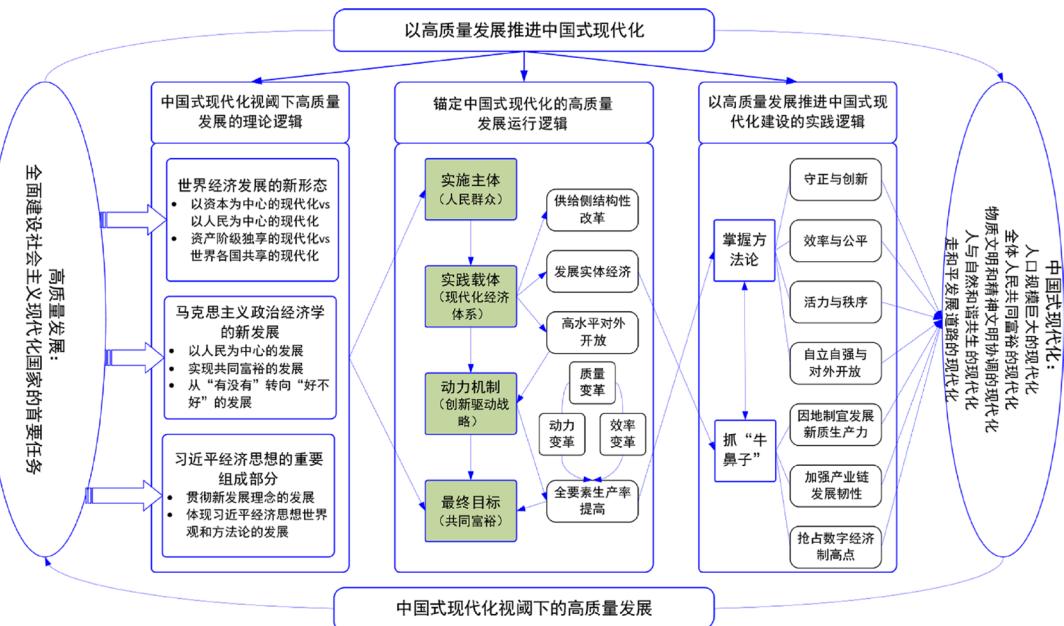


图1 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机制建构

<sup>①</sup> 高培勇、杜创、刘霞辉等：《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个逻辑框架》，《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8页。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或少数阶层掌握大多数财富也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度发展不同，是以新发展理念作为价值导向，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与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是相通的。<sup>①</sup>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sup>②</sup> 与此同时，高质量发展通过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益和质量，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不断完善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来实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共享，循序渐进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都是新时代历史阶段的特点，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消除两极分化，避免中产阶层塌陷，防止社会撕裂，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 三、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路径

#### (一) 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顶层设计，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顶层设计。”<sup>③</sup>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sup>④</sup> 没有丰富的物质文明和坚实的技术基础，是不可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所未有、前人未能的事业，必然面临诸多未知领域，不仅需要顶层谋划，还需要以“敢为人先”“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进行大胆的实践探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sup>⑤</sup> 全面深化改革是贯穿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之中的主线，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主要内容之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探索也必须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本身就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多种关系。因此，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实现发展动能的系统性、整体性提升及生产要素流动的协同效应，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

#### (二) 平衡战略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分析和解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sup>⑥</sup> 把握战略的原则性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锚定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中心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统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项事业。在此过程中，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是重中之重。扭住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把握的战略原则。坚持策略的灵活性就是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在因地制宜中把握战略主动。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sup>⑦</sup> 现阶段，改革开放已经步入深水区，碰到了更多体制机制障碍，需要下决心解决深层次矛盾。矛盾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审时度势，创造性地解决改革开放实践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处理新情况新问题要坚持策略的灵活性，绝不可思想僵化、刻舟求剑。在具体实践中，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指导思想，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sup>①</sup> 刘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4日第6版。

<sup>②</sup> 习近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sup>③</sup> 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求是》2023年第19期。

<sup>④</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8页。

<sup>⑤</sup>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sup>⑥</sup> 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求是》2023年第19期。

<sup>⑦</sup>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 (三)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而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sup>①</sup>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是要创造出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丰富、更高质量的物质财富，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方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通过技术和业态模式的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形成产业竞争优势；通过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建构与新质生产力更加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sup>②</sup>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围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sup>③</sup>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用数字赋能传统的生产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四)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实现更高水平开放格局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sup>④</sup>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绝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开放就是从边境开放向“边境后”开放延伸，由要素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sup>⑤⑥</sup>扩大制度型开放最终要服务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sup>⑦</sup>与以便捷化为核心的边境开放不同，“边境后”开放的目标是制度环境的透明性、稳定性，即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绿色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劳动保护、政府采购、数据流动、金融创新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兼容相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其目标是实现制度型开放水平、系统性改革成效、开放型经济质量的全面提升。经过 10 多年的探索，自由贸易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开展制度创新，在扩大制度型开放方面已经形成了量的优势，接下来就是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商务人员出入境管理、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率先对接国际公认规则和通行标准，开展高水平压力测试，推动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在更高水平开放格局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 四、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广东经验”

### (一) 以“走在前列”精神为指引，实施“1310”具体部署

202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广东考察时强调，“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要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sup>⑧</sup>“走在前列”是习近平总书记及党中央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作用的充分肯定和殷殷期许。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 2017 年、2018 年、2023 年分别对广东提出“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重要指示。从“两个走在前列”到“四个走在前列”

<sup>①</sup>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sup>②</sup> 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

<sup>③</sup>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

<sup>④</sup>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sup>⑤</sup> 沈坤荣、李敏：《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背景下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战略思考》，《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sup>⑥</sup>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思路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21年第2期。

<sup>⑦</sup> 江小涓、孟丽君、魏必：《以高水平分工和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资源配置效率》，《经济研究》2023年第8期。

<sup>⑧</sup>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人民日报》2023年4月14日第1版。

再到“一个走在前列”，三者之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sup>①②</sup>“走在前列”与“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杀出一条血路”的特区精神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核，<sup>③</sup>既是广东发展的精神指引，也是广东发展的实践指南。为此，广东省十三届三次全会提出“锚定‘走在前列’总目标，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奋力实现十大新突破”的“1310”具体部署。这也成为广东以高质量发展为牵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方略，将“走在前列”精神贯穿于广东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行动和实践始终。

## （二）坚持制造业当家，进一步强化当家产业、当家企业竞争优势

高质量发展，是广东推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sup>④</sup>制造业当家，是广东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的主要抓手。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广东考察时指出，广东要始终坚持以制造业立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制造业是广东的“底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东实施制造业当家“一把手”工程，提升当家产业、当家企业优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把广东制造业这份厚实家当做优做强。<sup>⑤</sup>通过一系列制造强省的举措，不断强化产业集群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广东建成了8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同时还在加快将新能源、超高清视频显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打造成新的万亿元级、5000亿元级产业集群；不断提升优质企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累计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13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28家，19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A股上市公司总量、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均居全国第一；不断优化制造业生态环境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反哺作用，“放水养鱼”，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扶持个体工商户、减税降费降低制造业成本，省财政新增10亿元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超5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超930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sup>⑥</sup>

## （三）举全省之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广东考察时指出，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抓紧做实，举全省之力办好这件大事，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sup>⑦</sup>广东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深中通道及广东城际线的建设，加之“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经珠港飞”政策落地，让大湾区内人员货物跨境流动更加便利。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开放与创新。随着“跨境理财通”业务不断发展壮大，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业务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启，三地跨境资金流动更加自由便捷。据统计，自2021年“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以来，截至2024年4月，“跨境理财通”个人投资者达11.09万人，完成跨境资金汇划507.24亿元。<sup>⑧</sup>科技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大湾区已陆续实现科研资金、科研人员、科研用物资跨境便捷流动，同时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规划落地，“深圳—香港—广州”科技创新走廊已连续4年位列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二位。<sup>⑨</sup>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截至2023年底，广东省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7.1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超7.5万家，均居全国首位。<sup>⑩</sup>数量多、活力足的市场主体是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

<sup>①</sup>《深刻认识“走在前列”总目标蕴含的新使命》，《南方日报》2023年6月22日第1版。

<sup>②</sup>史欣向：《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在前列》，《佛山日报》2023年6月20日第6版。

<sup>③</sup>《深刻认识“走在前列”总目标蕴含的新标高》，《南方日报》2023年6月25日第2版。

<sup>④</sup>《黄坤明同志在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的讲话实录》，《南方日报》2023年1月28日第1版。

<sup>⑤</sup>王伟中：《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列作出示范》，《经济日报》2023年1月17日第3版。

<sup>⑥</sup>《2024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南方日报》2024年1月29日第4版。

<sup>⑦</sup>《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人民日报》2023年4月14日第1版。

<sup>⑧</sup>《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稳步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额创历史新高》，《南方日报》2024年6月3日第5版。

<sup>⑨</sup>《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聚变”激发澎湃科创力量》，《科技日报》2024年3月7日第8版。

<sup>⑩</sup>《2024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南方日报》2024年1月29日第4版。

展走在前列的“重要法宝”。

#### (四) 发挥横琴、前海、南沙三大平台制度创新优势，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横琴、前海、南沙自贸试验区以贸易自由化为核心，推进大湾区内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体制机制开放引领制度型改革，形成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速全球高端要素向大湾区积聚，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2024年3月1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封关运行，开始实行货物“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人员进出高度便利的分线管理模式。封关不是封闭，而是更高水平开放。分线管理让横琴对接澳门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成为可能。前海自贸试验区紧紧围绕衔接港澳规则，加强与国际自由贸易港合作，加快建设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建设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推进专业领域规则衔接，进一步扩大港澳专业人士便利执业范围，推行建筑师负责制；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QFLP）、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QDIE）试点范围；加强与港澳政府部门的信息对接与共享，推动港澳跨境电子证照、公证文书等跨境共享应用。南沙自贸试验区在全国率先发布对接RCEP、CPTPP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十七条”，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金融服务、数据流动、竞争中立、绿色发展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进行压力测试。<sup>①</sup>同时，南沙正在布局“环港科大创新带”，通过对接国际化高水平教育标准和体系，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进入大湾区，不断丰富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的“第一资源”。

责任编辑：张超

---

<sup>①</sup>《广州南沙发布“17条”对接RCEP、CPTPP旨在加大自贸试验区“压力测试”力度》，《南方日报》2022年1月18日第AA1版。

历史学

# “遗忘”与“重塑”：美国二战中缅印战区的战争记忆构建<sup>\*</sup>

雷娟利 何肖祎涵 张思齐

**[摘要]**作为二战期间连接亚洲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战略枢纽，中缅印战区的战争记忆建构深刻折射出历史记忆的政治性与全球化时代的认知重构。美国对该战区的记忆建构呈现三重辩证维度：国家层面通过官方历史叙述与政策文本，以权力话语形塑战区记忆图景；社会层面战争亲历者的个体书写通过代际传承与公共传播转化为集体记忆；学术层面则通过学者的考据研究与理论阐释，持续推动战区历史的重新解读与意义建构。美国中缅印战区记忆的演进轨迹呈现清晰的历时性脉络：战后初期美国在战争创伤与秩序重建中完成战区记忆的初步编码，冷战至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博弈促使该段记忆经历系统性重塑，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浪潮推动记忆传承模式向跨国史视野拓展。在叙事特征层面，战区记忆的跨种族、跨文化属性导致其呈现出多重性；国际合作与冲突的动态平衡，则塑造了记忆的政治性维度；而美国“先欧后亚”战略的资源配置逻辑，导致该战区历史在主流叙事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中缅印战区这种“被遗忘”与“被重塑”的双重命运，本质上是二战记忆政治的微观缩影，为解构单一民族国家叙事、重构全球反法西斯战争史观提供了独特样本。

**[关键词]**中缅印战区 战争记忆 叙事特征

**[中图分类号]** K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8-0109-1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学术研究领域中，战争记忆研究已然发展为国际学界的前沿核心议题。美国学术界在二战记忆研究领域成果斐然，研究范畴既涵盖宏大的国家纪念叙事，又深入至具体战役记忆的比较分析，同时还对二战跨国记忆等进行比较。<sup>①</sup>中国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度亦与日俱增，诸多研究积极借鉴哈布瓦赫、阿斯曼等学者的记忆理论，深入剖析参战国二战记忆对国家形象塑造的影响。<sup>②</sup>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日本藏二战日军南方军师团史文献整理与研究”(23BSS044)、“赣鄱俊才支持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雷娟利，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张艳国工作室研究员（江西 南昌，330022）；何肖祎涵，中南大学人类文化遗产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410083）；张思齐，英国思克莱德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生导师（英国 格拉斯哥 G4 0LT）。

① 代表性成果有 Douglas Brinkley, *The World War II Memorial: A Grateful Nation Remember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Books, 2004; Michael Dolski, *D-Day Remembered: The Normandy Landings in American Collective Memory (Legacies of War)*, Knoxville, Tennesse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2016; Daniel Chirot, Gi-Wook Shin and Daniel Sneider, *Confronting Memories of World War II: European and Asian Legacies* (Jackson School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等。

② 代表性成果有郑毅：《靖国神社·英灵祭祀·国家物语——近代日本战争记忆的生成与固化》，《吉林大学社会

中缅印战区（China-Burma-India Theater，简称CBI）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重要的战略军事行动区域，以其独特的地缘格局、复杂的作战环境与多元的参战力量而著称。美国作为中缅印战区的主要参战国，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叙事中，中缅印战区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战区”<sup>①</sup>“最具政治色彩的战区”<sup>②</sup>以及“最被遗忘的战区”<sup>③</sup>这几种看似矛盾却又相互交织的历史标签。

目前，中国学界对中缅印战区战争记忆的空间分布、微观叙事形态及政治博弈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探讨，<sup>④</sup>美国学界的研究焦点则多集中于该战区的战略布局、军事行动、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方面，<sup>⑤</sup>而鲜有中缅印战区战争记忆的学术成果。近年来，一股崭新的解读文献的浪潮与相关学术专著、文集形成理论呼应，共同推动学界对这场“被遗忘的战争”展开新的审视与认知重构。<sup>⑥</sup>鉴于此，本文立足多源史料，聚焦美国对中缅印战区战争记忆的建构历程，系统探究特定群体记忆的生成逻辑与传播机制。通过解构政治权力的运作轨迹，文化认同的塑造路径，以及历史阐释的重构过程，剖析三者在记忆建构中的复杂互动与博弈关系，旨在填补中缅印战区战争记忆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缺口，推动学界深化对二战全球性记忆体系的整体性认知。

## 一、战争记忆构建主体的多元透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更广阔的历史书写领域中，不同叙事主体皆试图从自身独特立场与视角出发，对“真实”历史进行界定与阐释。这些源自多元视角的叙事，既存在相互印证、彼此支撑的共融性，又呈现出相互抵牾、冲突不断的张力。这种多元记忆呈现方式与叙事间的博弈，构成了战争记忆研究的核心特征，深刻揭示了记忆与真实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这体现在每一段历史都存在着无数个记忆者，他们或者以亲历者身份，或者以研究者身份，或者以控制者（利用者）身份来叙述这段历史，并以此呈现自己的历史认识。<sup>⑦</sup>二战后美国关于中缅印战区的战争记忆就呈现出国家、社会、学界三个不同层面的叙事主体。

### （一）国家层面的历史叙事

作为国家权力机构在战争期间形成的诸如军事命令、战略部署文件、外交函电等官方档案记录，通常由政府部门、军队系统等官方主体生成，其内容往往服务于国家在战争时期的治理需求与战后的历史诠释。从记忆建构角度看，国家可通过对档案的筛选、整理与公开，将战争经历纳入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从而形成具有官方权威性的战争记忆图景。美国政府与美国军方正是通过不同策

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沈惠芬：《华人离散群体的战争记忆——以东南亚华侨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侨批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王玉芹：《战后日德两国对二战历史认识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1期等。

① Eugene L. Rasor, *The China-Burma-India Campaign, 1931-1945: Historiography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8, p.1.

② Leo J. Daugherty III, *The Allied Resupply Effort in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during World War II*,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8, p.33.

③ David W. Hogan, *India-Burma*, Washington, D.C.: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2019, p.29.

④ 代表性成果有刘于思：《从腾冲忠烈祠到国殇墓园：战争记忆的空间争夺与权力博弈》，《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雷娟利：《二战后日本“战友会”群体与缅甸战场微观战史书写》，《世界历史》2023年第4期；罗贵榕：《关于滇西抗战叙事的思考》，《学术论坛》2015年第8期等。

⑤ 代表性成果有Arthur M. Smith and Craig Hooper, “THE MOSQUITO CAN BE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MORTAR ROUND: The Obligations of Command”,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58, no.1(2005), pp.77-87; Stephen Hill, “The 5307th Composite Unit (Provisional) ‘Merrill’s Marauders’: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 Strategic Success Through an Operational Concept in Burma”, *The Journal of Irregular Warfare and Special Operations*, vol.1, no.2(2023), pp.61-81;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等。

⑥ R. Gerald Hughes and Stephen Hanna, “Journeys back along the Roads to Mandalay, Imphal and Kohima: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Burma Theatr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37, no.1(2022), pp.126-144.

⑦ 孟钟捷：《从“德累斯顿大轰炸之争”谈二战记忆的真实性问题》，《世界历史》2019年第6期。

略和渠道塑造美国关于中缅印战区的官方叙事。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通过官方文献整理编撰、发起相关历史项目等方式，系统性地对中缅印战区战争历史进行阐释。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简称 NARA）保存着大量关于美军在中缅印战区活动的档案资料，其中核心资料归档于“记录组 493：美国陆军在中缅印战区的部队记录”。<sup>①</sup>作为该战区最具系统性的档案集合，这部分文献详细记载了1941—1947 年间美国陆军在中国、缅甸和印度三国军事行动、战略部署、后勤保障、训练计划及盟军作战历程。此外，“记录组 330：国防部长办公室记录”则对该战区美军的人员调配与职务任免情况进行了补充记载。<sup>②</sup>除了档案文件，NARA 还收藏了一批美军在中缅印战区执行任务的影视资料，如陆军航空兵“战斗主题”系列电影就呈现了 B-29 战斗机进入中缅印战区的影像。<sup>③</sup>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也整理收藏了中缅印战区政府官员、军方人员的系列原始档案，如《史迪威文件》<sup>④</sup>《亨丽埃塔处理卷》<sup>⑤</sup>《“驼峰飞行员协会”通讯》<sup>⑥</sup>等资料。

在系统保存官方档案、丰富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美国军方的历史书写以权威出版物为载体，旨在构建官方记忆体系。早在 1942 年，为应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紧急局势，美国就设立了军事历史主任办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简称 OCMH），该机构在战后持续进行二战历史研究，<sup>⑦</sup>出版了以《美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The U.S. Army in World War II*）为代表的官方战史出版物。在这一系列著作中，《史迪威的中国使命》<sup>⑧</sup>《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sup>⑨</sup>和《即将落幕的中缅印战区》<sup>⑩</sup>三部“绿皮书”聚焦中缅印战区，系统梳理了史迪威将军在中缅印战区的履职历程，涵盖战略部署、指挥权冲突与中美英三方关系等核心问题。从研究内容看，该机构其他成果还突破了传统军事史的单一视角，着重强调后勤技术力量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如《医疗部：对日作战中的医疗服务》详细描述了美国医疗部队如何在热带丛林中搭建简易战地医院、运输伤病员；<sup>⑪</sup>《通信兵：考验》和《通信兵：结局》则展现了该战区信号兵如何从零搭建起通信网络、协调中美

<sup>①</sup> Record Group 493: Records of U.S. Army Forces in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s of Operations, 1941–1947,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https://catalog.archives.gov/search?recordGroupNumber=493&f.level=recordgroup&offset=0>, accessed March 6, 2025.

<sup>②</sup> Officers' Attitudes toward Redeployment and Demobilization--China-Burma-India (AMS-219), July 1945, American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Surveys, Record Group 330: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https://catalog.archives.gov/id/7062944>, accessed March 6, 2025.

<sup>③</sup> B-29'S IN 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 OF OPERATIONS, 1939-1945, Motion Picture Films from the "Combat Subjects" Program Series, Record Group 18: Records of the Army Air Force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https://catalog.archives.gov/id/4418>, accessed March 6, 2025.

<sup>④</sup> Joseph Warren Stilwell papers, 1889-2010, 51001,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4335738>,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⑤</sup> Walk a little faster: escape from Burma with General Stilwell in 1942: processed, 1980, 97028,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4090892>,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⑥</sup> China-Burma-India Hump Pilots Association Newsletters, 1978-1986, 90055,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4090290>,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⑦</sup> 1973 年 6 月将其更名为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United State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简称 CMH）。

<sup>⑧</sup>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1987, pp.3-389.

<sup>⑨</sup>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1987, pp.3-472.

<sup>⑩</sup>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1999, pp.3-396.

<sup>⑪</sup> Mary Ellen Condon-Rall and Albert E. Cowdrey, *The Medical Department: Medical Service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 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1998, pp.286-318.

英三方通信系统。<sup>①</sup>除上述的官方战史书写之外，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还编撰了多部纪念性战史手册，如《缅甸，1942》<sup>②</sup>《中部缅甸》<sup>③</sup>《中国防御》<sup>④</sup>《中国攻势》<sup>⑤</sup>《印度—缅甸》<sup>⑥</sup>《梅里尔突击队，1944年2月至5月》等。<sup>⑦</sup>这些著述以特定区域或战役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丰富了中缅印战区的历史叙事。此外，美国陆军历史基金会（Army Historical Foundation，简称 AHF）也出品了一系列关于中缅印战区的艺术作品展和真实人物传记，这些作品以生动的艺术形象重现了美军在中缅印丛林中作战的壮观场景。<sup>⑧</sup>二战期间，美国空军隶属于陆军，被称为“陆军航空队”，相关军事档案由陆军管理。战后，空军成为独立军种，相关军事档案也移交给了美国空军部门，相关部门开始进行自身的历史书写。美国空军历史研究局（U.S.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简称 AFHRA）作为美国空军的中央档案馆，保存了大量与美国空军在中缅印战区行动有关的档案资料，包括第10航空队、第14航空队等空军单位的行动记录。<sup>⑨</sup>1979年，美国空军部正式设立美国空军传统项目（United States Air Force Heritage Program），主要任务是收集、管理和展示与美国空军相关的历史文献、口述历史、照片、徽章、制服、飞行器等资料。美国军方发行的系列报刊杂志，通过将战争经验转译为可传播的符号系统，在国民群体中逐步构建起特定的集体认知图景。以美国陆军于中缅印战区发行的《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sup>⑩</sup>《中国指挥部》<sup>⑪</sup>《美国大兵》<sup>⑫</sup>等官方出版物为例，这些刊物不仅实时通报战事进展，更别出心裁地收录大量士兵创作的故事、诙谐漫画与明星影像。它们另辟蹊径，从战地日常生活视角切入，打破传统军事报道的叙事窠臼，将笔触聚焦于美国士兵的真实生存境遇与隐秘内心世界，以此增强民众对战争的感知与理解。

## （二）社会层面的集体记忆

美国军人、后勤人员等战争亲历者留存的口述历史、回忆录、日记、家书以及战区遗留物品等原始资料，构成了还原历史现场、解构战争真相的重要依据。这些以第一视角形成的记录，不仅从多个维度展现了战争的真实图景，更揭示了历史叙事中常被忽视的人性维度。在军事行动的具象化呈现方面，美国空军运输司令部飞行员布利斯·K. 索恩（Bliss K. Thorne）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美国军

<sup>①</sup> George Raynor Thompson, Dixie R. Harris, Pauline M. Oakes and Dulany Terrett, *The Signal Corps: The Test (December 1941 to July 1943)*,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7, pp.113-116; George Raynor Thompson and Dixie R. Harris, *The Signal Corps: The Outcome (Mid-1943 Through 1945)*, 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1991, pp.175-203.

<sup>②</sup> Clayton R. Newell, *Burma, 1942*, Washington, D.C.: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95, pp.1-24.

<sup>③</sup> George L. MacGarrigle, *Central Burma*, Washington, D.C.: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96, pp.1-22.

<sup>④</sup> Mark D. Sherry, *China Defensive*, Washington, D.C.: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96, pp.1-26.

<sup>⑤</sup> Theresa L. Kraus, *China Offensive*, Washington, D.C.: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96, pp.1-23.

<sup>⑥</sup> David W. Hogan, Jr., *India-Burma*, pp.1-30.

<sup>⑦</sup> Major General Spurgeon Neel, *Merrill's Marauders, February-May 1944*,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5, pp.1-117.

<sup>⑧</sup> 参见 The Army Historical Foundation,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Artwork*, n.d., <https://armyhistory.org/china-burma-india-theater-artwork/>, accessed March 5, 2025; Joseph-James Ahern, *A Record Unequalled-The 20th General Hospital in World War II*, n.d., <https://armyhistory.org/a-record-unequalled-the-20th-general-hospital-in-world-war-ii/>, accessed March 5, 2025 等。

<sup>⑨</sup> 参见 Herbert Weaver and Marvin A. Rapp, *The Tenth Air Force, 1 January-10 March 1943*, Montgomery, Alabama: U.S.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 1944; Herbert Weaver and Marvin A. Rapp, *The Fourteenth Air Force to 1 October 1943*, Montgomery, Alabama: U.S.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 1945 等。

<sup>⑩</sup> 参见 Carl Warren Weidenburner, *CBI Roundup (Vol.3, NO.16, December 28, 1944)*, November 10, 2024, <https://www.cbi-theater.com/roundup/roundup122844.html>,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⑪</sup> 参见 Carl Warren Weidenburner, *THE COMMAND POST (Vol.1, NO.27, September 8, 1944)*, August 4, 2024, [https://www.cbi-theater.com/command\\_post/command\\_post\\_090844.html](https://www.cbi-theater.com/command_post/command_post_090844.html),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⑫</sup> 参见 Sgt. Lou Stoumen, *WHAT IT'S LIKE FOR CHINA GIs*, October 20, 1944, [https://www.cbi-theater.com/yankcbi/yank\\_cbi.html#GICHINA](https://www.cbi-theater.com/yankcbi/yank_cbi.html#GICHINA), accessed March 5, 2025.

人)身上爬满血腥的水蛭,穿着湿透的制服”;<sup>①</sup>另一位航空兵沃尔特·奥雷(Walter Orey)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遭遇日军轰炸”的惊险场景。<sup>②</sup>这些描述将战场的残酷与危险,以亲历者的视角鲜活地呈现出来。而在日常生活的记录中,这些资料更展现出战争年代的别样图景。美国第11空军基地通信支队的赫伯特·R.“杰克”·杰西(Herbert R.“Jake”Jesse)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在休假时与队友到印度勒克瑙夜总会和当地护士共舞的场景;<sup>③</sup>陆军士兵安德鲁(Andrew)在家书中分享了“举办胜利日啤酒派对”和“观看电影《情书》”的难忘经历;<sup>④</sup>陆军航空队退役军人约翰·沃克·拉塞尔中尉(John Walker Russell)则记录了他与队友在营地饲养宠物的情形。<sup>⑤</sup>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真实反映出战争环境下人性需求的坚韧与顽强。这类记忆虽长期被主流叙事所遮蔽,却恰恰是理解战争中人性复杂性的重要维度。

战争历史记忆的存续与传承,并非仅仅依托于官方文本的系统性构建,更渗透于代际间的故事讲述、老兵口述实录与家族记忆的延续之中。这一持续动态的过程,不仅实现了历史事件的具象化留存,更通过反复的叙事重构与仪式化表达,将个体经历升华为集体记忆,最终融入国家历史书写的宏大叙事。从社会记忆理论视角审视,记忆本质上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其内涵在群体交流与共享中不断被重塑与强化。<sup>⑥</sup>老兵的亲身经历构成战争记忆代际传承的核心源头,这些记忆通过家庭生活场景与社会交往网络的持续重构,逐步进入公共话语空间。例如,美军准尉亚瑟·保罗·兰西(Arthur Paul Lancy)将日语短语手册、USAAF徽章等战时物品赠予家人,这些承载特殊意义的物件成为讲述作战经历的重要媒介;<sup>⑦</sup>陆军工程兵弗朗茨·阿梅尼奇(Frank Amenitsch)带回的450余张战地照片,也成为家族内部追忆历史的珍贵素材。<sup>⑧</sup>这些个体记忆在家庭场域内的反复讲述,逐渐沉淀为具有情感共鸣的文化资产。这种代际记忆转移呈现出显著的复合特征:既依赖老兵的口述叙事与亲属记忆的共同构建,也借助电影、书籍等媒介的传播,同时还受到学校教育体系的规范与引导。美国疟疾控制官员托马斯·沃尔(Thomas H. Wall)的女儿安·麦凯(Ann MacKay)将父亲在前线抗击疟疾的故事撰写为回忆录;<sup>⑨</sup>退伍军人莱罗伊·C.库伯勒(Leroy C. Kubler)的女儿金·沃尔特曼(Kim Wolterman)整理出版了其父的战时书信集《从七叶树到美国大兵:莱罗伊·C.库伯勒的战争岁月1942—1945》,<sup>⑩</sup>通过书信与日记细腻呈现战争对普通士兵生活的深刻影响;陆军信号兵中尉路易斯·J.福斯特(Lt.

<sup>①</sup> Bliss K. Thorne, *The Hump: The Great Military Airlift of World War II*, Philadelphia, PA: J.B. Lippincott Company, 1965, p.37.

<sup>②</sup> Walter Orey, *Walter Orey Memoir of World War II*, n.d., <https://www.cbi-theater.com/orey/orey.html>,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③</sup> Carl Warren Weidenburner, *JAKE JESSE in the CBI Theater IIth Air Base Communications Detachment*, n.d., <https://www.cbi-theater.com/jesse/jesse.html#TOP>,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④</sup> Carl Warren Weidenburner, *Dear Mom*, n.d., <https://www.cbi-theater.com/dearmom/dearmom.html>,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⑤</sup> Carl Warren Weidenburner, *Into the Wildest Blue Yonder...Memoirs of 1st Lt. John Walker Russell Veteran of the U.S. Army Air Corps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of World War II*, August 26, 2015, <https://www.cbi-theater.com/blueyonder/blueyonder.html>,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⑥</sup> Cristian Rojas-Granada,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ocial Memory: a Narrative Review”, *Families Relationships and Societies*, May 2024, pp.1-15.

<sup>⑦</sup> Carl Warren Weidenburner, *Arthur Paul Lancy*, August 5, 2024, <https://www.cbi-theater.com/lancy/lancy.html>, accessed March 7, 2025.

<sup>⑧</sup> Robert F. Amenitsch, *Frank Amenitsch China-Burma-India Photo Album*, April 16, 2024, [https://www.cbi-theater.com/fja\\_photos/fja\\_photos.html](https://www.cbi-theater.com/fja_photos/fja_photos.html), accessed March 7, 2025.

<sup>⑨</sup> Carl Warren Weidenburner, *Thomas H. Wall*, April 5, 2024, <https://www.cbi-theater.com/wall-cbi/wall.html>, accessed March 7, 2025.

<sup>⑩</sup> Kim Wolterman, *From Buckeye to GI: Leroy C. Kubler, The War Years 1942-1945*, St. Louis, Missouri: Provenance Publishing LLC, 2011.

Louis J. Forster) 之子罗伯特·L. 福斯特 (Robert L. Forster) 在战后注释出版父亲的百封家书, 展现出一位普通士兵远离家乡参战的心理斗争、对生死与使命的思考以及对妻儿的牵挂。<sup>①</sup> 随着战争亲历者及其后代逐渐凋零, 这些私人化的历史叙事开始进入公共教育领域, 如美国开放教育资源平台 OER Commons 中的《世界历史》课程专门设置了“中缅印战区, 1944—1945 年”模块, 主要讲述了 1944 年至 1945 年间该战区的战争历史、重要战役及其战略意义,<sup>②</sup> 将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历史认知的组成部分。上述案例表明, 战争记忆的传播绝非简单的经验传递, 而是社会环境、价值筛选与情感共鸣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三) 学者视角下的历史重构

在战争记忆的建构谱系中, 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以差异化的认知视角与方法论路径, 于官方叙事框架与个体记忆碎片的交织场域, 通过严谨的学术考据与多维的理论诠释, 构建起另一种系统化的战争认知范式。基于对中缅印战区战争记忆书写旨趣的学术分野, 可将美国研究成果划分为“通俗性”和“实证性”两大类。前者侧重以通俗化的叙事策略与在地性的记忆打捞重构战区历史的具象图景, 后者则倾向于以学科化的理论体系与实证研究范式解构战区历史的结构性逻辑, 二者共同构成战争记忆书写的双重学术维度。

“通俗性”学术成果在写作风格上偏向对史实进行陈述, 内容大都涵盖多个战争视角, 信息翔实。叙述通常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呈现, 面向大众读者。如威廉·博伊德·辛克莱 (William Boyd Sinclair) 在 1986 年出版的《超乎想象的混乱: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缅印》中对中缅印战区的叙述角度涉及士兵故事、后勤补给等战时轶事, 这种叙事手法虽然涵盖战区发生的关键事件, 但整体写作手法偏向“人物加事件”的陈述, 并没有对史实进行过多学术分析。<sup>③</sup> 同时, 通过描写细节、对话和人物心理来营造现场感, 甚至不惜加入文学化的描写和个人感受, 使读者身临其境。许多此类作品带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 塑造出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 如飞虎队员舍生忘死的豪情等。<sup>④</sup> 多诺万·韦伯斯特 (Donovan Webster) 的《滇缅公路: 二战“中缅印”战场的壮丽史诗》等书则以轻松幽默的方式穿插作者个人在缅甸路上的探险经历, 笔调机敏风趣。<sup>⑤</sup> 同时, 他们更关注具体的人物故事和战斗经历, 强调战争中的英勇事迹与传奇冒险, 如飞越喜马拉雅“驼峰航线”的大胆飞行员、深入敌后的游击队“梅里尔突击队”的奇袭等。<sup>⑥</sup> 这些故事往往成为大众作品的主题, 通过生动的叙事和细腻的笔触将战争的全貌展现给大众。此类研究还侧重于从个体或群体的视角来刻画战争的残酷与复杂, 强调战争对平民社会、士兵心理、战场战略及战术等方面的影响。如曾获普利策奖的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W. 塔奇曼 (Barbara W. Tuchman) 在其著作中描绘的战争场景: “持续空袭让战线北移, 村庄沦为废墟, 难民流离失所, 牛车蜿蜒不绝, 热浪、饥饿与尘土笼罩大地”,<sup>⑦</sup> 生动书写了战争对平民社会的深刻冲击; 美国《时代周刊》专栏记者杰克·贝尔登 (Jack Belden) 在《跟随史迪威走出缅甸》中对难民“食

<sup>①</sup> Louis J. Forster and Robert L. Forster, *Letters from the CBI: A Soldier's Journey through the Forgotten Theater of World War II*, Virginia Beach, VA: Koehler Books, 2024.

<sup>②</sup> OER Commons, *War in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1944–45*, n.d., <https://oercommons.org/courseware/lesson/88063/student-old/?task=2>, accessed March 7, 2025.

<sup>③</sup> William Boyd Sinclair, *Confusion beyond Imagination: China-Burma-India in World War II*, Coeur d'Alene: Joe F. Whitley, 1986.

<sup>④</sup> Charles R. Bond, Terry H. Anderson, *A Flying Tiger's Diary*, Texas: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4.

<sup>⑤</sup> Donovan Webster, *The Burma Road: The Epic Story of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3.

<sup>⑥</sup> Turner Publishing, *Price of Glory*, Nashville, Tennessee: Turn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Gavin Mortimer, *Merrill's Marauders: The Untold Story of Unit Galahad and the Toughest Special Forces Mission of World War II*, Bellevue, WA: Quarto Publishing Group USA, 2013.

<sup>⑦</sup>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5, p.321.

不果腹、羸弱不堪”<sup>①</sup>生存状态的细致刻画，同样从微观层面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本质。不仅如此，历史学者还秉持批判性思维，打破了战役结果导向的传统叙事模式。美国历史作家杜安·P.舒尔茨（Duane P. Schultz）在分析“萨尔温江大捷”时，强调飞虎队飞行员在极端疲劳状态下的顽强作战以及指挥官的果敢决策，成为阻截日军渡江的关键因素。<sup>②</sup>

“实证性”研究成果往往将关注焦点置于理论框架的构建以及严谨的史实考证之上，强调学术深度和方法的规范性，具有学术导向。研究者常深入战争的宏观战略布局与微观战术运用层面展开探究。在研究中缅印战区历史人物时，他们不仅聚焦于决策机制、战略构想以及战术执行等具体层面，更致力于挖掘历史事件背后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通过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剖析，最终形成层次清晰、结构完整的历史阐释图景，为学术界理解相关历史问题提供了坚实且系统的认知框架。在中缅印战区历史人物研究方面，从史迪威的战略构想、第5307联合部队的战术革新，到飞虎队的空战传奇、陈纳德指挥体系的协同运作，学者们不仅将研究视角放置于军事主官的指挥艺术，更延伸至翻译团队、后勤保障与医疗救护等支撑力量。<sup>③</sup>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学者也常采用批判性思维，突破传统的战役结果导向叙事模式，尝试从新的角度理解战争的进程与结果。如美国陆军军史研究中心官方学者查尔斯·F.罗曼努斯（Charles F. Romanus）与赖利·桑德兰（Riley Sunderland）在战史书写中秉持批判性思维，一反战役结果导向的传统叙事模式，打破了盟军合作“铁板一块”的叙事神话，揭示了中缅印战区盟军指挥体系内部分裂与利益冲突的现实困境。<sup>④</sup>这些研究突破了单纯对军事行动的表层叙述，转而深入探究战略决策背后的逻辑脉络与国际权力博弈的复杂图景，从而使历史阐释具备了更为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在战场环境与后勤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尤为关注物资补给体系的战略意义，致力于揭示其对战争形态发展演变的塑造作用。罗曼努斯与桑德兰通过对大量档案资料的细致梳理与深入分析发现，该战区呈现出“战略规划与物资筹备同步推进”的独特运作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了“计划—准备—行动”的传统战争逻辑，以扎实的史料论证了后勤保障工作对战略实施具有决定性影响。此类研究不仅极大地深化了学界对战争运作内在机制的理解，更创新性地将后勤史、环境史的研究视角融入军事史领域，有效拓展了战争史研究的学术维度与研究边界。

## 二、战争记忆构建的历时性脉络

美国社会对中缅印战区战争记忆的塑造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演变特征，其叙述重点与表达方式紧密关联于不同时期的政治语境、社会情绪与文化诉求。战后初期，官方与媒体通过勋章授予、人物传记与影视作品，强化美军在该战区的英雄形象和对外军事胜利的合法性；冷战时期，该战区记忆被纳入“自由世界”意识形态框架，在反思“失去中国”的语境中引发学界与政界的政策争议；后冷战时期，伴随口述史研究的发展与档案解密，美国社会开始以新的视角重新评估中缅印战区，逐渐摆脱单一意识形态的影响，转向关注战争中的个体和战争的代价；随着21世纪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学界对中缅印战区的研究，日益转向关注跨国协作、人道主义援助、少数族裔参与等维度，进而从跨学科的视角还原该战区的历史。

① Jack Belden, *Retreat with Stilwel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3, p.321.

② Duane P. Schultz, *The Maverick War: Chennault and the Flying Tig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p.255.

③ 参见 Don Moser, *TIME-LIFE World War II Series#09-China-Burma-India*, Alexandria: Time Life Education, 1980; Maochun Yu, *The Dragon's War-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Press, 2013; Luo Tian, “Augmenting Combat Power: Military Translation in China-Burma-IndiaTheater”,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Them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vol.15(December 2016), pp.143-161; David C. Rutenberg and Jane S. Allen, *The Logistics of Waging War:American Logistics 1774-1985, Emphas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Airpower*,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ir Force Logistics Management Center, 1996, p.129.

④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87-89;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28-31, pp.138-139.

### （一）战后初期的记忆塑形（1945—1950年代）

二战结束后，美国迅速将战争胜利转化为国家认同的核心。政府和军队通过荣誉奖励和纪念活动，肯定了中缅印战区将士的功绩，塑造了“伟大的胜利”“民主的胜利”等叙事，强调美国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主导作用。战后，美军第5307联合部队因战绩卓越，每一位突击队队员都被授予铜星勋章，这种全员授勋的待遇在美国军事史上极为少见，彰显了官方对该部队战绩的高度肯定。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在战后除获得美国陆军杰出服役勋章外，还于1947年获颁美国海军杰出服役勋章，以表彰其在第14航空队的卓著贡献。这些官方举措在政策层面影响了对中缅印战区的评价，成为塑造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1945年至1950年代初，一批由战时亲历者或知名记者撰写的有关中缅印战区的回忆录、人物传记等著作陆续出版，使大众对中缅印战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其中一类重要出版物是中缅印战区高级将领的日记和回忆录，最出名的是史迪威将军的战时日记集《史迪威文件》。该书由著名记者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 White）整理编辑，披露了同盟国高层内部的矛盾，犀利地质疑了战时美国援华政策的某些失败之处。<sup>①</sup>这本书在战后美国引发了广泛讨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中缅印战区复杂性的认知。1949年，陈纳德将军的自传《战士之路》出版。陈纳德在书中详述他1937年赴华抗战、创建飞虎队及指挥第14航空队的经历，<sup>②</sup>对于许多美国读者而言，该书不仅讲述了惊险的战地故事，更强化了飞虎队在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退伍军人及其家属也在记忆重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46年，《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更名为《前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Ex-CBI Roundup*），并持续出版了64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战地纪念杂志之一，是中缅印战区退伍军人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杂志内容涵盖战地回忆、战后生活、幽默专栏等，旨在增强退伍军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sup>③</sup>1948年，退伍军人组织中缅印退伍军人协会（China-Burma-India Veterans Association，简称CBIVA）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成立，旨在纪念和提升该战区的历史地位。中缅印退伍军人协会通过《声音》等杂志刊登退役军人撰写的战时故事，<sup>④</sup>并通过州分会“Bashas”开展系列午餐会、晚宴及募捐活动。2000年1月，中缅印退伍军人协会还在美国夏洛特市自由公园修建了中缅印战区纪念碑。<sup>⑤</sup>此外，美国社会还借助一系列影像资料，打造出充满戏剧性与情感张力的叙事模式。这些影像资料艺术化的表达方式，不仅拓宽了历史认知的受众范围，更在集体记忆的塑造过程中，增强了民族认同的情感共鸣与文化凝聚力。在视觉叙事层面，电影《目标，缅甸！》（*Objective, Burma!*）、《史迪威公路》（*The Stilwell Road*）、《缅甸胜利》（*Burma Victory*）另辟蹊径，以跨文化视角重构了中缅印战区的历史图景。影片从微观层面对多国部队协同作战的细节刻画，与宏观历史背景相互映照，揭示了该区域长期被忽视的国际合作面向。<sup>⑥</sup>借助影像叙事技巧，这些作品将战地实景拍摄与亲历者口述证言相结合，为观众提供了双重历史认知维度，使观众得以深入了解该战区复杂的军事地理环境与战略博弈逻辑。这种富有感染力的呈现方式，不仅唤起了美国公众对历史记忆的共鸣，更将这段尘封的历史重新写入美国历史记忆的篇章。这些作品以贴近生活的叙事方式，

<sup>①</sup> Joseph Warren 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 by Joseph W. Stilwell, Arranged and Edited by Theodore H. White. (Foreword and Afterword by Winifred A. Stilwell.), Manhattan: W. Sloane, 1948.

<sup>②</sup> Claire Lee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The Memoirs of Claire Lee Chennault*,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49.

<sup>③</sup> Patrick Lucas, *Remembering Shared Honor*, February 2, 2022, <https://www.rshonor.org/node/13363>, accessed March 7, 2025.

<sup>④</sup> CBI Veterans Association, “Engineer in the Far East: Memoirs of World War II in China, Burma, and India”, *Sound-Off*, Spring 1989, pp.24-28.

<sup>⑤</sup> Commemorative Landscapes of North Carolina, China-Burma-India Memorial, Charlotte, n.d., <https://docsouth.unc.edu/commland/monument/359>, accessed March 7, 2025.

<sup>⑥</sup> Ian Jarvie, “The Burma Campaign on Film: ‘Objective Burma’ (1945), ‘The Stilwell Road’ (1945) and ‘Burma Victory’ (1945)”, *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vol.8, no.1(1988), pp.55-73.

赋予战争记忆鲜活的生命力，使历史认知从宏大的国家叙事转向个体经验的细腻表达，成为凝聚集体情感的重要载体。然而，此类叙事实践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在对战争创伤的表现上，往往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展现士兵在极端自然环境下的艰难处境。诸如中缅印战区潮湿丛林中的生存危机、热带疫病的肆虐、长期作战导致的心理崩溃等内容，常常被简化为英雄叙事的背景，未能得到充分呈现。如1962年上映的电影《梅里尔的掠夺者》(Merrill's Marauders)通过设计戏剧性情节，塑造理想化人物，用胜利的镜头替换残酷的战争叙事。<sup>①</sup>这种娱乐化的表达方式，虽然扩大了影片的传播范围，易为大众接受，却遮蔽了战争物质供应匮乏、战争对个体的精神创伤等实际问题，使得历史叙述成为单薄且变形的叙事形式。

## （二）冷战语境下的战争记忆重塑（1950—1990年代）

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将二战胜利与对抗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强调其“自由世界的捍卫者”形象。这种叙事在教育、媒体和政治宣传中得到强化。而越南战争引发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促使美国社会重新审视历史记忆。1972年，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W.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出版，首次系统分析了美国在中缅印战区的军事行动和战略，提升了该战区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sup>②</sup>从此，学术界和媒体开始关注中缅印战区的历史，强调其在二战中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层面的介入进一步为战争记忆的社会化提供了保障，如里根总统签署第5906号公告，宣布1988年11月12日为全国中缅印退伍军人感恩日，号召美利坚国民对这一群体进行关注。<sup>③</sup>

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对二战的回顾逐步摆脱意识形态的对立，开始以更为开放、多元的方式重构战争记忆。1990年代，美国历史研究界兴起“口述史热”，大量退伍军人口述战争记忆被采集、出版。如丹尼尔·福特(Daniel Ford)的《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1941—1942)》一书，以严谨考证和访谈方式重现飞虎队历史，成为该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中缅印战区研究成果之一。<sup>④</sup>美国国家二战博物馆(National WWII Museum)也在1990年代开始征集中缅印战区退伍军人口述材料，并将部分材料整理后在网络数据库公开展示。与冷战时期以政治对抗为主的叙事不同，这一阶段的出版物更强调人文与个人经历，回忆录出版量上升。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Sino-American Aviation Heritage Foundation)多次组织飞虎队老兵进行访华活动。美国中学及大学教材在修订二战章节时，开始加入中缅印战区的内容，特别是在讨论美国的“全球战争”战略时引入飞虎队、驼峰航线等材料，如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公司(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出版的美国历史教科书《美国盛会》(The American Pageant)，在第36章中简要提及中缅印战区的战略地位与空运难度。<sup>⑤</sup>而在1995年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美国官方也开展了一系列二战纪念活动，如美国邮政局发行了“缅甸公路，通往中国的717英里生命线”(Burma Road, 717 mile lifeline to China)纪念邮票1500万枚。<sup>⑥</sup>这些官方举措加上民间推动，将中缅印战区的战争记忆从历史事件转化为国家文化遗产，并成为美国民族认同与民族记忆的

<sup>①</sup> David Sterritt, “Fuller, Fisher, and the Art of the B-Movie Auteur”, *Quarterly Review of Film and Video*, vol.35, no.7(2018), pp.737-740.

<sup>②</sup>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41-45*, p.1.

<sup>③</sup> Ronald Reagan, *Proclamation 5906--National China-Burma-India Veterans Appreciation Day, 1988*, November 10, 1988,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archives/speech/proclamation-5906-national-china-burma-india-veterans-appreciation-day-1988>, accessed March 7, 2025.

<sup>④</sup> Daniel Ford, *Flying Tigers: Claire Chennault and His American Volunteers, 1941-1942*, Broadwa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7.

<sup>⑤</sup> David M. Kennedy, Lizabeth Cohen and Thomas Bailey, *The American Pageant*, Chapter 36, 12th Edition,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1.

<sup>⑥</sup>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Burma Road Commemorative Stamp*, September 3, 1991, [https://gardnerworld.com/cbi/ledo\\_road.htm](https://gardnerworld.com/cbi/ledo_road.htm), accessed March 7, 2025.

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关于战争的记忆不再单一，不同族裔、性别和社会群体的视角被纳入战争记忆的构建中。美国纪录片《荣誉与牺牲》<sup>①</sup>通过对日裔美国战士罗伊·松本（Roy Matsumoto）的个案叙事，在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将人物事迹与美国多元文化价值观联系起来，试图通过少数民族参战的故事，凸显国家认同的包容性。不过，同样作为媒介生产的再现方式，该策略叙事同样存在隐忧：在强化民族荣誉和牺牲精神的过程中，影片未能充分意识到战争对个人身心的全面冲击，也未能触及更加宽广的历史背景。这也表明，在媒介生产中构筑战争的记忆时，历史真实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选择性的叙事方式，虽然有助于塑造战时集体记忆，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认知偏差：过度强调英雄主义，掩盖了战争的复杂性；对个人荣耀的渲染，弱化了集体创伤的沉重历史意义。尽管这类表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具有一定的文化合理性，但其固有的片面性，终究限制了公众对战争全貌的认知与理解。

### （三）21世纪以来的战争记忆传承与拓展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群体的渐次凋零，战争记忆的代际传承问题已然成为社会各界瞩目的核心议题。在文化传承的动态进程中，新生代群体借助系统化教育、多元化媒体传播以及仪式化纪念活动等多元路径，持续承担起战争记忆传承的使命，推动战争记忆在时间维度与社会空间中的延续与重构。当代社会在回溯这段历史时，不再局限于史实陈述，而是深入探讨战争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深远影响，从中汲取教训，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与国际合作的价值理念。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曾长期被忽视的中缅印战区历史，在美国社会的记忆图景中逐渐获得更多关注，开始从历史尘埃中走向公众视野中心。

2000年，美国总统签署法案，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创立退伍军人历史项目（Veterans History Project，简称VHP），该项目收录了大量关于美国中缅印战区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资料。2003年，卡尔·沃伦·魏登伯纳（Carl Warren Weidenburner）为了纪念其父沃伦·魏登伯纳（Warren Weidenburner）在中缅印战区服役的经历，创办了“中缅印战区网站”（CBI Theater），<sup>②</sup>该网站不仅展示了他父亲的个人经历，还收录了大量其他中缅印战区退伍军人的故事和资料。200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推出了“中缅印战场特别故事影片”，以故事的形式帮助大众回顾这段历史。<sup>③</sup>除此之外，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博物馆（The National WWII Museum）的口述历史项目，也以数字馆藏资料为依托，在中缅印战区专题网页中介绍老兵口述史，并附有中缅印战区的地理分布图和关键战役时间轴，帮助大众更好地理解战区的战略格局和战斗过程。<sup>④</sup>而美国空军传统项目下属核心机构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简称NMUSAF）则通过多个专题展的形式，分别讲述飞行员在该战区的作战经历。如“飞越‘驼峰’——通往中国的生命线”板块讲述了飞行员在恶劣的气候条件和高海拔的环境中执行任务的故事；<sup>⑤</sup>“中缅印战区的黑人航空工程营”板块介绍了在该战区服

<sup>①</sup> Lucy Ostrander and Don Sellers, *Honor & Sacrifice: The Roy Matsumoto Story*, 2013, <https://stourwater.com/films/honor-sacrifice/>, accessed March 7, 2025.

<sup>②</sup> CBI Theater: [https://www.cbi-theater.com/menu/cbi\\_home.html](https://www.cbi-theater.com/menu/cbi_home.html).

<sup>③</sup> Jeffrey Lofton and Jessica Maccaro, *Veterans History Project Spotlights WWII Stories from China-Burma-India*, November 5, 2007, <https://www.loc.gov/item/prn-07-226/vhp-features-wwii-stories-from-china-burma-india/2007-11-06/>,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④</sup> The National WWII Museum, *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 of Operations*, n.d., <https://www.nationalww2museum.org/taxonomy/term/40>,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⑤</sup> National Museum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Flying the “Hump” Lifeline to China*, n.d., <https://www.nationalmuseum.af.mil/Visit/Museum-Exhibits/Fact-Sheets/Display/Article/3627010/flying-the-hump-lifeline-to-china/>, accessed March 5, 2025.

役的美国黑人士兵如何帮助建设与维护空军基地；<sup>①</sup>“P-51D ‘野马’ 战斗机”板块展示了P-51D战斗机的实物，并讲述了其在中缅印战区执行远程护航任务的历史。<sup>②</sup>美国空中机动指挥博物馆（Air Mobility Command Museum）及美国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也收藏展出了CBI臂章（China Burma India Patch）在内的一系列战区遗留物品。<sup>③</sup>2008年，飞虎队第69维修大队协会（Flying Tigers 69th DRS Association）成立。该协会致力于普及教育，认识第14航空队第69维修大队在中缅印战区的角色。协会还设立专项基金资助老兵后裔，同时发起“飞虎队历史项目”，组织志愿者修复曾在战区服役的飞机和设备。<sup>④</sup>近年来，美国政府对战争历史的研究与记忆构建进入新阶段。2015年成立的美国战俘及失踪军人统计署（Defense POW/MIA Accounting Agency，简称DPAA）为失踪或列为战俘的军人建立详细的档案，形成阵亡人员人事卷宗（Individual Deceased Personnel File，简称IDPF或“293卷宗”）。这些卷宗记载了相关人员战时服役信息、伤亡情况、遗体或遗骸处置等细节。DPAA还与中国合作进行信息搜集，对于中缅印战区，DPAA重点追踪二战期间的“飞虎队”和“驼峰航线”失踪人员，如对美国第5307联合部队陆军二等兵罗曼·切鲁比尼（Roman Cherubini）<sup>⑤</sup>遗骸身份的确认和对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尉亨利·J.卡林（Henry J. Carlin）<sup>⑥</sup>失踪事件的调查等。DPAA通过对战俘与失踪人员档案信息的持续追踪，不仅还原了战争中个体的生命轨迹，更在微观层面深化了美国官方对战争历史的记忆构建。

### 三、战争记忆叙事的深层特征解读

美国对二战各战区战争记忆的塑造，体现了鲜明的动态特征与复杂面向，其形成过程实则是官方叙事、个体记忆、学术探索及文化传播等多重力量相互交织、彼此博弈的结果。具体而言，官方记忆通过政策文件、纪念仪式以及博物馆展览等途径，构建起权威的历史叙述体系。这种官方记忆着重塑造英雄人物与辉煌战绩，以强化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认同，但在叙事过程中弱化了战争创伤的深层面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参战人员的回忆录、口述历史等资料，则为这一历史图景增添了更为丰富的细节与鲜活的主观体验。这些记忆从个体的视角出发，深刻揭示了战士们在恶劣环境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遭受的心理创伤，展现出与官方记忆截然不同的另一面。学术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连接官方记忆与个人记忆的桥梁角色。学者们通过档案资料的深入挖掘和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批判性地审视了官方叙事的某些偏差，为战争历史提供了更加全面和立体的视角。由此可见，多种社会力量的持续互动不仅拓展了美国二战战争记忆的叙事维度，也印证了历史记忆本质上是社会、政治与文化权力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特征在美国关于中缅印战区的战争记忆建构中同样显著。然而，由于中缅印战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与战略地位，其战争记忆叙事在诸多方面呈现出与其他战区的显著差异。这种特殊性不仅赋予该战区记忆叙事以独特的历史价值，也为二战战争记忆研究提供了新的

<sup>①</sup> National Museum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EAB in China-Burma-India*, n.d., <https://www.nationalmuseum.af.mil/Visit/Museum-Exhibits/Fact-Sheets/Display/Article/196660/eab-in-china-burma-india/>,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②</sup> National Museum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North American P-51D Mustang*, n.d., <https://www.nationalmuseum.af.mil/Visit/Museum-Exhibits/Fact-Sheets/Display/Article/196263/north-american-p-51d-mustang/>,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③</sup> Air Mobility Command Museum, *China Burma India Patch*, n.d., <https://www.amcmuseum.org/collections/china-burma-india-patch/>, accessed March 5, 2025;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Insignia, Unit, China-Burma-India (CBI) Theater, 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 n.d., [https://airandspace.si.edu/collection-objects/insignia-unit-china-burma-india-cbi-theater-united-states-army-air-forces/nasm\\_A19711378000](https://airandspace.si.edu/collection-objects/insignia-unit-china-burma-india-cbi-theater-united-states-army-air-forces/nasm_A19711378000),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④</sup> Flying Tigers 69th DRS Association: <https://www.flyingtigers69thdrs.com/>.

<sup>⑤</sup> Defense POW/MIA Accounting Agency, *Airman Accounted for from World War II (Cherubini, R.)*, March 17, 2025, <https://www.dpaa.mil/News-Stories/ID-Announcements/Article/4121983/airman-accounted-for-from-world-war-ii-cherubini-r/>, accessed March 6, 2025.

<sup>⑥</sup> Defense POW/MIA Accounting Agency, *Airman Accounted For From WWII (Carlin, H.)*, April 24, 2025, <https://www.dpaa.mil/News-Stories/ID-Announcements/Article/4164025/airman-accounted-for-from-wwii-carlin-h/>, accessed March 6, 2025.

分析维度与阐释空间。

### (一) 文化交融中的记忆复合性

美国对中缅印战区的战争记忆叙事，深刻映照出该战场跨族群、跨文化的复杂特性。其历史书写既彰显了跨境民族在军事、情报、后勤及游击战中的卓越贡献，也鲜活展现了这些民族独特的文化习俗、语言差异与战斗方式对美军产生的强烈冲击与深远影响。中缅印战区地处南亚与东南亚交界，囊括印度东北部、缅甸及中国西南边境区域。该区域诸多民族群体的传统聚居地跨越现代国界。例如，纳加族（Naga）分布于印度纳加兰邦、曼尼普尔州及缅甸萨尔温江流域；米佐族（Mizo）主要聚居在印度米佐兰州与缅甸钦邦；库基族（Kuki）则散布于印度曼尼普尔州、缅甸钦邦与克钦邦。在中缅印战区作战进程中，这些跨境少数民族为盟军提供了关键助力。纳加族、米佐族、库基族等山地部落对丛林山地非常熟悉，因而被盟军征召为向导、侦察员、挑夫及游击战士，美军亦积极借助这些当地力量推进军事行动。例如，美军于阿萨姆—缅甸边境的那加山地设立高山观察哨时，曾雇佣纳加族挑夫运输设备，并以别针、硬币等小礼品换取当地酋长的通行许可；因为克钦族人（Kachin）天生擅长狩猎，精通山地行军，身材矮小矫健，美军战略情报局（OSS）101分队招募大量克钦族山地勇士组建“克钦游击队”（亦称“克钦突击队”），美军5307联合部队亦配备克钦族向导与游击队员，以协助美军穿越陌生的缅北丛林。这些跨境部族以向导、情报员、运输人员及战斗人员等多重身份深度参与中缅印战区军事行动，为盟军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战后，该战区的美军亲历者在回忆与记录中常常提及这些当地盟友的文化风俗与独特形象。如在雷蒙德·施罗斯（Raymond Schroth）的《埃里克·塞瓦赖德的美国之旅》中就提及了1943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埃里克·西弗里德（Eric Sevareid）在随运输机跳伞时误入纳加族地区的情景。美国驻中国重庆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在回忆此事时感叹道：“‘野人’<sup>①</sup>没有砍下我们的头颅，反而收留了我们”。<sup>②</sup>

除此之外，相较于欧洲战场美军主要与语言文化相近的军队（如英、法军队）协同作战，服役于中缅印战区的美军真正置身于一个全球化、多文化交融的战场，身边集结了英联邦军队、中国远征军、印度士兵以及当地各族民众，这就是美国陆军护士队护士杰拉尔丁·莉莲·布克（Geraldine Lillian Boock）在口述历史访谈中提到在中缅印战区服役期间必须要“适应陌生文化”的原因。<sup>③</sup>而这样的背景也使得战后美军亲历者对于该战区的历史书写呈现出两个颇具特色的叙事特征。一方面是由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差异与宗教观念冲突所引发的障碍与挑战，如俄裔美国战地音乐家安德烈·科斯特拉内茨（Andre Kostelanetz）<sup>④</sup>在日记中便记录下这样一幕：在驱车前往音乐会途中，一列运送军需物资的美制机车阻挡了道路，一位印度铁路工程师站在铁轨上不断摇头，最初被误解为“否定”或“禁止通行”，后来安德烈才意识到摇头实则是印度语境中“同意”的意思。<sup>⑤</sup>另一方面，有关该战区的一

<sup>①</sup> 在当时美军语境中称当地部族为“野人”，虽带有偏见色彩，但反映了亲历者从最初的恐惧到最终受到善待而感到的意外。

<sup>②</sup> Raymond Schroth, *The American Journey of Eric Sevareid*, Lebanon, NH: Steerforth Press, 1995, 转引自 Hparkins, *Headhunters and Diplomats in the Truman Library*, August 2, 2011, <https://prologue.blogs.archives.gov/2011/08/02/headhunters-and-diplomats-in-the-truman-library/#:~:text=The%20Nagas%E2%80%99%20reaction%20to%20Davies%E2%80%99,was%20sacrificed%20for%20a%20banquet>, accessed March 6, 2025.

<sup>③</sup> Geraldine Lillian Boock Collection, 1944-1946, AFC/2001/001/32494, Veterans History Project, American Folklife Center,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collections/veterans-history-project-collection/serving-our-voices/world-war-ii/china-burma-india/ground-support/item/afc2001001.32494/#item-service\\_history](https://www.loc.gov/collections/veterans-history-project-collection/serving-our-voices/world-war-ii/china-burma-india/ground-support/item/afc2001001.32494/#item-service_history), accessed March 5, 2025.

<sup>④</sup> 安德烈·科斯特拉内茨（Andre Kostelanetz）是俄裔美国流行管弦乐指挥家和编曲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妻子，即著名女高音莉莉·庞斯（Lily Pons）一同作为美国联合服务组织（USO）的一部分，前往中缅印战区为盟军士兵进行慰问演出。

<sup>⑤</sup> India-Burma-China Diary, December 10, 1944-March 25, 1945, 1944-1945, Box/Folder 1208/5, Andre Kostelanetz Collection, 1922-1984, Music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item/2023870629/>, accessed March 24, 2025.

手资料叙事展现出浓郁的文化色彩，丰富了美军的战地经历书写。如美国陆军航空队士兵弗雷德·S. 里斯（Fred S. Reese）在回忆录中细致描述了战时他与印度卡奇的库默王公（Maharaj Kumer）会面时目睹的“奇特仪式”；<sup>①</sup>美国陆军士兵威廉·H. 戴尔（William H. Dale）在回忆录中分享了他在加尔各答选购当地特色珠宝、乌木装饰品的趣闻；<sup>②</sup>美国二级军士长罗伯特·E. 马勒（Robert E. Mahler）在日记中记录了尼泊尔寺庙周边“苦行僧”的忏悔仪式。<sup>③</sup>此类文化细节的描述，为战后的历史书写开辟了新的叙事视角，使战争记忆的书写得以跳出官方档案文件与宏大战争叙事的局限，洞察战地文化环境如何潜移默化影响士兵的日常体验，为填补传统军事史研究在战争人文维度的空白提供了研究支撑。

## （二）权力格局下的记忆政治学

在中缅印战区的军事实践中，战区部署与作战行动的领导格局呈现显著的多元共治特征，并非由美国单方面主导。作为后介入方，美国在战争初期更多扮演辅助角色，战区的主要作战任务最初由中英两国承担。尽管美方将领约瑟夫·史迪威被任命为中缅印战区最高指挥官，但这一职务在实际军事运作中未能形成绝对指挥权。多方在战略决策、部队调度及资源分配等环节产生持续摩擦，尤其以史迪威与中国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双方在军事指挥权归属及援华物资分配等核心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从战争记忆建构视角观察，美国关于中缅印战区的历史叙事带有明显的政治操控痕迹。这种选择性叙事模式，实质上是美国在多国军事合作背景下，为维护自身战略主导权、塑造良好国际形象并应对地缘政治挑战而采取的话语策略。通过政府机构与媒体、文化组织的协同运作，美国官方叙事着重渲染本国在战区的核心作用，刻意淡化中国等盟国的贡献，同时对多国合作中的复杂矛盾与地缘政治动机保持缄默。正如美国第二信号服务营无线电信息翻译员伯纳德·艾伦·韦斯伯格（Bernard Alan Weisberger）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撕裂的血肉、外翻的内脏、四溅的脑浆……都隐藏在‘为国捐躯’这类华丽措辞背后。”<sup>④</sup>美国官方通过“英雄叙事”塑造个体牺牲的崇高价值，结合“战略叙事”强调军事行动的全球意义，实现了战争记忆向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化，这一过程深刻反映了历史书写与政治权力的内在关联。

中缅印战区作为多国协同作战的关键战场，本应成为展现同盟国之间复杂互动与紧密合作关系的典型样本。然而，美国的历史记载却未能完整呈现盟国内部的利益博弈与矛盾冲突。以5307联合部队为例，这支在中缅印战区立下卓越战功的美军特种作战部队，战时虽被官方塑造为“杰出的作战力量”，<sup>⑤</sup>却因缺乏系统性宣传与战后档案封存，长期游离于主流战争记忆之外，成为二战中“被误解最多、被忽视最多、被利用最多、被报道最多，同时又最英勇但却最没有得到回报的团级部队”。<sup>⑥</sup>直至20世纪60年代官方档案解密，借助历史文献的重新审视、大众媒介传播及退伍军人回忆录等多元渠道，该部队的真实战史才逐渐为公众所知。战时，史迪威将军在诸多场合不断强调该部队在缅甸丛林地区作战时所表现出来的英勇与坚毅，并将其塑造为美国军队战斗精神的典范。<sup>⑦</sup>但退役人员自传、私人信件等第一手文献资料的陆续公开，揭示了官方叙事与历史真相的巨大反差。该部队在缅北作战期间长期面临补给匮乏、疾病肆虐、士兵心理崩溃等严峻挑战，与官方宣扬的“英勇无敌”形象形成强烈

① Michael Lee, *Fred Reese in India*, January 11, 2025, <https://cbi-theater.com/reese/reese.html>, accessed March 7, 2025.

② Karen Dustman, *Dale - Christy Family History*, May 1, 2023, [https://cbi-theater.com/William\\_Dale/Dale.html](https://cbi-theater.com/William_Dale/Dale.html), accessed March 7, 2025.

③ Paul Mahler, *World War II Diary of T/SGT. ROBERT E. MAHLER*, April 9, 2019, <https://cbi-theater.com/mahler/mahler.html>, accessed March 7, 2025.

④ My War Memoir, 1942-1946, AFC/2001/001/88300, Bernard Alan Weisberger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Veterans History Project, American Folklife Center, <https://www.loc.gov/item/afc2001001.88300/>, accessed March 7, 2025.

⑤ Charlton Ogburn, *The Marauders*, New York: Harper, 1959, p.283.

⑥ Charles Newton Hunter, *Galahad*, San Antonio, TX: Naylor Company, 1963, p.1.

⑦ Louis Allen, *Burma: The Longest War: 1941-1945*, Basingstoke, UK: Phoenix Press, 2000, pp.376-377.

冲突。史迪威对部队的高调褒奖，实则蕴含着深层政治考量：他通过将 5307 联合部队英雄化，强化美军在同盟体系中的话语权，提升美国军事威望，但对部队所处的困境表现漠然。<sup>①</sup>更具争议性的是，美国官方记述将作战失利归咎于“中国人不卫生的习惯”，<sup>②</sup>这种表述不仅缺乏客观公正，更刻意回避了指挥权争夺、后勤补给不足等核心矛盾，暴露出历史书写的择性过滤特征。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官方影像文本《梅里尔的掠夺者 1944》(Merrill's Marauders, 1944)<sup>③</sup>则在叙事过程中以军事胜利为中心，将跨国复杂的军事合作模式、政策制定的艰难过程等丰富内容，简化为一个单一的英雄故事，试图弱化战争的多元性与残酷性。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契合当时美国政府和军队建构战争记忆的意识形态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反复使用和生产的特定影像符号，将该部队建构成为国家的精神象征。这一案例深刻揭示了战争记忆建构中政治意图与历史真实性的内在矛盾。

### （三）战略遗忘与边缘化的历史书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布局中，美英盟军始终将欧洲战场置于核心地位。1941 年末至 1942 年初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明确确立“先欧后亚”原则，这一决策使中缅印战区在资源配置中长期处于劣势，这从兵力部署数据即可见一斑：美国在二战期间累计动员兵力约 1230 万，而投入中缅印战区的兵力仅约 25 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战区与太平洋战区的美军部署规模均数倍于此。<sup>④</sup>这种战略倾斜背后，折射出盟国内部的利益分歧与目标差异。战时中国迫切希望通过滇缅公路获取国际援助以维系抗战，英国致力于维护其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美国则试图以“抗日”为契机扩展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力。这种目标错位直接导致军事行动的协调困境，1942 年第一次缅甸战役的失利即为典型例证。战后，各方对失败责任的推诿进一步加剧了认知分歧：英国指责中国军队“指挥混乱”，美国批评英国“殖民保守”，中国则控诉美英“援华不力”。这种相互推诿的叙事格局，使得中缅印战区难以形成统一、客观的历史记忆，也导致该战区在盟军整体历史叙事中缺乏应有的权重与关注度。多位学者与亲历者的著述印证了该战区的“被遗忘”状态。美国陆军军史研究中心历史学家大卫·W·霍根 (David W. Hogan) 在官方战史《印度—缅甸》中，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坦普林·里特 (Jonathan Templin Ritter) 在《史迪威与蒙巴顿在缅甸：盟军战争，1943—1944》中，均以“被遗忘的战区”指称中缅印战场；曾在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信号兵团的约瑟夫·W·哈丁 (Joseph W. Harding) 更从亲历者视角揭示了该战区的历史边缘性。<sup>⑤</sup>退役将领约翰·K·辛格劳布 (John K. Singlaub) 曾感慨：“相较于丰富的太平洋战区史料，关于中缅印的研究著述近乎空白，尽管当地美军士兵承受的苦难丝毫不亚于其他战场。”1995 年《洛杉矶时报》对该战区退伍老兵的采访亦显示，老兵们以“从香槟战场调至疟疾战场”自嘲，生动道出中缅印战区恶劣的作战环境与长期被忽视的历史境遇。<sup>⑥</sup>

中缅印战区的“被遗忘”特质，还需从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的维度加以审视。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概念最早源于美国对战争老兵心理创伤的深入观察，而后逐渐拓展至涵盖所有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幸存者群体。美国精神医学领域权威工具书《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sup>①</sup> Charles Newton Hunter, *Galahad*, p.205.

<sup>②</sup> Gary J. Bjorge, *Merrill's Marauders: Combined Operations in Northern Burma in 1944*, Fort Leavenworth, KS: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1996, p.24.

<sup>③</sup> Merrill's Marauders, 1944, ARC Identifier 603003 / Local Identifier 200-QUAID-2,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https://archive.org/details/gov.archives.arc.603003>, accessed March 7, 2025.

<sup>④</sup> 1944 年 7 月欧洲战区美军约有 177 万兵力，至 1945 年 4 月已增至约 306 万；太平洋战区美军也投入巨大，陆军约 177 万，海军陆战队约 48.4 万。

<sup>⑤</sup> David W. Hogan, *India-Burma*, p.24; Jonathan Templin Ritter, *Stilwell and Mountbatten in Burma: Allies at War, 1943-1944*, Denton, Texas: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Press, 2017, p.4; Joseph W. Harding, *Divided We Stand: The Forgotten War and the 181st Signal Repair Co.*, Bloomington, Indiana: Xlibris Corporation, 2003, pp.14-18.

<sup>⑥</sup> JOHN-THOR DAHLBURG, “WWII Veterans Gather in India to Recall Conflict's 'Forgotten Theater': Commemoration: 20 Americans will fly to China in retracing of treacherous supply route”, *Los Angeles Times*, May 28, 1995.

(*DSM-5-TR*) 将其定义为一种焦虑症，其特点包括暴露于创伤事件后出现的焦虑、不安，并伴随持续且显著的重复体验症状、逃避创伤相关刺激，以及可归因于过度警觉反应的问题。<sup>①</sup> 中缅印战区的作战环境之恶劣，在全球战争史上堪称罕见。与地形平坦、补给线稳定的太平洋战场、北非战场、欧洲东线相比，中缅印战区的自然环境与战场条件对士兵心理构成多重压迫：长期高热高湿的气候、毒虫疫病的肆虐，加之通讯中断、后勤匮乏的作战困境，不仅加剧了生理折磨，更使心理创伤难以通过常规渠道宣泄。众多退伍士兵在战后出现了选择性遗忘的症状，或因创伤的压抑而拒绝回忆当年的战争经历。美国陆军部外科医生办公室编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神经精神病学·第2卷：海外战场》中就指出：“中缅印战区的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地对士兵们的精神问题产生了影响”。<sup>②</sup> 亲历者的创伤记忆为此提供了具象佐证，如曾服役于第40野战医院的卫生兵约翰·阿扎尼亚（John Adragna）在访谈中提及，网络媒介触发的记忆闪回让他“如同重返战场”；美国第164照相通讯部队战地摄影师西德尼·格林博格（Sydney Greenberg）因夜间目睹战友遭日军狙击身亡，长期陷入对黑暗的病理性恐惧。<sup>③</sup> 这类创伤体验往往成为退役军人的交谈禁忌，客观上加剧了该战区历史叙事的断裂。中缅印战区的“被遗忘”现象深刻揭示了战争记忆的本质并非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而是不同国家、阶层、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过去历史进行的选择性重构。

#### 四、结语

近年来，随着中缅印战区国际档案及中国远征军老兵口述史料的逐步开放，中外学界开始重新评估这一战区的历史价值：中缅印战区不仅是反法西斯同盟合作与矛盾的集中体现，更是亚洲战场从殖民体系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场域。对中缅印战区“被遗忘的胜利”悖论的学术反思，恰恰为解析二战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极具张力的批判视角。美国二战中缅印战区的历史记忆构建，本质上是一个权力、话语与文化多重因素交织的动态过程。国家通过官方叙事将战区记忆纳入权力合法性建构框架，社会集体记忆在公众认知与文化传播中不断重塑，而学术研究则以知识生产的方式解构与重构历史认知。这三类叙事主体借助不同媒介策略的交互作用，共同构建起关于中缅印战区的立体化记忆空间，既展现了战争记忆的多元性特征，也折射出记忆构建过程中权力、话语与认知的复杂博弈。历时性分析表明，战后初期的记忆建构服务于同盟国秩序的确立，冷战时期被纳入意识形态对抗体系，21世纪以来则在全球化语境下呈现传承与重构的张力。这种记忆构建既彰显了中缅印战区跨族群、跨文化的复杂性，也深刻反映出国际政治军事格局变动对历史叙事的决定性影响。同时，“先欧后亚”战略导致的记忆边缘化，揭示了政治权力与叙事主体的选择影响了历史书写。

一言以蔽之，美国二战中缅印战区的历史记忆建构实为一个多主体协同、多维度叙事交织且深嵌于复杂历史语境的动态实践。这一进程不仅解构了传统史学中“中心—边缘”的二元认知范式，更揭示出被遮蔽的区域记忆具有重构全球战争史叙事的颠覆性力量。这种记忆重构的学术价值，为构建包容性的全球反法西斯战争史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唯有打破区域隔阂，将亚洲战场与欧洲战场的历史经验同等对待，才能真正还原这场人类浩劫的全貌，实现对历史真相的深层叩问。

责任编辑：郭秀文

<sup>①</sup>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ed,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Text Revision (DSM-5-TR)*, Washington, DC, USA: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2022, p.482.

<sup>②</sup> William S. Mullins, *Neuropsychiatry in World War II. Volume 2. Overseas Theater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urgeon General,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73, p.821.

<sup>③</sup> 孙敏、江汶：《怒江之役：CBI战区往事》，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1-72、365-366页。

# 朝鲜王朝“镜城长白山”认识再考辨

——兼论穆克登查边定界前的朝鲜未管控区域<sup>\*</sup>

刘 阳

**[摘要]** 朝鲜王朝所认知的“镜城长白山”，并非今中国长白山，而是绵延于其咸镜北道吉州、明川、镜城与茂山四邑之交的一段山脉，大致相当于今咸镜山脉主脉中起始部分的山体。在此认知的基础上，朝鲜王朝还形成了“长白正干”的意识。此外，因受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地形分布，尤其是女真人给予的防御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朝鲜王朝在“镜城长白山”东、南侧附近曾设置大量关防设施，并由此促成了贯穿于其整个北部内陆地带的边防线的构建。迟至穆克登查边定界前夕，朝鲜王朝在鸭绿江、图们江（包括今长白山）以南未管控区域的范围，仅大体为这条边防线（即东起茂山邑治附近，南经“镜城长白山”附近，西达“惠山—甲山”一线）以外的区域。

**[关键词]** 镜城长白山 咸镜山脉 朝鲜王朝 明清中朝疆界史 穆克登

**[中图分类号]** K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8-0124-09

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其辖域内出现了不少含有“白山”二字的山脉名称，如北部就有“白头山”和“长白山”。只不过，朝鲜王朝所言之“白头山”，正是彼时中国（明清时期）的长白山，该山最终发展为中朝界山；而朝鲜的“长白山”，因距其咸镜道镜城府治（今朝鲜镜城郡胜岩劳动者区附近）较近，<sup>①</sup>而常被称作“镜城长白山”，二者极易混淆。

长期以来，随着有关“白头山”史地研究的深入，学界已普遍认识到“镜城长白山”与之为彼此有别之山，<sup>②</sup>只是目前仅有少数学者注意到“镜城长白山”的具体指代问题。比如，有学者将该山指作今朝鲜白头山脉、咸镜山脉及赴战岭山脉延伸的大山系，并称之为“白头山东麓”；<sup>③</sup>也有学者就此提出质疑，认为该山不应泛指一条大山系，而应指今朝鲜咸镜山脉的主峰之一，即位于镜城以西的冠帽峰（海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韩国藏近世鸭绿江下游岛屿图籍资料整理与研究（1392—1910）”（24BSS037）、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2025-CXRC-16）、2019年度信阳师范大学“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阳，信阳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南 信阳，464000）。

① 据《承政院日记》载：“上曰：‘长白山何邑最近耶？’闵维重、崔逸皆曰：‘镜城最近矣’”。参见《承政院日记》第231册，显宗十三年十一月辛卯，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笔写本（编号：奎12788），第52页b。

② 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韩]杨普景：《朝鲜时代的“白头大干”概念的形成》，《震檀学报》1997年第83号；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107-108页；陈慧：《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50-52页；[韩]金宇善（音译）：《从〈山经表〉看白头大干和地名研究》，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131-139页；何伊：《康熙时期穆克登勘界立碑相关问题再研究——结合16—19世纪若干朝鲜古地图的考察》，《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等等。

③ 杨军、李东彤：《长白山考——兼论穆克登查边以前的朝鲜北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4期。

拔2541米)。<sup>①</sup>不仅如此,持这两种不同观点的学者讨论“镜城长白山”的另一目的,还旨在说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即穆克登查边定界前,在今鸭绿江、图们江与长白山以南,朝鲜的北界实际应止于何处,或者说朝鲜尚未及于管控的区域范围如何,但也存在分歧。其中,前者主张彼时的朝鲜北界,涵盖了今朝鲜长津江、赴战江、赴战岭山脉及咸镜山脉等一线;<sup>②</sup>后者则仅将这一未管控区域的范围,限定在惠山以北、茂山以西、“白头山”以南及“镜城长白山”(冠帽峰)以北之间。<sup>③</sup>

应当说,后者否定将“镜城长白山”视作一条大山系,确为基于历史实情的推论,但将该山仅仅限指为一座冠帽峰,却留下了进一步商榷的空间。此外,后者对穆克登查边定界前的朝鲜未管控区域范围的圈定,也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只是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仍有再作补充之必要。有鉴于此,笔者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相关的朝鲜文献并佐以古地图资料,就以上有关朝鲜王朝“镜城长白山”认识等问题略述浅见,以求教于学界方家。

### 一、朝鲜王朝前期有关“镜城长白山”的初步认识

查览朝鲜半岛的史籍可知,朝鲜王朝建国后才对“镜城长白山”有所认知。高丽王朝末期将势力扩展至朝鲜半岛东北部地区,<sup>④</sup>才开始接触到该山。

朝鲜王朝有关“镜城长白山”的地理信息,最早见载于官修《世宗实录·地理志》(约成书于1432年<sup>⑤</sup>)中的“镜城郡”条:

名山曰白山,在郡西,高大。至五月雪始消,七月复有雪。山顶木矮小……四境……西距野人东良北境白山九十里……要害,白山大岭,在郡西。<sup>⑥</sup>

根据《世宗实录·地理志》的描述,“镜城长白山”初名“白山”,是咸吉(镜)道的三大名山之一,另两大名山分别为位于定平府(今朝鲜定平郡旧邑里附近)西北的鼻白山,以及位于安边府(今朝鲜安边邑附近)东边的乌鸦山。<sup>⑦</sup>从方位上看,该山在镜城郡辖域西部,距离镜城邑城仅约“九十里”,且作为与女真分野的要害山岭及边陲界山。该山高耸入云,山顶常年积雪,因而得名。

继《世宗实录·地理志》后,朝鲜王朝另一部全国性的官修地理文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约成书于1530年,<sup>⑧</sup>以下简称《胜览》),所述朝鲜山川地理信息比《世宗实录·地理志》丰富得多。《世宗实录·地理志》编成后的次年(1433),朝鲜王朝全面开启了在鸭绿江与图们江(以下合称“鸭—图”两江)南岸开疆拓土的行动,包括在图们江中、下游南岸设置庆源、会宁、钟城、庆兴、稳城、富宁“六镇”,<sup>⑨</sup>在鸭绿江上游南岸建立间延、慈城、茂昌、虞芮“四郡”,<sup>⑩</sup>以及在“四郡”以东的“三甲”(即三水、甲山二邑)地区进行深度开拓,<sup>⑪</sup>由此加深了对北方山川地理的认知,掌握了大量相关地理信息。据《胜览》“镜城、吉城(即吉州)、明川”三邑条目载:

镜城都护府……白山,在府西一百十里,山势甚峻。至五月雪始消,七月复有雪。山顶树木矮小,土人亦谓之“长白”……德山川,在府南二里,东流入海,俗名吾村川。鱼游涧川,在府北

① 李花子:《明清时期朝鲜地理称谓之长白山与白头山》,《清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② 杨军、李东形:《长白山考——兼论穆克登查边以前的朝鲜北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4期。

③ 李花子:《明清时期朝鲜地理称谓之长白山与白头山》,《清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④ 刘阳、金成镐:《中朝图们江界河形成源流略考——以朝鲜王朝的东北方经营为中心》,《史学集刊》2015年第5期。

⑤ 刘阳:《明代中朝官修地理志书中的鸭绿江、图们江地理认识》,《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3期。

⑥ 《朝鲜世宗实录》卷155《地理志·咸吉道·吉州牧·镜城郡》,《朝鲜王朝实录》第5册,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0年,第699页。

⑦ 《朝鲜世宗实录》卷155《地理志·咸吉道》,《朝鲜王朝实录》第5册,第693页。

⑧ 刘阳:《明代中朝官修地理志书中的鸭绿江、图们江地理认识》,《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3期。

⑨ 刘阳、金成镐:《中朝图们江界河形成源流略考——以朝鲜王朝的东北方经营为中心》,《史学集刊》2015年第5期。

⑩ 刘阳:《朝鲜王朝慈城、茂昌、虞芮三郡设置考》,《东疆学刊》2016年第4期;刘阳:《朝鲜王朝间延郡设置考》,《韩国研究论丛》2017年第1辑。

⑪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第6辑)卷49《甲山都护府》《三水郡》,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70年,第70-74页。

十七里，东流入海。朱乙温川，在府南三十二里，东流入海。已上三川俱源出自白头山……明润川，在府南一百十五里，源出自白头山……与云加委川合……云加委川，在府南一百九里，源出自白头山……入海……虚修罗川，在府北一百三十五里，源出长白山……入豆满江。<sup>①</sup>

吉城县……长白山，在县西一百十六里。<sup>②</sup>

明川县……大川，在县西十二里，俗名弓禾川，其源有二，一出自鹿山，一出长白山……东至镜城府界入海。<sup>③</sup>

相较于《世宗实录·地理志》，《胜览》不仅明确了“长白山”的新称谓，且解释了“长白”之名的由来，即来源于当地“土人”的惯称，这个新称谓也由此成为该山的正式称谓。在《世宗实录·地理志》基础上，《胜览》进一步明确了该山同时位于镜城与吉城二邑辖域西部，说明与该山毗邻的邑治并非只有“镜城”，亦有“吉城”。此外，原为吉城“长德山迤北”<sup>④</sup>辖地的明川邑，位处镜、吉二邑之间，同样应与该山毗邻。除了山体本身的面貌特征，该山附近还发源有众多河流。

“镜城长白山”既然与吉、明、镜三邑治地毗邻，而吉、镜二邑治之间又相距甚远，<sup>⑤</sup>那么由此指向一个重要事实，即该山不太可能仅孤立地指某一地点的一座（或数座连片）高峰，而应存在一定范围的山体长度。换言之，朝鲜王朝认识到的“镜城长白山”或许具有“连绵”的情况，而从相关地理信息均与吉、明、镜三邑有关，可推知这大概是一条绵延于此三邑辖境西部，并由群山构成的山脉。在今天看来，该山脉可以认定为朝鲜半岛东北部咸镜山脉主脉（亦称主干或主山）的一部分。

从发源于“镜城长白山”的河流流布状况，也可侧面佐证该山是否具有这种“连绵”的情况。在载入的诸河流中，依据它们的流向以及距离镜、明二邑的远近程度等信息，可以推断它们应以“镜城长白山”为分水岭，分为东流入海的山南之水与北流入豆满江（即今图们江）的山北之水。其中，山南之水主要有四条，由北向南依次为“鱼游涧川（今称罗北川）”“德山川（今称吾村川）”“朱乙温川（今称温堡川）”以及“云加委川（今称渔郎川）”；<sup>⑥</sup>而山北之水仅有一条“虚修罗川（似为今城川水<sup>⑦</sup>）”。这些河流并非源自某一座山峰，而是发源于包括冠帽峰在内的绵延相接的众多山峰，但这些山峰均隶属于今咸镜山脉主脉。由此而言，《胜览》尽管并未指明这些河流具体发源于哪一座山峰，却记载了一个共同的地名即“镜城长白山”，说明“镜城长白山”山体似当保持“连绵”之态，才更符合该山成为众水之源的情况。

综上所述，《胜览》在《世宗实录·地理志》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镜城长白山”的特色。尤其是可能存在的“连绵”情况，更成为检验朝鲜王朝对该山指代能否清晰认知的核心标志。不过，以上有关该山的“连绵”情况，毕竟只是根据《胜览》所提供信息的间接推测，而《胜览》实际并未明言，但这也侧面反映出朝鲜王朝对该山认知仍存在一定的视野局限性，至少还不能做到对此“连绵”情况的确切把握。此外，《胜览》引文中所记“镜城长白山”山北只有“虚修罗川”一水，且记入到“镜城”条目下，以及将“镜城长白山”混淆为“白头山”。<sup>⑧</sup>这种缺漏及误区，也与彼时朝鲜相关认知视野的局限

①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第6辑）卷50《镜城都护府·山川》，第75-76页。

②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第6辑）卷50《吉城县·山川·长白山》，第79页。

③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第6辑）卷50《明川县·山川·大川》，第82页。

④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第6辑）卷50《明川县·建置沿革》，第82页。

⑤ 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第6辑）卷50《镜城都护府》《吉城县》《明川县》等条（第75-83页）所载，镜城府治南至明川县界142朝鲜里，西至同县界145朝鲜里；吉城县治东至明川县界10朝鲜里，北至同县界32朝鲜里；明川县治东至镜城府界6朝鲜里，北至同府界7朝鲜里，西至吉城县界44朝鲜里。可见，镜城府治到吉城府治的距离至少不下200朝鲜里，远超此二治所分别到“镜城长白山”的距离（110或116朝鲜里）。

⑥ 上述引文中还提及“明润川”（今称化城川），亦即明川“大川”，乃“云加委川”的一大支流。

⑦ “虚修罗川”之名可能来源于“虚修罗峴”。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第6辑）卷50《镜城都护府·山川·虚修罗峴》条（第76页）载，该峴在镜城辖地西北与富宁辖地西南的交界处，故流经该峴附近以北并入图们江的河流，似只有今朝鲜咸镜北道茂山邑附近的城川水符合。

⑧ 有关朝鲜王朝前期混淆此二山的问题，可另详见李花子的《明清时期朝鲜地理称谓之长白山与白头山》（《清史研究》2019年第4期）一文中的论证。

性有关。

## 二、朝鲜王朝后期有关“镜城长白山”认识的深化

朝鲜王朝后期的“镜城长白山”认识，与前期尤其《胜览》成书以前相比，在山色、山势以及山上气候等特征上并无太大差异。比如，直到19世纪后半叶，由朝鲜地理学的集大成者金正浩（？—1866）所撰《大东地志》（约成书于1864年）仍记该山的特征曰：“高大重叠，多穷壑长谷，峻险无比，道路阻绝，人不堪居，山顶树木矮小，至五月雪始消，七月复有雪”。<sup>①</sup>所不同的是，朝鲜王朝后期更加注重从山系视野下考察“镜城长白山”，从而使其对该山的认知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所谓山系视野，就是朝鲜王朝在其整个山系系统的视野框架下认知诸山。相较于局部的、片面的观察，山系视野显得立体、宏大，能够较为全面且综合地反映出山脉的整体实况，从而体现了相对较高的认知水准。朝鲜王朝自建国之初起，就已萌生了“白头山”南脉的山系观念，即“有峻岭，自白头山起伏，南走铁岭，绵亘千余里”。<sup>②</sup>但如此笼统、粗浅的山系认知，直到《胜览》编撰时，仍未在此基础上因山川地理信息的增多而发生显著改观。故如上述，彼时朝鲜就其“镜城长白山”认识，尚未达到明确把握该山全貌的视野高度，而有关该山与附近其他诸山之关联，则更无从知晓了。

朝鲜王朝要迟至18世纪以后，才形成较为成熟的山系视野。但事实上，16世纪末至17世纪，一些朝鲜士人基于个人的经历或新获取的地理知识，在重新审视“镜城长白山”时，已初步呈现出超越前人认知的现象。如朝鲜宣祖十三年（1580），时任“咸镜道巡抚御史”<sup>③</sup>的金诚一（1538—1593）的记录：“长白山出自白头山，横亘明、吉、镜三州，到镜城朱温堡后分两支，一支西北下……一支东北下……车逾岭是东支腰断处也”。<sup>④</sup>朝鲜孝宗七年（1656）左右，由柳馨远（1622—1673）编成的《东国舆地志》，<sup>⑤</sup>在大体延续之前《胜览》对朝鲜山川地理记述的基础上新载入：“长白山……与头里山相连，山极高大”。<sup>⑥</sup>朝鲜显宗八年（1667），曾任咸镜道监司的闵鼎重（1628—1692）奏称：“白头一支入我境，东走为长白山，六镇及镜、明、吉皆列在其下矣，形胜大抵如此也”。<sup>⑦</sup>梳理这些朝鲜士人所掌握的“镜城长白山”信息，可知他们除已能确知该山在吉州、明川、镜城三地所拥有的“连绵”景象外，还认识到该山是“白头山”南走东分的不同山脉，一端连接着头里山（又称“豆里山”或“圆山”，即今朝鲜头流山，海拔2309米），且另有支脉等。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些零散且仍不太明朗的信息中所反映的整体性、立体化认知“镜城长白山”的倾向，表明彼时朝鲜已开始摆脱先前认知该山的局限，加速向成熟状态过渡。

17世纪晚期以后，朝鲜王朝对其北方地域的关注与开发力度持续加强，尤其是肃宗三十八年（即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穆克登勘界事件的发生，更促使朝鲜士人关注其北部山川地理的热情空前提高，各种相关地理著述或地图也随之出炉。<sup>⑧</sup>正是在此种因素的力促下，朝鲜王朝体系化的山系认知最终被全面构建起来，内容逐步覆盖其整个北方山川乃至全国山川，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镜城长白山”的认识。

自18世纪中叶起，朝鲜王朝较早以比较成熟的山系视野论及“镜城长白山”的重要著述，当首推英祖时期（1724—1776）的官修《舆地图书》（约成书于1765年）。该书首先介绍了“镜城长白山”在整个朝鲜北方大山系中的总体位置，即：以“白头山南条”（今朝鲜摩天岭山脉北段）所形成的“诸山大干

① [朝鲜王朝]金正浩：《大东地志》卷20《茂山·山水·长白山》，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76年，第439页。

② 《朝鲜世宗实录》卷155《地理志·咸吉道》，《朝鲜王朝实录》第5册，第693页。

③ 《朝鲜宣祖实录》卷14，十三年闰四月辛丑，《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360页。

④ [朝鲜王朝]金诚一：《鹤峰逸稿》卷3《北征日录》，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第36页。

⑤ [韩]朴仁镐：《韩国史学史》，全莹、金锦子、郑京日译，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12年，第90页。

⑥ [朝鲜王朝]柳馨远：《东国舆地志》卷8《咸镜道·吉州牧·山川·长白山》，载《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修订本，第1辑，史部第3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

⑦ 《承政院日记》第204册，显宗八年十月甲戌，第79页a。

⑧ [韩]朴仁镐：《韩国史学史》，全莹、金锦子、郑京日译，第113-114页。

脉”，延伸至“甲山之东为豆里山”，并“分为两条，一条东北折为长白山，为北道诸山之祖；一条西南折为……黄土岭及天秀、厚致、黄草诸岭，南为铁岭，为南道众山之根”。<sup>①</sup>显然，通过豆里山将“白头山南条”“镜城长白山”及“黄土”以南诸岭构成的山脉（今为赴战岭山脉）联为一体，构建起一个大型的朝鲜北方山系框架，而正是在这个大山系框架中，“镜城长白山”的来源、“连绵”的走向及大致方位，都全然可辨。与此同时，该书又细致阐述了“镜城长白山”在咸镜北道地域内延展的具体情况，即：将“镜城长白山”指为“宝多山大脉向落东北，逶迤至镜城界而止”，<sup>②</sup>这说明在山系视野下，该山山体起止得到更加清晰的界定，即在豆里山以东直到镜城邑辖境为止，由此也再次印证了上述其大体绵延于吉、明、镜三邑辖境西部（或新设茂山邑辖境南部<sup>③</sup>）的区间范围。而这样一条山脉被视为“北道诸山之祖”，只因该道诸山乃其“来脉”，如书中所列镜、明、吉、茂四邑辖域所属的绝大部分山岭，皆从该山“来脉”（应即该山的支脉）；甚至富宁邑所属“车逾岭”、庆兴邑所属“松真山”等该山北接或东续的山岭，也被视作该山“来脉”，进而再联系到“六镇”范围内的其他诸山。<sup>④</sup>由此，该山在整个咸镜北道山系中的突出地位，乃至以该山为中心构成的山系在该道辐射广远的态势，也大都被展现了出来。

除文本描述外，《舆地图书》中也插入了咸镜北道各邑地理面貌的相关古地图。其中，关涉“镜城长白山”的地图，首先是作为咸镜北道总图的《北兵营地图》，图中专门将“白头山南条”通过“镜城长白山”，与该道诸山共同构成的纵横交错的山系画卷，全景式地描绘了出来。尤其“镜城长白山”上的诸山峦轮廓还被特意绘成双线，以标示其“连绵”于吉、明、镜三邑西境（或茂山邑南境）的情况。而在咸镜北道各邑治分图（《吉州图》《明川府地图》《镜城府地图》《茂山府地图》《富宁府地图》）中，“镜城长白山”亦被描绘成“脉自白头山”，在吉、明、镜、茂四邑境界“连绵”，并成为衔接富宁邑所辖山岭的“入首”之山的情形。<sup>⑤</sup>显然，这些图像呈现与上述文字记载形成了互证，使得从咸镜北道山系到朝鲜北方大山系中的“镜城长白山”形象，皆一目了然。

总之，《舆地图书》以官方角度确认的山系视野下的“镜城长白山”面貌，树立了朝鲜王朝后期认知该山的典范。自此以后，其他朝鲜著述在谈论到该山时，要么大体继承了《舆地图书》的认知，如洪良浩（1724—1802）的《北塞记略》（约成书于1778年）即基本沿袭了《舆地图书》之说；<sup>⑥</sup>要么仅整合、改进了《舆地图书》中的某些相关文辞，如成海应（1760—1839）在《研经斋全集》（约成书于19世纪前期）中，直截了当地指明“长白山……横亘于明、吉、镜、茂四郡之间”，即该山在此四邑之交的“连绵”形势；<sup>⑦</sup>要么有限增添或更新了《舆地图书》中某些细节方面的认知，如官修《增补文献备考》（约成书于1908年）认为该山为“圆山东北次之山”，在绵延至镜城西境后，还向东续接有“马逾、巨门、契汤”等重要山岭，<sup>⑧</sup>等等。而与这些著述相应的是，除《舆地图书》中的插图外，朝鲜士人大致创作于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的其他相关古地图，如《朝鲜地图》《八道地图》《舆地图》《海东地图》《咸镜道全图》

① 《舆地图书》下，《咸镜南道端川府志·山川》《咸镜南道甲山府邑志·山川·白头山》，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年，第240、262页。

② 《舆地图书》下，《咸镜北道茂山府邑志·山川·长白山》，第298页。

③ 茂山邑在1684年完成设置，是朝鲜王朝设于“镜城长白山”以北、图们江上游南岸的唯一邑城。参见刘阳：《朝鲜王朝茂山镇建置考》，《东疆学刊》2023年第3期。

④ 《舆地图书》下，《咸镜北道镜城都护府邑志·山川》《咸镜北道吉州牧邑志·山川》《咸镜北道明川府邑志·山川》《咸镜北道会宁府邑志·山川》《咸镜北道庆兴都护府邑志·山川》《咸镜北道茂山府邑志·山川》，第167、168、175、185、191、286、298页。

⑤ 在吉、明、镜、茂四邑分图中，“镜城长白山”之脉及其“连绵”的状况，均有明确的标绘。另外，《镜城府地图》中又特以文字标注该山“脉自白头山”，意在说明该山脉的来源及其绵延至此的情况。而《富宁府地图》中则以文字标明了该邑所辖山脉“自长白山入首”的情况。所谓“入首”，在风水地理学上有“到头”之意，也就是说“镜城长白山”绵延至富宁辖境以前即已截止。

⑥ [朝鲜王朝]洪良浩：《北塞记略》，载[韩]陆洛现编：《间岛领有权关系资料集》2，汉城：白山文化社，1991年，第312-316页。

⑦ [朝鲜王朝]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46《北边杂议·白头山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74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第494页。

⑧ 《增补文献备考》卷19《舆地考七·山川》，汉城：明文堂，1959年，第290页。

《1872年地方地图·茂山地图》等，<sup>①</sup>所绘制的该山形象，也大体一如这些著述中的文本描述。可见，在《舆地图书》编纂的同时乃至编成之后，朝鲜王朝有关该山的认知，应是渐趋稳定的状态。在固化对该山认知的过程中，朝鲜土人还逐渐形成了“长白正干”的意识，不仅将“镜城长白山”统合到整个朝鲜半岛的山系系统中，更进一步强化了前述《舆地图书》中该山的“北道诸山之祖”的形象。

所谓“长白正干”，是朝鲜土人依照风水地理学划定的咸镜北道主干山脉，其南部还有在朝鲜王朝其他各道延伸的13条正脉，它们一并作为“白头大干”脉（亦即《舆地图书》中所言的“白头山南条”）在整个朝鲜半岛的主要支脉。<sup>②</sup>至于“镜城长白山”如何借助“长白正干”关涉到咸镜北道诸山脉，进而成为“北道诸山之祖”，我们以郑允容（1793—1865）所撰《北路纪略》（约成书于1830年）为例，予以说明。该书专门探讨朝鲜咸镜道的史地情况，是19世纪朝鲜土人对咸镜道山系认知程度的反映，颇具代表性。<sup>③</sup>书中仍是在论及“白头山”及“白头大干”脉后，联系到“镜城长白山”及“长白正干”：

雪岭<sup>④</sup>之下、豆里之上，左抽一千向东而行者为长白山，雄蟠百余里。诸支之右发者南东播为吉州北界、明川南北、镜城南界诸山，至于海，其最长者为吉州长德山、明川七宝山。诸支之左出者北播于茂山界，至于豆漫江上流。其干北东行，左抽一支北为茂山府，右抽一支东南为镜城府。干之北东行者，北播为富宁府诸山，又东至于钱挂岭，又东至于板荡岭。岭之北支播为会宁、钟城、庆源、稳城府诸山，至于豆漫江；岭之东支播为庆兴府诸山，至于海。<sup>⑤</sup>

作者首先指出“镜城长白山”山体在雪岭与豆里山之间发起，随即引出一个关键的“干”字，此“干”即“长白正干”。只是，此“干”不但包含了“雄蟠百余里”的“镜城长白山”，还一并纳入了接续该山“北东行”的余脉，而这条余脉正是由“六镇”辖境的钱挂岭、板荡岭等山岭串联构成的。<sup>⑥</sup>也就是说，这两部分山脉延袤横贯于整个咸镜北道，共同作为该道的主干脉（与今咸镜山脉主脉大部重合<sup>⑦</sup>）。由此，在《舆地图书》中仅书写为“镜城长白山来脉”的此“干”支脉，被作者详细地描述了出来：作为起始部分的“镜城长白山”山体，南向分支为吉州辖境北部、明川辖境南北及镜城辖境南部之山，北向分支为茂山辖境之山；而后续延伸的余脉部分，先分支为茂山、镜城二邑城附近之山，再分支形成散布于富宁等“六镇”所属诸山，直至图们江岸及海边。由此可见，“长白正干”正以“镜城长白山”山体为“干”始发之本体，又携更长之余脉，将整个咸镜北道的大、小山岭共同联结为一个区域性的山系系统，并最终铸就此“干”成为“北关诸邑之主脉”，<sup>⑧</sup>同时也得以让其中的“镜城长白山”堪为“北道诸山之祖”。

综上所述，朝鲜王朝后期的“镜城长白山”认识，逐步以成熟化的山系视野为基础，将其前期不甚明了的诸多信息，进一步揭示了出来。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针对“镜城长白山”山体所存“连绵”形象及大致范围的认知，朝鲜土人不仅大体明确并巩固了下来，甚至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长白正干”的意识。由此可知，“镜城长白山”既非指囊括今白头山脉、咸镜山脉及赴战岭山脉的大山系，也非仅仅指今咸镜山脉中的一座冠帽峰，而真正指的是位于朝鲜王朝吉州、明川、镜城与茂山四邑之交的一段山脉，

<sup>①</sup> 这些地图均为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笔写本，编号依次为奎16030、古4709-23、古4709-78、古4709-61、奎12156、奎10694。

<sup>②</sup> [韩] 韩永愚：《新编韩国通史》，李春虎译，首尔：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21年，第24页。

<sup>③</sup> 张雨雪、刘阳：《〈北路纪略〉的史料价值》，《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4辑。

<sup>④</sup> 该“雪岭”为豆里山北部邻接之山，即今朝鲜两江道白岩郡辖境与云兴郡辖境交界处的南雪岭，海拔1762米。

<sup>⑤</sup> [朝鲜王朝] 郑允容：《北路纪略》卷1《山川总要·白头余支》，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74年，第7-8页。

<sup>⑥</sup> 这条囊括了“钱挂”“板荡”等山岭的余脉，正是前述《舆地图书》中提及的车逾岭至松真山等“来脉”，只不过《舆地图书》彼时还尚未明确将之与“镜城长白山”统合为一条主干脉。另外，这条余脉延伸至板荡岭后，余下东达庆兴府的诸山被视为其支脉，也与《舆地图书》中所述稍有差别。

<sup>⑦</sup> 今咸镜山脉从今头流山以东（即“镜城长白山”始发处），直至今会宁茂山岭（即钱挂岭）以西之间的主脉，大体就是与“长白正干”所指山脉重合的部分。

<sup>⑧</sup> [朝鲜王朝] 洪仪泳：《北关纪事·山川道里》，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笔写本（编号：奎4224），第6页a。

大致相当于今咸镜山脉主脉中起始部分的山体。<sup>①</sup>

### 三、穆克登查边定界前的朝鲜未管控区域

之所以要理清“镜城长白山”所指的相关疑题，正如前述，是因为这涉及到清朝勘界使穆克登查边定界前，朝鲜王朝尚未管控的地域还有哪些。而若要考察这些地域范围，则务须首先基于一个学界共识，即朝鲜半岛北部尤其靠近“鸭一图”两江的地域至少自中国辽初以降，已为女真人世代居住的家园。<sup>②</sup>但这种作为女真居地的局面，却因来自朝鲜半岛南方势力的北扩而被打破。

截至15世纪中叶，朝鲜王朝通过设置“四郡六镇”以及开拓“三甲”地区，已构建起“鸭一图”两江“沿江防御体系”，<sup>③</sup>大体完成了对整个鸭绿江干流以南地区以及图们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全面防控。其中，甲山邑辖域内，北自该邑所辖惠山堡，南至该邑城间的布防，构成了“惠山—甲山”防线；而会宁、富宁二邑辖域内，北自会宁邑城，南至富宁邑城间的布防，构成了“会宁—富宁”防线。<sup>④</sup>总体来看，这两条防线的构成，使得朝鲜王朝的北部内陆地带，在“鸭一图”两江以南出现一大片尚未开拓的区域（以下简称“北部内陆未拓区”），而这两条防线正是这一区域东、西前沿的实际控制线，线外依旧为女真人领地。不过，这两条防线明显远隔而无法相接，它们之间应该还有一条防线，这就涉及到朝鲜王朝在“镜城长白山”东、南侧附近的一系列关防设置，只是这些关防基本是在15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步建立起来的。

朝鲜王朝之所以在“镜城长白山”附近布置关防，首先与朝鲜半岛东北部的特殊地形分布有关。朝鲜半岛东北部以高原、山地等高海拔地形居多，而平原、丘陵等低海拔地形主要分布在其东、南沿海及图们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其中，“镜城长白山”横亘于沿海平原与高原山地之间，因山体平均海拔相对较高，犹如一道天然屏障，故高丽王朝末期及朝鲜王朝在向这里扩展势力之时，才会采取优先拓占低海拔地区，<sup>⑤</sup>再渐次拓占高海拔地区的方略。尤其向东越过摩天岭后，彼时高丽尤其朝鲜王朝在军事力量相对不是很充裕的情况下，面对由“镜城长白山”向北的高海拔区域，自然不会贸然越入，而是选择了继续“北进”，优先拓占了山之东、南的沿海平原，直至“六镇”一带，由此造就了朝鲜王朝起初只管控了“镜城长白山”东、南侧地区，并在后来亦据此布防的局面。

此外，相较于地形因素的客观影响而言，来自“镜城长白山”以北的女真人所造成的防御压力，更直接导致朝鲜王朝不得不在该山附近布防。事实上，早在15世纪初期，以新迁入的建州女真为主体的女真势力就在“鸭一图”两江流域逐渐形成。<sup>⑥</sup>其中，图们江因南、北两岸皆有女真人分布，更让朝鲜王朝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才勉强稳定了“六镇”防线。在这个过程中，朝鲜王朝还时常要担心“沿江守要，据彼巢穴，近境野人及江北散处野人等，外虽顺服，内实疑贰”。<sup>⑦</sup>而“六镇”以西，正是图们江上游以南、“镜城长白山”以北的地域，也就是在上述朝鲜北部内陆未拓区的范围内。这里除了自然条件相对恶劣，还内含“东良北”（今朝鲜茂山郡辖域内）等建州女真人的重要据点。故15世纪中

<sup>①</sup> 今咸镜山脉为朝鲜半岛平均海拔最高的山脉，仅逾2000米的高峰就有72座。如果把该山脉之主脉自西南向东北延伸至今朝鲜境附近的山体，视作其起始部分，那么这部分山体就是这些高峰的主要集中区。如此连续成脉的高海拔山峰，正与朝鲜王朝习惯认知的“镜城长白山”形象是一致的。参见《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词典·咸镜山脉》，网址：<https://encykorea.aks.ac.kr/Article/E0062115>，访问时间：2024年7月8日。

<sup>②</sup> 相关论著如董万仓：《东北史纲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4-212页；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09-111页；孙进己、孙泓：《女真民族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0-125页；刁书仁、王崇时：《古代中朝宗藩关系与中朝疆界历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59-69页，等等。

<sup>③</sup> 刘阳：《15世纪中叶以来中朝鸭绿江与图们江界河形成的历史根源——以朝鲜王朝为中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sup>④</sup> 《朝鲜世宗实录》卷155《地理志·咸吉道·吉州牧·甲山郡》《地理志·咸吉道·会宁都护府》《地理志·咸吉道·富宁都护府》，《朝鲜王朝实录》第5册，第698-701页。

<sup>⑤</sup> 这里的低海拔地区拥有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是更适宜朝鲜王朝开拓及居民生活的优选之地。

<sup>⑥</sup> 董万仓：《东北史纲要》，第350-390页。

<sup>⑦</sup> 《朝鲜世宗实录》卷72，十八年五月乙未，《朝鲜王朝实录》第3册，第679页。

叶以前，朝鲜王朝尚没有充足的实力开拓这里，正所谓“东良设镇……不敢轻举，因循至今”。<sup>①</sup>如此一来，女真人在这里的活动，反倒大大增加了朝鲜边防的范围，致使“镜城长白山”以南（或以东）的朝鲜咸镜道沿海辖地，都成为前沿防地，即如“镜城、吉州贼来之路，则皆与东良北相连，远处之贼，无由而入”。<sup>②</sup>尤其在完成“六镇”设置后，这片内陆未拓区愈发成为朝鲜王朝的“腹心之疾、肘腋之患”。<sup>③</sup>

朝鲜王朝在“镜城长白山”东、南侧防御危机的严峻，应始于“郎卜儿罕事件”的发生。世祖五年（1459），居于“东良北”等地的建州毛怜部大酋长郎卜儿罕，被朝鲜王朝杀害，引发了建州女真人的群起反抗，<sup>④</sup>致使朝鲜王朝不得不关注并强化“镜城长白山”东、南侧附近的防御布置。沿该山之东、南，经镜、明、吉三邑辖地，直至该山始发处所接豆里山南麓的端川邑辖地，<sup>⑤</sup>朝鲜王朝不断加设以小型城堡（镇堡）、烽燧等为主的系列性关防设施。下面仅以其中最为重要的镇堡在《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中的记载为例，列表说明。

“镜城长白山”附近镇堡设置情况表

镇堡名	归属邑治	筑堡材料	所在位置	守将级别
芹洞堡	镜城	土	府北 67 里	——
鱼游洞堡		石	府北 35 里	万户
吾村堡		石	府西 20 里	——
朱乙温堡		石	府南 32 里	万户
甫老知栅		木	府南 43 里	——
甫化堡		石	府南 54 里	——
森森坡堡		石	府南 125 里	万户
斜尔洞堡	明川	石	县北 32 里	权管
将军坡堡	吉城（州）	石	州北 66 里	万户
西北堡		石	县西 67 里	万户
德万洞堡		石	县西 91 里	——
斜下北堡		石	县西 43 里	权管
吾乙足堡	端川	石	郡北 162 里	万户
双青堡		石	郡西 196 里	权管
甑山堡		——	郡西 190 里	权管

资料来源：《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第6辑）卷49《端川郡·关防》，第66页；《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第6辑）卷50《镜城都护府·关防》《吉城县·关防》《明川县·关防》，第76、80、83页。

如上表，在经过镇堡的革废或新增等局部调整后，镜城邑治下设有7堡，其中除芹洞堡<sup>⑥</sup>外，就是朝鲜后世常常称道的“镜城六堡”，即所谓“镜城府境长白山底设置六堡，以毖其患”；<sup>⑦</sup>而明、吉、端各邑治下，分别设有1堡、4堡及3堡。总体来看，朝鲜王朝依据四邑辖地沿边防守之形便，以间隔十余里或数十里，由北向南依次设置了15堡，且大部分为坚固的石堡。这些镇堡彼此联结相应，同时朝鲜王朝又派遣守将及军民赴防驻守，从而与烽燧等其他设施一并，形成了防御缜密且绵延相续的新防线。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这条新防线大体构建成型，并分别在其东端通过富宁邑城以南所辖玉莲堡，与“会宁—富宁”防线相接，西端通过甲山邑城以东所辖镇东堡，与“惠山—甲山”防线

① 《朝鲜世宗实录》卷88，二十二年三月丁未，《朝鲜王朝实录》第4册，第273页。

② 《朝鲜世宗实录》卷90，二十二年七月己巳，《朝鲜王朝实录》第4册，第307页。

③ [朝鲜王朝] 郑允容：《北路纪略》卷3《边胡·藩胡诸部·老土部落》，第333页。

④ 王臻：《朝鲜前期与明建州女真关系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00-110页。

⑤ 端川辖境设防，缘于与“镜城长白山”相连的“豆里山以南有吉州、甲山相通之路，若审地置堡……端川以南无虞矣”。参见《朝鲜世祖实录》卷29，八年九月甲午，《朝鲜王朝实录》第7册，第548页。

⑥ 该堡后来亦被革废。参见[朝鲜王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别集》卷17《边圉典故·镇堡》，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67年，第712页。

⑦ 《承政院日记》第269册，肃宗五年三月丁未，第22页a。

相接。<sup>①</sup>由此，三条防线合为一体，共同作为“鸭一图”两江“沿江防御体系”，在彼时朝鲜北部内陆地带上延伸出的一条相对完整的闭合型防御分支线，从而基本完成了贯穿这一地带针对未拓区域的边境防控。此后，整条防线在诸关防设施的维护与调整中<sup>②</sup>延续了下来，在朝鲜王朝前期结束前（大体相当于明末），基本保持了原状，<sup>③</sup>这也意味着朝鲜王朝北部内陆未拓区的范围亦依循此防线，防线外则始终为女真人领地。

明清鼎革之际，“清人起自建州，群胡从之去”，<sup>④</sup>朝鲜北境附近的女真人随清朝的兴起，绝大部分被撤离居地，而朝鲜王朝也趁机掀起了进一步扩展势力的步伐。从仁祖朝（1623—1649）开始，朝鲜边民就不断越入到“会宁—富宁”辖境西部的“车逾岭外至豆满江边”，<sup>⑤</sup>占垦图们江上游以南至“镜城长白山”之间的土地。不仅如此，朝鲜王朝更于肃宗十年（1684）在这片区域内新设茂山府，并东置“丰山、梁永二堡于其地”，<sup>⑥</sup>意图完全辖属该府治以东之地，标志着之前长期存续的整个朝鲜北部内陆未拓区防线东段，即“会宁—富宁”防线，自此开始发生较大幅度的西移。这从时任工曹判书的赵泰裔（1660—1723）向肃宗王（1674—1720年在位）的进言中即可看出：

大概茂山一邑，旧时蕃胡所处之地，树木成林，久为废弃之土。茂山镇初在车逾岭之南，此是长白山北麓，镇在山谷之间，土卒生理艰辛，潜为逾岭耕作于江边土沃之地，渐成聚落，故因民走集，亦随而移镇后，复升邑而为府矣。既已设邑之后，六镇百姓移入者，缠属山谷，树木成林之处，无不斫伐耕垦，渐次逼近于白山近处。所谓朴下川，朝廷初以许民为重难者，盖以近白山故也。此辈不有朝廷分付，相率入居……无所忌惮，乃复深入而占地。<sup>⑦</sup>

显然，因茂山邑的设置，尤其随着朝鲜边民加速向该邑西部迁徙占垦，截止到1712年清差穆克登勘界之际，朝鲜北部内陆未拓区的东段防线，至少已从车逾岭以内的“六镇”之地，西移至茂山邑附近一带。只不过茂山邑新设未久，其辖境并未停止向西扩展。而彼时朝鲜边民也在私自向该邑城以西大量徙居，不仅已占据了尚归属不明的“朴下川”（今朝鲜茂山郡延面水）近地，甚至有朝“白头山”腹地深处继续渗透的趋势。

综上所述，在穆克登查边定界以前，朝鲜王朝在“鸭一图”两江（包括今长白山）以南尚未管控的区域范围，即在其所构建的北部内陆未拓区防线以外。这条防线实际是从15世纪中叶开始，就已随着“四郡六镇”及“三甲”地区的防御设置，而在逐步形成中。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镜城长白山”东、南关防设施的布置成型为标志，该防线大体稳定下来，并一直延续至朝鲜王朝后期，直到17世纪末茂山邑设置后才发生局部改变。变动后的防线大体东起茂山邑治附近，南经“镜城长白山”东、南侧附近的关防设施，西达“惠山—甲山”一线。然而，当1712年穆克登完成定界后，包括江源段在内的整个“鸭一图”两江界河始完全确立，致使该防线逐渐丧失了原有功用，但朝鲜王朝却也因此轻易获取了“长白山之北、白头山之南奄为我有”<sup>⑧</sup>的疆土实利。

责任编辑：郭秀文

①《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第6辑）卷49《甲山都护府·关防》，第71页；《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第6辑）卷50《富宁都护府·关防》，第98页。

②如表中的端川邑原辖三堡，后增至四堡。据《朝鲜肃宗实录》载：“端川四堡之设，本为白山部落出没剽掠之备”。参见《朝鲜肃宗实录》卷18，十三年十二月辛亥，《朝鲜王朝实录》第39册，第115页。

③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509年会宁、富宁二邑辖域内，出现镇堡的局部西移（复或增）设，但不足以影响“会宁—富宁”防线的整体态势，更无碍于整个朝鲜北部内陆未拓区防线之大局。此外，在该防线以内的鸭绿江上游南岸曾出现所谓的“废四郡”地域，也同样无妨于这一未拓区防线，且朝鲜王朝后期又逐步恢复了对“废四郡”地域的管控。参见刘阳：《〈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东北地区地名标绘献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4辑；李花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④[朝鲜王朝]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46《北边杂议·白头山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74册，第494页。

⑤[朝鲜王朝]郑允容：《北路纪略》卷3《故实·拓边》，第308页。

⑥[朝鲜王朝]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46《北边杂议·白头山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74册，第494页。

⑦《承政院日记》第470册，肃宗三十八年七月辛丑，第20页b。

⑧《承政院日记》第515册，肃宗四十五年四月甲辰，第8页a。

# 黑格尔哲学、生成式AI与概率论： 历史研究的新工具与新思路

张 涛

**[摘要]**通过探讨生成式AI与概率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特别是如何基于黑格尔“理性的狡计”这一概念建立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黑格尔“理性的狡计”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深层逻辑的哲学框架，强调历史的辩证性和必然性；生成式AI在处理海量文本时展现出巨大的潜力，能够识别历史中的模式和趋势；概率论则可以对AI识别的模式进行量化验证。这三者的结合形成了“宏大—中观—微观”的研究框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简言之，生成式AI与概率论是促进学术范式转型的重要工具，其与黑格尔哲学的结合可以为历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理性的狡计 生成式AI 概率论 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8-0133-09

如今，历史研究者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数据越来越庞杂，材料来源越来越多样，称之为“浩瀚的历史信息海洋”也并不为过。自20世纪中后期起，统计方法逐渐被引入历史学研究中，计量史学兴起并逐渐获得认可；而进入21世纪以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崛起，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与视角。学术界正在思考新技术将对历史研究产生的深刻影响，其中最具根基性的议题便是，如何利用这些新工具进行研究，以及（特别是）如何理解乃至建构新工具和新思路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

有趣的是，当我们仔细观察生成式AI的工作方式时，会发现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理性的狡计”中的无意识推动力。AI本身并不理解历史的深层意义，但通过学习数据，它“无意识”地反映了历史中的某些规律性特征。这种特性与黑格尔的观点一致：个体（或工具）的行为可能并非出于自觉意图，却在更大的理性进程中发挥作用。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提示研究者可以将模型视为一种“狡计”的现代体现：它通过技术手段无意识地揭示历史模式，而学者的任务则是通过批判性思考，将这些模式置于黑格尔的哲学框架中并赋予其意义。

这样的思路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视角：AI识别出的历史模式与黑格尔“理性的狡计”之间存在怎样的共通与互补之处？概率论如何帮助我们对这些模式的相关性或必然性进行定量评估？“理性的狡计”如何深刻地启发对这些定量评估的人文解释？在此过程中，个体与整体、偶然与必然又应该如何平衡？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动力。本文并不追求得出一个封闭的“终极结论”，也不会将建立一个系统性的历史研究框架（“理性的狡计”—生成式AI—概率论）视作最终目标，而是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提供一个初步的多学科对话空间。

---

作者简介 张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四川 成都，610065）。

## 一、黑格尔“理性的狡计”与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

黑格尔“理性的狡计”(List der Vernunft)概念可以说是其历史哲学中最具代表性、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创见。在这一观念框架中，他认为个人的主观意图或利益诉求并不会直接推动历史进程的发展，人们的激情与行动会在相互冲突中无意识地实现“普遍理性”的目的。换言之，即使是非理性的激情和短视决策，也可能会促使历史朝向更系统、更理性、更进步的方向发展。这一观点不仅使历史事件背后的偶然性具有了哲学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揭示了规律性力量推动历史变迁的深层逻辑。

从历史判断的角度来看，“理性的狡计”所展现的内核与现代历史学的要求并无太大不同：学者在研究过去的事件时，需要考量的不仅仅是个体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具体动机，还要思考那些看似零散的因素是否具有内在关联，从而辨别出孕育其中的深层“规律”。以法国大革命为例，不少学者容易陷入到对个体动机或短期效应(如革命者的政治诉求和革命激情)的研究中，从而忽略了对历史更深层次的关注。但“理性的狡计”提醒我们，那些看似失控的激情行为不过是历史的“表层”，它们其实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最终引起了国家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思想观念上的突破。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国革命并非纯粹由社会矛盾或经济危机所致，而是某种深层因素通过罗伯斯庇尔等革命者的“激情”，借助纷繁复杂的动力机制实现了其长远目标。

近代以来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宏大历史观的批判，使研究者不再重视黑格尔，“理性的狡计”渐渐淡出史学界的视野。不过，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维，把黑格尔的“理性”替换为“规律”“结构”等深层次因素，也即人们常说的某种必然性，就能发现这一思想观念在当代学术中仍具有启发意义。例如，麦克菲(Peter McPhee)在《自由与毁灭》中深入刻画了革命热潮对政治决策与公共生活的塑造作用。<sup>①</sup>通过分析历史文本、政治文件与个人书信等，我们看到革命者的短期决策常常受到某种更深层次因素的影响，最终推动了欧洲现代化的制度框架和文化认同的诞生。

很多学者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考据与微观史料的挖掘上，认为借助信件、传记、报刊与政策文件等资料，就能还原运动或事件的“真实”过程。然而，仅仅停留于个体或局部叙述，就不可能认识到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与整体性。可以说，近代以来史学界对“史料”的盲目崇拜恰恰是史学疏离哲学后所走入的误区。如果将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纳入分析框架，研究者便会更主动去思索：在看似充满偶然性的行为背后，是否存在一种系统化的“力量”，规划着目标的逐步实现，也即遵循了某种深层目的或趋势？简言之，所谓“理性的狡计”不仅揭示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也强调了历史逻辑的深刻性。

其实换个角度就会发现，“理性的狡计”观念本质上构建了理解历史进程中微观行为与宏观趋势的辩证框架——正是这一点使其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该思想的核心在于：历史个体基于有限认知的具体选择，会在系统性的机制下，转化为超越个人意图的宏观变革。这种转化既非纯粹偶然的随机事件，也不遵循机械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作用于更深层次上的机制，具有如下三重特征。

首先，动机与结果间存在非对称性。因认知局限和局部目标限制，历史主体察觉不到其行为结果将推动更深远的结构性变化。仍以麦克菲的研究为例，他在书中揭示，雅各宾派关闭教堂的决策虽出于反教权的动机，却意外释放出大量教会地产，客观上加速了资本主义土地流转机制的建立。<sup>②</sup>这种动机与结果的严重偏离，恰如黑格尔所言的“理性的狡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非对称性具有双重维度：时间维度上，行动者无法预见自身行为的长期效应；空间维度上，局部决策通过系统网络产生不可控的涟漪效应。其次，矛盾转化的系统性。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劳资冲突(如工资、工作环境等)不仅局限于个人层面，而是扩散至整个社会层面。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劳资关系，而且促进了立法与制度的改善，构建起了更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起初，“个人—个人”“个人—组织”的矛盾是微观的，但随着系统性的转化，最终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可以说，矛盾转化的系统性正是宏观与微观得以

<sup>①</sup> [澳]彼得·麦克菲：《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杨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

<sup>②</sup> [澳]彼得·麦克菲：《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

协调的“中介”。最后，历史趋势具有稳定性。即使战争、革命等突发事件不断发生，长时段的历史趋势依旧能够保持某种稳定性。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激进派的主张并未立即得到落实，但开启的民族国家理念、社会平等意识、法律制度变革等，在其后多个世纪里不断被继承和修正。之所以如此，恰恰在于这些主张契合了人类潜意识中的某种理性，比如对正义的欲求。

因此，“理性的狡计”对于历史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也为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思维方法上的拓展。不过，这种宏大历史叙事始终面临实证困难。正如很多学者意识到的，当黑格尔将法国大革命解释为自由意志的必然时，他无法说明为何相似的社会矛盾（如18世纪末法国与英国都面临严峻的财政和社会危机，贵族与资产阶级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旧制度不满）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革命爆发与议会改革）。换言之，“理性的狡计”框架无法解释历史的多样性。更加困扰学者的是，该理论框架所涉及的转化机制仍旧晦暗不明。比如，三十年战争虽然催生了现代外交制度，但个体创伤转化为制度创新的机制仍不被了解。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生成式AI技术以及最新发展的概率论为突破这些局限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过分析海量数据（如议会记录、私人信件、物资清单），AI可以重建个体选择与系统约束的互动模型。概率论则可以对AI重建的各种模型进行可信度评估，从而使我们更好地量化可能性，以及判断是否符合历史必然性。同时，概率论还为理解个体意图与历史结果之间的转化提供了结构化框架——个体行为的随机性如何通过概率分布转化为宏观历史中的规律性。

## 二、生成式AI在历史分析中的应用

生成式AI能够从海量语料中习得概率分布、语义关联及上下文关系，并在生成过程中以相对逼真的方式“复现”被训练文本所承载的逻辑脉络。表面上看，它所生成的内容似乎不过是统计整合了字词或句式结构的出现频次，但其实在深度学习框架下，模型通过多层非线性映射来处理和生成语言，这使得它们能够捕捉到人类表达背后的思维模式。

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注重对史料的批判性阅读、背景性解读，以及多重证据相互印证；而生成式AI则在超大规模文本方面展现出非凡的、可与人类互补的潜力：它能将数以百万计的文献进行初步分拣、聚类与关键信息提取，从而让研究者从碎片化史料中找到可能具有启发价值的线索，然后再进行定性分析和人文解释来验证或反驳该初步发现。正如卡普兰（Steven L. Kaplan）对18世纪法国面包产业的研究所揭示的，即使我们能够统计面包价格在各地波动的频率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情绪等问题，也仍需进一步与具体的文化和制度背景相互印证，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地区发生的抗议浪潮更为激烈。<sup>①</sup>一些学者很早就开始尝试计量史学的方法，即运用数据库和统计方法来处理史料。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通过整理欧洲现代早期人口与社会动乱数据，揭示了动乱的爆发与人口压力之间的某种统计关系。<sup>②</sup>这类研究若与生成式AI结合，或可带来新的进展：一方面，生成式AI能够从大量史料中处理人口变动、地理环境、社会舆论等关键词句；另一方面，研究者可以将其与已有的统计模型结合，建构更具层级和弹性的解释框架。例如，对同一个历史阶段，革命或骚乱在不同地区爆发的原因往往包括政治压迫、宗教斗争、物资匮乏、谣言扩散等多种因素，如果只依靠传统的计量方法，研究者往往只能处理人力可及的范围内的少数样本。而生成式AI则能够协助处理大规模文本，帮助学者更全面地进行考察，诸如谣言怎样在不同群体流传，舆情如何快速变化乃至激化，进而对人群的动员机制做出更广泛的研究。

此外，生成式AI在分析历史文本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它能高效自动地重构人物网络和概念网络，形成“主题建模”或“情感分析”的初步结果。这些功能不仅会带来研究上的便利，也可能引发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反思。以前，若要通过日记、档案、报刊或地方志系统地梳理某些人的活动轨迹，

<sup>①</sup> Kaplan, S. L., *B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ign of Louis XV* (2nd ed.), London: Anthem Press, 2015.

<sup>②</sup> [美]杰克·A.戈德斯通：《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章廷杰、黄立志、章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往往需要投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力物力——这也就是为何几乎没有此方面的大规模研究的原因。而在 AI 的协助下，时间将会超大幅度缩减，甚至那些原本被看作琐碎的信息（如人名、地名重复出现的频率，或不同群体对民间传说的情感反应）都有机会被更快速地汇总与呈现。谭旋（Timothy Tackett）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早期“恐怖”的传播路径时，通过系统地梳理地方报刊、私人通信等史料，揭示了个体对中央政策的恐惧与不信任如何汇聚成为集体行为。<sup>①</sup>如若再结合生成式模型，便可能帮助研究者在那些庞杂的信息里找出反复出现的核心词汇，从而理解地方民众对于政策或事件反应的时空差异。所以，当代史学的重要趋势就在于跨学科对话，特别是与计算机科学的融合，而生成式 AI 便是关键纽带。

当然，过度依赖生成式 AI 也存在潜在风险，审慎严谨的学术规范与反思必不可少。众所周知，生成式大语言模型会“撒谎”，即会产生 AI 幻觉（AI Hallucinations）：生成看似合理的文本，并宣称是客观或真实信息。实际上，模型背后的概率机制仍存在问题，尤其是当训练数据存在错误、缺失或偏见时，AI 很容易得出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描述。就此而言，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关于量化分析与人文阐释应彼此平衡的警示依然适用：任何统计结果都需要回到原始材料与具体情境中进行印证和诠释。<sup>②</sup>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试图结合生成式 AI 与“理性的狡计”来建构理论框架时，两者之间的张力不容忽视：生成式 AI 是基于概率分布运作的，这与黑格尔式的历史观存在冲突，当然也可能互相启发。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历史在整体上具有一种目的论倾向，“理性的狡计”意味着个人往往被更大历史进程所利用。有学者提出，黑格尔对宏观的看法并不否定历史中的偶然性，而是认为偶然性因素在更长时段与更广阔社会结构中被整合或“消化”。<sup>③</sup>生成式 AI 在从海量文本中识别模式时，看似在微观层面上只是在根据概率“拟真”，却往往在输出文本时能够凸显某些“隐含”的逻辑脉络或价值取向，这与“理性的狡计”形成了可对比之处。我们并不能因此断言这便是“世界精神”的证据，但这的确能够引发思考：也许在无数不同动机的言语下，存在某种无意识的结构或规律，当我们能够进行超过人力的计算分析时，便能看到一种整体性结构或规律的演化轨迹。当然，这仍需进一步讨论：这条“轨迹”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技术的影响？学者的主体性与技术的偏向性该如何协调？等等。

所以，生成式 AI 在历史分析中的应用，需要某些迭代修正方法，比如贝叶斯推理等。也就是说，最终结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在研究中不断修正，从而调整甚至颠覆我们的先验假设。这一过程与皮平（Robert B. Pippin）和平卡德（Terry Pinkard）对黑格尔历史观的解读并行不悖：黑格尔认为“必然”不是线性的，而是通过一系列“正—反—合”的反复辩证过程逐步实现的。同样地，未来研究者对某段历史的理解，也并非在生成式 AI 处理完史料后就尘埃落定，而是随着新史料、新理论、新技术的出现不断修正模型，让 AI 协助验证各种假说，直至找到更能经受证据与理论考验的论述。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能用无限多的迭代来“逼近真理”，而更多意味着 AI 与（后文将要介绍的）概率分析可以给我们提供更丰富的视角与启发。

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即在于历史解释，所以对模型结果的解读必不可少。将 AI 输出的文本与既有的历史文献进行比较印证，已属于老生常谈，不再赘述。这里仅简要提及两点。首先，无论是 AI 的输出启发了现有研究，还是被史料所反驳，后续的工作将是对训练数据的检查、模型的调整或替换、对史料的量化改进等，也就是说，未来历史研究者的工作方式将会极大改变，需要更多的计算机科学以及数学方面的知识。其次，人文解释的独特性仍具有意义，但简单的比较印证将不再成为历史研究者独有的技能，换句话说，当前大部分学者之所以能够进行专业解释，更多是由于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

① [美] 谭旋：《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黄丹璐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② McCloskey, D. 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liometric School”,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8, vol.38 (1), pp.13-28. [美] 迪尔德丽·N. 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马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③ Pippin, R. B., *Hegel's Idealism: The Satisfactions of Self-Consciousne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inkard, T., *Hegel: A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McCarney, J., *Hegel on Histor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精力去接触史料和史书，但 AI 的出现将使得这点不再难以实现。这也就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对人文解释进行更加深刻、更具创造性的思索——“理性的狡计”恰能提供启发以及保证，后文将详细论述。

综上，生成式 AI 其实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式”研究路径，但我们必须确保在实证环节不被模型牵着鼻子走。其实，除了人工核查，如果引入概率论，将极大优化这一研究路径。因为通过概率论，我们可以对 AI 的输出进行评估，判断其可靠性和有效性，从而为历史研究提供更为严谨的依据。这种结合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识别潜在的问题，还能为生成式 AI 的应用提供更为科学的框架，确保历史研究的严谨性与准确性。

### 三、将概率论纳入考量<sup>①</sup>

生成式 AI 可以处理多种类型的数据，如文本、图像和音频等，这些数据并不需要量化处理，我们可以使用多层次空间映射等技术，将无法量化的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进而生成新的内容。与此不同，概率论主要依赖于可量化的数据。这就迫使我们面对如下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数学工具能否恰当地对历史进行量化。

传统历史研究中，由于史料常常不完整或存在价值取向，许多学者认为将定性材料与定量分析结合存在困难。然而，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受经济史和社会史影响，一些学者在人口变动、经济发展、社会运动等研究中尝试采用统计方法，为概率论在历史学中的应用提供了例证。例如，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对美国奴隶制经济效益的计量史学研究，<sup>②</sup> 以及诺斯（Douglass North）关于制度变迁的量化分析，<sup>③</sup> 逐渐展示了统计方法在拓展史学知识方面的潜力。另外，我们在进行研究时经常能够感到，虽然事件具有偶然性与独特性，但是当研究的规模足够大或时间跨度足够长时，似乎总会出现某些相对稳定的指标可以进行量化处理。所以，概率论等数学工具不仅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应用，而且使用得当将极大拓展历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丰富人们的认知。而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概率论与生成式 AI 技术的协作应用将会更加完善历史研究的数字化进程。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是概率论与“理性的狡计”之间的张力问题。上文已经提及，黑格尔历史观中的目的论倾向虽与概率的视角存在思维方式上的冲突，但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或不同时间跨度上进行调和，而概率论则为这种调和提供了一种多层次的分析框架。在微观层面，概率论可以帮助学者分析样本数据的偶然性；而在宏观层面，通过积累大量数据，概率论可以揭示出潜在的结构性趋势或规律。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兼顾到偶然性与必然性，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历史过程。

至于概率论对生成式 AI 的补充，首先，它可以成为鉴别和验证 AI 所识别模式的关键工具。我们知道，生成式 AI 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能够对海量历史文献进行“挖掘”，推断出其中存在的某些模式，例如在特定环境因素下，村镇叛乱的概率显著提高；或在经济衰退期，谣言与民间宗教骚乱之间的关联度增强。这些关系如果仅停留在文本“挖掘”层面，可能被质疑为不够可靠，或只能作为“探索性”结论。然而，我们若借助概率论对这些推断进行检验，区分相关因素与因果关系，并控制混杂因素，就能评估哪些模式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哪些只是特定样本或时期的“噪音”。当我们对史料进行重复分析并在一定区间内得到近似结果时，就说明提炼的模式很可能有合理的基础。

其次，概率论还可以对 AI 模型进行迭代修正。由于史料的复杂与多样，即使是专门为历史研究

<sup>①</sup> 从严格意义上说，现代机器学习 / 统计学习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概率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 AI 生成内容时就可以忽视概率论对结果的评估与检验。因为模型往往基于最大似然或相关估计方法对数据分布进行近似，无法保证对所有复杂或新颖情况都能准确处理。再加上现实环境中的数据会不断变化，并可能包含噪声或异常值，因此训练好的模型仍需在新场景下校验是否失效。尽管我们可以将部分概率论方法内嵌于 AI 的生成流程中，实现自我修正，但这往往面临同源性偏差、计算成本上升以及评估准则设计难度等问题。所以在当前模型智能水平下，概率论仍是关键的评估与修正手段，不可或缺。

<sup>②</sup> Fogel, R. W. and Engerman, S. L.,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4.

<sup>③</sup> North, D. C.,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训练的 AI 模型也会在处理史料时出现错误，概率论，尤其是贝叶斯推理，为这一需求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比如，当我们推测出可能需要修正的几个部分时，便可以使用贝叶斯推理来量化这些错误的可能概率，从而确定各自修正的优先级，优化修正流程。贝叶斯推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能够进行迭代学习。当新史料或新理论出现时，可以将这些信息纳入模型，通过贝叶斯推理计算后验分布（Posterior Distribution），这样可以在保留原有知识的基础上整合新的信息，从而提高模型的处理能力，增强对史料的理解。另外，贝叶斯方法也能够比较不同模型和参数设置，有助于研究者选择更合适的史料处理方案。

不过，我们也要承认，历史研究中的数据往往难以像自然科学或经济学那样统一、完备、方便量化。即使是目前被认为数据最丰富的经济史研究，也会面临诸多问题，如缺少关键变量、数据指标口径不一致、各群体记录不平衡等。如果学者过度相信概率模型或 AI 的输出，而忽略基础文献或缺少对历史背景的深度理解，就可能掉入所谓的“统计陷阱”之中。<sup>①</sup>另外，统计模型得出的概率只是反映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某些变量相关的程度，而并非意味着因果关系，更不用说目前还有大量事物难以量化或量化后必然存在信息的损失，如个人的心理状况、宗教信仰的凝聚力、文化对人的塑造等，这些都需要细致入微的定性分析才能给出全面的解释。更有甚者，如“黑天鹅事件”等超出了概率统计的范围，<sup>②</sup>但它们在历史上却时有发生。所以，不少学者呼吁在使用统计和概率方法时，需要保留定性分析的学科传统，例如地域特色、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思想观念等要素仍需从文本与实地考察中获取。概率模型的结果可以作为“佐证”或“启发”，但不能取代对史料的人文解读与阐释。<sup>③</sup>

所以，概率论与生成式 AI 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将它们结合起来使用，可以有效避免它们各自的缺陷，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复杂的史料。例如，如果我们要对欧洲革命运动进行量化研究，不仅要关注粮食价格、人口密度、工业雇佣人数与反抗运动之间的关系，还需分析舆论、思想派别和政治精英的动员能力等。生成式 AI 可以高效搜集与识别不同年代的舆论倾向，并用概率统计分析舆论形势与实际革命行动的关联。如果发现某城市报刊中对君主制的批评言论超过某个阈值后，该城市爆发叛乱的概率显著上升，就可以与经济、社会等其他变量交叉检验，从而形成对当时社会状况更立体的动态描述。如此看来，概率论扮演着多重角色。首先，概率论能够起到沟通微观和宏观的中介作用。要协调“偶然性”与“必然性”这对看似对立的概念，需要一种分析模式，能够在微观有限样本中认识随机性，同时在宏观累积样本中检测结构性的趋势，概率论的多层次分析框架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其次，它是验证工具，可以判断生成式 AI 输出内容的显著性，区分真实的相关性与虚假的相关性。再次，概率论可以更便捷地对模型或研究结论进行更新。借助贝叶斯推理等概率方法，我们能够不断迭代修正过往的结论，这保证了研究的活力。

综上，概率论在本文所建构的理论框架中既是工具，也是钥匙，既能协助研究者在大样本基础上发现隐藏的模式，又能提醒我们审视统计假设背后的条件，避免过度简化历史情境。这些认识与黑格尔式历史观之间存在张力，但更多的是对“理性的狡计”的启发。随着史料数字化的普及、数据库的完善、数学工具的丰富，以及生成式 AI 技术的成熟，概率论提供了一种相对系统的思考方式，使我们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理解更加深刻。正如经济史学家麦克洛斯基在多项研究中所强调的，量化分析不是追寻确定性的终点，而是一扇门，引领我们更深入地发掘历史与社会的演变。<sup>④</sup>而这扇门通往何处，仍需研究者对史料、语境与人文解读保持敏感性及创造性。只有在工具与理念整合之下，我们才能在总体与个别、

① Freedman, D. A., *Statistical Models: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Taleb, N. N.,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③ McCloskey, D. 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liometric School”,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8, vol.38 (1), pp.13-28.

④ McCloskey, D. 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liometric School”,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8, vol.38 (1), pp.13-28. [美] 迪尔德丽·N. 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

定量与定性、偶然与必然之间求得更具启发性的平衡。

#### 四、三者交汇：“理性的狡计”、生成式AI、概率论的相互补充

前文中我们相继审视了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生成式AI及概率论，可以发现三者并非各自孤立不能相容，而是能够在“宏大—中观—微观”这一框架中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黑格尔所提供的是一个宏观层次的哲学基础，强调在历史表面充满了偶然性与激情，但深层次可能暗含必然性或理性；生成式AI则是一种在大规模数据处理与文本分析中脱颖而出的中观工具，能够帮助研究者快速整理信息和初步建构分析框架；概率论及其衍生的统计或模拟方法，则在微观层面实现具体的量化与推断，并且能够起到沟通历史的微观与宏观的中介作用。

就方法论而言，以“理性的狡计”为基础就会迫使研究者去思考那些看似独立的事件、人物、动机背后是否有着共同的结构或方向。与此同时，AI技术给我们提供了深入大规模文本中追踪模式和隐含关联的能力。要将这些模式进一步转化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假说或历史论述，就需要概率论来处理诸多证据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对不同的解释方案进行比较与检验。这种过程看似复杂，但它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全面、更多层次的历史洞见。

由于这一研究框架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诸多技术的落实仍然需要研究者进行更为系统的实践与完善，所以许多方面尚属于理论构想，难以找到确凿的案例。不过，《宏观分析：数字方法与文学史》(*Macroanalysis: Digital Methods and Literary History*) (以下简称《宏观分析》)<sup>①</sup>一书，尤其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和展示这一框架潜力的基础。这本书所使用的计算机技术能够与人工智能和概率论迅速对接，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在对《宏观分析》研究方法的改进中，看到人工智能与概率论结合后的独特优势。接下来，我们将结合“理性的狡计”这一人文视角，进一步展示该框架的最后一环。

《宏观分析》一书出版于2013年，由乔克斯(Matthew L. Jockers)撰写，旨在为研究者提供一种基于大规模数据分析的全新研究视角。乔克斯在书中聚焦的是19世纪英文小说，他通过计量分析来揭示宏观层面的文学趋势。这样的做法与之前文学研究中常见的“精读”形成对照，使他的文学研究呈现为一种“远读”的样貌。<sup>②</sup>从当时数字人文尚处于探索阶段的背景来看，这部著作在数据挖掘、主题建模、作者风格分析等方面取得了突破，真正将统计方法与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结合起来。他在书中使用了词频统计、聚类分析、线性回归等较为基础的机器学习技术，这些技术在当时虽被统称为数据挖掘或文本挖掘方法，但若放在更广泛的定义下，也可以归于人工智能的范畴。只不过，这些方法不属于如今被广泛关注的深度学习或生成式模型，它们更多地依靠对文本特征的人工选择和聚类，<sup>③</sup>从而帮助研究者在成千上万部作品中找出潜在的主题模式和统计规律。尽管如此，乔克斯所使用的一整套统计和文本挖掘流程，已经能够体现出数字化研究在文学乃至更广泛人文学科研究中的雏形：先对文本进行标准化处理，再根据词频分布与上下文特征进行降维和聚类分析，从而让学者快速了解文献的结构性特征。

虽然《宏观分析》属于文学研究，但很多思路都可以借鉴到历史研究中，比如书中关于作者风格的量化分析。这种以词频、句法结构、常用词等为对象的统计方法，已经被广泛接受，也多次被应用于历史研究中，如确定史料是否伪造，确定匿名作品的作者等，这也是本文选取它为范例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宏观分析》所展现的研究前景令人振奋。在传统历史研究中，人们通常需要花费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仔细翻阅档案和文献，以形成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深刻理解。这一过程强调细节的相互对比、语义的深入分析以及对社会背景的深入理解，因此高度依赖研究者个人的经验和能力，同时也极为耗费时间和人力物力。相比之下，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将显著缩短研究所需的时间和资源。通过对大量文

<sup>①</sup> Jockers, M. L., *Macroanalysis: Digital methods and literary history*,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3.

<sup>②</sup> Moretti, F.,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 2013.

<sup>③</sup> 这也是一些研究者对其的质疑所在。换句话说，由于在最初的人工选择和聚类时，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带入了主观偏好，后续的验证结果也难以摆脱这种先天的限制，致使这种方式在知识增益和发现方面稍显局限。与之相对，生成式AI的自适应学习能力则使其在文本聚类与主题发现等方面不再完全依赖人工特征选择，展现出了更大的潜力。

本进行共时或历时的比较，人们能够极为便捷和快速地进行类似的研究，甚至能够揭示一些传统方法难以观察到的趋势。例如，借助词频统计和主题模型，研究者可以分析数万份信件、报刊、档案等，识别出同一时期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并对其兴衰周期或地理分布进行可视化处理。这一过程在以往则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接下来让我们聚焦《宏观分析》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聚类分析。乔克斯使用层次聚类、非监督式机器聚类等方法对作家风格或不同文本主题进行比照，从而在宏观层面快速发现一些作家形成了潜在的“簇（cluster）”，<sup>①</sup>而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共享某些语词习惯。如今，借助更高维度的嵌入技术<sup>②</sup>和大语言模型生成的语义空间，<sup>③</sup>这种聚类分析能达到更高的精度和复杂度。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各文本之间的相似度，还能够在富含上下文的多层语义空间中识别出人物性格、叙事策略等特征。与此同时，若再加入网络分析工具，对人物关系或地理位置进行关联，还可以动态地观测人物关系网络和场景变化。这种方法显然可以应用于分析史料：一个研究17世纪英国内战的学者，同样可以借助这些方法把数以千计的议会记录、信件、档案等纳入同一个框架，分析不同派系、不同年份的语言差异，展现其中复杂的动态关系。

不过，聚类分析在分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方面也存在一些明显缺陷。首先，聚类分析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缺乏明确的评估标准来验证分类结果的有效性。聚类结果往往依赖算法的输出，而非真实可验证的分类标准。例如，某些文本可能被算法归类为同一组，然而在主题、风格或历史背景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一问题在文本特征高度相似时尤为突出，有可能导致学者得出错误的结论，从而影响对文本的深入理解。其次，聚类算法的选择和参数设置对最终结果有重要影响。以层次聚类为例，该方法在选择聚类类型和距离度量时需要谨慎。如果选择了不合适的聚类类型（如分裂型而非凝聚型），<sup>④</sup>可能导致无法有效识别数据中的自然簇，最终结果可能无法反映数据的真实结构。此外，若距离度量（distance metric）选择不当（例如在高维稀疏数据中使用欧几里得距离），则可能导致相似度计算失真，从而将不相似的对象错误地聚为一类，影响分析的准确性。

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概率论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通过引入概率模型，我们可以对聚类结果进行更为严谨的评估。例如，使用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可以为每个簇分配一个概率分布，从而为每个文本在不同簇中的归属提供概率值。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量化文本属于某个簇的可能性，还可以通过最大化似然估计来优化聚类结果。此外，基于概率的聚类方法还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簇的不确定性。例如，某个文本可能在多个簇中都有较高的概率，这表明该文本的特征可能具有多重性或模糊性。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归类为某一特定簇。而在获得可靠的聚类结果后，如何对其进行深入的解释，揭示其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传统的因果解释通常采用线性回归等方法，描述变量之间的单向关联。例如，通过TF-IDF（词频—逆文本频率）权重分析，可以确定哪些词汇与某个主题相关联。但是，这种方法无法揭示变量之间的复杂交互效应，也无法解释聚类结果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意义。相比之下，引入黑格尔“理性的狡计”这一哲学概念，构建一个辩证的解释框架，便可以揭示文本数据中多层次的、非线性的关联和辩证递进的特征。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可以考虑以下这个十分简化的案例：假设我们对一组19世纪英国小说

① 在聚类分析中，簇是数据分析的基本单位，指由相似的数据点组成的一个组。聚类分析的目的是将数据划分为多个簇，使得同一簇内的数据之间的相似性尽可能高，而不同簇之间的数据相似性尽可能低。

② 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领域，嵌入（embedding）是一种将离散数据（如单词、句子或文档）转换为连续向量的技术，能够提供更丰富的语义信息和更强的区分能力。

③ 指通过大语言模型（如GPT、BERT等）所创建的高维向量空间，其中每个向量代表一个文本单元（如单词、短语或句子）的语义信息。它在上下文理解、语义信息、处理能力、适应性和灵活性等方面相较于传统统计方法具有显著优势。

④ 分裂型层次聚类：从一个整体开始，逐步将其分裂成更小的簇，直到每个簇只包含一个数据点或满足某个停止条件。凝聚型层次聚类：从每个数据点开始，逐步合并最相似的簇，直到达到预定的簇数或所有数据点合并为一个簇。

进行聚类分析。使用 AI 来分析这些小说的语词，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模式。例如，一个簇主要包含以女性视角进行叙述的作品，而另一个簇主要包含关于生态学的作品。如果仅从因果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数据，我们会认为，作品中女性视角的出现是回应特定历史背景，如 19 世纪中叶英国推动教育改革，女子教育逐渐受到重视，书籍市场中女性消费者数量显著提升；生态学的作品可能反映了对环境破坏的忧虑，因而作家通过作品表达对自然及人类关系的思考。不难看出，这种分析通常是线性的，旨在寻找某种直接关联，因而会诱使研究者对这两个簇进行独立的分析。

但是，从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的角度切入，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些文学模式的意义。“理性的狡计”框架强调历史与个体意图之间复杂的互动，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两个簇视为人们对多元社会的回应。尽管它们在表面上看似独立，但实际上可能反映出对权力、压迫和环境恶化的共同关注。这些作家在创作时，可能无意中使它们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借助这一框架，我们会去关注作家在描写女性时是否借用了描述自然景物的词汇，反之亦然。这种分析可以揭示两者相互关联时的修辞手法，例如隐喻的使用。这表明，它们不仅回应了多元的社会背景，还相互影响，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文学表达。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将这两个簇视为人类对社会变迁的感性反应，而它们又是理性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特殊运作方式。人类思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自身定位。通过引入女性视角，理性获得了新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定位方式；而通过对自然的描写，理性开始反思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通过审视自然来为自身定位。通过这两种反应，理性发生了变化，甚至可以说“它进步了”，仿佛真正实现了它的狡计。概言之，在这一点上，“理性的狡计”框架把作者的创作视为一种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抽象与反思的动态过程，从而迫使研究者不断反思表面上看似无关的事物之间是否存在深层次的交织、转化。

上述这个简单的案例分析，已经可以初步展示“‘理性的狡计’—生成式 AI—概率论”这一框架如何在实践中形成一条相辅相成的研究途径：概率论通过数量关系揭示可能的关联，生成式 AI 在大规模文本中识别潜在模式等，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则可以为这些离散的、看似互不关联的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机制”提供一种思路。当然，这里的分析仍然十分初步，但已经能够展现出它们之间的交织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中产生互补效应。相信随着研究及实践的深入，整合这些理论和方法的潜力将进一步显现。

## 五、结语

黑格尔“理性的狡计”强调了历史进程中看似独立的主体与事件，其背后却潜藏着某种必然的演进逻辑。生成式 AI 与概率论，则分别代表着数字时代信息处理与数学推理最前沿的力量，为我们理解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全新的可能。三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它们也并非无法应用于历史研究。未来，随着这些技术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或许能以更加全面、立体的方式来完善历史学。传统史学方法论中对资料的严谨考证、对语境的敏锐洞察依然不可或缺，但是若将它与大规模数据分析、计算模拟、人工智能技术相融合，或许能催生出前所未有的研究范式，它既能巩固历史学的学术基础，也能为当代的复杂世界提供更加多元化且富有远见的历史洞见。

换言之，生成式 AI 不应只是一种简单的文本生成工具或语料库检索助手；概率论也不应仅仅是种狭隘的量化手段。它们应该被视为促进学术范式转型和认知升级的催化剂，与历史学深沉的人文内涵相配合，一起推动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过去，更警醒地审视现在，更柔性且理性地展望未来。在这样的学术与技术融合进程中，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许能够真正逾越某些陈旧的思想边界，透过数字时代的新视角获得别样的生机。

历史从未停止向前迈进。当技术与人文交相辉映时，我们也许才刚刚开始真正理解那潜藏在历史深处的“理性之光”。

责任编辑：郭秀文

## 中唐诗人的盛唐诗视域探讨

——以刘禹锡与李白的异时空间叠合为切入点

戴伟华

**[摘要]**以刘禹锡“自夔州转历阳”的长江行踪以及由和州经金陵北上为线索，聚焦其与李白的异时空间叠合之处，选取金陵等关键地域空间，探究在盛唐与中唐不同的时代语境、同一地理环境中刘禹锡对李白其人其诗“规避”现象，反映中唐诗人试图通过与盛唐诗歌对话，确立自身创作合法性与价值的方式。这种“规避”，实则是中唐诗人对诗歌发展方向的主动探索，背后蕴含着对时代变迁、个人际遇的深刻反思，以及重塑诗歌审美标准的诗学观念。将李白、刘禹锡诗歌空间划分为大空间、中空间、小空间、微空间等层次，以刘禹锡诗歌创作为典型案例，展现诗人如何将个人情感与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相融合，在不同空间层次的切换中，构建起独特的诗歌意境。关于李白诗“吴京”概念的独特使用、韩愈痛斥的“群儿”并非指元白或附和者，以及对刘禹锡“考”“参”“为”“俟”写诗“四字诀”的阐释，都是小处着眼，为宏观论述累积基础。异时空间叠合中诗歌的“相承”与“规避”，为唐代诗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关键词]**刘禹锡 李白 中唐诗 盛唐诗 异时空间叠合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8-0142-11

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新材料的发掘至关重要，但常受限于材料本身的稀缺。因此，在既有常见材料中发现问题，往往需要理论视角的更新，这一理论更新也可以理解为对材料使用进行层次性划分。过去关注文化分区（如强势、次强势、弱势、次弱势），现在关注空间划分（如大空间、中空间、小空间、微空间），从异时空间叠合角度，考察诗学历时性结构。这种叠合的可能性随空间层级递减：微→小→中→大空间，即微、小空间在异时叠合的可能性最强。

空间理论的引入可为唐代文学研究开辟全新视角，有助于探讨文学的传承与变异。传统研究多聚焦于文学作品同一时空相承关系，而相对忽视了不同时空叠合所产生的相异性。将空间叠合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呈现两种典型现象：其一，存在明确文献支撑的前后传承关系，如李白与崔颢围绕黄鹤楼的诗歌创作；其二，虽在空间上相遇却无传承叠合，以杜甫与李商隐在陈子昂故乡梓州的经历最为典型。杜甫在梓州短暂停留时创作《陈拾遗故宅》《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等诗，以“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等句表达对陈子昂的仰慕；反观李商隐，在梓州居留时间更长，却未留下任何与陈子昂相关诗作。<sup>①</sup>二人在不同时间与陈子昂行迹产生空间叠合，文学回应却迥异，其成因可从三方面解析。首先是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的差异。杜甫亲历安史之乱，其心怀天下、关注民生的特质使其诗歌风格沉郁顿挫，与陈子昂刚健质朴的文风及忧国忧民的情怀高度契合，

**作者简介** 戴伟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语言服务研究中心教授（广东 广州，510006）。

① 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诗之路》，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46-48页。

故借缅怀陈子昂呼唤文人的现实担当；李商隐身处晚唐，深陷党争与仕途困顿，其诗歌多聚焦爱情与身世感慨，风格隐晦迷离，对陈子昂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共鸣较弱，难以在梓州激发创作冲动。其次是文学风格与创作倾向不同。杜甫以写实手法反映社会现实，认同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在探访遗迹时自然诉诸诗歌抒发情感；李商隐擅长运用华丽辞藻与隐晦象征表达个人情感，其创作视角更关注内心世界，难以在陈子昂遗迹中找到契合自身风格的创作切入点。再次是具体情境与触发因素的差异。杜甫在梓州可能因特定场景，如遗迹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激发情感共鸣；而李商隐或因缺乏强烈触动，或注意力被分散，未能产生创作冲动。

刘禹锡从夔州到和州的长江行踪，与李白存在着异时空间叠合现象，<sup>①</sup>而彼此之间又未构成呼应和相承关系。这引起我们对异时空间研究的兴趣。

—

空间划分对异时空间叠合研究至关重要。<sup>②</sup>将空间分为大、中、小、微多层级时，空间尺度越小，叠合发生的可能性越高。例如以唐代方镇为大空间，则所辖州、城市重要建筑、居所办公场地可依次划分为中、小、微空间；若以城市为大空间，如长安，则皇城、城坊、王府宅邸可分别对应中、小、微空间。其中，范围集中的小、微空间是异时空间叠合研究的重点区域。人与空间的关系复杂微妙，既存在“有人无空间”的疏离感，也会出现“有空间无人”的寂寞状态。诗歌中的地理元素不仅是现实环境的再现，更是情感与思想的载体。如李白《望庐山瀑布》以夸张笔触描绘“庐山”抒发对天地力量的赞叹；刘禹锡《西塞山怀古》通过“益州”“金陵”等地理名词构建历史场景，引发对朝代兴衰的思考。诗歌空间本质上是地理、情感、文化等多维度融合的有机整体。地理空间奠定物质基础，情感空间赋予诗歌生命力，文化空间则增添历史底蕴，三者相互交织，共同塑造诗歌独特的艺术形象。空间叠合在文学创作与历史记忆中的作用显著，同时间的空间叠合值得重视。如唐代大明宫，既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也是文化与艺术的中心。皇帝与百官在此举行早朝议政；王维、贾至、杜甫等文人在早朝之余以诗歌的形式记录大明宫的庄严宏伟，并融入对国家兴衰、人生际遇的深刻思考。唐代文人在同时空下的文学唱和，不仅展现了他们独特的文化追求和情感世界，更体现了政治与文化的深度交融。这种空间叠合的现象，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与文化财富，更为研究唐代历史与文化提供了重要视角。<sup>③</sup>

异时叠合的正向互动，已广受关注。如黄鹤楼意象，承载着无数诗人的深情厚谊与创作灵感。自崔颢写下《黄鹤楼》后，李白踏足此地，虽叹服“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sup>④</sup>但仍创作《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独特方式回应了崔颢的诗意。这种异时空间的叠合，并不局限于黄鹤楼这一方寸之地，更在唐代文学的广阔天地中，展现无尽的魅力与深度。

而异时空间叠合的反向、无互动，可见连州燕喜亭。连州因人口稀疏、城市结构简单，可将城市视为小空间，燕喜亭作为微空间。韩愈作《燕喜亭记》使其闻名，刘禹锡后任连州刺史，在小、微空间形成异时空间叠合现象，但刘却无一字叙及该亭。据韩愈外孙李覈《连山燕喜亭后记》，燕喜亭因韩愈作《燕喜亭记》，“为天下所嘉。”<sup>⑤</sup>刘禹锡的沉默或因韩愈怀疑自己被贬阳山与其有关，而刘禹锡深陷其中，导致二人关系微妙。在连州时二人虽有异时空间叠合，却不是相承，而是相背。<sup>⑥</sup>

① 戴伟华：《刘禹锡“自夔州转历阳”长江行踪及创作发微》，《名作欣赏》2025年第19期。

② 详参戴伟华：《异时空间叠合理论与文学研究创新》（未刊稿）。异时空间叠合理论为笔者长期研究唐代文学的理论总结，异时空间叠合的正面和反面，都具有应用价值。正面是显性的呈现，而反面是隐性的呈现。异时空间叠合，研究有一定的难度，往往是在彼此不相关联的材料中发现其联系。传统史学中的发覆、言人所未言者存在其中。应对兴起的人工智能写作，异时空间叠合理论中的反面、对抗性研究非常重要。

③ 戴伟华：《论杜甫乾元元年创作——〈早朝大明宫〉〈饮中八仙歌〉盛世记忆和现实情感》，《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6期。

④ [元]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02页。

⑤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93页。

⑥ 戴伟华：《刘禹锡与韩愈连州隐事揭秘》，《羊城晚报》2025年4月11日文史哲版。

李白和刘禹锡的金陵诗作，通过大、中、小、微空间的构建，为探讨诗歌的空间叠合背后的情感疏离和原因提供了范例。李白对金陵情有独钟，体现于两个“唯一”：一是称金陵为“吴京”，这一在唐代绝无仅有的用法体现了他对金陵的特殊认知和情感，赋予了金陵别样的历史文化意蕴。《登瓦官阁》：“灵光何足贵，长此镇吴京。”<sup>①</sup>《留别金陵诸公》：“黄旗一扫荡，割壤开吴京。”<sup>②</sup>《鼓吹入朝曲》：“金陵控海浦，渌水带吴京。”<sup>③</sup>《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sup>④</sup>这4首诗写于不同时期，都用了“吴京”。此称源于南朝宋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诗》：“岩险去汉宇，衿卫徙吴京”。李善注云：“言岩险之固，去彼汉宇；衿带周卫，徙此吴京。宋都吴地，故曰吴京也。”<sup>⑤</sup>唐刘知几《史通》云：“故齐府肇建，诵魏都以立宫；代国初迁，写吴京而树阙。故知经始之义，卜揆之功，经百王而不易，无一日而可废也。”<sup>⑥</sup>另外，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云：“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sup>⑦</sup>关涉李白身世之谜恐难以彻底解决，但他自言“本家金陵”应是可信的。“吴京”，这个在旧时代绝少有人用过的词，在新时代，甚至整个唐代，仅李白诗中用过4次，想来必有因由。二是李白曾代拟《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主张迁都金陵。在表中李白力陈：“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肩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图霸迹，隐轸由存。咽喉控带，萦错如绣。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臣又闻汤及盘庚五迁其邑，典谟训诰不以为非。卫文徙居楚丘，风人流咏。伏惟陛下因万人之荡析，乘六合之滂张，去扶风万有一危之近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苟利于物，断在宸衷。”<sup>⑧</sup>迁都金陵这一战略思维在唐人中极为罕见，说明其对金陵都城特质的重视。

李白多次漫游金陵，对金陵景观的熟悉与描写是全方位的，呈现多层次的空间维度：（一）大空间的宏观视野。李白《登瓦官阁》：“晨登瓦官阁，极眺金陵城。钟山对北户，淮水入南荣。漫漫雨花落，嘈嘈天乐鸣。两廊振法鼓，四角吟风筝。杳出霄汉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气灭，地古寒阴生。寥廓云海晚，苍茫宫观平。门余闻阖字，楼识凤凰名。雷作百山动，神扶万榦倾。灵光何足贵，长此镇吴京。”<sup>⑨</sup>诗人登高“极眺”，将钟山、淮水等地理标志与金陵城纳入大空间的宏阔视野，构建天地苍茫的雄浑气象。（二）中空间的城市图景。《鼓吹入朝曲》中“金陵控海浦，渌水带吴京。铙歌列骑吹，飒沓引公卿”，<sup>⑩</sup>描绘金陵作为交通要冲、绿水环绕的格局及车马喧嚣的繁华景象。同时，“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sup>⑪</sup>点明金陵的历史地位，以帝王宅、龙虎盘的意象，赋予金陵城深厚的历史底蕴，展现中空间中繁华与历史交织的独特魅力。（三）小空间的情感寄托。《金陵酒肆留别》里，“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sup>⑫</sup>聚焦酒肆空间，柳树、酒肆、吴姬等元素构成了小空间场景。柳花飘香、吴姬劝酒，将离情别绪寄托于温馨的生活场景。（四）微空间的灵动细节。《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云：“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罗浮麻姑台，此去或未返。遇君蓬池隐，就我石上饭。空言不成欢，强笑惜日晚。绿水向雁门，黄云蔽龙山。叹息两客鸟，徘徊吴越间。共语一执手，留连夜将久。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酒来笑复歌，兴酣乐事

①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9页。

②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九，第870页。

③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一三，第1325页。

④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一五，第1562页。

⑤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昭明文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4页。

⑥ [唐]刘知几著，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110页。

⑦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一七，第1761页。

⑧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一八，第1895页。

⑨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一，第48-49页。

⑩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一三，第1325页。

⑪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八，第744页。

⑫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一，第65页。

多。水影弄月色，清光奈愁何。明晨挂帆席，离恨满沧波。”<sup>①</sup>“绿水”“黄云”“客鸟”等细微的景物构成微空间，以灵动笔触展现金陵自然景色的细微变化，并暗示漂泊心境。李白诗歌中的金陵空间，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宏大画卷，通过大空间的壮阔、中空间的繁华厚重、小空间的细腻温情以及微空间的灵动变幻，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了金陵的风貌。李白通过多层次空间描写，将金陵的自然地理、人文景观与个人情感、历史感悟熔铸一体，赋予其永恒艺术生命，为后世研究唐代金陵的历史文化和李白的创作风格留下了珍贵的文学遗产。

刘禹锡一生宦海沉浮，对历史兴亡有深刻洞察，在《金陵怀古》《金陵五题》等诗中打破空间界限，通过大、中、小、微不同尺度的精妙构建，将金陵城的千年风云与个人的深沉思索熔铸于诗，展现一幅波澜壮阔又细腻入微的历史画卷。(一) 大空间的历史长卷。《金陵怀古》云：“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sup>②</sup>开篇诗人选取冶城、征虏亭、蔡洲、幕府山等极具代表性的地点，将金陵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冶城相传为春秋吴王夫差所筑，是金陵早期文明的开端；征虏亭则在东晋时期作为军事交通要冲，见证无数战事与离别。蔡洲春草年年新绿，幕府山云烟始终缭绕，自然景物的永恒与朝代兴衰形成对比，共同勾勒金陵作为六朝古都历经战火与王朝更替的沧桑历史。(二) 中空间的具象场景。《金陵五题》聚焦于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等具体地点，将大空间中的历史沧桑落实于具体场景。如《石头城》里“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sup>③</sup>群山依旧环绕，江潮依然拍打着城墙，曾经作为东吴及南朝各代都城，素有“虎踞龙盘”之称的石头城如今空空荡荡，唯有寂寞弥漫。群山环绕、江潮拍打勾勒石头城的空间轮廓，将历史变迁的痕迹直观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乌衣巷同样如此。这里曾是东晋王谢两大世家聚居之地，代表着贵族的荣耀与辉煌。“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sup>④</sup>曾经的繁华已被野草与夕阳所取代。朱雀桥与乌衣巷的组合，将昔日的兴盛与如今的衰败并置，让读者能够真切触摸到历史的沧桑巨变。这些中空间的场景，如同历史长卷中的一幅幅插图，将大空间里抽象的历史具象化。(三) 小空间的局部特写。《石头城》中“山围”“潮打”细节描绘。群山环绕，江潮拍打城墙声，在空寂的城中回荡，不仅展现了石头城的地理特征，更传递出历史的厚重与不可抗拒。《乌衣巷》里“野草花”“夕阳斜”衰败意象组合，营造萧瑟、凄凉的氛围，强化历史变迁带来的时空错位感。小空间的描写，让读者得以近距离感受金陵的沧桑与诗人对历史兴衰的深沉感慨。(四) 微空间的点睛之笔。微空间聚焦细微而关键的意象，成为诗歌意境升华的关键。《石头城》中“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sup>⑤</sup>“旧时月”作为金陵城繁华与落寞的见证者，夜深人静时越过残破的女墙洒落空城，时间与空间在此刻交织。这一细节将小空间中的沧桑感推向极致，引发读者对历史的无限遐思。刘禹锡对金陵大、中、小、微空间的精心雕琢，犹如搭建起一座通往历史深处的桥梁。大空间的纵横交错，为金陵的历史变迁勾勒出宏大的背景框架；中空间的具象场景，让抽象的历史变得真实可触；小空间的局部特写，细腻渲染出沧桑的氛围；微空间的点睛意象，则凝聚着跨越时空的哲思。不同层次空间的巧妙融合，生动再现了金陵城跌宕起伏的历史轨迹，也让诗人对朝代更迭、人生无常的喟叹跃然纸上。刘禹锡的金陵诗作凭借独特的空间艺术，超越了单纯的咏史怀古，成为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艺术感染力的经典，历久弥新，启迪后世对历史与人生的思考。

## 二

研究李白、刘禹锡的金陵诗歌时，其空间分析聚焦于两个关键维度。其一，空间可划分性与相对性，空间可按标准分为不同层次，但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各层次之间常存在交叉融合。其二，重点考察二人

①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八，第820页。

②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685页。

③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六，第671页。

④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六，第675页。

⑤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六，第671页。

笔下金陵空间是否存在叠合之处，以此挖掘他们对金陵理解及空间意象运用的异同。

刘禹锡《金陵五题并引》云：“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迥尔生思，欵然有得。它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余四韵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尔。”<sup>①</sup>据《引》，《金陵五题》作于和州刺史任上，曾两次出示，一次示“客”，一次在扬州得到白居易高度评价。查屏球认为，《金陵怀古》诗中所列四个地名与《金陵五题》所言五地不重复，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江令宅、冶城、征虏亭、蔡洲、幕府山，多处都在秦淮河边，基本绕金陵一周。这种空间感与秩序性表明他可能到过现场。《金陵五题》《金陵怀古》中的实景感与空间感，可能就是经过实地考察后获得，并据此对前作加工与修改。序言所述“未游秣陵”仅反映初稿状态。实际上，《金陵五题》从构思到修改再到完善历时约二年，刘禹锡为修改旧作，花了近一个多月时间进行实地考察，获得了真切感受。<sup>②</sup>

李白多次游金陵，刘禹锡则虚、实两次游金陵。二人对金陵的诗意图写在空间维度上存在很大部分的叠合。从大空间来看，二人皆着眼山川形胜，置金陵于宏大的天地背景。李白在《登瓦官阁》里，借“钟山对北户，淮水入南荣”，<sup>③</sup>以钟山与淮水环绕之势，勾勒出金陵雄浑壮阔的大空间格局，彰显其豪迈之气。刘禹锡《金陵五题》初稿创作时虽未亲临金陵，却在和州隔江远眺中，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描绘山峦环绕、江潮拍打的大空间景象。这里的“山”与“潮”，与李白诗中的钟山、淮水类似，均从宏观构建金陵的空间轮廓，为诗歌奠定厚重基调。中空间层面，共同书写金陵城内的诸多历史遗迹与繁华之地。李白在《金陵三首》“金陵控海浦，渌水带吴京。铙歌列骑吹，飒沓引公卿”展现交通枢纽的繁华，又借“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回溯历史底蕴。刘禹锡在《金陵五题》中，“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乌衣巷》）聚焦东晋王谢大族聚居地的今昔；“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台城》）描述台城兴衰。<sup>④</sup>乌衣巷、台城等中空间的典型代表承载历史兴衰的记忆，具象化呈现繁华与沧桑交织。不过，在小空间与微空间上，李白与刘禹锡的诗作存在明显差异。李白的小空间常聚焦生活场景，如《金陵酒肆留别》里的酒肆，“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充满生活气息与细腻情感，借此表达与友人的惜别之情，而刘禹锡的诗作较少纯粹描绘生活场景的小空间。在微空间方面，李白以灵动意象深化情感，像《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里的“绿水”“黄云”“客鸟”，营造苍茫悠远氛围，暗示漂泊心境。刘禹锡的微空间意象则更多围绕历史遗迹展开，如《石头城》里的“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旧时月”见证金陵兴衰，强化历史沧桑感。李白与刘禹锡的金陵诗在大、中空间存在重合，都善于借宏观地理风貌与城中历史遗迹展现金陵，但在小、微空间的处理上各有侧重，通过独特的意象和情感表达，为读者营造出一种跨越时间的相遇，使金陵的历史与现实在诗中相互映照、交融。他们笔下的金陵诗呈现不同的情感基调和艺术风格，共同丰富了金陵题材诗歌的内涵。事实上李白和刘禹锡都有在金陵生活和考察的经历。李白写过“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sup>⑤</sup>长千里近秦淮河。刘禹锡在《金陵五题》的《江令宅》中也提到“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sup>⑥</sup>借秦淮河的依旧碧绿，对比江令宅的兴衰，抒发历史变迁之感。李白有“石头巉岩如虎踞，凌波欲过沧江去。钟山龙盘走势来，秀色

①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六，第671页。

② 查屏球：《刘禹锡〈金陵五题〉与刘、白扬州诗会》，戴伟华主编：《刘禹锡研究》（第四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39-41页。

③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一，第48页。

④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六，第677页。

⑤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一，第61页。

⑥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六，第681页。

横分历阳树”，<sup>①</sup>形容石头城的地势险要。刘禹锡以石头城为主题，“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描绘了石头城的荒凉景象。李白居住久，对金陵非常熟悉，刘禹锡对金陵向往，并游历其间。这些承载历史文化信息的代表性地点是二人诗歌创作的共同素材，在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重合。

刘禹锡的地方叙述有“考、参、为、俟”四字诀，其《历阳书事七十四韵并引》云：“至则考图经，参见事，为之诗，俟采风之夜讽者。”<sup>②</sup>一考图经，二参见事，三为之诗，四俟采风，体现了他认真严谨的态度和系统的创作方法。“考图经”即查阅地理典籍，了解所写之地的山川地理、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等背景信息，为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坚实的依据，增强诗歌真实性和厚重感。“参见事”意味着亲身考察当地实际情况和具体事务，了解民生疾苦、社会风俗、政治治理等问题，通过与当地百姓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心声，目睹社会的种种现象，增强诗歌的现实意义和感染力。在经过考图经和参见事两个前期准备阶段后，刘禹锡才开始“为之诗”。此时，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感受，能够将自己对所写对象的理解、思考和情感融入诗中。他运用自己高超的艺术技巧，对素材进行精心的筛选、组织和加工，通过巧妙的构思、优美的语言、和谐的韵律，将客观事实和主观情感完美结合，创作具有艺术价值的诗歌作品。“俟采风”是指等待采诗官来收集诗歌。在古代，采诗是一种了解民意、观察社会风气的方式。刘禹锡希望自己的诗歌被采诗官收集，一方面反映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广泛传播，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期待自己的诗歌能够上达天听，使统治者了解民情，起政治讽喻和社会批判作用，体现文人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刘禹锡的这一写诗四字诀，从资料收集、实地考察，到创作诗歌，再到期望诗歌发挥社会作用，形成了完整创作流程，展现了刘禹锡对诗歌创作的严肃态度及社会价值的高度重视。《金陵五题》初稿刘禹锡憾于未游秣陵只能“考图经”，定稿则结合了“参见事”的实地修改，卧游与实勘结合成就名篇。四字诀对研究《金陵五题》的空间有导引功能。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sup>③</sup>刘禹锡这一诗句高度概括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的核心意旨。<sup>④</sup>孟浩然凝练道出人事更迭、历史长河奔涌向前的规律，同时将永恒江山与短暂人生并置，凸显出个体在历史时空下的渺小，又借羊祜典故抒发个体功业未就的惆怅，情感真挚深沉。刘禹锡则以“几回”浓缩历史兴衰循环，将朝代更迭的伤痛尽数纳入，以“山形依旧”这一不变的自然景观与变动的人事作比，以具纵深感的笔触将孟诗中个体登临的喟叹，升华为对历史沧桑的整体观照，是对孟浩然诗歌核心意旨的精炼概括与诗意升华。

### 三

在金陵这一特殊的地理空间中，李白与刘禹锡的文学创作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异时空间叠合现象。李白笔下的金陵是“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的繁华消散之地，<sup>⑤</sup>以浪漫笔触勾勒历史兴衰的苍茫。刘禹锡身处金陵时同样以历史兴亡为主题，写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等千古名句。然而，与空间叠合可能引发的文学传承预期相反，刘禹锡在金陵创作时有意回避李白诗歌所营造的空间意象。这种回避导致本应产生文学呼应与传承的空间叠合，最终呈现近乎割裂的状态。

刘禹锡秉持“一考图经，二参见事，三为之诗，四俟采风”的严谨创作态度，必然熟知金陵的历史典故、风土人情，不可能不知晓李白的金陵诗篇。但细察其现存与金陵相关的诗作，找不到任何呼应李白诗歌空间的痕迹，既未引用李白笔下的意象，也未回应其观点，甚至有意规避其描写对象，这种刻意的忽视，构成了异时空间叠合中显著的“对抗性”表现。这种现象背后，或许源于刘禹锡独特的文学追

①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八，第753页。

②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六，第590页。

③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五，第565-566页。

④ [唐]孟浩然撰，李景白校注：《孟浩然诗集校注》卷三，第231页。

⑤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八，第757页。

求与创作理念。他力图摆脱前人影响，在金陵这一充满历史底蕴的空间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路径。相较于李白浪漫飘逸的诗风，刘禹锡更倾向于以冷峻视角审视历史，通过对金陵古迹的重新解读传递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思考。他不愿被李白的诗歌空间束缚，希望凭借自身的艺术创造力，构建独具特色的金陵文学图景，在文学史上留下独特印记。这种有意的回避与忽视，体现了异时空间叠合理论中文学传承与变异的复杂性，彰显个体追求创新与突破的强烈诉求。

从单篇作品看，规避现象仍然存在。例一，刘禹锡《晚泊牛渚》诗云：“芦苇晚风起，秋江鱗甲生。残霞忽改色，远雁有余声。戍鼓音响绝，渔家灯火明。无人能咏史，独自月中行。”<sup>①</sup>其中“无人能咏史”用袁宏《咏史》典故。《世说新语》载：“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sup>②</sup>李白有《夜泊牛渚怀古》，诗云：“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sup>③</sup>诗中“斯人”指袁宏。袁宏《咏史》——李白《夜泊牛渚怀古》——刘禹锡《晚泊牛渚》，构成了一条聚集于咏史的传播链，但刘禹锡诗中了无李白夜泊牛渚怀古的痕迹。刘禹锡是否读到李白诗？如读过，为何故意回避？从地理空间与历史脉络来看，牛渚作为重要津渡，承载着秦始皇东巡、谢尚遇袁宏、温峤燃犀等典故，是文人墨客怀古抒情的经典场域。李白以“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追忆袁宏遇知音的往事，将个人怀才不遇的怅惘寄寓于牛渚的江月之中；刘禹锡晚泊牛渚时，虽同样提及袁宏咏史典故，发出“无人能咏史，独自月中行”的慨叹，却刻意回避李白诗中“青天无片云”的清朗意境与“枫叶落纷纷”的萧索意象，转而描绘“芦苇晚风起，秋江鱗甲生”的动态画面，“戍鼓音响绝，渔家灯火明”的静谧氛围，围绕自身观察与历史思考展开，构建独立于李白情感范式之外，属于自己的历史叙事逻辑。这种回避是中唐诗人求新意识与“诗豪”身份之下，在文学创作中主动选择的“对抗性策略”，既显示其对文学独创性的追求，也折射出中唐文人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的集体心态。

例二，九华山原名九子山，改为九华山是李白的杰作，<sup>④</sup>亦为后世认可。但刘禹锡《九华山歌并引》云：“九华山在池州青阳县西南……惜其地偏且远，不为世所称，故歌以大之。奇峰一见惊魂魄，思想洪炉始开辟。疑是九龙夭矫欲攀天，忽逢霹雳一声化为石。不然何至今，悠悠亿万年，气势不死如腾岱。云含幽兮月添冷，日凝辉兮江漾影。结根不得要路津，迥秀长在无人境。轩皇封禅登云亭，大禹会计临东溟。乘櫂不来广乐绝，独与猿鸟愁青荧。君不见敬亭之山黄索漠，兀如断岸无稜角。宣城谢守一首诗，遂使声名齐五岳。九华山，九华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籍甚乎人间？”<sup>⑤</sup>刘禹锡《九华山歌》写作意图在《引》中讲得很清楚，有感而发，“惜其地偏且远，不为世所称”，应有自况之意。诗中绝口不提李白为九华山更名并题咏的关键事实，反而引用谢朓曾为宣城太守，作《游敬亭山》使敬亭山扬名的事例，<sup>⑥</sup>以此隐喻九华山同样具备因诗显名的潜质。九华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境内，距离青阳县城 20 公里，而敬亭山位于宣城市北郊，九华山与敬亭山并非一山，为何刘禹锡在咏九华山诗中插入谢朓一首咏敬亭山的诗？李白游敬亭山，写下《独坐敬亭山》诗，而这在刘诗中也未见踪影。此诗不能解之一，刘禹锡忽视了李白改九子山为九华山，并有诗作事；不能解之二，咏九华山，为何用谢朓咏敬亭山诗来说事。

刘禹锡《九华山歌并引》在空间意象与文学传承层面的“反常”表现，与《晚泊牛渚》形成互

①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五，第 582-583 页。

② 周兴陆辑著：《世说新语江校注汇评》卷上之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年，第 465 页。

③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四，第 327 页。

④ 《九华山录》：“此山奇秀，高出云表，峰峦异状，其数有九，故号九子山焉。李白因游九子，睹其山秀异，遂更号曰九华。”金涛声、朱文彩编：《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86 页。

⑤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五，第 577-578 页。

⑥ [南朝齐]谢朓撰，曹融南校注：《谢朓集校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238 页。

文性关联，共同构建其文学创作对李白的刻意疏离与自我建构的深层逻辑。从文学创新的角度看，刘禹锡刻意避开李白的九华山诗，本质上是对文学“先在权威”的主动突围。中唐时期，诗坛求变之风盛行，李白的浪漫主义高峰令后世诗人既向往又忌惮。若刘禹锡在九华山诗中呼应李白，难免陷入“拾人牙慧”的创作困境，他选择以谢朓《游敬亭山》的典故替代李白的九华山书写，实则是以“他山之石”重构文学话语——通过谢朓诗歌对敬亭山的“点石成金”，巧妙避开与李白直接对话，另辟蹊径建立独特的审美体系。这种“迂回式”创作策略，展现出刘禹锡对文学独创性的执着追求。从自我投射的角度分析，刘禹锡以九华山“结根不得要路津，迥秀长在无人境”映射自身怀才不遇。用谢朓典故，并非偶然。谢朓作为南朝文人，虽仕途起伏却以诗名传世，借谢朓对敬亭山的“拯救”，暗含对自身文学价值终将被认可的期许，同时也暗含对李白“改山名”影响力的微妙挑战——李白能赋予九华山新名，而刘禹锡则试图以诗歌赋予九华山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完成对这一空间的文学重塑。从空间叙事的角度解读，刘禹锡通过并置九华山与敬亭山，打破了地理空间的物理界限，构建独特的文化地理图谱。在他的诗中，两座山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实体，而是成为承载文学理想与个体情怀的符号。通过将谢朓与敬亭山的文学神话移植到九华山的语境中，刘禹锡创造出一种跨空间的文学对话，这种对话表面上是对谢朓的致敬，实则是对李白文学霸权的隐性抵抗。刘禹锡在《九华山歌并引》中的创作选择，与《晚泊牛渚》的“回避策略”一脉相承，均体现出其在异时空间叠合中的主动姿态。

刘禹锡在采石矶与李白空间相遇，无一点想起李白的痕迹。刘禹锡的知音白居易也很少言及李白，他在《与元九书》将李白视为“不及一命，穷悴终身”<sup>①</sup>的诗人命运多舛典型。在《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嗟叹：“每叹陈夫子（原注：陈子昂著《感遇诗》称于世），常嗟李谪仙（原注：贺知章谓李白为谪仙人）。名高折人爵，思苦减天年（原注：李竟无官，陈亦早夭）。不得当时遇，空令后代怜。”<sup>②</sup>白居易有《李白墓》诗一首，一般系于元和十三年（818）江州时期作。诗云：“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sup>③</sup>白居易应该没有到过采石矶，《李白墓》只是怀想之作。白居易未去李白墓而有诗，刘禹锡经过采石矶而无诗。不过，白诗也只是同情李白的命运穷悴，“嗟”“怜”而已。可以说，刘禹锡在《九华山歌并引》和《晚泊牛渚》中，本该自然引起自己关注的李白及其诗作，却只字未及，视而不见，这是有意为之。他拒绝成为李白文学传统的被动继承者，而是通过对典故的创造性活用、对自我境遇的隐喻表达以及对空间叙事的重构，在李白巨大文学影响力下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创作天地。

#### 四

中唐人的盛唐视域是一个值得多层面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韩愈的《调张籍》是中唐文人审视盛唐文学遗产的重要文献，其诗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鲜明展现了中唐人对盛唐重要作家的态度，以强烈情感和生动比喻，盛赞李白、杜甫的文学成就，同时严厉斥责那些诋毁李、杜的人。从诗中“群儿”的表述来看，韩愈所指的诋毁者并非个别人，而是具有一定规模，反映了中唐时期对盛唐作家评价的复杂性。此诗成为探究中唐时期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生态以及中唐人对盛唐文化传承与反思的重要切入点。

《诗人玉屑》认为韩愈此诗针对元稹“李杜优劣论，先杜而后李”。<sup>④</sup>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推崇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而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sup>⑤</sup>元稹的推崇提升了杜甫的地位，但

①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6页。

②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39-1340页。

③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一七，第1383页。

④ [宋]魏庆之著，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30页。

⑤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649页。

判断韩愈之言仅限于元稹“李杜优劣论”而发并不确当，需结合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才能理解此期李杜诗评。白《书》元《志》虽有先后，但二人观点相近，元《志》受白《书》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虽肯定李杜为“诗之豪者”，但也指出李白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sup>①</sup>元稹作杜甫墓志基本沿用白居易观点。据元稹所言，他一直想对杜诗“条析其文，体别相附”，给诗界树立标准。既然是定标准，元稹当通览当代诗，不独只读杜诗。就白居易和元稹在此对李、杜二家之评，犯不着韩愈怒斥。既然“时人谓之李杜”“世称李杜”，那么白、元就在推崇李、杜的大前提下，对李、杜略作分别，定其高下。

方世举试图理清楚其事本末，一云：“此诗极称李杜，盖公素所推服者，而其言则有为而发。《旧唐书·白居易传》：元和十年，居易贬江州司马。时元微之在通州，尝与元书，因论作文之大旨云……是李、杜交讥也。元于元和八年作《杜工部墓志铭》云……其尊杜而贬李，亦已甚矣。时其论新出，愈盖闻而深怪之，故为此诗。因元、白之谤伤，而欲与籍参逐翱翔。要之，籍岂能颉颃于公耶？此所以为调也。”<sup>②</sup>二云：“《临汉隐居诗话》：元稹作李、杜优劣论，先杜而后李，韩退之不以为然，曰‘李杜文章在’云云，为微之发也。《后山诗话》：余评李白诗，如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正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竹坡诗话》：元微之作李、杜优劣论，谓太白不能窥杜甫之藩篱，况堂奥乎？唐人未尝有此论，而稹始为之。至退之云云，则不复为优劣矣。洪庆善作《韩文辨证》，著魏道辅之言，谓退之此诗为微之作。微之虽不当自作优劣，然指稹为愚儿，岂退之之意乎？按：群儿兼指当时附和者说，何独蔽罪于元耶？”<sup>③</sup>方世举一云中有“元、白之谤伤”，细按白《书》元《志》，并无“谤伤”之处；二云“群儿兼指当时附和者说，何独蔽罪于元耶”，是明白人的话，虽未必正确，却启发我们思考。如附和元稹的李杜论，也不值得韩愈痛斥为“群儿愚”“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如附和者指白居易也不对，元白观点相通。只有一种可能，当时有“群儿”“谤伤”李、杜，但只是口头议论，而未形成文字。

韩愈论诗亦同于元、白从陈子昂到李、杜的序列，其《荐士》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sup>④</sup>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乐章轻鲍照，碑板笑颜竣。”<sup>⑤</sup>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sup>⑥</sup>在对李、杜的评价与认同方面，元稹、白居易、韩愈三人的观点基本保持一致。后人误读韩愈有关李、杜的论述是针对元稹或元稹与白居易，主要源于对白居易相关书信、元稹墓志文章的理解偏差。实际上，韩愈的相关言论至少从主要方面来看，并非针对元、白二人，甚至都不能说有所旁涉。至此，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浮现：韩愈在其言论中所怒斥的对象究竟是谁？虽无定论，但其怒斥对象至少涵盖了刘禹锡。这为理解中唐时期文人之间的文学观念碰撞、交往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

在唐代诗歌发展历程中，诗人之间存在明显代沟。这种代沟不仅体现在创作风格、审美取向的差异上，更反映在对前代诗人的评价态度中。从盛唐诗人对初唐诗歌的审视，到中唐诗人对盛唐诗歌的评判，都能看到不同时代诗歌观念的碰撞。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诗人普遍对前代诗人谢朓怀有崇敬之情，这与

①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八，第323页。

② [唐]韩愈著，[清]方世举编年笺注，郝润华、丁俊丽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18页。

③ [唐]韩愈著，[清]方世举编年笺注，郝润华、丁俊丽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九，第518-519页。

④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50页。

⑤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一〇，第126页。

⑥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36页。

同一时代中部分人对前一时期诗人的批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杜甫曾怒斥盛唐时期有人嘲笑初唐四杰，韩愈也对中唐人谤伤李白、杜甫的行为予以斥责，这表明在盛唐确实存在一股批评初唐四杰诗歌的声音，而中唐时期也存在批评盛唐李、杜诗歌的倾向。不过，无论是杜甫对初唐四杰的维护，还是韩愈对李、杜的捍卫，其出发点或许并非单纯基于诗学批评本身。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借题发挥的意味，可能蕴含对所处时代诗风的思考，或是在文学流派之争中表明立场，甚至包含个人恩怨，反映出诗歌批评与时代背景、个人因素的复杂交织。

刘禹锡对李、杜的态度呈现显著的规避倾向，其对杜甫的态度与其对李白的回避如出一辙，这或许正是韩愈强调“李杜文章在”背后的潜在因素。夔州本应成为刘禹锡与杜甫创作空间交集的天然场域，但刘禹锡留存的诗作全无对杜甫的任何提及。从大、中、小、微的空间维度考察，无论是描绘夔州整体地域风貌的宏大叙事，还是聚焦特定场景的细微刻画，刘禹锡与杜甫夔州的创作空间均未产生丝毫呼应，形成全方位的“文学规避”现象，这为研究三人的创作视角、地域文化认知以及文学互动关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切口。<sup>①</sup>此规避现象源于刘禹锡与杜甫的创作背景、人生经历的巨大差异。杜甫夔州诗作充满安史之乱后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个人漂泊的悲怆。刘禹锡虽同样身处晚唐复杂的政治环境，但他因参与政治革新失败而多次被贬，辗转各地的经历塑造了他的豁达坚韧。刘禹锡在夔州的创作，题材广泛，既有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索，也有对地方风土人情的生动描绘，其作品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杜甫在夔州的心境和创作着眼点大相径庭。这一巨大差异深刻影响了刘禹锡与杜甫对夔州空间的感知与表达。杜甫以悲怆之笔勾勒出夔州的苍凉与苦难，而刘禹锡则以豁达视角展现夔州的别样风情，二者截然不同的创作风貌，使得他们在夔州的诗歌创作中难以产生共鸣，加剧了刘禹锡在空间呈现的刻意疏离。

从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可知当时李、杜诗集已在诗人中流传，讨论刘禹锡对李白诗的接受时，基本上可排除刘禹锡没有读到李白诗的可能。中唐文人对盛唐文学遗产的接受图景中，刘禹锡与白居易对李白的态度呈现显著差异。刘禹锡在采石矶这一与李白产生异时空间叠合的地点，始终保持着彻底的文学缄默，呈现“在场失语”的独特状态。而白居易虽未曾踏足采石矶，却在《李白墓》中以“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这样饱含悲叹的语句，通过“嗟”“怜”交织的叙事方式，构建起“缺席怜悯”的情感投射。这种“在场失语”与“缺席怜悯”的戏剧性反差，折射出中唐文人面对李白这座文学丰碑时的复杂心态。李白所代表的盛唐浪漫主义高峰，既是中唐诗人向往的精神偶像，也是横亘在他们面前难以突破的创作桎梏。刘禹锡选择以“不写之写”的策略，主动规避李白的文学影响，用静默的姿态捍卫自身创作的独立性。

个人恩怨总会在人物品评或文学批评中表现出来。《刘宾客嘉话录》载：“刘禹锡曰：‘韩十八愈直是太轻薄，谓李二十六程曰：‘某与丞相崔大群同年往还，直是聪明过人。’李曰：‘何处是过人者？’韩曰：‘共愈往还二十余年，不曾共说著文章，此岂不是敏慧过人也？’”<sup>②</sup>方世举云：“《蔡宽夫诗话》：旧说退之子不慧，读‘金根车’，改为‘金银’。然退之《赠张籍》诗所谓‘召令吐所记，解摘了瑟惆’，则不应不识字也。不知诗之所称乃子乎？按：退之止一子，其天资亦或聪颖。观《孟郊集》有《喜符郎》诗，有《天纵》诗，其略云：‘念符不由级，级得文章阶。偷笔作文章，乞墨潜磨揩。幸当禁止之，勿使恣狂怀。’则‘金根车’之改‘金银’，或未足信。且其事出《刘梦得嘉话录》，刘与昌黎之交不终，得毋爱憎之口耶！”<sup>③</sup>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以凝练而饱含深情的笔触，追忆与韩愈的深厚情谊及学术交往：“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时

<sup>①</sup> 参戴伟华：《刘禹锡与杜甫夔州异时空间叠合论》（未刊稿）。

<sup>②</sup>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附录一，第2262页。

<sup>③</sup> [唐]韩愈著，[清]方世举编年笺注，郝润华、丁俊丽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九，第517页。

惟子厚，窜言其间，贊詞愉愉，固非顏顏。磅礴上下，羲、农以还。会于有极，服之无言。”<sup>①</sup>这段文字尽显刘禹锡的执着与坦荡。他坦诚道出自己与韩愈、柳宗元的独特关系：韩愈以笔力雄健见长，刘禹锡则精于理论阐发，二人性格鲜明、各抒己见，学术交流时如矛与盾般激烈碰撞；而柳宗元温润谦和，恰似调和剂，巧妙穿梭于两人之间，以温和委婉的言辞调和分歧，使讨论在思想交锋中不失融洽。三人纵论古今，最终在某些观点上达成高度契合。刘禹锡认真严肃而又自省反思，故不能仅以文字之争待之，也可以说借文字喻人生。我们也深感古人在描述或叙述特别的人际关系时，通常比较含蓄，欲说还休。伤痛在心上，从文字中很难读出并了解其全部，有时文字甚至会引发人们误读。

本文以刘禹锡与李白的异时空间叠合为切入点，探讨中唐诗人对盛唐诗歌的接受视域，为唐代诗歌研究提供新视角。研究引入空间理论，阐述异时空间叠合现象及呼应与不呼应两种结果，并强调空间层级划分的重要性及其作为多维度融合的整体。以连州、大明宫、黄鹤楼等地为例，揭示空间叠合在文学创作与历史记忆中的作用。聚焦李白和刘禹锡诗歌的空间叠合，以金陵为典型分析二人诗中金陵的大、中、小、微空间。李白的金陵诗展现金陵风貌并融入个人情感，刘禹锡的金陵诗借空间构建展现历史变迁。二者虽在大、中空间有重合，在小、微空间各有侧重，但都在小、微空间营造出跨越时间相遇的感觉。刘禹锡遵循“考、参、为、俟”诗歌创作四字诀，对《金陵五题》创作意义重大。刘禹锡在金陵创作时刻意回避李白诗歌的空间意象，在《晚泊牛渚》《九华山歌并引》等诗中也有体现。他对文学独创性的追求与创作理念，折射出中唐文人在传统与创新间寻求平衡的心态。探讨韩愈《调张籍》中“群儿”的指向，刘禹锡至少是潜在对象之一。刘禹锡对杜甫同样存在规避倾向，其与杜甫在夔州创作空间无呼应，这与他们的创作背景、人生经历差异有关。刘禹锡与白居易对李白的态度不同，分别呈现“在场失语”与“缺席怜悯”，反映中唐文人面对李白这一文学丰碑的复杂心态。通过对刘禹锡与李白诗歌的研究，揭示中唐诗人眼中的盛唐诗视域，展现其突破创新的艺术追求与时代使命感，呈现唐代诗歌发展中诗人复杂的关系，以及诗歌批评与时代背景、个人诉求的交织。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文人对前代人的态度复杂微妙，他们对前代人的喜欢或不喜欢，未必源于明确的关系，有时仅基于自身的生活习惯、个性特点，或是代际之间的差异，又或是夹杂着个人恩怨，进而影响对前人文化遗产的态度及传承方式。

责任编辑：刘青

---

<sup>①</sup>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一六，第1844页。

# 文人化的独径：论《聊斋志异》中个人意趣对志怪传统的重塑<sup>\*</sup>

王 昝

**[摘要]**清代小说迈入了文人独创的时代，对文人独创的研究不应止于自传、自寓，作者个性化的表达对小说世界的改变也是重要表现。蒲松龄将诗人气质、平民视角和个人意趣灌注在志怪题材当中，使《聊斋志异》在文言小说中独开一境。其文人独创性可以概括为：个人意趣对志怪小说的多方面影响，如幽独意象的形象化、审美感知的情节化等；个人视角对文本建构的作用，如对凡人命运的关切、欲望化的志怪书写、个人情感对文本的左右；主观的叙事立场对传统抒情题材的修正。《聊斋志异》的独创性为个人的、边缘化的审美感受提炼了叙事构架，赋予个人的想象和意绪以新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清代小说 文人独创 《聊斋志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8-0153-07

清代小说进入了完全的文人独创时代，文人化的核心在于作者的内在世界在作品中隐然可见，这使得清代小说逐渐脱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那种雄浑多元、旨深义广却彼此消解的道德化主旨。在清代杰出作品中，小说家高度个性化的意念、语言、想象和表达方式，无论显豁或潜隐，都独具一格、难以替代，这正是文人独创小说带来的新特质。文人独创不仅是清代小说研究的关键词，更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与视野。

清代小说的文人独创路径，在于集成与融合多种文学传统，主要体现在小说文体的渗透、创作手法的多样、抒情性的增强以及作者个体的凸显。具体而言，一是文体的高度融合。小说本就是综合性文类，清代文人化最突出的表现是集各类文体之大成。如《红楼梦》融汇诗、赋、词、散曲、哀祭文、骈体文乃至联额、偈语、书启、灯谜、酒令等，堪称“文备众体”。《聊斋志异》五百余篇故事，虽可分为“花妖狐魅”“畸人异行”和“轶事琐闻”三类，实则整合了传奇、志怪与文人笔记等文体类型。这已超越纪昀所指责的“一书兼二体”，<sup>①</sup>而可谓“一书兼数体”。<sup>②</sup>二是文本内在一致性的增强。《红楼梦》能够区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境界的差异，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成于众手的作品则难以做到。这种倾向是小说从听书转向纸上阅读、从世代累积转向文人独创的必然结果。三是作者个体的凸显。作者的经历、见解、情感成为文本中清晰可寻的印记。这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中，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代‘子部小说’序跋著录整理与文类观念演变研究”(23BZW0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① [清]盛时彦：《姑妄听之跋》，[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72页。

② 万晴川：《〈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新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表现为某种明显的“自传性”；<sup>①</sup>而在李百川《绿野仙踪》、夏敬渠《野叟曝言》、屠绅《蟫史》等小说中则表现为一厢情愿地以盖世英雄自比的“自况性”<sup>②</sup>等。文言小说的文人独创路径与白话小说有所不同。早在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以元明之际的战乱纪实、文人罹祸和儿女情恋（人鬼恋）为主题”，在其故事情节与话语方式中已初显文人意趣的独创性。<sup>③</sup>然此种探索在明代未能激起广泛回响。直至清初，蒲松龄才接续瞿佑，以《聊斋志异》开启文言小说独创路径的深入探索。在“以传奇法而志怪”的写作手法创新的同时，凭借独特的个人视角，极大地丰富了神怪世界的表现力。在其之前，除瞿佑《剪灯新话》外，读者很难在《贾云华还魂记》《负情依传》一类明代传奇小说中，觉察到处处隐现的作者个人。

## 一、个人意趣化的志怪世界

《聊斋志异》的故事浸透着蒲松龄强烈的主观色彩。他将个人的观察、想象与文学才华倾注于志怪小说，开创了不同于历代文言小说的新质。文言小说的创作与流传多囿于读书人群体，其题材、人物与书写方式均遵循古代小说最普遍的审美准则——“奇”与“怪”。无论是“传奇”还是“志怪”，抑或白话、文言，“事奇人异”——情节与人物非同寻常——乃小说共通的审美旨趣。唐宋传奇多以才子佳人细腻凄婉的爱情为主，多为单篇行世，难以窥见作者整体的精神世界；志怪小说则侧重民间传说与怪异事件，其粗陈梗概的文体形式，折射出士大夫的博物、考据等学术趣味。无论是《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传奇，还是《搜神记》《夷坚志》《阅微草堂笔记》等志怪，其知识背景与意识形态话语逻辑均属上层知识分子。而蒲松龄却在神异世界中融入了前所未有的个人印记，使神怪世界化身为认知与想象的载体。他极大地拓宽并丰富了小说的表现领域，深化了对人性的探索与发掘，使《聊斋志异》呈现出与以往志怪、传奇迥异的面貌。

（一）微观叙事与幽峭意境：个人审美意趣的投射。蒲松龄对细微之物有着异乎寻常的体察与感知能力。这些微末之物常具短暂易逝、轻盈柔弱的特性。古典诗词中，萤火、促织、风花竹石、废畦空囊等皆可入诗，承载着诗人精微的情致与爱怜，抚慰其用世情怀，亦见其细腻的观察表现力（如王维“青虫飞网户，暮雀隐花枝”、贾岛“穴蚁苔痕静，藏蝉柏叶稠”）。蒲松龄将这种对微观世界的诗意图捕捉引入小说创作，并深受晚明思潮，尤其是竟陵派“幽峭”文风的影响。他曾编纂刘侗和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为《帝京景物选略》，并撰《小引》赞其“字为读，句为折；无读不峭，无折不幽”，“幽幽曲曲，渺渺冥冥，一步一折，一折一形”的风格。这种幽峭的笔墨，来自细致的观察、精细的刻画：“凌波微步，步每不咫，一咫一莲生，步步迹，咫印，细珊瑚，香尘满，几乎坐绣而行锦矣。”<sup>④</sup>《聊斋志异》中幽冥之境的营造，正深得此种幽峭意境之精髓。如《连琐》中杨于畏居所“墙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声如涛涌”，女鬼连琐“珊瑚自草中出，手扶小树，低首哀吟”，寥寥数笔，阴幽氛围立刻扑面而来；<sup>⑤</sup>类似《婴宁》中“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sup>⑥</sup>的描写，亦被冯镇峦赞为“点缀小景如画”。<sup>⑦</sup>这种对幽微景致的敏感捕捉，源自蒲松龄内心的细腻感受，契合其“咫印，细珊瑚”，“坐绣而行锦”的审美追求。蒲松龄与竟陵派对“幽独”的共鸣，植根于晚明以来士人不屈俗流的自我定位。谭元春所谓“人有孤怀，有孤诣”，<sup>⑧</sup>钟惺追求的“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sup>⑨</sup>强调唯有境取幽独、书写孤旷，方能

<sup>①</sup> 清人金和云《儒林外史》“杜少卿乃先生自况”；脂砚斋评《石头记》多有揭示其具“自寓”性质的内容，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更提出了著名的“自传说”。

<sup>②</sup> 参见王进驹：《乾隆时期自况性长篇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sup>③</sup> [美]孙康宜：《文章憎命达：再议瞿佑及其〈剪灯新话〉的遭遇》，《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sup>④</sup> [清]蒲松龄：《〈帝京景物选略〉小引》，《蒲松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3页。

<sup>⑤</sup>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31页。

<sup>⑥</sup>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149页。

<sup>⑦</sup> [清]冯镇峦评：《狐嫁女》，[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53页。

<sup>⑧</sup> [明]谭元春：《诗归序》，吴调公主编：《竟陵派钟惺谭元春选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7页。

<sup>⑨</sup> [明]钟惺：《诗归序》，吴调公主编：《竟陵派钟惺谭元春选集》，第118页。

传达独特的孤怀孤诣，摆脱公共话语桎梏。《聊斋志异》中大量幽寂孤独的意境书写，正是这种个体精神的体现。蒲松龄推崇精微绵密的笔法，正如他在《〈帝京景物选略〉小引》中所言，要效法赵子昂画树，化身为梗叶之微，“写花则便须蕊，写山若水，则又丘壑影、细浪纹也”。<sup>①</sup>这种对微观世界的专注，在《聊斋志异》中化为绿蜂（《绿衣女》）、蜂子（《莲花公主》）等细小精灵的生动描摹，具有“一种幽微之景，悉领之于恬退之情”的审美涵盖力。

蒲松龄对细微之物的神奇想象，不仅是在“短篇中具赋物之妙”，<sup>②</sup>更在于他能从平凡事物中开拓幻境。《小猎犬》中，书生目睹身高二寸许的武士臂架蝇鹰，“盘旋室中”，进而展开一场恢弘而滑稽的微型狩猎图卷，最终仅遗落一只“如巨蚁”的猎犬，并被书生不慎压扁，留下奇幻余韵。<sup>③</sup>此类对微小之物的精灵化书写，其精神内核与杜甫“幽偏得自怡”<sup>④</sup>的审美意境及苏轼诗中“钩帘归乳燕，穴纸出痴蝇”<sup>⑤</sup>的悲悯情怀一脉相承，是唐宋以来私人领域文学书写的延续。在清人看来，优秀诗人必备捕捉幽细之境的能力，比如王夫之推崇陈子昂《春夜别友人》诗，“雄大中饶有幽细，无此则一笨伯”。<sup>⑥</sup>又如清人说杜甫这样大手笔的诗人，偏善状幽微之景，<sup>⑦</sup>可将幽微之景视为诗人情感外化与自怡的载体。

虽前代志怪传奇亦有涉及蚊（《南柯太守传》）、獭、龟、蝼蛄（《搜神记》《夷坚志》）等微小之物，然其形象多不美善，与人类关系亦不友好。唯《聊斋志异》在微末之物的超自然叙事中，成功传递出“幽偏得自怡”的诗意审美，书中微小生灵被高度审美化。绿衣女是一种绿蜂，居然“谈吐间妙解音律”，不但声音动人，歌辞雅致：“树上乌臼鸟，赚奴中夜散。不怨绣鞋湿，只恐郎无伴。”<sup>⑧</sup>甚至能以身拖墨成“谢”字。《莲花公主》中，书生梦醒，听闻“耳畔啼声，嚶嚶未绝，审听之，殊非人声，乃蜂子二三头，飞鸣枕上”。<sup>⑨</sup>见蜂巢被大蛇破坏，蜂群“依依裳袂间，拂之不去”，遂助其重建家园，蜂群“络绎如蝇”前来依附，“滋息更盛”。相较《异闻录》中《淳于棼》的主人公：“旦视其穴，遂失群蚁，莫知所去”的神秘结尾，所引发的“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sup>⑩</sup>的哲理思考，蒲松龄更关注微小生命的生存与栖居。诸如《竹青》《花姑子》《青蛙神》中凡人与乌鸦、獐子、蛙等庶物精灵的婚姻，皆属此类。这种对平凡琐细之物的观察、体验与想象，常被视为想象力的内敛，由宏大神话转向微观奇迹。此转变类似于诗歌史上宋诗的趋于平淡琐细及以俗为雅，这既是清代文言小说文人化的表征，亦为宋元以降平民文学演进之结果。通过将渺小脆弱生灵神怪化，《聊斋志异》开创了书写个人意趣与奇特想象的小说范式（如《小髻》《白于玉》《小官人》《葭中怪》）。《白于玉》中仙人缩至指大，“翩然跨蝉背上，嘲哳而飞，杳入云中”。<sup>⑪</sup>《胡氏》写狐精以草虫为驴、高粱叶为刀、蒿梗为箭与人类作战；《小官人》描绘“马大如蛙，人细于指”<sup>⑫</sup>的小人仪仗队，被派来送礼的小人携着拳头大的包裹，来到床下，行礼如仪，厚着脸皮将主人送来的礼物据为己有，“欣然携之而去”。这些“倏忽来去”的奇幻故事，源于作者于寂寥贫乏中对微小之美的发现与感受，也是唐宋以来文人诗文中私人趣味书写的叙事文学转化。如白居易“花开将尔当夫人”、林逋“梅妻鹤子”，《葛巾》《香玉》《黄英》《荷花三娘子》等篇则将此类诗意图象化，赋予故事以诗意之美，传达出传统抒情言志框架难以容纳的个人化

① [清]蒲松龄：《〈帝京景物选略〉小引》，《蒲松龄集》，第53页。

② [清]但明伦评：《绿衣女》，[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679页。

③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529页。

④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69页。

⑤ 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547页。

⑥ [明]王夫之评选，王学太校点：《唐诗评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86页。

⑦ 清代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中有“老杜五言律，善写幽细之景”。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18页。

⑧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678页。

⑨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676-677页。

⑩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七五《淳于棼》，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15页。

⑪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341页。

⑫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200页。

话题。

综上所述，蒲松龄将对细微之物的神奇想象，转化为传达其独特人生感悟与艺术构思的媒介。这些作品并非民间故事的简单记录，而是其匠心独运的创造。此前志怪小说，无论题材来源如何，其主题、动机、情节多具类型化和稳定性特征。《聊斋志异》此类故事则倾注了对异类与自然物的体察与刻画之个人意趣，成为作者自由表达个人意念与欲望的载体。这种充满个人兴味的观察与结想视角，是解读《聊斋志异》独特魅力的关键线索。

(二) 个人生命体验的深度介入：疾病、孤寂与理想投射。《聊斋志异》深刻烙印着蒲松龄的个人生活经历、情感与想象方式，其鲜明程度为此前身世模糊的小说家所罕见。《聊斋志异》创作的高峰期正值蒲松龄中年，其诗文主调常为病痛书写。“聊斋”故事的“沉冥抑塞，托志幽遐”，<sup>①</sup>有着切实的身体与精神根源。孱弱的体质与敏锐的感知，为其笔下的鬼神荒怪题材注入了一种感官层面的真实性。蒲松龄的《念奴娇·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孝廉》自称：“四十衰同七十者，病骨秋来先觉。”“前身何似？想半生贫贱，不偿业果。”《满庭芳·中元病足不能归》：“最是堪怜此夜，卧榻上有个人存。今宵也，年年作客，冷月笑征魂。……叹躯中痛痒，隔袜常扪。贫病皆由夙业，遭颠跛敢怨天孙？”<sup>②</sup>皆透露出深重的病痛与宿命感。反观小说，《连琐》《连城》《聂小倩》中寒砭肌骨的森森鬼气，通过荒寒萧索的意象，借视觉、听觉、身体感受传达被人遗忘的孤独感。《公孙九娘》《鲁公女》《连城》《伍秋月》中的鬼女，骨软足弱，“随风摇曳，屡欲倾侧”<sup>③</sup>的逼真描述，仿佛源于作者“前世瞿昙枯淡骨，寸怀中元自尘缘浅”（《贺新凉》），“有三分痛，七分痒，万分忧”（《行乡子·忧病》）<sup>④</sup>的身体痛楚体验。与客观志怪的作者不同，蒲松龄的创作是灵与肉共同参与的历程。狐鬼世界因融入了其个人的身体感知而显得格外生动真实，这是单纯记录见闻的志怪作者难以企及的打动人心的原创力量。

蒲松龄塑造花妖狐魅之所以空前成功，与其生活环境的局限及其被激发的超凡想象力密不可分。从人物塑造角度看，蒲松龄对现实中的男性形象及知识女性缺乏深入了解，这使其笔下的女性角色多为虚幻的理想化身。人类与花妖狐魅等异类间的爱情故事，如《黄英》《香玉》《娇娜》《嫦娥》《阿宝》《莲香》《连城》《白秋练》等，是《聊斋志异》最为人称道的“以传奇法而志怪”的代表作。其中女性的共同特点是气质优雅，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像白秋练那样的女子，听到书生夜中吟诗，便暗中潜听，从此一往情深、相思成疾，乃至断绝了饮食和睡眠；如连琐那样在白杨萧萧、声如涛涌的夜中，荒草树下诗思蹇涩、久吟不辍的女鬼，这些风雅女性只能存在于作家的想象之中。这些风雅脱俗、善解人意且倾慕斯文的女性形象，在蒲松龄的现实生活中实难寻觅，故其理想化投射更为强烈，所以“他对孙蕙的一位能吟诗的姬妾——顾青霞，颇有兴趣，很有点感情”。<sup>⑤</sup>如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耶夫曾指出的，蒲松龄娶有一位目不识丁、半未开化，只知操持家务，而绝不希冀源源不断的爱情关注的女人，对他这样的男人来说，把精神之爱诉诸异物，特别富有诱惑力，能使他丰富多彩的个性在对女性的想象中充分发挥，生意盎然。<sup>⑥</sup>正是出于展示个人丰富想象与情趣、表达理想化精神生活的目的，蒲松龄才倾力塑造了这些才情卓越的异类女性形象。

## 二、晚明“求真”思潮与《聊斋志异》的主观性革新

晚明思潮的核心之一在于求“真”，此“真”须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sup>⑦</sup>情绪、欲望、嗜好作为人的本真一面被肯定，自我意识与纵欲观念由此在文学创作中获得合法性。袁中道所倡“任其喜

<sup>①</sup> [清]余集：《聊斋志异序》，[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6页。

<sup>②</sup> [清]蒲松龄：《蒲松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20-721页。

<sup>③</sup>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671-672页。

<sup>④</sup> [清]蒲松龄：《蒲松龄集》，第724页。

<sup>⑤</sup> 袁世硕：《蒲松龄与孙蕙：南游行迹与顾青霞》，《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71页。

<sup>⑥</sup> 参见王薇生：《苏联汉学家评〈聊斋志异〉》，《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

<sup>⑦</sup> [明]袁宏道：《叙小修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88页。

怒之互陈，而未常少有缘饰”，<sup>①</sup>正是此风气的体现。这一思潮深刻影响了小说创作，推动小说家以强烈的主观性构筑文本世界。李渔关于在艺术天地中“出将入相”、无所不能的言论，即为其显例。蒲松龄同样深受浸染，其《聊斋志异》的文本构建呈现鲜明的率性、自适与游戏色彩，比如为满足友人毕怡庵读《青凤》后的神往，他即兴创作《狐梦》；《绛妃》一篇则幻设花神邀约场景，只为展示其酣畅淋漓的讨风神檄文才情。书中诸多娱乐、嘲讽、机趣的戏谑之作，如《毛狐》《潍县狐》《狐谐》《司札吏》《骂鸭》《鸮鸟》《司训》《伏狐》等，虽承袭了“子部小说”中“琐语之属”，如《笑林》《谈谐》《谐史》《笑苑千金》等，所载皆“俳优嘲弄之语”，“盖小说家有此一格”。<sup>②</sup>但蒲松龄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将这种个人化的视角与立场，通过敏锐的感受和观察，与小说的文学性深度结合，从而重塑了传统的志怪世界。

(一) 平民立场与志怪主题的革新。传统志怪小说主题相对固定(如灾异谶应、唤名巫术、离魂、人神遇合等)，作者多以旁观者姿态记录神怪，“粗陈梗概”，情感投入有限。《聊斋志异》虽大部分篇章仍属志怪范畴，蒲松龄却对其主题进行了显著革新：摒弃了灾异谶应、唤名巫术等旧主题，融合创新其他主题，并尤为关键地引入了司马迁“太史公曰”的体例，以“异史氏曰”直接、鲜明地表达其个人立场与情感判断，颠覆了读者对志怪主题的刻板认知。<sup>③</sup>

蒲松龄的个人好恶与强烈的平民立场，是其革新志怪主题的核心动力，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具有鲜明的底层义愤。如《伍秋月》中疾呼“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sup>④</sup>《三生》和《潍县狐》中，“异史氏”判断现在做官的前世应是马、蛇、驴一类“毛角之俦”。<sup>⑤</sup>二是无权势者对社会规则的痛恨。《罗刹海市》借马骥在美丑颠倒国度的遭遇，将传统“殊方异域”的知识性主题转化为辛辣的社会讽刺，发出“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痴之癖，举世一辙。……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sup>⑥</sup>的愤懑控诉。三是个人化的情绪共鸣。《蛇人》称那些落井下石者，不但羞于为人，“亦羞此蛇也已”；<sup>⑦</sup>《镜听》借“异史氏曰”慨叹“贫穷则父母不子”，<sup>⑧</sup>直指世态炎凉。正是源于平民立场，“异史氏曰”的议论被认为不够权威和深刻，议论的内容与正文故事不够吻合，以及节外生枝、篇幅过长，<sup>⑨</sup>但正是这种属于个人的愤激之辞，成为文人独创性的重要表征。蒲松龄的平民视角还深刻修正了传统主题的内涵。《贾奉雉》这个故事就颇有意味。贾奉雉本是心气高傲的书生，因为科场中衡文标准是非颠倒，他不得已拿些鄙冗不可告人的句子连缀成文，居然高中，自感“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真无颜出见同人”，深感耻辱而遁世修仙；后因道心不坚被逐，归家发现物是人非，生活无着，子孙“率陋劣少文”，供食渐缺。为生存计，他不得不违背初衷，忍辱复应科举。功名富贵到手后，方悟“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sup>⑩</sup>相较于《搜神后记》的“丁令威”、《幽明录》的“刘晨阮肇”等超逸的修仙故事，《贾奉雉》融入了庶民的生存困境与凡人的挣扎苦恼，将蒲松龄个人的辛酸经历转化为悠扬仙乐中的现实嘈杂，别开境界。

(二) 神怪女性作为欲望书写的合法化载体。《聊斋志异》的一大特色在于，常以身体关系(尤以“书生遇艳”模式)建构人与外界(历史、异域、自然、幽冥)的联系。书中美丽的女主角身份各异，有历史魂魄(《公孙九娘》《林四娘》)、异域代表(《夜叉国》《仙人岛》)、仙境人物(《翩翩》《嫦娥》)、自然

① [明]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156页。

② [清]纪昀等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917页。

③ 参见马振方：《“异史氏曰”琐议——读〈聊斋志异〉》，《文献》1980年第2期；任孚先：《〈聊斋志异〉“异史氏曰”的思想和艺术》，《文学评论》1985年第2期。

④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672页。

⑤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74页。

⑥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464页。

⑦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47页。

⑧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939页。

⑨ 朱尧：《论〈聊斋志异〉“异史氏曰”思想和艺术上的缺陷》，《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4期。

⑩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1361-1365页。

精灵（《花姑子》《婴宁》《香玉》）、情鬼（《鲁公女》《连琐》《连城》）。她们共同体现了“万物有灵”“万物有情”的情感化模式，赋予故事强烈感染力。蒲松龄着意刻画这些神怪女性的美色与情态：公孙九娘“笑弯秋月，羞晕朝霞，实天人也”；<sup>①</sup>白秋练“病态含娇，秋波自流。……嫣然微笑”；<sup>②</sup>伍秋月“年可十四五，容华端妙”；<sup>③</sup>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sup>④</sup>这些女性形象大都艳色无双，情态缠绵。“好色”既是出自个人的真心，也最能打动人心，这是《聊斋志异》流行的重要原因。晚明以降的尊情适欲观念，为此类书写提供了思想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蒲松龄通过这种私人化的异类婚恋关系，巧妙地探讨了历史、政治、地理、自然等宏大命题。如彼得·盖伊所言，“性与爱是所有经验的起点，是对时代变迁的最原始反映”。<sup>⑤</sup>书写恋情婚姻，既能深入人情幽微，亦可映射各种权力结构。在蒲松龄笔下，历史、异域、自然、鬼魂等抽象概念，皆化为鲜活、美丽、温柔的女性形象，如《娇娜》中的孔生，虽在病痛之中，“望见颜色，顿忘，精神为之一爽”。<sup>⑥</sup>这种情感化的叙事模式，虽不免有感情沉溺之弊，却为陈旧的志怪故事注入了新意，使僵化的形象焕发光彩。

（三）个人情感对文本的支配。清初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明确提出作者在艺术世界中的主宰地位：“上天入地，作佛成仙，无一不随意到，较之南面百城，洵有过焉者矣。”<sup>⑦</sup>这种作者作为文本“独裁者”的观念，本质上是晚明“贵我”意识的体现。蒲松龄的创作正是如此，其个人立场与情感深度左右着情节走向与人物命运。《菱角》写乱离中的家人遇合，菩萨变作老嫗，只为成全胡大成的婚姻；《邢子仪》中穷书生能否极泰来，皆因上天特为眷顾。《聊斋志异》中有很多这类故事，其背后皆是作者情感完全左右文本，天地以万物为刍狗，独钟情于一己耳。纪昀将情感化的表达概括为“怀挟恩怨”“绘画横陈”，<sup>⑧</sup>二知道人总结“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酸辛泪也”。<sup>⑨</sup>这些见解代表了明清评点者的“发愤著书”立场，叙事文本的建构出于作者的一腔孤愤，作者的个人意志则左右了小说文本。

《聊斋志异》虚幻女性的建构，是以穷书生的需求为中心，“她们，或者思考读书人‘出处’等人生哲理，在他们困顿求仕过程中给予帮助，或者以‘理想女性’——贤妻、佳妾、双美共一夫——满足男性中心论需要”；<sup>⑩</sup>在情感天平上，蒲松龄偏爱书生，同情负屈衔冤的底层百姓，为他们安排好运和温情照拂。对不公正的考官（《三生》《司文郎》《何仙》）、瞧不起读书人的势利亲友（《胡四娘》《姊妹易嫁》《陈锡九》《凤仙》）、破坏宗法秩序的悍妇（《官梦弼》《二商》），则以罪罚冥诛发泄他的情绪。诚然，作为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难以容纳宏大背景与恢弘视角，其将情感完全倾注于微末人物与妖法奇遇，视野或有局限。然而，正是这种强烈个人情感对文本的全面支配，使得《聊斋志异》在志怪传统中独树一帜，成为晚明“求真”思潮在小说领域最富个性与感染力的回响。

### 三、传统抒情主题的志怪化演绎

《聊斋志异》的个人化转向，显著体现于蒲松龄以神怪故事承载并转化诗文传统中的核心文学主题。神怪题材不仅为其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独特的表现手段，更成为其抒发个人意绪的有效载体。从“悲士不遇”与“悼亡”这两个源远流长的主题切入，可窥见其融汇传统与个人创造的特质。

①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479页。

②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1483页。

③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668页。

④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60页。

⑤ [美]彼得·盖伊：《感官的教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页。

⑥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60页。

⑦ [清]李渔：《闲情偶寄·音律第三》，《李渔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⑧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68页。

⑨ [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83页。

⑩ 马瑞芳：《〈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文史哲》2000年第4期。

在价值标准单一化的等级社会中，“悲士不遇”成为代代文人反复吟咏的普遍主题。其源头可追溯至战国“贤人失志之赋”，如屈原、荀卿之作，多抒发政治失意后的复杂心绪，常陷入生命虚无的困惑，如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兼具“朝闻夕死”的儒家进取与“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sup>①</sup>的道家超脱。蒲松龄则运用小说这一叙事文体，借助神怪题材的独特优势，赋予“悲士不遇”主题新质。他塑造了黄英、香玉、娇娜、婴宁等化身花妖狐魅的“异类知己”。她们以美好形象与旖旎温情，慰藉下层士人的孤寂失意，极大地丰富了主题的情感内涵与审美体验。志怪小说并不想用事实说服读者，而是用虚假的东西迷惑读者，逐步消除读者的怀疑，让作者和读者在虚构的基础上共同享受心愿得偿的乐趣。而那些鬼书生、狐男子身为鬼魅和异类，竟也有“悲士不遇”的悲慨，与现实社会对照，则传达出更为浩渺的希冀与悲凉。

悼亡主题中的神怪情节，为有限的时空赋予了无限的幻像和复杂的况味。传统悼亡诗（如《诗经·葛生》、潘岳《悼亡诗》、苏轼《江城子》）常依托灵堂、墓地、故居、梦境等意象，抒发天人永隔的刻骨哀伤，情感深厚而纯粹。《聊斋志异》则以鬼故事写悼亡，别具幽深复杂的况味。如《章阿端》戚生因购鬼宅而丧妻，“块然无偶，憭慄自伤”，得到鬼女阿端的青睐，阿端感其情，为他寻找回鬼妻。“生执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二人死生契阔之后再得相聚，“暮以暨晓，惟恐欢尽”。因为鬼妻投生限期将满，夫妻终夜泣涕，托阿端用冥资百万找他鬼代为投生，鬼妻遂得居家中。阿端后得鬼病而亡。三年之后，戚生的鬼妻因他鬼代替投生的事件败露，被责令投胎而去。鬼妻声言“情之所钟，本愿长死，不乐生也。”言讫不动，“面庞形质，渐就澌灭矣”。<sup>②</sup>《聊斋志异》的悼亡主题，虽不如潘岳《悼亡诗》那般辞藻华艳，但传达的情感更为复杂，斯人已亡之痛，物是人非之叹，同样令人怅惘。从先秦不知名的诗人到潘岳、元稹和苏轼，都在悼亡诗词中写出了个人的刻骨哀伤，蒲松龄则将悼亡主题写成了一个看似俗套，又有些艳情的书生、鬼妻和艳鬼的故事，但明伦指出：“内妻外室，新亡故鬼，连床共榻，彻夜尽欢，虽曰刚肠，亦无足取。”章阿端为鬼而复死，诚如冯镇峦的评价：“鬼中之鬼，演成一派鬼话。”<sup>③</sup>小说之叙事需要处理复杂的经验，会把一些相反的情绪和元素混杂，远不如抒情文学那样情感深厚纯粹，但《聊斋志异》中那些热闹的鬼故事，基底却是对寂寞个体的悲悯。

在宋代白话文学兴起后，无论是志怪还是传奇，文言小说的内容和体裁所受的限制都越加突出。“整个文言小说在明末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文言小说的尴尬局面延续到清初终于被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所打破”。<sup>④</sup>蒲松龄以其诗人敏感、平民关切与丰富个人意趣，凭借《聊斋志异》打破僵局。《聊斋志异》的优长不只在于“以传奇法而志怪”。传奇体文辞的优美富艳，叙事婉转详尽，固然改变了志怪之粗陈梗概的局面，但蒲松龄个人因素对文本世界的介入则是更为根本性的原因。他以一个乡间读书人的独特视角和学养，极大拓展了文言小说的表现范围，使之能容纳更广泛的人类经验与浓烈的主观色彩，为个人化、边缘化的审美感受提炼出有效的叙事架构，赋予个人想象与意绪以新生命。因此，《聊斋志异》不仅成功融入清代小说文人独创的潮流，更在其中探索出一条以神怪熔铸诗文传统、以个人意趣激活文体的成功路径，成为文言小说在清代焕发新生并进入小说史演进主流的关键。

责任编辑：刘青

①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0页。

②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627-631页。

③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629页。

④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16页。

# 日本江户“地本”文化视域下的明清小说绘本出版<sup>\*</sup>

吴肖丹

**[摘要]**日本江户后期，明清小说的绘本大量出版，成为继通俗物后中国经典在地化的重要出版物。绘本是文运东渐背景下“地本”文化的产物，并非通俗物的副产品，百余年的发展大致以18、19世纪之交为界，主要以草双纸和读本两类书籍形态呈现。绘本出版与质变的动力来自地本的平民读者群，基础教育和文化消费催生了读者，受白话长篇小说影响的江户后期读本小说培养了读者。以小说家山东京传、曲亭马琴，北尾派、葛饰派、歌川派部分浮世绘画师，书商江户仙鹤堂、大阪群玉堂构成的地本圈子编绘传播绘本，出版过程中流派风格、地域文化、合作竞争等深刻影响了绘本的文图呈现，是探讨文图关系、文本改编不可忽略的生态。

**[关键词]**明清小说 绘本 地本 出版

〔中图分类号〕I207.41；J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8-0160-09

明清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产生了和刻本（训读本）、通俗物（片假名译本），宝历到庆应（1751—1868）百余年间还出版了大量的绘本，书名冠以“绘本”“通俗绘本”“画本”等字样，正文文字是平假名，插图为浮世绘。据笔者统计，这类绘本共有36部，数量和质量在小说域外传播中殊为可观，同时期朝鲜半岛和越南有翻刻本、译本，少见绘本，西欧译本插图数量不多且多翻刻中国、日本版画。以往研究者往往将绘本附于通俗物后讨论，事实上通俗物与绘本属不同的书籍和阅读系统，文言小说有翻刻本、通俗物，却罕见绘本，白话长篇小说仅《水浒传》有翻刻本，一部小说有一种通俗物，却可能有多种绘本，绘本有必要与通俗物区别开来独立讨论。金文京指出，日本保存了不少《三国演义》的明刊本却不像朝鲜一样有翻刻本，是接受了晚明的观念将《三国演义》看作通俗小说而非一般汉籍。<sup>①</sup>编绘成绘本、以江户平民读物“地本”面目呈现的36部明清小说，<sup>②</sup>是在地化的读物，哪些小说被编译成绘本？如何编译？反映了明清小说的接受情况。

明清小说的传播接受，绘本是不可忽略的一环，日本学界如高岛俊男的《水浒传》研究，<sup>③</sup>上田望的《三国演义》研究，<sup>④</sup>铃木重三的绘本美术研究，<sup>⑤</sup>已论及部分经典绘本，尚未系统整理明清小说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日本江户时期中国古典小说图像研究”(23BZW10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肖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420）。

① [韩]金文京：《〈三国演义〉的世界》，邱岭、吴芳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39页。

② 地本意为口语化的出版物，是指江户早期文化较落后的江户地区出版的绘草子、草双纸等书籍，明历、万治间（1655—1661）逐渐发展，享保时期（1716—1736）随着“文运东渐”发展迅猛，包括戏剧、读本等约18类书籍。见[日]中野三敏：《书志学谈义·江户的板本》，东京：岩波书店，2015年，第110页。

③ [日]高岛俊男：《水浒传与日本人：从江户到昭和》，东京：大修馆书店，1991年。

④ [日]上田望：《〈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接受（前篇）——以翻译和插图为中心》，《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室纪要》2006年3月（第9期）。

⑤ [日]铃木重三：《绘本与浮世绘：江户出版文化的考察》，东京：美术出版社，1979年。

绘本，讨论地本文化与小说传播的关系。绘本图文的呈现及接受，实与出版各环节息息相关，从地本文化、读者培养和编绘过程深入绘本这一特殊出版物的生成，可解答小说接受的诸多问题，也可再现小说传播的生动图景。

### 一、草双纸和读本：“文运东渐”背景下的绘本书籍形态及发展

通俗物得名，始于1692—1725年京都、大阪出版《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译本，后扩用于汉籍译本书名，<sup>①</sup>可以说是因明清小说的翻译而有了这类书籍。绘本则是将明清小说编绘成当时已流行的地本，地本是江户（东京）的读物，享保（1716—1736）中期随着“文运东渐”影响京都、大阪并在宝历（1751—1764）末繁荣于三地。<sup>②</sup>绘本或冠以“通俗”二字，但与通俗物实属不同时段不同类别的出版物，通俗物被收入京阪出版大家联合发布的正式出版物目录，如1729年《书籍目录》“通俗书”类收录了19种中国历史小说译本（含《战国策》《水浒传》）。明清小说的绘本主要出版于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不在《书籍目录》登记，对地本进行分类，是明治以后的事。<sup>③</sup>

明清小说有重绘插图的译本见表1《江户时期中国小说绘本书目》。<sup>④</sup>周健强的《江户时期白话小说翻译书目》统计了43部明清小说编译本，<sup>⑤</sup>与表1合并，除去底本非小说的《通俗台湾军谈》《通俗战国策》和文言小说《通俗如意君传》，共有白话小说编译本75部，包括通俗物和绘本。从这些编译本内容和形制上看，绘本区别于通俗物有以下特点：一是插图非绘本独有，但绘本插图形制和风格与通俗物不同，德田武认为通俗军谈不带插画，<sup>⑥</sup>事实上通俗军谈即通俗物如《通俗台湾军谈》有插图。通俗物插图是少量全页式插图穿插于正文，风格典雅，绘本插图采用地本的形制，从每页皆有图、图环绕文逐渐发展到文图分离，风格多样。二是绘本文字用平假名，通俗物用片假名。明治前使用这两种文字的书籍有严格区别，日本书籍用平假名，翻译汉籍用片假名，<sup>⑦</sup>明清小说绘本打破了这个界限，“绘本成为促进广泛接受的契机，也证明其深受好评”，<sup>⑧</sup>成为汉文化的普及读物。三是绘本和通俗本尺寸不同。绘本是半张美浓纸对折装订成约19×13cm的中本，还有约17.5×12cm的小本、约22×17cm的半纸本，<sup>⑨</sup>开本较小，每卷10-40页，通俗物是尺寸约25×18cm的大本，每卷30-90页不等。四是出版情况不同，通俗物由京阪贵族、学院支持的书肆出版，<sup>⑩</sup>绘本始发于江户，后多三地书商联合出版；通俗物翻译者多为汉语学者，绘本多为地本作家；通俗物多见于藩校藏书，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先导读物，<sup>⑪</sup>而绘本为平民读物。按这些区别，表1《明清军谈国姓爷忠义传》《通俗醉菩提》《通俗女仙外史》《绣像通俗金翹传》《通俗如意君传》《通俗明皇后宫传》6书当归入通俗物，故75部明清白话小说编译本中有36部

① [日]中村幸彦：《近世比较文学考》，东京：中央公论社，1981年，第279-284页。当时出版的通俗物按出版时间为序分别是：《通俗三国志》《通俗汉楚军谈》《通俗唐太宗军鉴》《通俗两汉纪事》《通俗列国志吴越军谈》《通俗战国策》《通俗续三国志》《通俗五代军谈》《通俗列国志前编武王军谈》《通俗南北朝军谈》《北魏南梁军谈》《通俗皇明英烈传》《唐玄宗军谈》《通俗列国志前编十二朝军谈》《通俗续后三国志》《明清军谈国姓爷忠义传》《通俗续后三国志续篇》《通俗宋史军谈》《通俗两国志》《通俗台湾军谈》《通俗忠义水浒传》。

② [日]中野三敏：《文运东渐的一个侧面——出版现象面的再整理》，早稻田大学国文学会：《国文学研究》1963年9月。

③ [日]中野三敏：《书志学谈义·江户的板本》，第110页。

④ 出版物类别，结合图书馆注记和出版情况判定；书名以封面为准，仅列初次出版时间及主板元（权）。第5条《通俗三国志》据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封面手写“安永元”注记为1771年。第18条《通俗明皇后宫传》未详底本，参见[日]中村幸彦：《近世比较文学考》，第285页。

⑤ 周健强：《中国古典小说在日本江户时期的流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465-467页。

⑥ [日]德田武：《中国讲史小说与日本通俗军谈》，陆坚、王勇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4页。

⑦ [日]中村幸彦：《近世比较文学考》，第286-287页。

⑧ [日]长尾直茂：《“前期通俗物”小考——以〈通俗三国志〉〈通俗汉楚军谈〉为中心》，《上智大学国文学论集》1991年（第24号）。

⑨ [日]中野三敏：《书志学谈义·江户的板本》，第57-58页。

⑩ 林桂如：《中国讲史小说与大阪所刊通俗军谈》，台湾《故宫学术季刊》2021年第1期。

⑪ [日]江村北海：《授业编》卷二，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天明三年（1783）刊本，第4叶。

表1 江户时期中国小说绘本书目

序号	明清小说	绘本	编译者	绘者	刊刻时间	书坊
1	《定鼎奇闻》	《明清军谈国姓爷忠义传》(读本) 20册19卷	鶴飼石齋	未详	1717	京都田中庄兵卫等2家
2		《绘本国姓爷忠义传》(读本)二编23卷	法桥玉山、山珪士信	法桥玉山	1804—1834	大阪河内屋茂兵卫等11家
3	《三国志演义》	《三国志》(赤本)1卷	羽川珍重	羽川珍重	1721	未详
4		《通俗三国志》(黑本)1卷	鸟居清满	鸟居清满	1760	江戸鱗形屋孙兵卫
5		《通俗三国志》(黑本)10卷	未详	未详	1771	未详
6		《关羽五关破》(青本)3卷	鸟居清满	鸟居清满	1772	江戸村田屋治郎兵卫
7		《孔明赤壁謀》(青本)3卷	鸟居清满	鸟居清满	1772	江戸村田屋治郎兵卫
8		《画本三国志》(读本)10卷	未详	桂宗信	1782	大阪葛城長兵卫等6家
9		《玄德勇武伝》(黄表纸)3卷	重田贞一	重田贞一	1802	未详
10		《三国志》(合卷)3卷	重田贞一	胜川春英	1808	未详
11		《三国志画传》(合卷)十编76卷	重田贞一	歌川国安	1830—1835	江戸鶴屋喜右卫门、山本平吉
12		《绘本三鼎倭孔明》(黄表纸)5卷	睦酒亭老人	北尾重政	1803	江戸西村与八
13		《绘本通俗三国志》(读本) 八编75卷	湖南文山译、 池田东篱亭校	葛饰戴斗二世	1836—1841	大阪河内屋茂兵卫等2家
14		《拔翠三国志》(读本)六编6册	钝亭魯文	歌川芳宗	1857	未详
15	《醉菩提传》	《通俗醉菩提》(读本)5册5卷	三宅嘯山	未详	1759	京都青云馆
16	《金云翫传》	《绣像通俗金翫传》(读本)7册5卷	西田维则	未详	1763	大阪藤屋弥兵卫
17	《肉蒲团》	《绘本肉蒲团》3卷存上下卷	未详	石川丰信	1765	未详
18	未详	《通俗明皇后宮傳》5册5卷	山口輝雄	未详	1771	江戸雁义堂
19	《水浒传》	《水浒画潛覽》3卷	鳥山石燕	鳥山石燕	1777	京都出云寺和泉
20		《梁山一步談》(黄表纸)3卷	山东京传	北尾重政	1792	江戸鶯屋重三郎
21		《天剛垂楊柳》(黄表纸)3卷	山东京传	北尾重政	1792	江戸鶯屋重三郎
22	《水浒传》	《新編水滸画傳》(读本) 九编90卷	曲亭馬琴(初编)、 高井兰山(二至九编)	葛饰北斋	1805—1838	江戸角丸屋甚助等3家(初编)、江戸英平吉等4家(二编)、江戸丁子屋平兵卫等7家(三至七编)、大阪河内屋茂兵卫等11家(八至九编)
23		《稗史水滸傳》(初至六编) 《国字水滸傳》(七至二十编) (合卷)二十编40册80卷	山东京山(初至六编)，柳亭种彦(七至九、十三编)，笠亭仙果(十至十二、十四至十七编)，松亭金水(十八至二十编)	歌川国芳	1829—1851	江戸大黒屋平吉、 鶴屋喜右卫门等6家
24		《绘本水滸傳》(绘本)2册	未详	葛饰北斋	1829	江戸英平吉
25		《绘本水滸傳》2册	未详	溪斋英泉	1829	未详
26		《狂歌水滸画集》1册	石川雅望等	柳川重信	1830	六树园
27		《水滸画傳》(读本)3册3卷	柳水亭种清	葵冈北溪	1856	江戸甘泉堂
28		《肖像水滸銘々傳》(读本)4册存2册	钝亭魯文	歌川国久	1850、1856	江戸文苑堂
29		《绣像水滸銘々傳》(绘本)3册	江境庵花川	月冈芳年	1867	江戸大桥堂
30	《西汉演义传》	《汉楚军談》(黄表纸)5卷	未详	未详	1765	未详
31		《通俗要略楚汉戰》(青本)10卷	未详	未详	1766	江戸鱗形屋孙兵卫
32		《绘本汉楚军談》(读本)10卷	曲亭馬琴	北尾重政	1806	江戸鶴屋喜右卫门
33		《绘本汉楚军談》(读本)10卷	曲亭馬琴	北尾政美	1807	京都額田正三郎等9家
34		《通俗绘本汉楚军談》(读本)20卷	鶴飼貞高	葛饰北斋	1843、1845	江戸丁子屋平兵卫(初编) 山城屋左兵卫等5家(二编)
35		《摘要汉楚军談后編》1册	钝亭魯文	未详	1856	未详
36	《如意君傳》	《通俗如意君傳》(读本)5卷	山口輝雄	未详	1767	江戸小川庄七
37	《女仙外史》	《通俗大明女仙傳》(读本)12卷	三宅嘯山	未详	1789	京都林伊兵卫
38	《西游记》	《通俗画图勢勇談》(绘本)3卷	志水燕十	鳥山石燕	1784	未详
39		《绘本西游記》(读本)四编40册40卷	西田维则(初编)、 山珪士信(二编)、 亭岳丘山(三、四编)	大原东野(初编)、 歌川丰广(二编)、 葛饰北斋(三、四编)	1806—1837	大阪河内屋茂兵卫等10家
40		《西游記图說》1册	未详	月冈芳年	1858	江戸品川屋久助
41	《春秋列国志傳》	《画本武王軍談》(黄表纸)5卷	曲亭馬琴	北尾重政	1806	江戸鶴屋喜右卫门
42		《绘本吴越軍談》(读本)三编30册30卷	清地以立、 池田东篱亭补正	柳川重信二世	1852	大阪河内屋茂兵卫等12家

是绘本，39部是通俗物。

绘本的发展以18、19世纪之交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18世纪后期是草双纸型的节译本零散出版，19世纪前期是合卷、读本型的全译本和画册缩略本有策划地出版。草双纸的“草”有低劣之意，<sup>①</sup>“双纸”含义同草子、册子，按封面纸色和题材不同分类，安永（1772）前流行赤本、黑本、青本，安永至文政间（1772—1829）流行黄表纸，<sup>②</sup>印刷、装订粗糙，纸张单薄，一般为中本、小本或半纸本，仅5卷、10卷或3卷，每卷为5张纸装订成10页，文字书于图像空白处，深受大众欢迎。同时江户后期的长篇读本开始发展，印刷较精美，一般为半纸本，在20卷以上，每卷约30-40页，文图分开，数页文间1双页连式插图，部分卷首有绣像。如《三国演义》从赤本《三国志》、黑本《通俗三国志》发展到黄表纸《关羽五关破》，日渐精详，《绘本三国志》为读本的初期形态。合卷是天宝间（1818—1843）在黄表纸基础上形成卷数为5的倍数的读物，每卷约30页，一般为小本，封面多为精美的锦绘。19世纪读本型绘本成熟，字画兼良，有汉字序跋，牌记精美，出版信息齐全。如《三国演义》有合卷《三国志画传》76卷载到玄德至葭萌关，插图叙事详细，读本《绘本通俗三国志》90卷载完全书，卷首还附有人物绣像，正文约5页文字间1双页连式插图。这一时期还有缩略本或仅有简短文字的绘本，可供赏玩。

以地本的形式出版，书籍形态也影响了明清小说的在地化。首先内容呈现受出版物形制影响，如草双纸每卷仅10页，内容被删改，合卷以图为主，改变了小说的节奏，读本重设章回，影响了叙事重点，基于形制限制对小说内容进行重排、略写、插叙等技术处理也反映了时人对文本结构的接受。其次小说的内涵浸染了地本的文化，充分突出了平民性、娱乐性，如内容上赤本偏向童蒙，黑本偏重历史、歌舞伎及传奇，青本偏重恋爱、怪异、战争，黄表纸则多讽刺时政，宽政后以教训为主，<sup>③</sup>读本强调劝惩、教育，小说编译时也会往相关风格倾斜。随着地本蓬勃发展，绘本在时间和传播圈层上与通俗物前后相继、互相补充，推动明清小说的深入传播接受。

## 二、读者的培养与阅读：百年绘本的出版动因及与通俗物的关系

明清小说传播基本路径是通俗物—中国小说热—通俗物、绘本—二次中国小说热—绘本、锦绘，但从通俗物到绘本的发展并非直线型，绘本百余年间的发展也是跳跃式的，比如18世纪的绘本内容与通俗物、19世纪的绘本关系并不密切。通俗物、绘本虽属不同书籍，但绘本为何不一开始就将通俗物改译加上插图？此途诚经济便捷，19世纪3部改编自通俗物的绘本，池田东篱亭交代编译《绘本通俗三国志》底本是“江南文山子译《三国志》”，曲亭马琴编译《绘本汉楚军谈》也参考了《通俗汉楚军谈》的翻译，《新编水浒画传》二编后是高井兰山据冈岛冠山的通俗物编译，此书再刊本牌记宣传“唐本百回本翻译”，可见读者有获知足本全貌的需求，这是绘本从3卷、10卷本发展到80卷本的动力。但百年间不同辈的读者也可能一直满足于欣赏草双纸类以图为主的简短绘本，正如黄表纸变成合卷叠加卷数，未改叙事结构，绘本演变出特殊的类型——读本，这种有章回结构、图少文多的读物相对草双纸是质的飞跃，其中有其特殊的动因。

回顾通俗物和绘本的出版，有以下现象：一是一部明清白话长篇小说仅有一部通俗物长期流行，但可能有多部风格各异的绘本先后或同时流行。如《水浒传》有10部绘本，《新编水浒画传》艰难启动的二编与《稗史水浒传》《绘本水浒传》等皆于1829年推出，正值水浒热顶峰。绘本应读物形制、趣味变化推陈出新，通俗物却未应时推出新译本。二是通俗物不是绘本产生的直接推动者。从时间看绘本是自发出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小说传入日本时间相近，通俗物分别于1692、1757—1790年出版，首个绘本分别于1721、1772年出现。从内容看绘本并非通俗物加上插图的出版物，文字多有改动，插图风格多变，如《定鼎奇闻》的通俗物插图是绘卷典雅的风格，绘本插图采用中日杂糅的风

① [日]长泽规矩也：《图解和汉印刷史·解说篇》，东京：汲古书院，1976年，第61页。

② [日]铃木重三：《绘本与浮世绘：江户出版文化的考察》，第15页。

③ [日]川瀬一马：《日本书志学用语言辞典》，东京：雄松堂，1982年，第79页。

格。三是通俗物和绘本各有发展规律，通俗物在发展开端就以21部长篇通俗物集中出版达到顶峰，后续发展缓慢且转向中短篇小说，绘本开始出版呈零散自发，至19世纪20年代读本密集策划出版迎来盛况。19世纪两类读物一盛一衰，如当时通俗物仅有《通俗西游记》(1758—1831)，历70载仅译至65回，而《绘本西游记》(1806—1837)起步晚，但30载完结全书。时移世变，读者是两类读本出版变化的根本原因，通俗物的读者量小稳定，绘本的读者量大且变化极大，19世纪长篇绘本大量涌现标志着能够接受足本白话长篇小说的读者群的形成。

绘本的变化缘于读者阅读水平和趣味的飞跃，而读者的培养是由江户后期读本，特别是被称为“稗史”的长篇俗语小说的成熟推动的，稗史则受到明清白话长篇小说的影响。江户的水浒热是享保到宝历间(1716—1762)产生于有识者之间，文政到天保间(1818—1831)扩散到一般读者，<sup>①</sup>在两段热潮间，绘本发展起来，缘于书商“开创一条新的销售路线：在庶民中积极培养新读者”，<sup>②</sup>但在充满《好色一代男》之类讲述町人生活的中短篇读物市场中，白话长篇小说完整传播到平民读者间还需要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结合中日文学交流看，18、19世纪间兴起的江户后期读本，正是直接学习或翻改通俗物的长篇俗语读本，区别于早期读本的显著特点是长篇结构和运用俗语。日本古代长篇小说如《源氏物语》等由很多独立篇章构成，人物、事件之间联系不紧密，<sup>③</sup>江户早期翻改中国文言小说的读本如《伽婢子》等都是短篇，地本的草双纸也是中短篇且章回缺乏有机联系，后期始有学习中国长篇章回小说的读本。“山东京传《忠臣水浒传》1799年出版的前编和1801年刊行的后编被视为前、后期读本的分界，前、后期分别以短篇、长篇为典型”。<sup>④</sup>1749年都贺庭钟的《英草纸》序开始提倡像中国白话小说一样用俗语，1773年建部绫足的《本朝水浒传》学习中国白话长篇小说，<sup>⑤</sup>曲亭马琴将他放在《近世物之本江户作家部类》首位，<sup>⑥</sup>但惋惜他未能用俗语写作，<sup>⑦</sup>直到19世纪山东京传、曲亭马琴提倡俗语并践行于创作，如《八犬传》纯熟使用妇孺野老能读的47个假名，<sup>⑧</sup>后期读本才真正成熟。通俗物影响了江户后期读本的成熟，后期读本的传播又转而培养了读者，促成明清小说读本型绘本的编刊传播。至此，书商才将此前供有识者阅读的通俗物改编成读本，“在文化(1804—1818)盛期迎接作为地本的读本，是以通俗军记和实录等作为直接的母体，谋求进一步的阅读”，<sup>⑨</sup>使绘本发生质变。江户后期读本成为读者接受绘本的桥梁，首先是长篇章回体的连贯结构与人物性格，中村幸彦指出全体首尾一贯呈大纺锤形、插话如小纺锤参与整体情节，前后呼应及使全体情节保持一贯的主要人物性格，是白话长篇小说教授给日本作者的，<sup>⑩</sup>如曲亭马琴模仿中国小说创作并总结了稗史七原则，运用这些结构原则的小说培养了读者。其次是题材情节的改编，“(翻案)十七、十八世纪又成为借用中国白话小说以满足江户市民对新文学渴求的应急手段。在长篇读本中，也有部分穿插中国小说翻案的”。<sup>⑪</sup>读本的改编为读者在日本文本语境熟悉、理解相关题材和情节做好了准备。草双纸仅普及了明清小说的部分情节，读本则与翻改小说交相辉映，推动小说深入传播。

除了接受水平的提高，读者愿阅读、能阅读和能消费也是绘本发展重要的动因。“通俗小说既是精神产品又是文化商品这双重品格的矛盾统一”，<sup>⑫</sup>精神产品对读者的吸引力是首要的，尤其长篇绘本每

① [日]中村幸彦：《近世比较文学考》，第247页。

② [日]今田洋三：《江户的本屋：近世文化史的侧面》，东京：平凡社，2009年，第43页。

③ 勾艳军：《日本近世小说观念研究：兼论其中国文学思想渊源》，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54-255页。

④ [日]大高洋司：《京传与马琴：〈稗史类〉读本样式的形成》，东京：翰林书房，2010年，第5页。

⑤ [日]麻生矶次：《江户文学与中国文学》，东京：三省堂，1976年，第61-62页。

⑥ [日]曲亭马琴：《近世物之本江户作家部类》，东京：岩波书社，2014年，第151页。

⑦ 王晓平：《日本文论》，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92-796页。

⑧ [日]曲亭马琴：《八犬传》(陆)，李树果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98页。

⑨ [日]中野三敏：《书志学谈义·江户的板本》，第115页。

⑩ [日]中村幸彦：《近世小说史》，东京：中央公论社，1979年，第168页。

⑪ 王晓平：《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3页。

⑫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编出版间隔时间很长，如《新编水浒画传》《稗史水浒传》连载数十年，如无旺盛持久的需求难以支持。《水浒传》吸引有识者“如同晴天霹雳，出现在眼前的第一部可以称之为小说的小说”，<sup>①</sup>对通过翻改读本了解部分情节的平民读者吸引力依然强大，1850年松亭金水在《稗史水浒传》序中指出读者关注西洋学，对水浒的兴趣下降，但明治年间，全译绘本仍多次重排石印、铅印本出版，如《新编水浒画传》有12种再刊本。<sup>②</sup>精神产品的产出速度和时机也很重要，江户后期作家笔耕不辍，读本在市场仍供不应求，在翻改读本和戏曲等流行时，绘本的编刊也就顺理成章了。江户后期的基础教育造就了大量能阅读的读者。平民可通过说书、戏曲等方式了解小说，绘本的销量是平民教育和语言文字变化间接推动的。18世纪江户语取代了京阪流行的上方语，以平假名标记汉字，同时市井开设平民学校“寺子屋”，基础教育推行平假名，读写“崩し字”的草书，造就了能读绘本的读者。平假名书籍有庞大的读者群，如1721年官方发布荻生徂徕片假名译解的《六谕衍义》，平民广泛接受的是1722年室鸠巢平假名译解的《六谕衍义大意》。池田东篱亭序言也强调《通俗三国志》久为童蒙史学要书，但“汉字楷书版（通俗本）间巷童子仍或不能读”，书商请他译成“草书”，“仍思童子难读，复使戴斗子图画之，冀使儿童玩其绘而晓其书”。

绘本的纸张、印刷及相应价格也较符合平民消费。江户后期通俗读物印刷量大，成熟的雕版印刷和激烈的出版竞争使廉价的印刷品成为可能。从1715年《增益书籍目录》记载看，汉籍价格昂贵，京阪通俗物价格很高，绘本则在平民能消费的范围，如《三国志》是160目，《绘本故事谈》是16匁（文目），<sup>③</sup>江户后期书价上涨，一册赤本或黑本在1760年约8文目，到1805年约12文目，<sup>④</sup>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曲线一致。<sup>⑤</sup>但一套合卷和读本动辄数十册，总价不低，平民主要通过租借阅读。书商将新刊样本发给各地书肆“地本屋”，根据书肆预定印刷，书肆主要销售对象是租书商“贷本屋”。据1808年官方统计，租书店在江户约656家、大阪约300家。<sup>⑥</sup>租书价格低廉，如1720年租借2.5文目的草子读物《清水物语》的租金为0.15文目。<sup>⑦</sup>租赁商和读者对价格敏感反过来影响绘本的出版，如《浮牡丹全传》因拖稿成本上升，定价太高销售困难，导致出版商破产。

明清小说被编译成通俗物，并不意味着自然而然会被编译成草双纸、读本，曲亭马琴、岳亭丘山等翻改明清小说，并不意味他们会将之编译成绘本，绘本出版、演变的关键是日渐成熟的读者。

### 三 如何编绘：编译者、画师和书商的合作关系与绘本编刊

作家能够且愿意编译绘本，画师熟悉中国题材且能用图像阐释小说，书商组织出版并根据市场反馈对书籍进行调整，是绘本出版的必要条件。江户后期的读物创作界，明清小说绘本的编译者、画师及书商非常特殊，这是一个以作家曲亭马琴、山东京传及北尾派、葛饰派、歌川派等部分画师为中心，19世纪后主要由群玉堂和仙鹤堂主导出版的群体，也是当时地本创作出版的核心群体。据《浮世绘类考》《增补浮世绘类考》等记载的编绘者生平，绘制出表2《绘本编译者、画师关系表》，可见他们之间相对稳定的合作和前后继承的关系。同时编绘者往往兼有作家和画师双重身份，一部绘本的画师可能是其他绘本的编译者，他们的合作与绘本的出版可以说是因缘际会、相互促进。

为什么是这些编译者和画师创作了绘本？他们对绘本有何影响？这一问题关涉编绘者与明清小说的关系、编绘者的师承关系及书商间的地域竞争等。首先是编绘者都受到明清小说的影响，甚至因此成就艺术变革。编译者大多有翻改明清小说的经历，如山东京传、曲亭马琴在翻改、学习基础上成就江户后

① [日]中村幸彦：《近世比较文学考》，第247页。

② [日]高島俊男：《水浒传与日本人：从江户到昭和》，第237-252页。

③ 《增益书籍目录大全》，九州大学中央图书馆藏本。案，正德五年物价飞涨，一石白米约110文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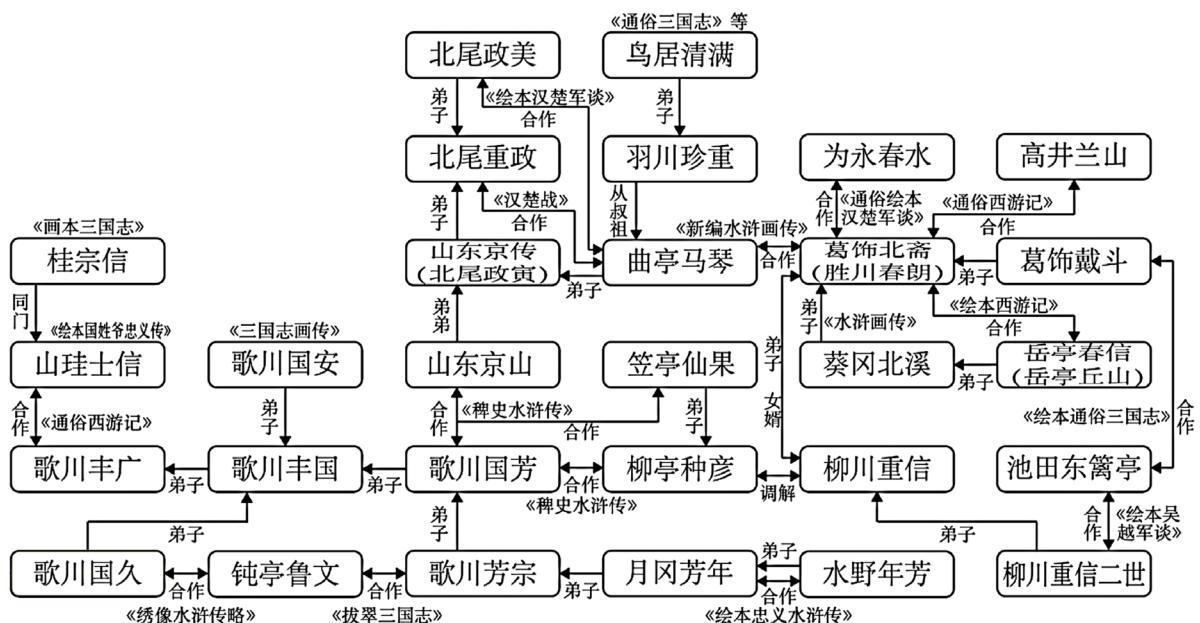
④ [日]上里春生：《江户书籍商史》，东京：时代出版社，1930年，第210页。

⑤ 参见张博：《日本江户时代前期大众文化雏形研究》图表，南开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0页。

⑥ [日]白仓敬彦、田中优子、早川闻多、三桥修：《浮世绘春画阅读（上）》，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第67页。

⑦ [日]长友千代治：《近世贷本屋的研究》，东京：东京堂，1982年，第95页。

表2 绘本编译者、画师关系表



期读本典范，葛饰北斋弟子葵冈北溪曾参加石川雅望组织的水浒狂歌集，他的《水浒画传》能准确把握人物特征。又如北溪的弟子岳亭春信编译《绘本西游记》三、四编，有《俊杰神稻水浒传》，以及三国、水浒题材锦绘，细腻精美。但并非所有作家都能译绘好作品，如高井兰山有翻改读本《三国妖妇传》，但翻译《水浒传》“远不如马琴翻译的”。<sup>①</sup>浮世绘流派各有特色，但仅北尾派、葛饰派、歌川派等部分画师创作明清小说绘本插图，也绘制翻改读本的插图。如马琴和北斋“江户读本二人组”的名气固然是绘本销售的保证，更因他们熟悉中国题材并能完成编绘工作。水浒题材给画师带来了挑战，葛饰北斋和歌川国芳也成就“武者绘”的艺术革新。<sup>②</sup>向上追溯，北斋因邻里关系受北尾重政影响，国芳早年临摹重政、政美的画作，效法北斋，而北尾派较早在插图中融入中国题材和画风。

其次，师友关系是编绘者形成相近译绘风格、得到稿约的原因。最早编绘明清小说绘本赤本《三国志》的羽川珍重出身武家，是马琴的从叔祖。羽川珍重的孙子兼弟子鸟居清满有3部《三国演义》绘本，这一家族与《三国演义》的关系相当密切。马琴的文学引路人是山东京传，他为马琴介绍婚姻、生计。京传是重政的弟子，他的两部水浒题材绘本和《忠臣水浒传》插图皆由重政完成。重政1770年左右始为读物绘制插图，弟子政美1776年也开始绘制插图，<sup>③</sup>像《西汉演义传》两部绘本，师徒同题竞技，难分彼此。<sup>④</sup>歌川丰国的师傅及三位弟子的插图皆融入歌川派役者绘的特色，国芳弟子歌川芳宗有《拔翠三国志》，月冈芳年有《西游记图说》等，皆极夸张之能事。月冈雪鼎弟子桂宗信绘《通俗三国志》，冈田玉山编绘《定鼎奇闻》，典雅细腻。北斋经典的人物造型为子弟所熟习，他数量惊人的四部中国小说绘本插图，部分由弟子代笔，<sup>⑤</sup>他曾因贫穷将葛饰戴斗的名号售与弟子，弟子以名号及师承风格绘《绘本通俗三国志》，难辨真伪，北溪的水浒画册再版被冠以北斋之名，<sup>⑥</sup>他的弟子兼女婿柳川重信的《狂歌水浒画传集》与再传弟子柳川重信二世绘《绘本吴越军谈》画风相近。圈子合作也带来负面结果，如北斋与重信矛盾的调停人柳亭种彦及其弟子笠亭仙果编译了《稗史水浒传》七至十七编，因他不欣赏水浒，

① [日]饭岛虚心:《葛饰北斋传》,东京:岩波书店,2018年,第82-83页。

② 吴肖丹:《水浒题材的浮世绘及其变革》,《学术研究》2023年第4期。

③ [日]田島志一、大村西崖:《日本浮世绘精选集》,赵闻悦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18年,第367页。

④《绘本汉楚军谈》(1807) 横山邦治藏书注记绘者为重政，大高洋司注记为政美。

⑤ [日]饭岛虚心:《葛饰北斋传》,第188页。

⑥《北斋水浒传（竹川藤兵卫刊）的复制版》，东京：北星出版社，1976年。

翻译冗长而毫无波澜起伏，京传弟弟山东京山译《稗史水浒传》前六编，颇遭恶评。

最后书商的经营策划也有其特点，从表1持有绘本主板元（版权）的数量和质量看，大阪群玉堂（河内屋茂兵卫）和江户仙鹤堂（鹤屋喜右卫门）在明清小说出版上很有资源和经验，取得成功且各有特点：一是书籍种类，群玉堂除了绘本，还出版大量汉籍经典，仙鹤堂主要出版地本。二是竞争关系，二者在19世纪常同时推出同题材绘本，若以数量和质量论，群玉堂更胜一筹。三是编译策划，群玉堂多与葛饰派合作，仙鹤堂多与北尾派、歌川派合作。四是合作方式，群玉堂多以相合板（联合出版）持有主板元，比起开板印书，更倾向于投资江户、京都书商的股权稳定经营，<sup>①</sup>手段灵活，仙鹤堂则多独立出版，联合对象仅限江户书商。如《新编水浒画传》初编版权先后属众星阁、万笈堂、文溪堂，终为群玉堂所得。《绘本通俗三国志》则较特殊，群玉堂仅联合拥有通俗物版权的双额堂，策划刊刻绘本。

在绘本成书过程中，出版时间、地域及相关的知识经验、文学传统等影响了绘本的特点。从时间上看，18世纪节译水平风格差异很大，如黄表纸《梁山一步谈》情节跳跃，青本《通俗要略楚汉战》对战事叙述完整，有教育意味。19世纪绘本书商组织策划对文字要求较高，如《稗史水浒传》应市场反馈数次更换编译者。早期插图风格不稳定，或模仿中国插图或沿用日本风格，如两部黑本《通俗三国志》以中日截然不同的人物面目和服饰呈现，考虑读者喜好创新风格，后期插图能较好地融合中日元素，如“（《绘本通俗三国志》）插画场景和构图与以往的作品不同，是河内屋茂兵卫经营的结果”。<sup>②</sup>从地域上看，大阪书商出版汉籍经验丰富，编译详略得当，贴近原著，插图或偏中式或中日杂糅，江户绘本保留了较强的本地特色，编译改变章节和节奏，重视每个人物呈现，削弱情节波澜，插图偏日式风格，如《新编水浒画传》《稗史水浒传》章回、插图差异甚大。

深入到编绘过程，绘本的成书受每个环节影响，这一过程以编译者为中心，包括书商联系编译者、画师、书家、刻工等，编译者提供文字、下绘（插图草图），画师完成板下绘（插图定稿），书家写字，刻工雕版。如黄表纸每页皆有图，“作者的构想可能有一部分在叙述中给出，还有一部分通过插画来表达”，<sup>③</sup>编译者提供文字并设计下绘，要确定插图的内容、构图甚至细节，不少编译者也是画师，确定草图是当行之事。画师绘完插图初稿后返回给编译者审核，经改定方可付梓，出色的编译者和画师为追求完美效果，会指定书家、刻工。

编译者作为绘本创作主导者，与画师的合作过程是复杂的。首先是读者甚至租书店对插图兴趣更大，导致编译者的决定地位未得到充分彰显。虽然是编译者给出下绘，画师协助完成，但插图艺术的优劣会影响销售。“最后的功劳多还是归功于画家”“世上只有少数读者关注文字，更多人喜欢图画，不想再写作”，<sup>④</sup>像马琴自信文本质量，却也曾因插图致《侠客传》滞销发出这样的感慨。1836年北斋说自己着重表现“庶民的跃动感”，<sup>⑤</sup>这种视角无疑能赢得平民的共鸣。其次是因个性、名气的差异导致合作中编、绘主导地位不稳定，创作中双方对作品常有理解差异和磨合调整。好的插图除了能补叙正文，还是正文“余情余意的绘解”，<sup>⑥</sup>这类内涵的增殖有赖画师阐释。同时插图“具有向都市民众传递各类信息的‘媒体’功能”，<sup>⑦</sup>多融入读者感兴趣的事物。如国芳在《稗史水浒传》中融入江户街景和广告，京传则要求插图不能过于中国风致使不够亲民，影响作品售卖。在绘本文图关系、创作意图和插图成就上，编译者的文

① [日] 滨田启介：《近世后期关于大阪书林的趋向——以书林河内屋为中心》，日本近世文学会：《近世文艺》1956年（3号）。

② [日] 渡边由美子：《关于〈绘本通俗三国志〉插画和成立情况》，《文学论藻》1994年第2期。

③ [日] 田岛志一、大村西崖：《日本浮世绘精选集》，第373-374页。

④ [日] 铃木重三：《绘本与浮世绘：江户出版文化的考察》，第40、165页。

⑤ [日] 有木大辅：《唐诗选版本研究》，东京：好文出版社，2013年，第124页。

⑥ [日] 铃木重三：《绘本与浮世绘：江户出版文化的考察》，第163页。

⑦ [日] 辻惟雄：《图说日本美术史》，蔡敦达、邬利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83页。

学主张、画师的艺术表现和他们的合作磨合是必须考量的复杂因素。马琴和北斋几则失和传闻就反映了此间的变数，传闻一是北斋认为马琴作品成功靠的是自己的画作，二是二人对水浒插图有分歧，书商支持北斋致马琴罢笔，三是北斋在插图添加情节所无的野狐，四是北斋不接受马琴下绘的设定。传闻虽不实，但离开了有个性的画师，马琴读本插图难有杰作，《新编水浒画传》编译也逊色不少。马琴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指定下绘的人物、构图，对衣物纹样、回目图案都有细致要求，并指导画师去中国书籍中寻找素材，如让北斋弟子临摹《水浒叶子》备考，他给许多画师带来压力，能顺从要求的柳川重信、歌川丰广等跟他合作较多。北斋也有强烈的个人主张，“不必遵从作者们提供的下绘”，“在绘画时完全保留了创作的权利”，<sup>①</sup>《新编水浒画传》“作者不提供画稿，完全出自画工的主张”。<sup>②</sup>但细究起来，自《新编水浒画传》始，读本卷首方有如水浒叶子般的人物绣像，应是马琴的创设，后为《绘本通俗三国志》《三国志画传》所学习。绘本在印刷环节还受到商业和政策的影响。定稿及印刷效果会因进展、成本等被改动，策划好的册数章节会根据销量重新安排，版权命运又与经济投资挂钩。如马琴《新编水浒画传》序言交代书商为快速出版，让刻工进驻马琴住所，翻译一张便雕刻一张，由于无空检查，导致错漏不少，此书版权几经转手，仅修改了牌记，未修改正文。又如“寽政改革”（1787—1793）禁异学、讽刺文学，令古典军谈、劝惩小说盛行，《通俗三国志》《通俗汉楚军谈》《通俗忠义水浒传》3部通俗物在这一时期编译成绘本实则顺应了这一趋势，当然出版的情况是复杂的，如《绘本西游记》内页广告计划出版《画本通俗两国志》，未见成书。

综上所述，明清小说绘本并非通俗物的副产品，它们与通俗物实属不同类别的图书。现代学界对明清小说进行重译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汉演义传》《西游记》的经典绘本及后来的石印、铅印重排本出版，与《唐诗选画本》《孔子一代记》之类的书籍，成为江户后期至明治普及程度最高的中国文学经典读物。绘本以江户平民熟悉的书籍形态、平假名书写、文图结合方式等实现了在地化，是江户地本文化与明清小说尤其是白话长篇小说碰撞的产物。绘本的形制、读者、出版合作及竞争等，是小说接受史中生动的图景，是探讨文图关系、文本改编不可忽略的生态。

责任编辑：刘青

---

① [日]浅野秀刚：《暮年北斋——他的艺术之思，他的艺术之路》，[英]提摩西·克拉克编：《葛饰北斋·超越巨浪》，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0页。

② 参见[日]高岛俊男：《水浒传与日本人：从江户到昭和》曲亭马琴致殿村篠斋信，第183页。

# 学术史视野下“戏曲选本”的概念生成与跨学科研究<sup>\*</sup>

陈志勇

**[摘要]**戏曲选本的编刻、流通和阅读，是明清剧坛重要的组成部分，反映出戏曲史变迁脉络。审视百年以来的“戏曲选本”研究史，学界存在概念内涵与外延理解的明显分歧，很大程度影响了相关学术成果的产出。重勘概念生成史及其研究范围的模糊地带，有助于从“还原”与“再构”两个层面厘清戏曲选本的边界。以百年学术史的成就启示和存在问题为起点，前瞻戏曲选本的研究进境，则可在深化文献学研究基础上，将“选本现象”与“文本内涵”、中观探讨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兼取戏曲史、书籍史、阅读史、图像学、表演艺术学、文本社会学的多重视野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进步。

**[关键词]**戏曲选本 研究回顾 概念复勘 进境前瞻 方法论思考

**[中图分类号]** I207.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8-0169-08

戏曲选本如诗选、词选、文选相类，其编纂、刊刻与阅读亦是文学传播、批评和知识再生产的重要途径及方式。然而与诗、词、散文及小说选本成为当下古代文学的热点研究领域有所不同，戏曲选本的研究相对趋冷，有影响力和学术含量的成果较少，这一状况固然与该领域研究起步较晚密切相关，但“戏曲选本”概念外延模糊、研究视野不广和研究方法陈旧，很大程度影响了学者涉足的热情和锐气。客观而言，明清时期戏曲选本的数量十分庞大，内容与形态也极为复杂，关联着文学文本、舞台表演、读者接受、商业出版、剧坛变革等多个层面，因此，这些重要文献已超越文学文本范畴，呈现出更广泛的“社会性”和“多义性”，亟需以“跨学科”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开拓新方向与新领域。故而，本文在梳理百年来相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复勘“戏曲选本”概念的生成脉络及其外延边界，剖析当前研究的困境，前瞻研究之进境，贡献方法论的思考成果，以期推动戏曲选本之学术进步。

## 一、“戏曲选本”的概念生成及其外延复勘

允心而论，百年来的“戏曲选本”研究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存在明显不足。首要问题在于概念内涵与外延存在理解分歧，导致研究范围人言人殊。“戏曲选本”是现代学术语境下产物，古人并无这一文本概念，以现代学术概念去判别、择拣相关的历史文献会发现，要么符合定义的文本寥寥无几，要么因为不同学者对“戏曲选本”概念存在认识分歧而导致学术实践难以充分展开。这种概念边界模糊与历史文本形态之间存在的“不适应性”，是当前戏曲选本研究必须正视的核心困境。因此，亟需梳理该概念的演进史，厘清其外延，以明确研究的对象和疆域。

“考词作史”，一个核心概念的形成过程，就是这一领域的学术史；反之，“每一概念所指示现代意义的准确内涵，须通过对其生成、演变、定格的历史过程予以认知，方能真实地把握”。<sup>①</sup>检视20世纪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戏曲选本叙录与珍稀版本集成研究”(23&ZD28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志勇，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① 冯天瑜：《从训诂到历史文化语义学》，《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以来“戏曲选本”的研究史，郑振铎 1923 年最早提出“戏曲集”“戏曲选本”等概念，<sup>①</sup>1927 年更于《中国戏曲的选本》中对“戏曲选本”的含义有清晰的表述，认为戏曲选本是选录“戏曲”的选集，其标准是以“一出”为单位选录，而非“一个曲调”为单位，强调戏曲选本的“摘锦”意义。<sup>②</sup>郑振铎以“选剧出”而非“选只曲”为标准来界定“戏曲选本”，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曲选与曲谱的界限。之后，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 1930 年成书的《支那近世戏曲史》附录三“曲学书目举要”中，称《醉怡情》《缀白裘》等书为“戏曲散出散曲总集”，<sup>③</sup>这是对戏曲选本的特别称谓。1942 年傅芸子在《释滚调》一文中多次使用“青阳调曲选”“青阳曲选”或“曲选”等词汇，<sup>④</sup>次年发表的《内阁文库读曲续记》则多次使用“选集”一词。<sup>⑤</sup>20 世纪 50 年代初，叶德均在《明代南戏五大腔调及其支流》《秋夜月中罕见剧名考》等论文中明确使用“戏曲选本”一词指称《词林一枝》《大明春》等书。<sup>⑥</sup>同一时期，王古鲁利用日本内阁文库藏的《词林一枝》等曲选撰写《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1956)一书，采用“戏曲散出总集”的概念。<sup>⑦</sup>这一概念应来源于他翻译《中国近世戏曲史》时沿用作者青木正儿“戏曲散出散曲总集”<sup>⑧</sup>的提法，更强调戏曲选本的“散出”性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更加重视对这些书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如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1995)在“戏剧选本解题”中，提出“戏剧选本”概念，其外延包括 3 类：戏曲剧本集、戏曲剧本单出选集和戏曲散曲(俗曲)选集。<sup>⑨</sup>随后，赵山林指导朱崇志以“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2004)，朱氏对“戏曲选本”的概念作了更为周延的界定：“戏曲选本，是指戏曲选家根据一定的意图、依据一定的编选原则和编选体例，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戏曲作品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单剧、单出或单曲汇聚而成的作品集。在外在形式上，戏曲选本表现为剧选、出选、曲选三种形态；而在内层价值上，它则分别具有清读、清唱、表演的功能。”<sup>⑩</sup>这一概念的界定显然是充分吸收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产物，代表当时学界的思考成果。

然而，现有“戏曲选本”定义仍显著存在现代学术概念与历史文本形态的“不对应”：其一，若“剧选”也归于戏曲选本，《元曲选》《六十种曲》等究竟是“全集”还是“选集”(选本)？其二，明清时期既选录戏曲又选收散曲、民歌小调、小说甚至历史、地理等江湖知识的选本，如何判定其是否属于“戏曲选本”？其三，面对“选”的动态编辑过程和静态文本形态，如何区分曲选与曲谱的界限？这些矛盾凸显中国古代戏曲选本文献形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多样化的文本面貌使此概念产生了“模糊地带”。现代学术对“戏曲选本”的认知，很大程度是基于《缀白裘》等书的选录散出、曲段文本样貌的认知建构起来的，而以《缀白裘》纯粹选录戏曲散出的文本形态绳衡其他曲选，会发现明清时期很多曲选都越出了《缀白裘》的“示例”边界，故而需要回到各种类型选本来做具体的讨论。

第一类是剧曲与散曲合刻选本。在明中晚期及清初，社会各阶层参与戏曲活动越来越活跃，书商瞄准这一群体对曲选阅读的需求，制作了多种散曲、剧曲合刻的选本，从而较好地兼顾案头阅读、娱乐清唱、熟悉戏词的多重需求。比如正德、嘉靖年间编选的《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皆是散曲、剧曲兼收，表现出规范曲唱、整备正声的编辑意图。从内容上看，这 3 部书具有选录曲词的选本性

<sup>①</sup> 原文刊载《小说月报》第 14 卷第 4 号，1923 年 1 月，收入郑振铎：《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508-509 页。

<sup>②</sup> 原文刊载《小说月报》第 17 卷号外，1927 年 6 月，收入郑振铎：《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 510 页。

<sup>③</sup> [日]青木正儿：《支那近世戏曲史》，京都弘文堂 1930 年 4 月日文版，第 887 页。

<sup>④</sup> 原文刊载《东方学报》(京都)第 12 册第 4 分，昭和十七年(1942)1 月。此文收入《白川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66-188 页。

<sup>⑤</sup> 原文刊载《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第 2 期，1943 年 1 月，收入《白川集》，第 151-165 页。

<sup>⑥</sup> 叶德均(1911—1956)，此文应作于上世纪 50 年代前期，后收入氏著《戏曲小说丛考》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58 页、第 372 页。

<sup>⑦</sup> 王古鲁辑录：《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年，第 1 页。

<sup>⑧</sup> [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古鲁译著，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年，第 722 页。

<sup>⑨</sup> 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第 9 章第 4 节，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1032 页。

<sup>⑩</sup> 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2-3 页。

质；从编纂意图和功能而言，又具备曲谱的性质。郑振铎将《雍熙乐府》看作曲律（或词律）一类的书，而非戏曲选本；而明清时期时人也有将这3部书视为曲集（曲选），如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子部第十“乐府家”下的“散词”类，收录有二十卷和十三卷两个版本的《雍熙乐府》，与十五部散曲集同列，<sup>①</sup>显示祁理孙将《雍熙乐府》视为散曲集。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在书末设“词曲”科，将《盛世新声》《词林摘艳》与《改定元贤传奇》《元曲选》《啸余谱》以及多种散曲集放置一起，表明黄氏将《盛世新声》《词林摘艳》定位为“曲集”。由此看来，将此3部曲籍判定为曲选（或戏曲选本）既符合它们的文本特征，也与明清文人的判断基本吻合。

第二类是具有曲谱特征的选本，如《吴歛萃雅》《词林逸响》《南音三籁》。以明末凌濛初选辑的《南音三籁》为例，就有戏曲选本与曲谱两种不同的归类法，如清人祁理孙藏编《奕庆藏书楼书目》子部第十“乐府家”下的“评谱”类，收录有《南音三籁》。<sup>②</sup>所谓“评谱”，即指词曲评论和词谱曲谱。显然，《南音三籁》被祁理孙视为曲谱。钱曾《钱遵王藏书目》亦将《南音三籁》归于“曲谱类”，<sup>③</sup>至民初，王国维《曲录》卷六“杂剧传奇总集部”也将此书收入“曲谱部”。<sup>④</sup>不过，任半塘对王国维将《南音三籁》定性为曲谱持不同意见，认为此书“疑为南曲选本，而非曲谱”。<sup>⑤</sup>俞为民基于凌濛初为文人曲家清唱之备而做了考订曲牌、句式、平仄、衬字、韵位等工作，将《南音三籁》及其同类书界定为“选本型曲谱”。<sup>⑥</sup>“选本型曲谱”一词的提出，似乎有调和“曲选说”与“曲谱说”的意味，但细绎其重心仍是曲谱。相较于《南曲全谱》《南曲九宫正始》等文字谱以只曲为单位编选不同，《南音三籁》以套曲为单位，而且在每个套曲前注明其“品级”（天、地、人三籁），并附以批语，校正格律或品评曲词，也具有选曲精良、分类品评的选本功能，故将其视为兼具曲谱特征的选本亦无不可。

第三类是剧曲散出与杂类知识合刻的分栏选本。比较典型的有：（1）戏曲与小说合刻，如明末《听秋轩精选万锦娇丽》；（2）戏曲与诗词曲等文类合刻，如清顺治四年（1647）序刻本《来凤馆精选古今传奇》（又名《最娱情》）；（3）戏曲与江湖知识合刻，如万历年间福建建阳刊刻的《词林一枝》《大明天下春》等三栏曲选。对于合刻多种知识的通俗书籍，一些书籍史或文化史学者将之定性为文学杂集、<sup>⑦</sup>戏曲杂书、<sup>⑧</sup>杂志型戏曲选本<sup>⑨</sup>或“复合型选本”。<sup>⑩</sup>然而在笔者看来，以主栏知识的内容和类型将“这类书籍定性为戏曲选本，显然是最符合这些书籍实际情况的”。<sup>⑪</sup>

第四类是全本戏的汇集本，比如《元曲选》，究竟是选集还是全集？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曲选》距离书籍生成的时代越来越远，由于其庞大的体量对作品的保存起到很好的作用，这时“选集”会起到“全

<sup>①</sup> [清]祁理孙藏编：《奕庆藏书楼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明清卷》第14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09页。

<sup>②</sup> [清]祁理孙藏编：《奕庆藏书楼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明清卷》第14册，第285页。

<sup>③</sup> [清]钱曾撰，瞿凤起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

<sup>④</sup> 吴平、回达强主编：《历代戏曲目录丛刊》影印清宣统元年番禹沈氏刊本第4册，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第2189页。

<sup>⑤</sup> 《国闻周报》4卷第11期，1927年，收入吴平、回达强主编：《历代戏曲目录丛刊》影印清宣统元年番禹沈氏刊本第4册，第2331页。

<sup>⑥</sup> 俞为民：《明代选本型曲谱考述》，《戏曲学报》（台湾）第6期，2009年12月；《论〈南音三籁〉的性质与曲学成就》，《艺术百家》2010年第1期。

<sup>⑦</sup> [美]商伟：《〈金瓶梅词话〉与晚明商业印刷文化》，陈毓飞译，载乐黛云等主编：《跨文化对话》第33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96页。

<sup>⑧</sup> 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2页。

<sup>⑨</sup> 王辉：《明代中后期福建建阳刊杂志型戏曲选本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0页。

<sup>⑩</sup> 黄婉仪在考察明刻《缀白裘三集》时，针对此选本剧曲、散曲兼收的情况，提出“复合型选本”的概念，参见氏著：《洞庭萧士编〈缀白裘三集〉考论》，《戏曲研究》第105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第185页。

<sup>⑪</sup> 参见陈志勇：《士商便览、旅行类书与晚明刊刻曲选的读者定位——书籍史视域下闽刻戏曲选本考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集”的作用，其书籍性质也随之发生改变，故徐朔方称其是“选本兼全集”，<sup>①</sup>王毅也认为《元曲选》是“选本兼全集本”。<sup>②</sup>但从成书的形态而言，《元曲选》具有鲜明的“选”特征，臧懋循在序言中提道：“予家藏杂剧多祕本，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釐成十集。”<sup>③</sup>可见此书是他从数量庞大的元剧中“选”出来的百种曲，故此笔者更倾向于将《元曲选》《六十种曲》等视为戏曲选本。

综上，笔者认为衡量文本是否归属“戏曲选本”的研究领域时，需要考虑编纂者的主观编选意图、文本性质的定位以及文本特征、用途功能等。具体而言，戏曲选本或可分为以下六类：一是杂剧、传奇的整剧选本，如《元曲选》《六十种曲》等。二是纯粹的戏曲散出选本，如《乐府红珊》《缀白裘》等。三是戏曲和散曲兼收的选本，如《雍熙乐府》《词林白雪》等。四是以清唱为用途的曲谱型选本，如《南音三籁》《吴歈萃雅》等。五是以散出为主，兼及笑话、时曲、俗调甚至小说的选本，如《词林一枝》《大明天下春》等。六是晚清时期产生的大量的京剧和其他地方戏“小全本”的剧本集。

## 二、“戏曲选本”百年学术史的梳理与检讨

若将20世纪20年代郑振铎在《中国的戏曲集》(1923)、《中国戏曲的选本》(1927)中分别提出“戏曲集”“戏曲选本”概念并介绍这类书籍视为开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戏曲选本”研究已历百年。

戏曲选本研究是从文献的访求、介绍与影印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初，傅芸子在日本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和静嘉堂文库发现《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等7种选本并撰文介绍，<sup>④</sup>让中日两国学者对这批东渡日本的明代曲选有了初步的认识。50年代，傅惜华在撰写《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时，于“引用书籍解题”中罗列了30种戏曲选本。<sup>⑤</sup>这份书单截至当时是最全的关于戏曲选本的目录，其中不乏傅氏私人藏书。随着学术条件的改善，戏曲选本的研究向纵深推进，更多的孤本曲集被发现和影印。1980年，中华书局配补影印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所藏明代胡文焕所编《群音类选》；1984—1987年间，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影印海内外孤本戏曲选本23种，是目前学界利用最广的戏曲选本丛书。1992年台湾南天书局影印出版了龙彼得在欧洲发现的三种闽南弦管选本《满天春》《钰妍锦丽》和《百花赛锦》，次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发现的《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和《大明天下春》。随着学术的进步和对外学术交流的便利，近年来学者通过国内外藏书机构的访书，又发现了一些新的戏曲选本或新的版本，如郭英德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曲选》《词珍雅调》《万锦清音》<sup>⑥</sup>的介绍，汪超宏关于韩国檀国大学栗谷纪念图书馆藏《词林落霞》<sup>⑦</sup>的考论。此外，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长泽文库”所藏《海内曲魁》，<sup>⑧</sup>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所藏明代曲选《万锦徽音》，<sup>⑨</sup>也被重新发现。

戏曲选本的著录(或叙录)、整理(点校、笺注)以及版本形态、编纂方式、内容的考察，也是近年学界关注的热点。整体研究如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2004)，从源流论、文本论、思想论、文献论四个层面对明清戏曲选本做了较为宏观的研究。<sup>⑩</sup>个案研究则有以下重要成果值得提及：王钢、王永宽将《盛世新声》的著作权赋予明正德间教坊司奉銮臧贤，<sup>⑪</sup>李舜华在专著《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

① 徐朔方：《元曲选家臧懋循》，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② 王毅：《试析明代臧懋循的出版经营思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4期。

③ [明]臧懋循编，隋树森补编：《元曲选(附外编)》，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2页。

④ 原文刊载《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第2期，1943年1月。此文收入《白川集》，第151—165页。

⑤ 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36—543页。

⑥ 郭英德：《稀见明代戏曲选本三种叙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⑦ 汪超宏：《韩国藏戏曲选本〈词林落霞〉考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⑧ 李家桥：《长泽文库藏晚明戏曲选集〈海内曲魁〉之初考》，载《第三届戏曲与俗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2019年8月。林杰祥：《关西大学藏孤本曲选〈海内曲魁〉考》，《文化遗产》2021年第3期。

⑨ 徐巧越：《英国人对中国戏剧的认知与接受(1400—1799)》，《文化遗产》2022年第4期。此文之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王一卜博士2015年9月在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Annual Conference(英国汉学年会)，发表《苏格兰国图藏孤本明刊戏曲选集〈万锦徽音〉研究》的论文。

⑩ 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⑪ 王钢、王永宽：《〈盛世新声〉与臧贤——附说〈雍熙乐府〉与郭勋》，《文学遗产》1991年第4期。

(2006)、<sup>①</sup>韦强《明代嘉靖时期戏曲选本研究》(2021)重点考察了《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三家曲选的性质、所录戏文的特点、散曲剧曲与弦索弹唱的关系等问题。孙崇涛则花费数年,对藏于西班牙圣·劳伦佐皇家图书馆的《风月锦囊》逐剧逐篇予以考索并揭示其文献价值,后汇成《风月锦囊考释》(2000)出版,<sup>②</sup>此是迄今为止对《风月锦囊》最为详细之研究专书。明清时期,苏州、杭州、南京、建阳是戏曲选本的重要出版地,赵继红针对《乐府红珊瑚》发现过程、编选观念、选本性质、分类思想和文献价值做系统研究,<sup>③</sup>陈志勇则细致探究《群音类选》及闽刻10余种曲选的编刻形态。<sup>④</sup>此外,日本学者根山徹就《缀白裘合选》发表了系列论文,<sup>⑤</sup>台湾学者黄婉仪系统梳理乾隆间钱德苍编选的《缀白裘》的版本系谱。<sup>⑥</sup>咸丰、同治年间姚燮编选的《复庄今乐府选》则是清代另一部体量庞大的戏曲选本,吴敢、徐永明、罗旭舟、陈妙丹等学者都作了细致研究,<sup>⑦</sup>彰显此书的文献价值与选本史意义。

戏曲选本与戏曲史的研究关系密切,刘建欣的博士论文专题讨论了明清戏曲选本中独具特色的“宗元”思想及其对选本编纂产生的影响。<sup>⑧</sup>侯淑娟从戏曲选本出发,探究《五桂记》《咬脐记》《金丸记》等剧本的演变脉络,阐释民间演剧对文本流变的意义。<sup>⑨</sup>另外,一些历史或文化学者以自身知识体系建构的新角度探讨明清戏曲选本的文化意蕴,如黄小荣以晚明闽刻戏曲选本作为史料,探讨选本中的个人知识演变为公共知识的路径和机制;<sup>⑩</sup>何予明考察了晚明闽刻戏曲选本独特的文本形态、知识涵容及与书坊主、舞台、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认为戏曲选本的编刻者“将页面转为雕版印刷、文本、表演文化交互作用的动态场所”,从而创造了一个“阅读的剧场”。<sup>⑪</sup>这是带有西方书籍史、新文化史等理论视野探索戏曲选本的新成果。

综观近百年来明代戏曲选本研究成果,海内外所藏曲选近年虽有零星的新发现,但整体增量不大;选本的本体研究较为充分,尤其在版本、编者、体例、剧目、辑佚等问题探讨深入。研究者试图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来观照明清戏曲选本,揭示其与戏曲进程、地方声腔、南北曲交融、地域文化的互动关系,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

### 三、“戏曲选本”的跨学科研究与方法论思考

百年来的戏曲选本研究虽成果丰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现有研究多将明清戏曲选本视为材料库(或文本库),版本与文本研究方面的成果较多,但目前曲选的家底仍然不清,版本普查和叙录的专著阙如。在具体研究层面,微观个案分析较多,对明代戏曲选本进行“中观”层次探讨和理论反思则相对不足。研究视角亦显单一,主要聚焦于精英阶层的接受和文人传奇,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选本所涵摄的民间戏曲存在形态与演化轨迹,曲选文献的学术价值未被充分彰显。总体而言,研究观念、视野与方法基本局限

① 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11-351页。

② 详参孙崇涛:《风月锦囊考释》第8章《锦本的来龙去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65-272页。

③ 赵继红:《明万历〈乐府红珊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④ 陈志勇:《曲种分类法、小字注释与胡文焕的选本制作——基于晚明曲选〈群音类选〉的考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⑤ [日]根山徹:《明末清初戏曲选本之纂辑——关于明刻清康熙间重修本〈缀白裘合选〉》,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编:《中国文学论集》第25号,1996年;《陈氏继志斋与〈缀白裘合选〉》,山口大学文学会编:《山口大学文学会志》第49卷(人文学部创立二十周年纪念特集号),1999年。

⑥ 黄婉仪:《钱德苍编〈缀白裘〉与翻刻、改辑本系谱析论》,《戏曲研究》第89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

⑦ 吴敢:《〈今乐府选〉叙考》,《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徐永明:《姚燮与〈复庄今乐府选〉》,《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张晓兰:《新发现〈复庄今乐府选〉抄本考略》,《戏曲艺术》2016年第2期;罗旭舟:《〈复庄今乐府选〉存本新考》,《戏曲艺术》2016年第3期。

⑧ 刘建欣:《明清戏曲选本“宗元”研究》,黑龙江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⑨ 侯淑娟:《晚明戏曲选集对〈五桂记〉及窦仪故事的辑存》,《东吴中文学报》2015年总第30期;《〈咬脐记〉的选辑及其所反映的问题和现象》,《东吴中文学报》2016年总第32期;《元明杂剧〈抱妆盒〉对明代新南戏〈金丸记〉流传的影响》,《东吴中文学报》2017年总第34期。

⑩ 黄小荣:《明清民间公共知识体系、传播方式与自身建构——以明清曲本为材料》,《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⑪ 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第163页。

于传统的戏曲史观，对曲选的辑选、编纂、刻印与读者接受、社会风尚、剧坛变迁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所关联的历史语境及意义未能得到应有的揭示。前瞻戏曲选本的研究，或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

一是以选本的文献学研究为基础，深入考察不同版本的文本变化及内在逻辑。首要任务是摸清戏曲选本的家底，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访求稀见文本。在此基础上，亟需对同名选本的不同版本展开系统调查与精细比勘。如《新镌歌林拾翠》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浙图孤山分馆等藏本各异，且与《善本戏曲丛刊》所影印的《初镌歌林拾翠》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书。《醉怡情》《乐府争奇》《乐府遴奇》也存在多种同中有异的版本。对不同版本进行对比和梳理，比较其异文和编纂方式的差异，可揭示同一部书在不同时期针对读者需求和剧坛趣尚变化所做的改动，如钱编《缀白裘》面世后，出现了大量改辑、翻刻本，包括鸿文堂、学耕堂、四教堂、集古堂、五柳居等，它们与金阊宝仁堂原刻本的六集、八集、十集、十二集合订本构成了庞大的《缀白裘》改辑版本系统。<sup>①</sup>故而，将《缀白裘》内、外两个版本系统都调查清楚并准确叙录，为学界提供完备的文献信息谱系，也是戏曲选本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在“摸清家底”基础上，展开扎实、可靠、深入的个案研究仍然大有可为。事实上，明清戏曲选本还有很多文本都没有研究者涉足，如《词林白雪》是万历间窦彦斌编纂的一部包含散曲和戏曲的复合型曲选，显现出徽派曲选的独特风格，类似的情况还有《乐府大明春》《乐府玉树英》《醉怡情》《万锦娇丽》等，目前尚无研究者对其进行细致的研究。

二是以书籍史和文本社会学为视角，深化戏曲选本的个案研究。书籍史是近几十年来兴起于欧洲的交叉学科。20世纪50年代末由法国年鉴学派学者吕西安·费弗尔、亨利·让·马丁等提出书籍史理论，他们跨越目录学的畛域，以书籍为中心，更加关注书籍生产与读者接受之间、书籍与社会系统之间、文类体系和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sup>②</sup>在书籍史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西方一些学者如奥地利学者皮埃尔·V·齐马、新西兰学者麦肯锡等进一步提出“文本社会学”(Sociology of texts)，不仅探究书籍的物质形式及其生产、接受的形态，而且探讨书籍“形式”的社会意义，拓宽了书籍史的研究范围。<sup>③</sup>在书籍史视域的引导下，研究者将戏曲选本视为“流动的”社会性文本，关注其构思、制作、修订、流通、接受等各个环节，探索选本编刻与戏曲传播接受的深层联系，考察戏曲选本与演剧史的关系，揭示选本承载和传递的社会意涵。正是基于这一视角和理念，研究者可将每一部戏曲选本都视为特殊的“书籍”，通过探究书商策略与读者实践，揭示其在明代社会系统与士庶生活中的功能与意义，开辟戏曲研究新径。书籍史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1) 考察选本的物理形制。包括书籍的排版(书廓宽高、行距字距、空余版面多寡等)，字体(楷体、宋体还是匠体)，纸墨的质量等，籍此研判这部选本的书籍性质、功用目标、书籍价格及其预期读者的文化程度与社会地位，为深入文本研究奠基。(2) 研判选本的读者人群。结合文本细读，考察编者与书坊的编纂策略、出版意图，再结合书籍“物质形制”的考察来研判戏曲选本的阅读人群。如《月露音》按照庄骚愤乐四集，录曲弃白，突出曲牌名，配有精美的插图，其书当为文人清玩娱曲所备。《大明春》以戏曲的散出为中心编排，曲白皆备，并在中栏刻入大量各类江湖知识，封面插图绘有生活场景，此选本当是为士商人群提供曲类及旅行知识的特殊类书。(3) 描述选本的阅读史。关注选本在消费人群中流转、阅读与接受过程，重点考察读者阶层(读者比购买者、收藏者的范围更大)、阅读心态和消费方式，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读者群体的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建构读者行为与选本编纂、生产、传播及文本内容共同作用的意义系统。此层面融合了阅读史、书籍文化史和文本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比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成书的臧懋循编刻的《元曲选》，面世之后就成为明人阅读、追摹元

① 黄婉仪：《钱德苍编〈缀白裘〉与翻刻、改辑本系谱析论》，《戏曲研究》第89辑，第1-47页。

② 参阅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

③ 李明杰、李瑞龙：《物质形态与文本意义：麦肯锡文本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述评》，《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年第4期。

杂剧的首选文本，甚至在晚明激荡起一股编刻元明杂剧选集的风潮，沈泰、冯梦龙、卓人月、祁彪佳都有意愿或付诸行动。如何在描述其读者接受史的基础上重估《元曲选》的功过得失，也是选本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面向。鉴此，发掘戏曲选本传播接受的相关史料，清晰描述它们的阅读史，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书籍史视角的最大价值在于：能更贴近地把握选本的编刻形态与文本个性，并对物理形制、编纂意图、书籍性质、读者群体、流通反馈等细节进行延展性探讨，如同对每部选本进行“全身扫描”，为宏观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运用社会学视野考察戏曲选本。将戏曲选本的创作、编刻、流通和接受视为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中的一种事象，充满着丰富的文化含义，能极大拓展戏曲选本的研究边界和文本内涵。由于明清戏曲选本内容与形态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呼唤以“跨学科”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开拓新方向、新领域。其一，戏曲选本作为特殊文献，既关联全本与其他选本，又与剧本文学、舞台表演密切相关；同时涉及读者、观众、出版市场、书商等多方。明代中晚期印刷出版业的高度繁荣，南京、建阳、苏州、杭州等地的书商都涉足戏曲书籍市场，为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更丰厚的商业利润，在选本的制作环节追新逐异，创造出别具一格的书籍样貌。于此，戏曲选本文献不仅仅是戏曲史学者关注的对象，也是历史文献、书籍出版史、文化社会史读者感兴趣的领域。其二，鉴于选本特殊的书籍性质、文本形态与读者群体，需在文献学基础上，融合书籍史、文本社会学、阅读史、出版史等理论方法，将“选本现象”的研究置于戏曲演进史、文献文化史、城市娱乐史乃至书籍管控视野下综合考察，揭示每一个选本生成、流通与消费（阅读）的特殊历史语境。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乾隆四十一年（1776）宝仁堂编刻《缀白裘新集合编》卷首的《识语》提及规避违碍字句的问题：“今本堂细加校订，凡原本曲文宾白内，偶有字样违碍者，悉皆删去。”<sup>①</sup>台湾学者黄婉仪也注意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教堂镌刊《重订缀白裘全编》，经过调整剧目、修改违碍语、变更目录题名、留空格等做法，规避清廷对民间流通曲本的审查。<sup>②</sup>此类文本与版式改动，清晰映射了选本与文化政策的互动关系。

概言之，作为一种“社会性文本”，戏曲选本蕴含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涵，启示我们以戏曲史、书籍史、阅读史、图像学、表演艺术学、文本社会学的多重视野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推动该领域研究迈向新高度。

#### 四、“戏曲选本”研究的几点反思

明清时期戏曲选本编选与刊刻高度繁荣，现存120余种，总字数逾千万。这一体量庞大的文献宝库，为古代戏曲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原始文献。面对这个文献宝库和研究现状，笔者提出几点思考。

首先，从“还原”与“重构”两个角度，理析“戏曲选本”的概念，明晰“戏曲选本”研究的边界。人类对知识的追求与讨论都始于概念，概念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基本工具和出发点，无论是研究对象的边界的划定，还是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的采用，甚至是成果的表达和学者间的交流，都要借助于概念。对于“戏曲选本”的研究，同样需要对此概念进行界定和分类。由于不同的立场和知识结构，学者对“戏曲选本”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产生分歧，导致在实际的学术实践和成果表达上存在较大困惑。在笔者看来，对“戏曲选本”做学术意义上的概念界定，离不开“还原”与“重构”二途。

明清时期并无“戏曲选本”这个概念，几乎每一部存世的戏曲选本在书籍性质和形态上，都与今人理解的“戏曲选本”存在或多或少的偏差，故而需要追溯和“还原”明清时期制作、流通和消费的历史语境，从戏曲选本的生成与“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新审视其性质、价值及边界。于此，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扩大视野和调整焦点，跳出“戏曲选本”概念的樊篱，从内容与形态来判定书籍的性质、选本功能和读者定位，根据历史语境将它们视为“歌册曲库”（如《词珍雅调》），或是江湖知识读本（如《词林一枝》），或是通俗读物（如《最娱情》）。另一方面，基于当下学术规范表达的需要，又需对“戏曲选

① 郭英德、李志远纂笺：《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10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4780页。

② 黄婉仪：《钱德苍编〈缀白裘〉与翻刻、改辑本系谱析论》，《戏曲研究》第89辑，第31-34页。

本”的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构”与“再建”，赋予研究对象清晰的身份属性与外延边界，以此获得戏曲选本这个研究领域的“整体性”视野，使相关研究落到实处、着眼宏观。“还原”与“重构”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辨析概念与追溯观念的学术起点。

其次，中观与宏观研究是推动戏曲选本向学术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中观研究”是分时段、出版地、编者阶层、读者阶层等维度，对戏曲选本做更大范围的研究，目的是寻绎某一“类型”文本群的时代特征、地域特色和文化圈层的共同特点。比如，就地域而言，将晚明时期江南地区（苏州、杭州、南京、徽州、湖州）等城市商业出版的戏曲选本视为整体，考察其书籍形态、编刻策略、戏曲潮流等共通性，可深化理解其在剧坛变革中的作用。同样，若将万历年间福建建阳书坊编刻的戏曲选本作为研究对象，可揭示社会中下阶层读者群体的壮大对戏曲类书籍的巨大消费需求，从而反观晚明时期戏曲的繁荣不仅包括大量上层文人参与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也包括大众读者对“戏曲蛋糕”的膨大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中观研究既要把握某一类型戏曲选本的共性，也要充分关注每一个选本的个性；既要考察历时变迁，也需分析地域差异。在彰显个性的基础上归纳共同特征和演进规律，选本在“长时段”里的独特意义才会较为贴近地被揭示出来。而宏观研究尤其是理论总结，是当下戏曲选本研究最为缺乏的。这固然与“戏曲选本”研究对象的游移有一定关系，但更源于个案与中观研究成果的积累尚不充分。因此，宏观研究要与精细个案、深入中观考察相结合，通过明确的理论指向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以达成从文献到文学（戏曲）本体，再到文化史逐层推进的研究理路。

再次，以多重视野，重衡戏曲选本的戏曲史、文化史意义。戏曲选本作为剧坛演出的“晴雨表”，真实反映出戏曲观演的实况和戏曲的舞台生命力，是明清剧坛变迁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存世文献中可以看到戏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发展的更多面向。（1）从表演的角度切入戏曲选本的研究，意味着将戏曲视为一种“活态”的艺术品类。一方面戏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曲无定本”，研究应重视文本的改编、流动与变异性。另一方面，戏曲选本中的某些散出也可为当下戏曲表演艺术提供重要参考。比如，清乾隆年间钱德苍所编《缀白裘》，共收当时流行的《牡丹亭》舞台演出本十二出，囊括其精华。《惊梦》演杜丽娘在梦境中与柳梦梅共赴巫山云雨，清代《缀白裘》据此发展出“堆花”，让十二花神在台上表演舞蹈，起到美化舞台艺术、展示高超技艺的良好效果。这是历代艺人不断探索舞台创作与搬演规律的产物，体现出卓绝的艺术创新性。（2）戏曲选本的编刻、流通和阅读，是戏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本比对和异文分析，可提炼有价值的戏曲史命题，比如选本与全本、选本与清唱、选本与折子戏、选本与声腔是什么关系？戏曲选本是戏曲潮流的折射，明清剧坛的变迁如何在各种戏曲选本中得到体现？戏曲选本联系着众多的戏曲要素（剧作家、全本戏、书坊主、读者、伶人），那么，选本又对明清剧坛的发展有何反作用力呢？这些学术命题都值得深入探讨。（3）明清戏曲选本多为面向社会中下层的通俗读物，很大程度反映出民间戏曲传播与接受的样貌，因此在不偏废对文人曲选关注的同时，应更多关注坊刻曲选的流通、中下层读者的消费以及民间南戏的存在状态，以“向下一路”的新视域描绘民间戏曲活动的立体图景，揭示民间戏曲消费对戏曲史的独特意义。

华康德说：“一种真正新颖的思维方式，即生成性的思维方式，其标志之一就是它不仅能超越它最初被公之于世时受各种因素限定的学术情境和经验领域，从而产生颇有创见的命题，而且还在乎它能反思自身，甚至能跳出自身来反思自身。”<sup>①</sup>当下戏曲选本研究相对冷清的局面固然有视野、观念、方法的局限，但更需要研究者秉持这种“跳出自身反思自身”的思维与学术勇气，方能开辟新境。

责任编辑：刘青

① [美]华德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前言”，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 Main Abstracts

### **The Empower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Wu Yulin and Li Jinxia 8*

The theory of productivity is the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combined the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major proposition of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holds that productivity is the decisive for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ystems and governance. In the new historical era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lay an important empoweri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olidifie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t not only p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by empowering the functional coordin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ubjects, the overall grasp of social governance objects, and the intelligence of social governance platforms, but also provides new practical paths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empowering new governance ideas in the era, empowering new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society, and empowering new governance methods for the government.

### **Holistic Collaboration: Policy Analysis and Governance Restructuring of Generic Drug Substitution in China**

*Hu Yinglian and Chen Ye 58*

Generic drug substitution is a critical intersection of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nd Great Power of Quality. Despite incentives from vast pharmaceutical market and stringent regulatory constraints, China still faces persistent quality risks with generic drugs. To address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generic drug substitution policies and analyze the root causes of issue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1) China's generic drug substitution policies have established a 'strong regulation-strong incentive' framework, achieving policy objectives such as drug safety, efficacy and affordability, as well as pharmaceuti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varying degrees. (2) However, there exist contradictions between generic drug substitution policies and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drug governance models, particularly i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dynamics of the health system, regulatory frameworks and capabilities, and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which weaken or distort the effects of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Policy discussions without considering governance does not align with China's realities. Based on holistic 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s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of health system, a 'holistic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model for generic drug substitution is proposed. Recommendations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policy effectiveness of generic drug substitution are followed, including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rough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policies, combination of generic drug consistency evaluation and post-market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improvement of social co-governance network for drug safety.

### **Revisiting the Employment of Older Workers**

#### **—A Literature Review Based on Dual Perspectives of Labor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Ye Chusheng, Han Ruiyi and Shen Minmin 82*

Under the accelerating wave of global aging, the employment of older workers has evolved from an individual choice to a national strategic priorit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research progress on older workers force participation through dual perspectives of labor markets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revealing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perceptions and the potential for paradigm shifts. Critical reflection on existing literature demonstrates that old and youth employment do not constitute a "zero-sum game", with significant intergenerational sectoral segregation and complementary effects emerging. On the supply side, while older workers face dual constraints of physical capacity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medical advancements and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s effectively mitigate physiological disadvantages while elevating human capital

baselines. Age-friendly workplace adaptations coupled with social security incentives enable the conversion of older workers' experiential capital into productive advantages. Demand-side analysis confronts the paradox of job compatibility, misjudgments in age-productivity assessments, and controversies over intergenerational substitution elasticity, yet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fundamentally reconfigures labor supply-demand dynamic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isplaces low-skilled positions in the short term while generating new industries and professions through efficiency gains over time. Older workers' experiential advantages in cognition-intensive tasks, when synergized with AI capabilities, cultivate "experience-enhance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scenario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 older workers and young workers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respec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which can form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skill complementarit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rioritize quantifying experiential capital, identifying dividend-generating industries, and explor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pathways to unlock human capital dividends in aging societies.

### **"Oblivion and Resha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War Memory in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during World War II**

*Lei Juanli, He Xiaoyihan and Zhang Sigi* 109

As a strategic hub connecting the Asian and Pacific theaters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construction of war memory in the China-Burma-India (CBI) theater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United States' construction of memory in this theater presents a threefold dialectical dimens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official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policy texts shape the memory landscape of the theater through power discourse; at the social level, individual writings by war veterans, through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public dissemination, transform into collective memory; and at the academic level, scholars'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reinterpretation and significanc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ater's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memory of the CBI theater follows a clear chronological trajectory: in the immediate post-war period, the initial encoding of the theater's memory was completed amidst war trauma and order reconstruc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post-Cold War periods,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led to the systematic reshaping of this memory; and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has expanded the model of memory transmission to a 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the cross-racial and cross-cultural attributes of the theater's memory lead to its multiplicity; the dynamic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shapes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the memory; and the U.S. "Europe First, Asia Later" strategic resource allocation logic results in the long-standing marginalization of this theater's history in mainstream narratives. The dual fate of the CBI theater, being both "forgotten" and "reconstructed" essentially represents a microcosm of the politics of World War II memory, offering a unique case for deconstructing the narrative of single nation-states and reconstructing the global antifascist war history.

### **The Publication of Eho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ovels in the Context of "Jihon" Culture in Edo Japan?**

*Wu Xiaodan* 160

In the later period of Edo Japan, a large number of Ehon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published, forming a dissemination path of tuzokumono - Chinese novel craze - tuzokumono, Ehon - second Chinese novel craze - Ehon, and nishiki-e. Ehon was the product of "Jihon"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astward spread of Edo region culture. Their development over a hundred years was roughly divided by the turn of the 18<sup>th</sup> and 19<sup>th</sup> centuries, mainly presented in the forms of kusa-zohi and Yomihon.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publication and qualitative change of Ehon came from the Jihon's civilian readership. Basic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gave rise to readers, and the Edo later period's Yomihon influenced by vernacular long novels cultivated readers. Ehon were mainly compiled and disseminated by a circle composed of writers such as Santo Kyoden and Kyokutei Bakin, some ukiyo-e painters of the Kitao, Katsushika, and Utagawa schools, and publishers such as Tsuruya Kiemon and Kawachiya Mohei. School styles, regional cultures,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fluence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text and images in Ehon. Jihon culture background cannot be ignored when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 and image and text adaptation.